

CI WEI GE WEN JI

茨威格文集

高中甫 主编　5　传记卷·下

陕西人民出版社

茨威格文集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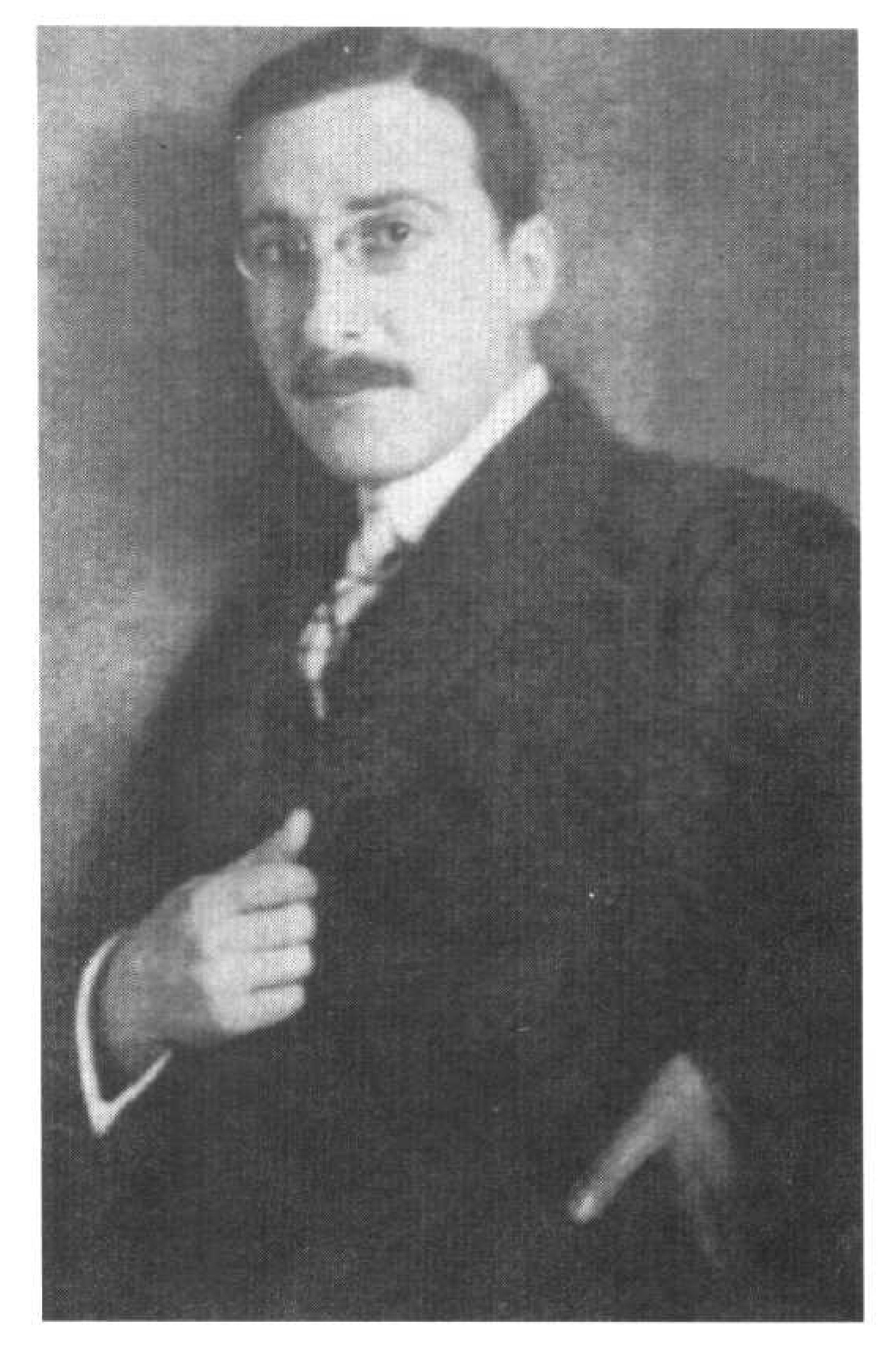
传记卷・下

高中甫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茨威格 1940年



1



2

3



1　茨威格，1939年1月。

2　1940 年10月出席巴西外交 部的一次招待会，与巴西外长马· 索阿莱斯交谈。

3　1940 年底摄于里约热内卢。

卷首语

这一卷收有茨威格的两部历史人物传记:《埃拉斯谟·封·鹿特丹》和《麦哲伦》。

在二三十年代，茨威格写了多部历史人物传记，但他在1934年完成的《埃拉斯谟·封·鹿特丹》——还应把他在随后于1936年写的《卡斯台里奥反对加尔文》算在内——却与他的其他一些传记不同，它是茨威格通过历史人物的描述对当前的政治事件的一种表态，是自己政治观点的一种曲折的然而却是明确的表述,如有的批评家称，是“一种遮掩起来的自我描述”。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2月法西斯制造了国会纵火案，5月10日在柏林，随即在德国各地发生了近代史上最丑恶的“焚书运动”，包括茨威格在内的进步作家、犹太种族出身的作家的作品、著作被付之一炬。就在此后数日，茨威格在5月

15 日致克劳斯·曼的信中称："我现在要做的，是对人道主义者，也是心灵的人道主义者埃拉斯谟的研究，他由于路德而遭到失败，就像今天的人道主义的法国人由于希特勒而遭到失败一样"，紧接着这句话他写道："我要通过类似的描述和以极高的公正性用一种特有的方式在这一人物身上去展示我们这种类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呢？1933 年 12 月 9 日，他在致赫·黑塞的信中做了阐释："我把埃拉斯谟·封·鹿特丹选来做为帮助我解脱困境的人，他是中间者，是理性的人，他同样处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磨盘石之中，就如我们处在今天的相对立的巨大运动之中一样。看到他，处境恶劣，当他以体面的方式面对困难的决定和抉择而遭受折磨时，看到他并不孤立，我感到是一种小小的安慰，他宁愿如此而不是贪图安逸，一下子就投靠到某一个党派那边去。"在这部他称之为是一本小的自由之书中，他颂扬了人道主义和精神自由，对思想统治、政治暴力和宗教狂热进行了批判和鞭笞，这无疑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的，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痛斥；但无可讳言，这部传记也暴露了茨威格思想上的弱点。他缺少锐敏的政治嗅觉，不能从更深的社会层次中去观察去分析。在截然对立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的斗争中，他不是去辨别是非，去弄清进步和反动，而是要去沟通，去中介，越是在一个狂热的时代越是要采取一种超党派的立场。在茨威格身上，对艺术的敏锐和对时代运动的观察上和思考上的迟钝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要补充的是，在随后的年代里，茨威格在自己的行动和作品中对自己的这种观点有了修正和感到悔误。

《麦哲伦》是茨威格在 1938 年完成的。

麦哲伦（1480—1521）是葡萄牙著名航海家，第一个环球

航行的人。对茨威格说来，麦哲伦的突出贡献不仅在于环球航行本身，更重要的是他的胆识和信念。作者在这一历史人物身上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善于承担历史使命，坚韧不拔的大智大勇的形象。赫尔曼·布洛赫在读了这部传记后，1938年1月2日致作者的信中写道:“天才的本质很少被把握得这样深刻和这样透彻，如您在《麦哲伦》中所成功做到的那样。

目录

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与悲哀

使命与人生的意义

我们无法否认，在十六世纪时曾经名声显赫、荣耀辉煌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如今只不过是一个称谓而已。他那些用已被遗忘的、超越国界的语言——研究古代文化的拉丁文撰写的、不可胜数的著作，正安安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睡大觉。在那些昔日世界闻名的著作中，几乎没有一部论著至今仍然余响不绝。就连他的个人形象也因为其难以捉摸、模棱两可和矛盾重重，同其他宗教改革家更为鲜明、更为激进的形象相比，显得黯然失色。关于他的私生活，没有什么趣闻可以奉告。一个默然不语、只知永无休止地工作之人很少给自己创造一种感性的生平。就像基石往往掩埋和隐藏在业已建好的楼房下面一样，甚至就连他真正的业绩也被掩埋和隐藏在现代意识之下了。因此要事先简明扼要地说一说是什么情况使这个伟

大的被遗忘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今天，而且恰恰是在今天，在我们眼中变得可敬。这种情况就是：在西方所有作家和著作家中，他是第一个有觉悟的欧洲人，是第一个好争论的和平之友，是人文主义、世俗与教会友好理想能言善辩的辩护人。此外，他在为争取以更加公正、更为人们所赞同的方式创造我们精神世界的斗争中，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他这种不幸的命运只能使我们对他怀有更加真诚的、兄弟般的感情。伊拉斯谟喜欢的许多东西我们都喜欢。他喜欢诗歌和哲学、书籍和艺术品、各种语言和各个民族，而且为了完成进一步提高道德水准的任务，他对整个人类都一视同仁。他只恨世界上的一样东西，并把它视为理性的对立面——狂热。甚至就连伊拉斯谟这个一切人中最不狂热之人，这个也许并非地位极其崇高、但学识极其渊博的英才，这颗虽然不是大慈大悲、却是正直友好的心，都把思想信念方面容不得任何异议的各种形式视为我们人世的传统恶习。按照他的信念，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一切纠纷几乎都可以不用暴力，通过相互迁就的办法来调解，因为所有的纠纷都置于人性的范围内。相对而言，差不多任何一种冲突都是可以解决的，那些围猎者和夸大其词者也并非时时刻刻都剑拔弩张。因此伊拉斯谟反对各种狂热，而不管它是宗教领域的，还是民族领域的，或者是世界观领域的狂热，他把这种狂热视为各种谅解的天生的和致命的破坏者。他憎恨一切顽固不化之人和思想片面之人，而不管他们身上穿的是僧侣的长袍还是教授的长袍。他憎恨那些闭视塞听的思想家和各个阶级和种族的狂热信徒，因为这些人要求处处都要盲目服从他们自己的意见，把任何一种不同观点都轻蔑地斥之为异端邪说或者流氓行为。正如他不希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一样，他也坚

决反对别人把任何一种宗教信条或者政治信条强加在他的头上。对他而言，思想上的独立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一个人不管是出现在布道坛上还是在讲台上，就像谈到上帝传给他、而且是悄悄传给他一个人的福音那样谈到自己个人的真理时，这位自由的英才在其中看到的往往就是世界上神圣的多样性的萎缩。因此他整个一生在一切领域都竭尽全力，用他那闪闪发光、令人信服的智慧，同自身疯狂的那些刚愎自用的狂热分子作斗争，只是在极其罕见的幸福时刻，他才嘲笑他们。在这些比较宽容的时刻，这种狭隘的狂热在他眼中只不过是精神上值得同情的头脑狭隘，是"愚蠢"的无数形式当中的一种形式罢了。他在其《愚人颂》中十分轻松愉快地给愚蠢的上千个变种和种类分门别类，并把它们画成漫画。他作为一个真正的、毫无偏见的正人君子，完全理解，甚至同情他的死敌。不过伊拉斯谟内心深处却始终清楚，人类天性的这种不可救药的精神，这种狂热将会毁掉他那宽容的世界和他的一生。

因为伊拉斯谟的使命和人生意义就是本着博爱的精神将各种对立面和谐地联合在一起，所以他天生就是一个做连接工作的，或者用与他在拒绝一切极端行为方面相似的歌德① 的话来说，是"一个做联络工作的人"。每一次巨大的变革，每一次"叛乱"，每一次令人沮丧的大规模争吵，在感情上都与他这个自以为是忠诚和文静的使者所要为之尽职尽责的世界理性明确的本质背道而驰。在他看来，特别是战争简直同进行道德思考的人类水火不容，因为战争是解决内部对立最粗暴、最强有力

①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

的形式。能够通过善意的理解来缓和冲突，澄清含糊不清的东西，理清混乱的事情，重新织进已经扯断的线，给与世隔绝者带来更为广泛的联系的这种世所罕见的本领，是他能忍耐的天赋的真正力量。他的同时代人都怀着感激的心情，干脆把这种经常起作用的谅解意志称为“伊拉斯谟学说”。这样一个人要为这个“伊拉斯谟学说”赢得全世界。因为他集进行创造的所有形式，集诗人、语言学家、神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所以他认为在整个宇宙空间有可能将甚至看似势不两立之物结合在一起。没有一个领域是他那斡旋的本领不能涉足的，或者感到陌生的。在伊拉斯谟看来，并不存在着耶稣与苏格拉底①、基督教教义与仿古智慧、虔诚与美德之间道德上的、无法消除的对立。他这个授有圣职的教士本着宽容的精神，把异教徒接纳到他神圣的天国之中，把他们友好地带到教父面前。同神学一样，哲学是他另外一个、而且也是同样纯粹的寻神形式。正像他以感激的心情仰望希腊的奥林匹斯山一样，他也怀着同情虔诚的感情仰望基督教的天国。他并不像加尔文②和其他宗教狂那样，把在感官方面充满喜悦之情的文艺复兴视为宗教改革的敌人，而是把它视为宗教改革更为自由的姐妹。他作为第一个有觉悟的世界主义者和欧洲人，并不定居于某一国度，而以四海为家，他不承认一个民族具有压倒其他民族的任何优势。因为他教育自己的心灵，要把各民族最高尚、最完美的英才，把他们的精英作为唯一的标准去评价这些民族，因此，他认为所有的民族都

①苏格拉底（Sokrates，前469—前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②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法国神学家，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

可爱。他把企图将一切国家、种族和阶级所有这些友好善良之士如今都召集到有教养者的巨大联盟之中这一崇高尝试，看作真正的人生目标，并把它作为己任。当他将拉丁文这种超越语言之上的语言提高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相互理解的语言时，他为了世界的继续存在，就给欧洲各个民族创造了一个超越民族的、统一的思维——表达方式。这真是一个令人永志不忘的举动！他那渊博的知识怀着感激之情回顾过去，他那虔诚的意识深信不疑地展望未来。但他却始终不渝地避开世界上的暴行，因为这种暴行愚蠢而又恶毒地怀着持续不断的敌意，一再谋求搞乱上帝的计划。只有高级领域，即造型的和创造的领域才友好地吸引着他。他把这视为每一个致力于扩展拓宽这一领域的有识之士的任务。这样一来，他有朝一日也许就可以像天光一样，一视同仁、完完全全地拥抱整个人类。伊拉斯谟及其门徒认为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来促使人类进步，希望通过更加广泛地普及文化教育、文字、研究和书籍，得到个人和整体的教育能力。这就是这种早期人文主义最虔诚的信仰（和美好的、悲剧性的谬误）。这些早期的理想主义者对于通过坚持不懈地培养学习和阅读习惯就可以获得使人的本性变得高贵的能力，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几乎是宗教般的信任感。伊拉斯谟作为一个迷信书本的学者，从来就没有怀疑过道德方面充分的可教性和可学性。他以为生活全盘和谐化的问题肯定会由于人类这种接近实现的人文主义化而迎刃而解。

这样一种崇高的梦想也许是很吸引人的，这就好比来自各国的一块强有力的磁铁可以吸引时代的精英那样。甚至这位从道德的角度来感知的人往往也会感到，如果没有令人欣慰的想法，没有扩展灵魂的空想，自身的存在就是微不足道的，空空

洞洞的。就是他作为单个的人，也会把自己的愿望和印象部分地附加到普遍提高世界道德水准中去。我们的现在只不过是通往更高一级完美无瑕的阶梯，只不过是为一种完美得多的人生历程所作的准备。谁善于认证企图通过一种新的理想来实现人类道德进步的这种希望的力量，谁就会成为他那一代人的领袖。伊拉斯谟就是如此。那个时机对于他那本着人道精神来统一欧洲的思想非常有利，因为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伟大发现和发明，文艺复兴对于科学和艺术的革新，早已重新成为整个欧洲的一种令人高兴的、一种超越民族的集体经历。西方世界在沉寂多年之后，第一次对于自己的使命又充满了信任感。最优秀的理想主义人士都从各个国家涌向人文主义。每一个人都希望成为这个王国的公民——世界公民。皇帝和教皇、王侯与教士、艺术家和政治家、少年与妇女都竞相学习艺术和科学。拉丁文成了他们的共同语言，成了精神方面最早的世界语：这是从罗马文明崩溃以来通过伊拉斯谟的学者共和国第一次——让我们赞美这种业绩吧！——重新形成共同的欧洲文化，第一次并非一个民族的虚荣，而是整个人类的福利成为一个亲如手足的理想主义团体的宗旨。有识之士希望在精神上结合起来，各种语言希望通过一种包括各种语言的语言来达到相互理解，各个民族希望在不分民族的情况下最终和平共处的这种要求，这种理性的胜利也是伊拉斯谟的胜利，是他那神圣的，但却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时机。

为什么这样一个纯洁的王国不能延续下去呢？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为什么就是那些崇高的、精神上相互理解的人文主义理想会一再成功？为什么“伊拉斯谟学说”在早就教人知道一切敌视都毫无意义的人类当中只有如此微不足道的实际

力量？很可惜，我们不得不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得不承认，从来就没有一种理想会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到心满意足，这种理想会仅仅考虑公共福利。在一般人当中，就连仇恨也在单纯的爱的力量之外，要求它那阴森森的权力，每个人的自私自利都希望从各种理想当中尽快地获取个人的好处。具体之物，明显之物往往比抽象之物更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因此在政治方面，每一个口号往往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追随者。这种口号所宣告的并不是理想，而是敌意，是一种针对另外一个阶级、另外一个种族、另外一种宗教的、唾手可得、便于使用的对立，因为狂热最容易燃烧起它那仇恨的罪恶火焰。与此相反，就像伊拉斯谟理想那样的一种仅仅是起连结作用的，一种超越民族的，一种泛人道的理想，对于总想要恶狠狠地盯着对手的年轻人来说，当然缺乏外观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而且决不会带来那种犹如壮观的异象般的强烈刺激。须知，这种异象每一次都在指出自己国界那边的和自己宗教团体之外的敌人。因此，那些把人们没完没了的不满情绪引到另一种风向的党派英才就比较容易得手，而人文主义，不给任何憎恨情绪留有余地的伊拉斯谟学说却勇敢地将自己能忍耐的努力都集中在一个遥远的、几乎看不见的目标上面了。只要它所梦见的民族，只要统一的欧洲国家尚未成为现实，这种学说就是，而且永远是一种精神高尚的理想。因此，这些未来人类相互理解的信徒既是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熟知人性的专家。他们绝不该不了解到，自己的事业总受到热情那永无休止的非理性的威胁，他们必须怀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意识到，时时刻刻都有一道汹涌澎湃的狂热洪流，从人类欲望世界的最底层汇聚起来，将一再漫过并冲决堤坝。几乎每代新人都要经历这样一番挫折。因此，内心毫不困

惑地经受住这种挫折，也就成了他们的道德任务。

但是，伊拉斯谟个人的悲剧就在于，恰恰是他这位所有人中很不狂热、极力反对狂热的人，恰恰是在超越民族的思想破天荒第一次在欧洲闪耀着胜利的光辉这一时刻，却被卷入了历史上最疯狂的群众性民族宗教激情的大发泄之中。一般说来，我们称之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那些事件，根本就说不上是生气勃勃的民族意识。甚至战争的惊涛骇浪在前几个世纪也只席卷个别部落，个别省区。总的看来，在社会与宗教大辩论中，有识之士能够置身于混战之外，能够对政治家的激情视而不见，漠然置之——歌德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他在拿破仑战争的喧嚣声中依然安安静静地忙于他的精神劳动。但是有时候，在若干世纪也极少出现具有会把整个世界像一块布似的撕成两个部分的这种风力的对立关系。这个巨大的裂口横穿每一个国度，每一个城市，每一座房子，每一个家庭，每一颗心。这样一来，群众滥用的威力便会以其巨大的压力从各个方面抓住个人，个人也无法自卫，在集体的疯狂中无力自拔。这样一种惊涛骇浪的猛烈撞击不允许有任何安全的避风港，有任何僻静的场所。一个社会问题、宗教问题以及任何一个精神——理论问题的猛烈摩擦，都会引起这样一些全面的世界性纠纷。不过对于狂热而言，不管它的火焰是用什么东西燃起的，其实都一样。它只需要燃烧，发出火焰，只需要释放它那聚集起来的仇恨的力量。恰恰在群众发狂这一恐怖时刻，战争的恶魔那不可抗拒的力量，会极其频繁地炸开理性的链条，无拘无束、兴高采烈地扑向世界。

在群众发狂和世界党派分裂这样的可怕时刻，单个人的意志无力自卫。有识之士想要拯救自己的愿望，却徒劳无益地陷入观察的那与世隔绝的范围内。时代迫使他卷入右派或者左派

的喧嚷之中，不是加入这一帮就是加入那一帮，不是赞成这一口号，就是赞成那一派别；在这样的时代，在数十万、数百万战士当中，没有人需要比那种不想屈从于聚众发狂、思想片面，而想走中间路线的人有更多的勇气，更大的力量，更多的道德上的坚定性了。就在这里，便开始了伊拉斯谟的悲剧。他作为德国第一个宗教改革家（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其他人更多的是革命家，而不是宗教改革家），试图按照理性的法则革新天主教；但是命运针对他这个有远见、有才智之人，针对这个进化论者，却派来了一个行动迅速果断的人——路德这位革命家，这位受到德国郁积的群众力量疯狂驱使的人。马丁博士那个农民的铁拳一下子就把伊拉斯谟那只高贵的、只握笔杆的手既胆怯、又温柔地去尽力结合的东西打得粉碎。有好几个世纪，基督教世界、欧洲世界分裂成相互对立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北方和南方，日耳曼人和罗马语族人。在这一时刻，对于德国人，对于西方人只有一种选择，一种决定：要么罗马教皇，要么路德；要么天主教会的赦罪权，要么四福音书。在当时的领袖人物中却只有伊拉斯谟一个人拒绝站在某一方。这就是他那值得纪念的行动。他既不站在教会一边，也不站在宗教改革家一边。他对于两者都心怀感激之情。他之所以感激福音新教教义，那是因为他出于信念，第一个要求和促进这种教义；他之所以感激天主教，那是因为他在天主教内捍卫摇摇欲坠的世界最后的精神统一形式。但是，右面是夸张，左面也是夸张；右面是狂热，左面也是狂热。不过这位一成不变的反狂热之人既不为这种夸张效劳，也不为那种夸张服务，而仅仅服务于他那永恒的尺度，服务于正义。为了从这种纷争之中救出全人类的财富，救出共同的文化财富，他作为调解人徒劳无益地站到中间位置，因

而也就站到了危险的位置。他试图用他那赤裸的双手将水与火混在一起，让一个狂热分子同另一个狂热分子握手言欢。这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因而也是双倍巨大的努力。开初，两个营垒里的人都不明白他的态度，因为他说话时语气温和，所以都抱有希望，以为可以把他争取过来。但一当他们双方明白这位自由自在之人并不尊重别的意见，也不为之发誓赌咒，而且也不想声援任何教义时，仇恨和嘲讽便从左、右两个方面劈头盖脸地落到他的头上。因为伊拉斯谟不愿意参加任何一派，所以他同两边都闹崩了，“归尔甫派说我是吉伯林派，吉伯林派认为我是归尔甫派”①。新教徒路德恶毒咒骂他的名字，天主教再一次将他所有的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但是没有一种威胁，也没有一种谩骂能够促使伊拉斯谟去参加这一派或者那一派；我不愿意屈从任何东西，也不想属于任何派别，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奉行自己这句格言，始终做一个独立的人。面对政治家、领袖和诱惑人们具有片面激情的引诱者，一个艺术家、一个按照伊拉斯谟的意愿行事的英才有义务成为理解者和调解者，成为有分寸、持中间立场的人。他不应站在任何阵线，而只能反对一切自由思想的共同敌人，反对各种狂热。他不能离开各种派别，因为同情一切具有人性的东西是艺术家的职责；而只能超越各种派别，超越各种混战，既同这种夸张，也同那种夸张进行斗争，还会遭到各种派别同样不幸的、荒唐的仇恨。

伊拉斯谟的同代人和后裔把伊拉斯谟这种态度，他这种举棋不定或者说得更恰当些是他不想决定，干脆称之为胆怯，嘲

①中世纪意大利两个敌对的政治派别。同情教廷的归尔甫派与同情德意志皇帝的吉伯林派的分裂，造成意大利各城市之间的长期斗争。

笑这个思前想后、犹豫不决的人优柔寡断、反复无常。事实上，伊拉斯谟并不像长在角落里的芦苇那样敞开胸怀面对世界，这种无所畏惧的英勇行为不是他的风格。他小心翼翼地弯向一边，而后便像芦苇一样彬彬有礼地左右摇摆。不过他这样做，仅仅只是为了不让自己被风吹折，以便随时直起身来。他有自己对于独立的信仰，有自己“决不屈从”的信条。他手里拿的好像并非引以自豪的圣体显示匣，而好像是藏在大衣下面的小偷用灯笼。在群众性疯狂发生最激烈的冲突时，他有时就蜷缩在避难的洞穴里，躲藏在隐蔽的小路上。不过，他却从当代仇恨的风暴中把自己的精神瑰宝，自己的人类信仰安然无恙地送回了家中——这一点最重要——斯宾诺莎①、莱辛②和伏尔泰③以及所有未来的欧洲人都可以用这个发出微光的灯心点燃他们的火炬。伊拉斯谟作为他那有才智的一代人中绝无仅有之人，对于整个人类的价值比起对于单个的氏族来，更为可贵。他远离战场，不属于任何一支军队，受到交战双方的攻击，孤独一人悄然而逝。他虽然孤独寂寞，但独立，自由。这一点是关键。

然而历史对于战败者并不公平。它不大喜欢有分寸的人、调解人、有人性的人。那些狂热分子、毫无节制的人、在精神与行为方面疯狂的冒险家是它的宠儿，因此它对这位沉默寡言的、人道的仆人近乎鄙夷不屑，视而不见。在宗教改革家的巨幅画像上面，伊拉斯谟居于次要地位。其他的人、所有那些对于自

①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哲学史上最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一的创建人。

②莱辛（Lessing，1729—1781），德国剧作家、戏剧和宗教评论家、美学家。

③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

己的天才和信仰着了迷的人，都戏剧性地摆脱不了自己的命运：胡斯①在熊熊烈焰中窒息而死，萨伏那洛拉②惨死在佛罗伦萨的火刑柱上，塞尔维特③被加尔文这个宗教狂推进火中。每个人都有自己悲惨的时刻：人们用烧红的钳子来折磨托马斯·闵采尔④，把约翰·诺克斯⑤钉在槽舰上作苦役。叉开双腿站在德意志土地上的路德对着皇帝和帝国大声嚷嚷“我只好这样”。人们把托马斯·莫尔⑥和约翰·费希尔⑦的头按到断头台的行刑砧上，茨温利⑧被带刺的棍棒打死，躺在卡佩勒的田野上。他们都是令人难忘的人物。他们用虔诚的愤怒进行自卫，在自己的苦难中感到极度兴奋，由于自己的命运变得伟大。在他们身后，宗教狂热那灾难性的大火烧向远处，农民战争中毁掉的城堡，被摧毁的城市，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期间被洗劫一空的田庄，这些恐怖的风景画都从坏的方面来为被各种宗教狂误解得走了样的耶稣基督作证。它们在上苍面前控告人世间互不相

①胡斯（Jan Hus，1372/1373—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被处火刑。

②萨伏那洛拉（Savonarola，1452—1494），意大利基督教宣教士、改革家和殉教士，被处绞刑与火刑。

③塞尔维特（Servetus，1511？—1553），西班牙医学家、神学家，被烧死。

④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约1490—1525），德国农民战争领袖、宗教改革家，农民起义失败后被俘处死。

⑤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约1514—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

⑥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1477—1535），英国人文主义者，反异端作品作家、政治家，被诬陷处死。

⑦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1469—1535），英国人文主义者，因反对国王被处死。

⑧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领袖，在第二次卡佩勒战役中任随军牧师，死于战场。

让的意愿的缺乏理智。但是在这种喧嚷声中，在宗教战争那些伟大的领导人身后，在离他们所有的人不远处，露出了伊拉斯谟那张高贵的、布满淡淡愁云的面孔。他没有站在刑讯柱旁，他的手里也没有拿着剑，没有可怕的风景画使他的脸变得难看。但是那只蓝光闪烁、含情脉脉的眼睛，那只在霍尔拜因① 的画中变得不朽的眼睛，透过群众激情的这种骚乱，看到我们这个同样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的脸上显露出泰然自若、听天由命的神情——啊，他到底了解人世上这永恒的愚蠢！——然而一丝轻松的、淡淡的、自信的笑容却浮现在他的嘴角。他这个有经验的人知道，所有的激情终有一天会感到困倦；这就是这些激情的意义。要掩饰自己，这就是各种狂热的命运。那种永恒的、寂然无声的、有耐心的理性，他能够等待，能够坚持。有时候，当别人大发雷霆时，他不得不默然不语，一声不吭。但是他的时代总会到来，而且往往还会再次到来。

①霍尔拜因（Hans Holbein，1497—1543），德国肖像画家和装饰艺术家。

时代的回顾

从十五世纪往十六世纪过渡是欧洲的一个关键时刻，它那戏剧性的紧凑，只有当代可以比较。欧洲的活动范围一下子就扩展到了全世界。一个发现接着一个发现，短短几年之间，新一代航海家后裔的大胆把过去几个世纪由于漠不关心或者胆小怕事所耽误的东西，全都追补回来了。数字好似在一只电子钟上跳跃：一四八六年，迪亚斯①作为第一个欧洲人航行到好望角；一四九二年，哥伦布②到达美洲群岛；一四九七年，塞巴斯蒂安·卡伯特③到达拉布拉多海岸，这样也就到了美

①迪亚斯（Bartolomeu Diaz，约1450—1500），葡萄牙航海家。

②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新大陆的发现者。

③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约1476—1557），英国航海家、探险家和制图学家。

洲大陆。当白色人种意识到一块新的大陆时，伽马① 已经离开桑给巴尔航行到卡利卡特，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海路；一五〇〇年卡布拉尔② 发现巴西；而最终，也就是从一五一九年到一五二二年，麦哲伦③ 作出了最值得纪念的、登峰造极的壮举，第一次环绕整个地球航行，从西班牙出发，又回到西班牙。与此同时，贝海姆④ 于一四九〇年制作的“马铃薯”，即第一个地球仪在刚出现时虽然遭到嘲笑，被说成是非基督教的假设和滑稽的东西，但人们却认识到它是正确的。这种极其勇敢的行为坚定了那种最为大胆的想法。有思维的人类迄今为止都隐隐约约、郁郁寡欢地在一个未知领域里穿过星空旋转着。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被称为未知领域的圆球，一夜之间变成了可以体验、可以经历的现实。海洋——一个迄今仍然在神话中不断汹涌着的蓝色荒野，一夜之间变成了业已跨越、可以测量的海洋，成了一个可以为人类服务的要素。欧洲人的勇气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如今在发现宇宙的疯狂竞赛中再也没有间歇、没有喘息的机会了。每当加的斯或者里斯本的大炮欢迎一艘远航归来的大橹舰时，好奇的人群都要涌向码头，去听听来自新发现国家的消息，去欣赏从未见到过的鸟兽和人。他们全身战栗着，注视着堆积如山的金银货物。欧洲由于欧洲人精神上的英雄气概，一夜之间

①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

②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1467/1468—1520），葡萄牙航海家。

③麦哲伦（Magalhāens，1480—1521），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被认为是第一个环球航行的人。

④贝海姆（Martin Behaim，1459—1507），德国航海家、地理学家，他制作的纽伦堡地球仪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地球仪。

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和统治者。现在，这个消息又通过欧洲传遍四面八方。但是差不多与此同时，哥白尼也在详细研究在豁然开朗的地球上空日月星辰那些尚未有人踏上的轨道。所有这些新的知识都由于新发明的活版印刷术，以同样的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速度，渗入到西方最偏远的城市和最偏僻的村庄：自若干世纪以来，欧洲第一次有了一种令人喜悦、改善生活的集体经历。一代人的工夫，人类观点的原始概念，空间和时间都有了迥然不同的尺度和价值——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电话、无线电、汽车和飞机突然间大大缩短了空间和时间距离，同样因为发明和发现，我们对于生活节奏要重新进行评价。

外部宇宙空间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扩大自然会引起精神领域内同样急剧的转变。突然间，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用另外的尺度来思考，来计算，来生活；但是在大脑适应这种很难把握的变化之前，感觉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精神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尺度时，当所有这些准则和形式——它把这些东西视为永恒之物，作为它安身立命的基础——都在它的脚下幽灵般地离去时，一种茫然失措的迷惘，一半恐惧、一半狂喜往往就是精神的第一个反应。一夜之间，一切确定无疑的东西都成了问题，昨日的一切都成了千年老朽，都已过时。托勒密① 的世界地图这个二十个世代都不容更改的圣物，就因为哥伦布和麦哲伦，变成了孩子嘲笑的对象。几千年来十分虔诚地抄录下来、被奉为正确无误的那些关于世界概况、天文学、几何学、医学和数学的著作已经失去效用，变得陈旧。昔日的一切都由于新时代热烈的气息而枯萎。现在所有的评论和辩论都已结束，古老的权

①托勒密（Ptolemäus），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

威作为遭到毁灭的敬畏的偶像，已经威信扫地。经院哲学那纸做的牢狱已经倒塌，人们可以极目远眺了。精神上对于知识和科学的狂热在用新型世界材料向欧洲有机体突然供血过程中勃然兴起，节奏加快。处于从容过渡中的发展从这种狂热中获得一个急剧的过程，现存的一切都像遭到地震似的晃动起来。中世纪遗传下来的级别顺序都在重新组合。有的人高升，有的人下沉：骑士等级走向毁灭，城市拔地而起，农民阶层日益贫困，商业和奢侈由于海洋财富这种肥料，并借助热带的力量而兴盛起来。不满情绪越演越烈，一次全面的、社会的重新组合业已开始，同我们由于技术的渗入而引起的重新组合相似，它那同样过于突然的组建和合理化也在进行：那些典型时刻当中的一个时刻已经出现，这时人类仿佛要被自己的成就所压倒，不得不竭尽全力，以便重新赶上来。

人类级别的所有区段都被这巨大的撞击所动摇，就连精神王国的那个最底层也只有在这辉煌的世纪交替和世界转折时期才能达到。须知，在通常情况下精神王国的这个最底层——宗教在时代风暴中都会安然无恙。教义被天主教禁锢在死板的形式中，就像一块岩石那样坚定不移地经受了各种风暴，这种伟大而虔诚的服从仿佛已经成为中世纪的标志。权威高高在上，坚强不屈，在那里发号施令，人类十分虔诚地由下面仰望《圣经》，对于宗教的真理不敢有丝毫怀疑。哪里出现反抗，宗教就在哪里公开自己的防御力量：革出教门折断了皇帝的宝剑，使异教徒的呼吸遭到窒息。一切民族、部族和阶级，不管他们相互之间如何陌生，如何敌视，这种众口一词、谦卑恭顺的服从，这种对于一个卓越团体的盲目、幸福的信仰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在中世纪，西方人只有一种统一的魂灵，天主教的魂灵。欧洲

躺在教会的怀抱中，有时候为神秘主义的梦幻所感动，所激动，但它依旧躺着，它对每一种渴求真理和科学的愿望都感到陌生。现在，一种不满情绪第一次开始激动西方人的灵魂：自从地球的秘密变得可以探索以来，为什么神性就不能探索？有个别人逐渐把他们曾经谦卑、恭顺地低下的头颅从膝盖上抬起来，用询问的目光仰望着，现在激励他们的不再是谦卑，而是一种新的思考的勇气和探询的勇气，除了未知海洋那些勇敢冒险家之外，除了哥伦布、皮萨罗①、麦哲伦之外，又出现一代敢于坚决地成其大事的精神上的征服者。若干世纪以来，就像装在一个封闭的瓶中一样锁闭在教义中的宗教的力量散发出扑鼻的芳香，它从庄重的宗教会议渗透出来，一直渗透到民众的深处。就是在这最后的领域，世界也希望更新和变化。十六世纪的人们由于他们那经受考验的自信，感到自己再也不是渴望神恩的甘露的那种微乎其微、毫无意志的尘粒，而是事件的中心人物，是世界上有力量的人。恭顺和忧郁突然变成我们可以用文艺复兴这个词来概括其对于权力极为感性的、永恒的陶醉的这种自尊心。有才智的导师与教堂里的导师，科学与教会平起平坐。就是在这里，至高无上的权威也被破除，或者说至少也被动摇，中世纪谦卑恭顺、默不作声的人类已成过去，一种新的人类已经出现。这些人在以同样的热情探询和研究过去的人们是怎样信仰和祷告的。求知欲走出修道院，进入几乎在欧洲各国同时出现的大学，进入从事自由研究的城堡。为诗人、思想家、哲学家，为人类一切奥秘的宣告者和研究者都提供了活动的天地，精

①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约1475—1541），西班牙冒险家、秘鲁印加帝国的征服者。

神将自己的力量注入到另外的形式之中。人文主义试图绕过宗教的中介，将神性交还给人们。那时已经提出宗教改革这一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要求，这种情况开始是零星出现，但后来便大量涌现。

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刻，一个成为时代转折点的世纪交替：欧洲在瞬息之间仿佛就有了心脏，有了灵魂，有了意志，有了要求。它作为整体感到自己正受到尚未理解的、要求变化的命令的大声呼唤。这一时刻已经万事俱备，各个国家都不安宁，人们心中都充满恐惧，心急如焚，更何况在所有这一切的上面，飘荡着、回响着的唯一心声就是偷偷倾听解放的言词，有的放矢的言词。精神如果现在不善于改造世界，那就永远也不会改造世界。

阴郁的青年时代

伊拉斯谟没有故乡，没有真正的家庭，他几乎是出生在真空里。这就是这位超越民族、属于全世界的天才的杰出象征。他那赢得世界声誉的伊拉斯谟·罗特洛达谟这个名字并非受自父辈和祖先，而是一个假名。他一生所用的语言并非家乡的荷兰语，而是学会的拉丁文。他出生的日期和情况仍然扑朔迷离，除了一四六六年这个赤裸裸的出生年份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了。伊拉斯谟对于这样一种模糊不清的状况并非没有责任，因为他不喜欢谈论自己的出身，因为他是一个私生子，谈得越多，就越生气。他是一个教士的孩子，“是由非法的和因为害怕以玷污罪受到惩罚的性交生下来的”（里德[1] 在他著名的小说

①里德（Charles Reade，1814—1884），英国作家。

《教堂和炉边》里关于伊拉斯谟童年的那些充满浪漫情调的叙述自然是杜撰的)。他的父母早亡，可以理解，亲戚们都尽可能一文不花地赶忙疏远这个私生子。值得庆幸的是教会往往乐于把一个有天赋的孩子拉到身边。九岁时，小德西德里乌斯（事实上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被送到代芬特尔教士学校，后来到了黑措根布施。他于一四八七年进入施泰恩奥古斯丁修道院。他之所以去那里，主要的不是出于宗教倾向，而是因为那里有国内首屈一指的古典图书馆。他在那里于一四八八年前后立下修道誓愿。但是关于他在这些熔炼心灵的修道院岁月里争夺虔诚冠军的情况，却无法从任何方面得到证实。相反，人们从他的书信中得知，他主要研究的却是艺术，是拉丁文学和绘画。尽管如此，但他毕竟还是于一四九二年通过乌德勒支的主教之手接受了神父职衔。

在伊拉斯谟一生中，只有很少的人曾经看见他身穿这件神职人员的长袍。人们往往需要费点力气才能回忆起这位思想自由、不带偏见的文人实际上直至临终时都是神职人员。但是伊拉斯谟懂得伟大的生活艺术，善于以缓慢的、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摆脱一切使他感到窒息的东西，善于穿着那件衣服，在那种压力下维护自己内心的自由。他以极其巧妙的借口从两个教皇那里获得豁免，不必身穿神父的长袍。他凭着一张健康证书就摆脱了斋戒。尽管他的上司请求他，警告他，甚至威胁他，但他已不再受修道院院规的约束，哪怕多一天也不行。

这样，就已经显露出他性格当中一种重要的，也许是最本质的特征：伊拉斯谟不愿对任何事和任何人承担义务。他不愿持续不断地去服任何徭役、苦役，甚至不愿做礼拜。他迫于其天性中内在的独立性，必须保持自由之身，不隶属任何人。他

在内心里从来就不承认任何上司。他感到自己对任何宫廷，任何大学，任何职业，任何修道院，任何教堂，任何城市都不曾负有义务。就像他捍卫自己的精神自由一样，他一生都在以默默无声、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捍卫自己的道德自由。

与他性格中这个非常本质的特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第二个特征是：伊拉斯谟尽管是独立的狂热信徒，但他决不因此而成为一个造反者，一个革命家。相反，他憎恶一切公开的矛盾冲突，他作为聪明的战术家，避免对这个世界的权势和当权者进行任何不必要的反抗。他宁肯同他们达成协议，也不愿意反对他们。他宁肯去骗取自己的独立，也不愿意通过斗争以获得独立。他不像路德那样用大胆的戏剧动作脱下自己的奥古斯丁袈裟，因为这种袈裟对他来说太狭小，太束缚心灵；不，他宁肯轻轻地，按照秘密取得的许可，悄悄地脱下袈裟：他作为列那狐①的好学生，机智灵巧地摆脱人们给他的自由设置的陷阱。为了在某个时候成为一名英雄，他过于小心谨慎，他通过自己清醒的、冷静考虑到人类种种弱点的头脑，实现为了个性发展所需要的一切：他争取塑造生活时的独立性在这场永恒的战役中，不是以勇气，而是以心理学获胜。

但是，这门自由和独立塑造生活的伟大艺术（对每个艺术家来说都是最难的艺术），要经过学习才能掌握。伊拉斯谟所受的训练既严格，又费力。修道院的狭隘、死板使他感到难以忍受，他在二十六岁时才摆脱这个修道院。然而——作为他外交技巧的初步考验——他从上司那里溜走时，并非作为一个违背

①列那狐原为法国12至13世纪长篇故事诗《列那狐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在同强敌的斗争中，总能以其狡黠战胜对方。

誓约的僧侣，而是在秘密谈判之后应召到坎布雷主教身边，作为拉丁文秘书陪同他前往意大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同一年，这个修道院囚虏发现了欧洲，发现了他未来的世界。值得庆幸的是主教推迟了他的旅行，因此伊拉斯谟有时间，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悠然地享受生活。他不用做弥撒，他可以坐在巨大的、摆满佳肴的饭桌旁用餐，可以结识聪明的人，可以满怀激情地潜心研究拉丁文和宗教古典作家的作品。除此而外，还可以写他的《反野蛮》对话。顺便提一下，他的处女作的这个书名也许会出现在他所有著作的扉页上。他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扩充自己的知识，从而不自觉地开始了他一生对缺乏教养、愚蠢和传统的骄傲自大的大规模讨伐。但是很可惜，坎布雷主教放弃了他的罗马之行，这段美好的时光只好戛然而止，现在再也用不着拉丁文秘书了。如今，这个被借用的僧侣伊拉斯谟本该乖乖地回到他的修道院去，但他现在既然已经饮进了自由那甜蜜的毒汁，自然也就不愿意，而且决不愿意放弃这种自由了。因此，他便假装对更高深的宗教科学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他用自己惧怕修道院的全部激情和能量，同时也用他那心理学迅速成熟的技巧纠缠好心的主教。主教想用一笔奖学金把他送往巴黎，好让他能够在那里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最后主教为他祝福，并赠给伊拉斯谟更为重要的东西——一笔为数不多的款项作为奖学金。修道院院长等待这个不忠实的人返回，算是白等了。但他不得不几年，几十年地去等待伊拉斯谟，因为伊拉斯谟早已自作主张，给自己告了假，整个一生免去修道生活和其他任何约束。

坎布雷主教给这个年轻的神学大学生提供了一笔为数不多的款项。然而这笔款项对于一个三十岁的人来说，却是微不足

道的。伊拉斯谟用辛辣的讽刺口气把这位节约的资助人称为他的“安的梅塞纳斯”①。这位很快就习惯自由，而且在主教餐桌旁受到娇惯的人，不得不忍辱负重，栖身于贫困者之家——臭名昭著的孟太古学院。他对这个学院的苦行主义制度和它那严厉的主教感到不满。这座精神监狱位于拉丁区，在圣米歇尔山上（大致在今天的先贤祠）。它怀着嫉妒的心情把这位年轻的、对生活充满好奇心的大学生同世俗伙伴那轻松愉快的活动完全隔离开来。他就像谈论刑事犯的刑期那样，谈到自己最美好的青年时代的这座神学监狱。谈起卫生学来具有令人惊异的现代概念的伊拉斯谟，在他的书信中怨声不断：卧室有损健康，四壁冰冷，没有粉刷，光秃秃的，看起来近似厕所，没有人长期住在这个“醋集体”中不会病死，或者病得要死的。就连食品他也不喜欢，不管是蛋还是肉，都是坏的，葡萄酒已经变质，夜晚充满着同虱子、老鼠等有害小动物的不体面的斗争。“你从孟太古来？”他后来在课堂讨论中嘲讽道。“你头上肯定满是月桂果吧？——不，是虱子。”当时的修道院教育反正也不害怕使用体罚，更何况像罗耀拉②这样一个狂热的苦行僧二十个年头在同一个房子里考虑为了意志教育必须泰然忍受的东西——荆条与教鞭，与像伊拉斯谟这样一种神经过敏的、独立的天性背道而驰。甚至连课程也使他讨厌：他很快就学会永远厌恶经院哲学的精神及其已经死去的形式主义，厌恶它那狭隘的塔木德主

①梅塞纳斯（Maecenas，约前70—前8），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外交官和顾问，古代著名的文学赞助人。安的（Anti）为音译，意为“反”，安的梅塞纳斯（Antimaecenas）意为：反梅塞纳斯。

②罗耀拉（Loyola，1491—1556），西班牙人，天主教耶稣会创立人。

义① 和吹毛求疵。他心中的艺术家奋起——虽然不像稍后的拉伯雷② 那样轻松愉快，但也怀着同样蔑视的心情——反对在这个普洛克路忒斯之床③上对精神的歪曲。“凡是一度同缪斯或者美惠三女神有过交往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理解这门科学的奥秘。你从文化财富那里获得的一切，都必须在这里失去，你从赫利孔山④ 的源泉中吮吸的东西，必须重新吐出来。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压根不说拉丁文化，不说优美的东西或者有风趣的东西。我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这样的进步，但愿他们有朝一日也会承认我就是他们的人。”最后一场疾病给了他渴望已久的借口，在放弃神学博士学位的情况下逃出这个令人憎恨的肉体和精神的橹舰。尽管伊拉斯谟在短期休养之后又重新回到巴黎，却再也没有回到“醋集体”，“醋学校”，而是宁可靠当家庭教师和辅导教师给年轻富裕的德国人和英国人上课维持生活：艺术家的独立在这个教士身上已经开始了。

但是独立根本不是为还处于半个中世纪世界里的神职人员准备的。所有的职业都划分为明确的等级。世俗的王侯和教会的主教、教士、行会师傅、士兵、官吏、手工业者、农民，每

①塔木德主义（Talmudismus）一词源于《塔木德》（Talmud）。《塔木德》为犹太教法典，是注释、讲解犹太教律法的著作。

②拉伯雷（Franqois Rabelais，约1483—1553），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

③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洛克路忒斯开设一黑店，拦劫行人，将投宿旅客一律安置在一张床上，将身高者截其足，将身矮者强行拉长，以适应床铺长度。这里指生搬硬套地强求适应一个模式。

④赫利孔山（Helikon），缪斯居住的地方。

一种职业都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群体，都小心翼翼地用墙壁将自己封闭起来，以防止任何入侵者。对于有才智之士，对于进行创造的人们，对于学者、自由艺术家、音乐家来说，在这个世界秩序中还没有他们的位置，因为当时还没有后来能保证独立的酬金。因此对于有才智的人来说，除了为这些统治阶级当中的某一个阶级服务，别无选择。他要么成为王侯的奴仆，要么成为上帝的仆人。既然艺术尚未被视为独立的力量，因此艺术家就必须在有权有势的人那里寻求恩宠。他不得不成为某一个仁慈的主人的宠儿，在这里求得一份薪俸，在那里讨得一笔退休金，不得不——直至莫扎特和海顿① 的年代——蜷缩在仆役共有的圈子里。如果他不想饿死的话，那就必须用种种献词来奉承爱好虚荣的人，用种种论战性的小册子来吓唬胆小怕事的人，用乞求信来争取富有的人。对他而言，这种为了每日的面包而进行的、有失体面的斗争，正持续不断、毫无保障地在一个或者众多资助人那里更新着。十代、二十代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生活的，从瓦尔特·封·德尔·福格威德② 直至作为第一个强有力的人粗暴要求自己艺术家的权利并毫无顾忌地接受这种权利的贝多芬，都是如此。当然，这种自轻自贱、俯首帖耳和卑躬屈膝对于像伊拉斯谟这样一个头脑非常冷静、善于讽刺的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巨大的牺牲。他早就看透了社会上的骗人把戏。因为他没有叛逆的天性，所以便接受这个世界的现行法

①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海顿（Franz Joseph Haydn，1732—1869），两人皆为奥地利作曲家。

②瓦尔特·封·德尔·福格威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约1170—1230），奥地利诗人，宫廷抒情诗的代表人物。

律，而仅仅把力气花费在用巧妙的方式违反和回避这些法律上面。但是他那条通往成功的路仍然漫长，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直到他五十岁时——因为在这以后王侯们争取他，教皇们和宗教改革家们请求他，印刷工们纠缠他，富人们都以能赠给他家一件礼物为荣——伊拉斯谟都在靠馈赠的、甚至是乞讨的面包过活。他头发已经花白，还不得不点头哈腰，向人鞠躬。他阿谀奉承的献词，谄媚恭维的书信不计其数，它们充斥他的大部分往来书信，如果把它们集中起来，简直可以充当一部申请者用古典尺牍。他用非常狡猾的手段和出色的技巧使他的乞讨别具风格。然而在这个往往令人惋惜的缺乏性格的自豪感后面，在他身上却隐藏着一种坚决的、辉煌的独立意志。伊拉斯谟在书信中阿谀奉承，为的是在其著作中能够更符合真实。他接受别人的馈赠，却并不为任何一个人所收买。他拒绝一切可能会使他长期受制于某一特殊人物的东西。虽然他是几十所大学都希望聘任执教的国际知名学者，但他却宁愿在威尼斯阿尔达斯①的一家印刷所当一名单纯的校对员，要不然就去当非常年轻的英国贵族的家庭教师和旅行侍从，或者干脆在富有的朋友那里做食客。但是所有这一切能维持多久，往往要看他是否感到满意。他从来不会长时间地待在一个地方。这种倔强坚决的自由意志，这种不为任何人服务的愿望使伊拉斯谟一生都成为居无定所之人。他不断地周游列国，一会儿在荷兰，一会儿在英国，一会儿又在意大利、德国和瑞士。这位在那时的学者当中首屈一指的旅行家和旅行最多的人，既不太穷，又不太富，他经常

①阿尔达斯（Aldus Manutius，约15—16世纪），他或他的家人以其印行的精装古典书籍，即阿尔定版书籍著称于世。

都像贝多芬那样“生活无着”，不过这种漫游和流浪却比家园和住所更忠实于他那哲学的天性。他宁愿当一段时间主教的小秘书，也不想自己永远成为主教，宁愿当王侯的一个拿少量金币的临时顾问，也不想做他那权力无限的宰相。这个有才智的人出于内在的本能，害怕任何一种外在的权力，任何一种飞黄腾达——待在权力的阴影里，不承担任何责任地去工作，在一间安静的房间里阅读好的书籍，撰写自己的著作，既不当任何人的统治者，也不当任何人的臣仆，这已成为伊拉斯谟真正的生活理想。他为了这种精神上的自由，走了不少黑暗的、甚至是曲折的道路，但是所有这些道路都通向同一个内在的目标——通向他那艺术的、生活的精神独立。

伊拉斯谟三十岁时在英国才发现自己真正的领域。直到那时，他都在沉闷的修道院陋室里，在狭隘、粗俗的人群中生活。神学院的严格管教和经院哲学的精神压力对于他那纤巧细微、过度敏感好奇的神经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折磨。他那视野广阔的精神在这种限制之中无法得到发扬。不过，为了引起他对于世界知识和自由的那种无比的渴望，这种盐和这种苦也许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这种管教当中，久经考验者学会了一劳永逸地去憎恨一切狭隘偏见和教条片面，一切粗暴野蛮和专横跋扈，并把它们统统斥之为野蛮。正因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如此彻底，如此痛苦地亲身经历过中世纪，才使他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使者。他被一个名叫洛德·蒙蒂茹的年轻学生带往英国之后，才第一次怀着无比幸福的感情呼吸精神文化使人精神振作的空气，因为伊拉斯谟是在大好时机来到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在经历了永无休止、殃及全国达数十年之久的红白玫瑰战争之后，英国重新享受和平的好处。凡是战争与政治都被排斥之处，

艺术和科学便可以更加自由地发展。这个身材矮小的修道院附设学校的学生和授课人第一次发现，存在着一个只有精神和知识才被视为力量的领域。没有打听他的私生子出身，没有再数他做弥撒和祈祷的次数。在这里，在上流社会中，因为他那漂亮的拉丁文，有趣的雄辩术，人们只把他看成是艺术家、有才智的人。在这里，他很幸运地感受到了英国人令人惊异的热情好客，珍贵的客观性。它正如龙萨① 所赞美的那样：

这些伟大的主
和谐、美丽、彬彬有礼，宽宏而强大

在这个国家也为他显示出思维的另一种方式。虽然威克里夫②早已被人遗忘，但是在牛津，对于神学更为自由、更为大胆的理解却继续存在着。在这里，他找到了为他展示一个新的文艺古典时期的希腊语教师。最优秀的人物，最伟大的人物成了他的资助人和朋友，甚至当时还是亲王的年轻国王亨利八世也让人把这个小小的神父介绍给他。使伊拉斯谟永远感到荣幸，证明他那令人难忘的举止行为的是：那一代人中最高尚的人托马斯·莫尔和约翰·费希尔成了他的莫逆之交，约翰·科利特③、

①龙萨（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

②威克里夫（John Wiclif，1330—1384），英国宗教改革家。

③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1466/1467—1519），英格兰神学家、伦敦圣保罗学校创建人。

渥兰大主教和克兰麦大主教① 成了他的资助人。这位年轻的人文主义者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样一种精神充实的空气。他利用这种热情好客的时光，把自己的知识向各方面扩展，他在同高贵的人们及其朋友和夫人们的交谈中使自己的举止变得更加文雅。他对自身地位的自我意识促成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个迟钝笨拙、畏缩不前的小神父变成了穿起教士长袍来就像穿一件夜礼服那样的一种神父。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打扮，他学习骑马和打猎，他在英国贵族热情好客的家庭里养成了贵族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后来在德国与狭隘人文主义者更为粗鲁、更为笨拙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给他带来相当一部分文化上的尊贵地位。他被置于政治世界的中心；同教会和宫廷里最优秀的人物成为莫逆之交，他那尖锐的目光获得了后来令世界佩服的那种广度和普遍性。就连他的情绪也变得开朗了。“你不问问我，”他兴奋地给一个朋友写道，“我是否喜欢英国？如今，要是你信得过我的话，那我就请你也相信我，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感到如此舒适的了。我在这里找到一种舒适的、使人身心健康的气候，找到这么多的文化和学识，而且并非那种吹毛求疵、陈腐乏味的文化和知识，而是深刻的、精确的和古典形态的。它们既用拉丁文，也用希腊文写成，致使我除了在那里可以见到的事物之外，很少眷恋意大利。当我倾听我的朋友科利特讲话时，我就觉得仿佛我是在听柏拉图本人讲话似的。难道说大自然不是曾经创造出一种比托马斯·莫尔的性格更为善良、更为温柔、更为幸运的本性吗？”在英国，伊拉斯谟摆脱了中世纪的病魔，恢复了健康。

①渥兰（William Warham，约 1450—1532），克兰麦（Thomas Cranmer，1489—1556），两人皆为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

但是，对于英国的热爱并没有使伊拉斯谟成为英国人。这位获得解放之人作为世界主义者、社交界名流，作为自由的与博学的人回来了。从现在起，凡是知识与文化、教育与书籍所在之处，都有他的爱。对他而言，国家、河流和海洋，等级、种族和阶级再也不能把宇宙分割开来。他只知道两个阶层：文化与精神贵族是上层社会，平民与野蛮是下层社会。凡是书籍和“雄辩与学问”这句名言所在之处，从现在起都是他的故乡。

这种顽固局限于精神贵族的圈子，局限于当时十分狭小的文化阶层的状况使伊拉斯谟的形象和他的创作成了无本之木：他作为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到处只不过是拜访者，是客人。他在任何地方都不接受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不吸收独一无二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在他不计其数的旅行中，其实他都避开了各国最本质的东西。在他看来，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都由他可以与他进行字斟句酌的交谈的几十个人组成，一个城市就由它的图书馆组成。他可能还注意到，哪个地方的旅客最干净，人最有礼貌，酒最甜。但是除了书本艺术之外，他把其他的各种艺术都拒之门外。他不看绘画，不听音乐。他没有注意到在罗马有一个芬奇、有一个拉斐尔和一个米开朗琪罗在进行创作。他把教皇们的艺术热情斥之为多余的浪费，斥之为反神圣信条的爱好豪华。伊拉斯谟从来就没有读过阿里奥斯托① 的诗句。在英国，他对乔叟② 感到陌生。在法国，他对

①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53)，16 世纪意大利的重要诗人。

②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 1342—1400)，英国莎士比亚以前最杰出的作家和诗人。

法兰西的文学创作也不熟悉。灌进他耳朵里的确实只有拉丁文这种语言。在他看来，谷登堡① 的艺术是他唯一的、真正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关系密切的缪斯。他是很难捉摸的文学家，这种类型的文学家只有通过诗文、通过印刷字母，才能把握世界内容。他同现实之间的联系除了通过书籍媒介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途径。他同书籍的交往多于同妇女的交往。他喜欢书籍，因为它们态度温和，没有暴力，对于麻木的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它们是有文化教养的人在一个毫无权利的时代唯一的特权。这位平常省吃俭用的人只有在这个领域里才变成了浪费者。如果说他试图用献词来挣钱的话，那他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买书，越买越多，越买越多，希腊文、拉丁文古典作家的作品都买。他之所以喜欢这些书籍，不仅仅因为其内容，而且也因为他作为第一批藏书家当中的一员，从纯感官的角度珍爱这些存在着和生成着的，以其精美、轻便，同时又以美学形式出现的书籍。在威尼斯的阿尔达斯，或者在巴塞尔的弗罗本②低矮的印刷所里，他站在工人中间，从印刷机上拿过油墨未干的印张，同从事这项技术的工匠们一道添上装饰物和精致的大写花体字起首字母；就像一个视力敏锐的猎手那样，用灵巧的、削得尖尖的笔追踪印刷错误，或者还在油墨未干的书页上迅速凑成一个更加纯粹、更具古典味的拉丁文词组。对于他来说，著书立说，为著书立说而工作，就是他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是

①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约14世纪90年代—1468），德国活字印刷术发明家。

②弗罗本（Johann Froben，约1460—1527），瑞士巴塞尔最著名的印刷家。

他生存的最自然的形式。最后,伊拉斯谟从未在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生活过,而是超然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外。他生活在一种更加淡漠、目光更加尖锐的气氛之中,生活在形式主义艺术家、受过大学教育者的象牙之塔里。但他——又一个林扣斯① 却从全部用书本和论文建成的塔楼上好奇地俯视着,以便自由地、清楚地、公正地去观察和理解生气勃勃的生活。

理解和越来越准确的理解是这位奇特的天才真正的兴趣。严格说来,伊拉斯谟也许称不上思想深刻的英才。他不属于那种寻根究底的思想家,不属于把一种新精神的行星系赠送给宇宙的那种伟大的改革家。伊拉斯谟的真理其实就只是明白清楚。如果说伊拉斯谟不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博学者,如果说他不是一个有深度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正确思考的思想家,一个像伏尔泰和莱辛那样目光敏锐的思想家和自由的思想家,一个堪称楷模的理解者和得到他人理解的人,一个极其高尚的启蒙运动者。在他看来,传播圣洁与正直是一种天职。他厌恶一切混乱,出于本能地厌恶一切含糊不清的故弄玄虚和异想天开的形而上学。他像歌德一样,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模糊不清的事物"更使他深恶痛绝的了。广度把他引出自我,但深度却不吸引他:他从未向帕斯卡② 的"深渊"俯下身去,他也不知道某个路德、罗耀拉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③ 的

①林扣斯(Lynkeus),希腊神话人物,目光尖锐,能洞察一切。

②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近代概率论奠基人。

③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jewskij,1821—1881),俄国小说家。

心灵的颤抖，不知道这类神秘莫测，近似死亡和疯狂的可怕的危机。看来，一切言过其实的事物对于他那理性的方式来说，都是陌生的。但是另一方面，中世纪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不迷信的了。他很可能曾经轻声地取笑过他同时代人的危机，取笑萨伏那洛拉的地狱幻象，取笑路德对于魔鬼那惊慌失措的恐惧，取笑某个帕拉切尔苏斯① 的星状幻想。他只能理解和使人理解所有能理解的东西。清清楚楚的东西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而凡是他用确信无疑的目光照亮的东西，也会立即变得明朗和有条不紊。由于他的思想清澈透明和他的感情易于理解，他成了十六世纪伟大的解说家、时代批评家、教育家和导师。他不仅是他那一时代的导师，而且也是后世之师，因为十八世纪所有的启蒙运动者、自由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以及十九世纪的不少教育家都是他的精神的传人。

但是，在所有客观的和有教育意义的事物中却隐藏着肤浅庸俗的危险。如果说十七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由于其狂妄的理性使我们感到厌恶的话，那么这也并非伊拉斯谟的过失，因为它只是鹦鹉学舌地模仿他的方法，而缺乏他的精神。那些小小的英才缺少一点机智巧妙的语言，缺少那种不受限制的、使其大师所有的书信和对话都十分轻松愉快、文字优美、妙趣横生的优势。在伊拉斯谟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种愉快、嘲讽的情绪同庄重威严的学者气保持着平衡。他有足够的能量去玩弄自己的精神力量。首先，一种同时闪烁发光的、但并不怀有恶意的，一种讽刺性的、但并不怀有敌意的诙谐是他所特有的。这种遗

①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出生于瑞士的医生、炼金家。

产先为斯威夫特①，后为莱辛、伏尔泰和萧伯纳② 所继承。伊拉斯谟作为新时代第一个伟大的文体学家，喜欢在眨眼睛、使眼色的当儿悄悄说出某些异端邪说的真理，他善于用天才的放肆言词和独创的技巧，避开检查官的嗅觉，写出最棘手的事情。他是一个危险的叛逆者，但他却从未危及过自身，他受到自己那学者的外衣或者迅速罩上的一件爱开玩笑者的外衣的保护。别的人只说出了伊拉斯谟所道出的当时丑恶行径的十分之一，就被处以火刑，活活烧死，因为他们说出这些事情时语言粗鲁，大声叫骂。可是他的著作却受到教皇和主教、国王和公爵的垂青，甚至报之以种种头衔和礼物。伊拉斯谟由于其文学的、人文主义的包装艺术，其实已经把宗教改革的全部炸药偷偷地运进了修道院和王侯的宫殿之中。从他开始——他处处都是先驱——出现了政治散文的高超技巧及其从富有诗意的文章直至生气勃勃的讽刺文章的完整阶梯，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文字的那种受到鼓舞的技巧。这种技巧后来在伏尔泰、海涅③ 和尼采④ 手中被十分出色地用来嘲讽一切世俗的与教会的势力。对于现状而言，它往往比性情忧郁的严肃者粗暴的公开攻击更危险。作家由于有伊拉斯谟，第一次成为欧洲与其他社会力量并列的一支社会力量。但他并没有心怀瓦解和煽动的意图，而只是按照那种结合和联合的意愿来运用这种力量，这件事使他流芳千古。

①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杰出的讽刺作家。
②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英国剧作家。
③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德国诗人、政治家、思想家。
④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伊拉斯谟这个伟大的作家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一个像他这种类型的人物为了要对世界产生影响，就必然要活得长久。帕斯卡、斯宾诺莎、尼采可以夭亡，因为他们总结出来的精神偏偏在最狭隘、最封闭的形式中达到尽善尽美。伊拉斯谟则相反，他是一个收藏家、寻觅者，一个评注和压缩的行家，他除了从世界获得材料外，本身不具有多少材料。他并不是通过自己思想感情的强度，而是通过其广度发挥作用。伊拉斯谟与其说是一个干练的人，不如说是一个艺术家。对于他那永远准备齐全的才智来说，写作只不过是谈话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它用不着他那灵活的头脑花费特别的力气。有一天他自己解释道，他撰写一部新书比读一部旧书的校样还要省事。他用不着生气，用不着激动，他们的理解力本来就比单词跟随他的速度更快。“我感到，”茨温利写道，“我读你的文章时，仿佛就是在听你讲话似的，好像看到你那虽然矮小、但却优美的身材以极其讨人喜欢的方式向我走来。”他写得越轻松，就越有说服力；写得越多，就越起作用。

伊拉斯谟写出的处女作之所以走运，应当归功于一种情况，或者说也许要归功于对于时代气氛的不自觉的认识。在几年当中，年轻的伊拉斯谟为了教他的学生，编出了拉丁文名言集。他抓着一个大好时机，让人把这个集子在巴黎用《格言》这一标题付印。就这样，他便在无意之间迎合了当时故作风雅的时尚，因为当时正是拉丁文最为流行，每一个有文学头衔的人——这种滥用几乎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都以为自己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因此也就有义务用拉丁文引文来塞满书信或者论文，或者讲演。伊拉斯谟巧妙的选择使所有人文主义的假绅士们如今不用再费力气去亲自阅读古典作家的作品了。当某个人

要写信时，从现在起他就用不着长时间地去翻阅大开本的书，而是很快地就可以从《格言》中找出一句漂亮空洞的言词了。既然假绅士在任何时代都不计其数，因此这本书很快就风行起来了：在所有的国家都印行了十几版，每一个版本的引文都比前一版增加了一倍。弃婴和私生子伊拉斯谟的名字一下子在整个欧洲家喻户晓。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获得一次成功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但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获得成功，而且每一次都是在另外一个领域，那就显露出一种使命，那就证明这个艺术家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种力量不能增强，这种本领无法学会，就连伊拉斯谟也从未自觉地瞄准过某一成就。他的成就往往都是以极其意外的方式取得的。当他在其《对话》中私下为托付给他的学生写上几句对话，以使他们更易于学会拉丁文时，三代人用的一本教科书也就由此问世了。当他认为在《愚人颂》中写的是一种戏谑式的讽刺时，他已经在用这本书发动一次反对权威的革命了。当他将《圣经》从希腊文重新译为拉丁文并加以评点时，一种新的神学也由此开始了。当他在几天之内为一位对自己丈夫不虔诚的冷漠感到痛苦的虔诚妇女写一本安慰书时，这本书也就成了一本关于新的福音新教虔诚的问答手册。他往往都是歪打正着。往往一个自由的、没有成见的英才独立自主地触及到的事物，对于一个囿于陈旧观念的世界来说，都是新鲜的，因为凡是独立思考的人，同时也会为大家进行最为出色、最有裨益的思考。

肖　像

"伊拉斯谟的神情是我所见到的最富于表情、十分重要的一种神情。"拉瓦特尔① 说。对于他，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其观相术方面的专长吧。这样一种"十分重要的"、表现一种新型的人的面貌，连当时的大画家们也觉察到了。所有的肖像画家当中画法最精确的画家画他不下六次。汉斯·霍尔拜因按照不同的年龄，把这位伟大的教师都细致精确地画下来。阿尔布雷希特·丢勒② 画了两次。克文汀·马塞斯③ 画了一次。在德国人中，还没有人享有一种类似的无上光荣的圣像待遇。因

①拉瓦特尔（Johann Kaspar Lavater，1741—1801），瑞士作家、观相术创立者。

②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德国画家。

③马塞斯（原文为 Quinten Matsys，可能有误，应为 Quentin Massys，1466—1530），尼德兰画家。

为能允许画这位优秀的聪明人伊拉斯谟，同时也是公开向这个博学多才的人表示敬意，是他把各行各业被分割的手工业行会联合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文主义教育团体。画家们借助伊拉斯谟的画像来颂扬他们的庇护者，颂扬这个为了生活的新的艺术和道德形象而斗争的伟大先驱。他们调动这种精神力量所有的象征物，以便在他们整页的画图上来表现他。伊拉斯谟就像武艺高强、戴上头盔、手持宝剑的武士，像佩有徽章、口讲格言的贵族，像头顶光环、身穿法衣的主教。作为握有新式武器的武士，作为手捧书本之人出现在每一幅画像中。他们无一例外，都画他——像军队包围一样——正在书本的包围之中写作或者创作。在丢勒的肖像画中，他左手拿着墨水瓶，右手拿着鹅毛笔，他身边是一些信件，他面前是一大堆大开本的书。霍尔拜因有一次描绘他把手撑在一本带有象征性书名《海格立斯的壮举》的书上。这是一种巧妙的崇拜，以赞颂伊拉斯谟工作效率之高。另外一次霍尔拜因在偷看他，只见他在构思和创造“概念”时，把手放到古罗马神忒耳弥诺斯的头上。往往同时要用肉体来强调他那善于思考的姿势的“精细、谨慎、聪明、胆怯之处”（拉瓦特尔语），强调把无与伦比、令人难忘的光辉赋予这种通常皆为概念化的面貌的那种思想家、寻觅者、试验者的气质。

因为纯粹的肉体本身只能视为面具，视为表面，所以，如果在眼睛里没有从内部积聚的力量，伊拉斯谟的面貌就根本说不上美。大自然并没有给予这位精神上富有的人大量馈赠，它只提供给他极少量真正的生命的内容和生命力——非常矮小的身躯，狭长的脑袋，而不是结实、健壮、有抵抗力的身体。它注入他血管里的血又少又淡，而且注血时态度冷漠，，在敏感的

神经外面绷上一层细嫩、多病、苍白的皮。这层皮犹如灰色、有裂缝的羊皮纸，逐渐起皱，碎裂成上千道皱纹和上千个日耳曼古文字。人们处处都可以感到生命力的过于微弱。头发过于稀疏，颜色很浅，黄里泛白，散落在青筋可见的太阳穴四周。贫血的双手恰似雪花石膏一样苍白。鼻子从鸟脸上伸出来，长得太尖，就像羽毛管笔的笔尖一样长。紧闭的嘴唇剪裁得太细长，太像女巫，说起话来声音微弱，单调平板。两眼尽管目光炯炯，但太小，而且还被遮住了。在这张严肃的、只知工作的苦行僧脸上找不到一点红光，整个脸形也没有一处是圆的。很难想象这位博学之士年轻时会骑马、游泳和击剑，会同女人们开玩笑甚至谈情说爱，会经受狂风暴雨，会大声说笑。人们看到这副文雅的、因经历的时间较长稍微有些干瘪的僧侣的面容，便会情不自禁地首先想到紧闭的窗户，想到炉子的热气、书上的灰尘，想到彻夜不眠的夜晚和不断工作的白昼。这副冷漠的面孔散发不出丝毫的热能，丝毫的强电流。实际上伊拉斯谟总感到寒冷。这位老待在屋里的小个子身上总裹住袖子宽大的、厚厚的、用毛皮镶边的长袍。他那早已歇顶的头上总戴着天鹅绒四角帽，以抵御折磨人的穿堂风。这是一个并未生活在生活中，而是生活在思维中的人的面貌。这种人的力量并不存在于整个的躯体中，而仅仅锁闭在太阳穴后面隆起的那个瘦骨嶙峋的前额之中。伊拉斯谟对现实毫无抵抗力，而仅仅只有在智力成果中才有自己真正的生命力。

伊拉斯谟的面貌只有通过这种来自精神的光芒才变得有价值，正因为如此，所以霍尔拜因那幅表现在最神圣的时刻、在工作的创造性瞬间的伊拉斯谟画像——他众多杰作中的这幅杰作，也许是他对一位作家，可以说是描绘得极其完美的这幅画

才无与伦比，令人难忘。在画中，画家把感受到的言词魔术般地转变成可以视见的文字。人们回想起那幅画上的情景——因为见过它的人，都可能又会把它给忘记了——看到伊拉斯谟站在他的斜面写字台前，人们的每根神经都会情不自禁地感觉到：他孤单一人。在这间屋子里，一片寂静。这位正埋头工作的人身后那道门很可能是关上的，没有人进出。在这间狭窄的小屋里没有一点动静，不过即便四周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已经陷于沉思默想，沉醉于创作的神思恍惚之中的人也不会觉察到的。他静止不动时显得像石头般的安静，但如果仔细观察他，那么这种状况却并非安静，而是地地道道的自我陶醉，是一种神秘莫测、完全在内心世界里出现的生活状况。因为在思想高度集中时，蓝光闪烁的眼睛——好像有一道光从他瞳孔里射到文字上似的——正在跟踪白纸上的文字。他的右手，那只细长、瘦削、近乎女性的手乖乖地按照一道来自大脑的命令，把他的文字写在这页纸上。他双唇紧闭，额头在平静、沉着地闪闪发光。这枝羽毛笔似乎是在机械地、轻松愉快地把他的文字写到这页静止不动的纸上。然而眉宇间一块小小的、往前凸出的肌肉却显露出他那在看不见的、几乎是无法觉察的情况下进行的脑力劳动的艰辛。在大脑创造性的区域附近的这道小小的、痉挛着的皱纹几乎是无形地让人预感到，为了寻找一种表达方式，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所进行的痛苦的思索。这样一来，思考就完全从身体上显露出来了。人们都明白：在这个人的四周一切都是紧张、急切，这种沉默充满着种种神秘的暗流。在这种描绘中，化学上由精神物质向形式、由文字向出版的能量转换这一通常无法偷看到的瞬间，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人们可以一连好几个小时地注视着这幅画像，倾听它那回荡着的寂静，因为霍尔拜因

在工作着的伊拉斯谟的象征中，已经使每一个脑力劳动者那神圣的严肃，使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看不见的耐心变得不朽了。

只有在这幅肖像画中，人们才感觉到伊拉斯谟的本质，只有在这里，人们才预感到在矮小、瘦弱的身躯，在这个有才智之人像拖一个成为累赘的、易碎的蜗牛壳那样拖着的身躯后面隐藏着的实力。伊拉斯谟一生都经受着他健康状况不佳的折磨，因为大自然拒绝赐给他肌肉上的东西，却绰绰有余地分配给了他的神经。还在非常年轻时，他就经常神经衰弱，或许还患有器官过敏症，老是怀疑自己生病。大自然给他绷上的健康保护层数量太少，破洞太多，往往在某个地方会有一处受不到保护，神经过敏。一会儿是胃出毛病，一会儿四肢又是风湿性疼痛，一会儿是结石病折磨他，一会儿又是痛风使他疼痛难忍，就像冷的东西会对蛀空的牙齿产生影响一样，每一丝寒冷的微风都会对这个过分敏感之人产生影响。他的信件就是一本连续不断的病历。没有一种气候能够完全中他的意，他在酷热时呻吟，在大雾时忧伤。他讨厌风，稍有点凉就感到冷。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受不了生了火的瓷砖壁炉，污浊空气的任何一种气味都会引起他的头疼和恶心。他穿上的皮衣和厚厚的长袍往往都不起作用：这不足以保持正常的体温。每天他都需要勃艮第葡萄酒，以维持他那干涸的血液在半道上的畅通。如果说葡萄酒只是稍微酸了一点的话，那么内脏中的火警信号却已经表露出来了。伊拉斯谟作为伊壁鸠鲁① 的一个优秀学生，对于丰盛的饭食非常乐于接受，但十分害怕糟糕的膳食，因为变质的肉食会使他反胃，而只要闻到鱼的气味，就会使他窒息。这种敏感使他变得

①伊壁鸠鲁（Epikouros，前341—前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娇气。文化成了他的需要：伊拉斯谟只能穿精美、暖和的衣料，睡干净的床，在他的办公桌上必须点价格昂贵的蜡烛，而不能点随处可见的、冒烟的松木火把。因此，每次旅行都成了令人厌恶的冒险。这个永不停步的漫游者关于当时十分糟糕、落后的德国乡村客栈的报道，就成了一本文化史上无法取代的，同时又是令人赏心悦目的、集咒骂与危险之大成的航海日志。他在巴塞尔每天回住处都要绕弯路，以避开一条臭味特别难闻的巷子，因为任何一种形式的臭味、嘈杂声、垃圾、烟雾以及传播到精神上的粗野和混乱会给他的感受能力带来非常可怕的精神痛苦。有一次在罗马，朋友们带他去看斗牛时，他用讨厌的口气解释道，他“不喜欢这种血腥的游戏，不喜欢这些野蛮的残渣余孽”，他内心的温情受到各种形式的粗野的伤害。这位孤独的保健学家在野蛮世界粗暴忽视其身体的时代，绝望地寻找着他作为艺术家、作家在其风格中、工作中实现着的同一种洁净。他那现代化的、神经过敏的有机体在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化需要方面超过了他那体格粗壮、皮肤粗糙、神经坚强的同时代人。但他最大的恐惧却是当时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置人于死地的瘟疫。他一听说在百里之外有黑色瘟疫流行，马上便会不寒而栗。他会立即拆掉帐篷，惊慌失措地逃之夭夭，管你是皇帝召他去议事，还是最诱人的建议在挑逗他，都一样。看到他身上满是麻风、溃疡或者虱子跳蚤之类的东西，会使他自惭形秽。伊拉斯谟从未否认过对于各种疾病的这种过分惧怕。他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生活在尘世中的凡人，一点儿也不怕承认自己“只要提到死亡这个名称就会浑身发抖”。因为他像每一个喜欢工作，把工作看得很重的人一样，不想被一次愚蠢的偶然事件，一次单纯的传染送掉性命。正因为他这个对自己最了

解的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天生体弱，了解自己神经方面的特殊危险，所以他才爱惜自己那矮小、敏感的身子，甚至非常吝惜这个身子。他避免频繁的应酬，他对洁净和备好的食品非常在意，他避开维纳斯的种种诱惑，尤其害怕战神玛斯。身体上的虚弱越折磨这个逐渐衰老的人，他的生活安排就越发自觉地转变成一种不断掩护退却的战斗，以便拯救他为了自己唯一的生活乐趣——工作所需要的那一点点安宁、安全和孤独。只是由于这种在卫生保健方面的小心谨慎，由于这种感官享受方面的放弃，伊拉斯谟才做出了难以想象的事情，拖住他身子的那辆破车，七十年间勉勉强强地走过所有时代当中最野蛮、最混乱的时代，保住了那个绝无仅有的、他在此生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他的目光的神圣和他内心自由的不可侵犯。

一个人有这样一种神经方面的畏惧，有这样一种器官方面的过敏，很难成为一名英雄。这种性格必然表现出这样一种不可靠的体质特征。看一眼他的精神面貌就知道，这个如此敏感柔弱的小个子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野蛮的力量本性中不大适合当领头的人。“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特征，”拉瓦特尔是这样评判他的外貌的。这对伊拉斯谟的性格也同样适用。这种不易激动从来就无法去应付一次真正的战斗。伊拉斯谟只能用某些遇到危险时便立即装死或者改变颜色的小动物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但他在遇到骚乱时还是情愿缩回到他那蜗牛壳里，缩回到他的书斋之中。只有在他书的壁垒后面，他心里才踏实。在受命运摆布的瞬间观察伊拉斯谟，差不多会使人感到难堪，因为情况一旦变得越发紧急之时，他就会匆匆忙忙地悄悄离开危险地区。他在每一次作出判断之时，都要用不承担义务的“假如”和“倘若”来掩护自己撤退。他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摇摆不

定，他把自己的朋友弄得稀里糊涂，把自己的敌人弄得七窍生烟，谁要是指望他会成为同盟者，谁就会感到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上当受骗，因为伊拉斯谟作为一个坚定的独来独往之人，除他自身之外，不想忠于任何一个人。他出于本能，厌恶各式各样的决定，因为这些决定就是义务。他狂热喜爱的这位但丁①也许会因为他的冷漠，把他扔到地狱前院那些"中立者"，那些天使当中去。这些天使在上帝与魔王的斗争中同样不想偏袒任何一方：

> 同他们混合在一起的
>
> 还有一队卑贱的天使，他们对神不叛逆，也不忠诚；只顾到自己。②

凡是要求具有献身精神，承担全部责任之处，伊拉斯谟都会缩回到他那不偏不倚的、冷冰冰的蜗牛壳里去。他也许从来就没有发现过自己愿意作为殉道者，为了世界上的某一观点和某一信念去上断头台。但是对于这个在整个时代都为人熟知的性格弱点，没有任何人比伊拉斯谟本人更了解的了。他很乐意承认，他的身体，他的灵魂里丝毫没有那种形成殉道者天性的物质，但他却因为自己的生活状况而学会了柏拉图的价值分等。按照柏拉图的分法，正义和顺从是人类的第一美德，而第二位才是勇

①但丁（Alighièri Dante，1265—1321），意大利诗人，《神曲》的作者。

②此处引文摘自朱维基先生翻译的《神曲·地狱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气。伊拉斯谟的勇气充其量表现在他生性正直，使他不会因为自己胆怯而感到羞愧（此外，这也是永远诚实的一种非常罕见的形式）。有一次，当有人粗暴地指责他缺乏斗争勇气时，他微笑着，用信心十足的词句温文尔雅地回答道："假如我是一个瑞士雇佣兵的话，这倒是一种严厉的谴责。可我是一个学者，我需要的是安安静静地去工作。"

在这种不可信任的事物中，可以信任之处本来就只有一点：那个孜孜不倦、均匀工作的大脑，似乎就是游离于他那虚弱的身子之外的一个特殊身体。这个大脑不知道什么叫诱惑，什么叫疲劳，什么叫动摇不定，什么叫危险。它从孩提时代起，直至死亡的时刻止，都以同样清醒和辉煌的效力工作着。在肉体和血液方面，伊拉斯谟是一个虚弱的疑病患者，而在工作方面却是一个巨人。他那矮小的个头只需要三四个小时的睡眠——啊，他竟然没有用坏这个身子！——其余二十个小时他就不停地工作，写作，读书，辩论，整理，校阅。他在旅途上写，在颠簸的车上写，任何一家饭馆里的桌子都可以立即变成他的办公桌。对于他来说，醒着也就等于是在进行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铅笔就是他手上的第六个手指。他躲到书本和纸张后面去，像通过一部针孔摄影机那样嫉妒好奇地观察着所有的事件，没有一种科学上的进步，没有一项发明，没有一本小册子，没有一个政治事件能逃脱他那窥视的目光。他通过书本和书信这一媒介，对整个世界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这种转化几乎完全通过书写的和印刷的文字来进行，同现实的物质代谢在伊拉斯谟那里仅仅通过大脑的途径来实现，这些情况无疑把一种学院式研究方式的特点，把某种抽象的冷漠带进了他的著作之中。就连他的著作也像他的身体一样，在多数情况下缺乏勃勃生气

和充分的感官性。在这里，一个人只用大脑上的眼睛，而不是用所有活生生的、吸收着的器官来掌握世界。不过他这种好奇，他的求知欲却包括了所有的领域。这种好奇和求知欲犹如探照灯一般将自己的光四处移动着，散射到生活的所有问题上，用均匀、无情的清晰度照亮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具有不可超越的精度和巨大作用的、十分现代化的思维器械。几乎没有一块同时代人活动的场地没有曝光。这位起着推动作用、四处漂泊，但往往又是目光敏锐的精英在思想的每一个领域都是后来总结性努力的先驱和开路先锋。因为伊拉斯谟具有一种魔法十足的探矿杖的本能，他在同时代人走过的任何一处，感觉到所触及到的问题的金银矿脉。他觉察到这些矿脉，预感到这些矿脉。他第一个指出这些矿脉，但是他那急于继续漫游的兴趣在多数情况下都随着这种发现者的喜悦一道消逝殆尽。他把真正的挖掘财宝，把挖掘、筛选和分析利用的辛劳都留给后人。他的局限就在于此。伊拉斯谟（或者更确切地说，他那奇妙的大脑上的眼睛）仅仅照见了这些问题，他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就像他的血液，他的身体缺乏生气勃勃的激情一样，他的创造性也缺乏极端的狂热、最后的韧性、片面性的狂怒——他的世界是广度，而不是深度。

因此，对于这位极其现代的、同时又是超越时代的人物形象的每一种评价，如果只是衡量他的著作，不同时衡量他的作用，都会失之公允。因为伊拉斯谟是一个多层面的人物，一个各种天才的密集体，是一个总和，但并非统一体。他大胆而又胆怯，他积极向前，但在最后冲刺时却又犹豫不决。他作为文学家爱好虚荣，作为人、作为怀疑论者和唯心主义者又非常谦卑。他将所有的对立物都用松散的混合方式结合在自己身上。一

个犹如蜜蜂般勤奋的学者和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神学家，一个严厉的时代批判家和一个温和的教育家，一个头脑不太清醒的诗人和一个卓越的写信人，一个愤怒的讽刺家和一个温柔的、具有一切人性的使徒——所有这一切在这个见多识广的英才身上都同时拥有活动范围，而不会相互仇视或者相互倾轧。因为在他众多才能当中的这个联合相互矛盾的事物、解决矛盾的才能，不仅在外界生活中，而且还在自己身体内部发挥作用。不过，从这样一种多样性中，自然无法产生一种统一 的效果，更何况我们称之为伊拉斯谟本体，伊拉斯谟思想的东西，由于一种集中的表现形式，在他某些后裔当中，而不是在伊拉斯谟本人身上找到了更具说服力的特征。德国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自由的《圣经》研究以及拉伯雷和斯威夫特的讽刺，欧洲理想和现代人文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他思考中的想法，没有丝毫东西是他自己的行动。他四处倡议，四处提出问题，然而到处又都是运动超过了他本人。理解的天性很少又是实现的天性，因为远见使冲力丧失力量，“很少见到——”正如路德所说，“一部好的作品是由于智慧和谨慎创作出来的，一切都必须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伊拉斯谟是他那个世纪的灯光，别的人是他的力量——他照亮道路，别的人善于走这条路，而他自己却往往像光源一样呆在阴影之中。但是这位指出通往新鲜事物之路的人受到大家敬仰的程度，并不亚于第一个走上这些道路的人；就是那些在人们看不见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人，也完成了自己的业绩。

杰出的年华

如果一个艺术家找到他得以在其中将其才能的总和和谐地联合起来的主体艺术形式，这就是他一生中无可比拟的机遇。伊拉斯谟由于《愚人颂》中一个妙不可言、全部实现的念头，做到了这一点。在这里，学识渊博的学者、无情的时代批评家、冷嘲热讽的讽刺家在他身上情同手足般地融为一体。人们在他的著作中还找不到一部作品像他这部最著名的、唯一能永世长存的作品那样，能在作品中把伊拉斯谟视为大师的。更何况这种直指时代核心的射击出自于无拘无束、简直就是轻松自如的手：这部出色的讽刺作品是在七天之内，确实仅仅为了使心情轻松而一气呵成的。然而恰恰是这种轻松给他长上翅膀，无忧无虑赋予他满不在乎的动力。伊拉斯谟当时已经年过四十，他不仅已经博览群书，著作等身，而且还用

他那冷静、怀疑的目光深入地观察过人类。他根本没有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感知人类。他看到理性是如何难以控制现实，对他来说，整个混乱拥挤的人群都非常愚蠢，不管他的目光转向哪里，他都会看到按照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意思所写的诗行：

功绩注定做叫化子，
可怜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
艺术被官府统治得结舌箝口，
精神变得无权无势，
耿直被人瞎吹为愚蠢。①

谁长期像他那样贫穷，谁长期在黑暗之中站在有权有势者门前乞求施舍，谁就像吸一块有苦味的海绵一样吸着充满苦涩的心，谁就明白一切人类行为的不公正和傻里傻气，有时他的嘴唇会因为愤怒和无法大叫大喊而颤抖。但是伊拉斯谟在内心深处并非“叛乱者”、反叛者，并非激进之人：声音刺耳、充满激情的谴责不符合他那温和谨慎的性格。伊拉斯谟完全缺乏这种幼稚美好的幻想：以为人们一下子就可以推翻世界上一切坏的东西——他在冷静地思考，当人们不能仅仅改变这个世界时，当这种欺骗和自我欺骗业已成为永恒的人类法则和无法改变的事物时，同世界搞坏关系又有何用？聪明人不诉苦，明智的人不激动：他用敏锐的目光和蔑视的嘴唇注视着这种愚蠢的行径，然后踏上了自己——但丁所说的“查看与通过”——那条坚定不

①此处参照梁宗岱先生译文译出。梁文见《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页。

移的道路。

但是有时候，一种轻松的心情也会有一阵使这位智者那严肃、顺从的目光放松一下，然后他便会露出笑容，并用这种微笑嘲讽般地照亮世界。伊拉斯谟的旅程在（一五〇九年）那些日子越过阿尔卑斯山。他从意大利返回故里。他在意大利看到处于彻底的、宗教没落中的教会，看到尤里乌斯教皇① 充当雇佣兵队长，在他周围聚集着他的雇佣兵，看到主教们不守使徒的清贫，生活奢侈豪华。在这个遭到破坏的国家体会到了王侯们罪恶的战争狂热。他们掠夺成性，犹如野狼般你争我夺。他体会到有权有势之人的骄横，人民可怕的贫困化。他再一次深入地看到了荒谬之深渊。但是现在这类事情就像阿尔卑斯山阳光灿烂的山脊后面的乌云那样，非常遥远。学者、著作家伊拉斯谟坐在鞍上，他身上没有背着——这是很特殊的巧合——他的哲学包袱，没有背着通常他的好奇心都以评论性的目光盯着不放的那些古文手抄本和古代文献。他的思想在这里，在户外自由自在。他有兴致去玩耍和纵情欢乐。这时有一个想法向他飞来，这种想法五彩缤纷、美丽动人，好比一只蝴蝶。他带着它，完成了这次幸运的旅行。刚一到英国，他便在托马斯·莫尔明亮、熟悉的乡村别墅里写下了这部小小的诙谐作品。他写这部作品的初衷，本来只是想给济济一堂的朋友们开开心，为了对托马斯·莫尔表示敬意，用“赞美愚蠢”（拉丁文为 Laus stultitiae，人们最容易译成《愚人颂》②）这一文字游戏给这些

①此处应为尤里乌斯二世（教皇）（Julius Ⅱ.，Pope，1443—1513），罗马教皇，一生曾多次征战。

②《愚人颂》是常见的译法。

文章命名。

同伊拉斯谟那些严肃的、重要的、学术味浓厚而且过于浓厚的主要著作相比，这部小小的、大胆的讽刺作品首先显得有点像孩子似的放纵，有点体态轻盈、灵巧敏捷。然而并非篇幅和分量赋予艺术品以内在的持久性，正像在政治领域内一句格言，一个致命的笑话所起的作用往往比狄摩西尼① 的演讲更为关键那样，在文学范围内这些小开本的书大都比规模宏伟的长篇巨著更有生命力。在伏尔泰的一百八十部作品中，真正有生命力的只有那本薄薄的讽刺性中篇小说《老实人》。在乐于写作的伊拉斯谟无数的大开本书中，只有这个快乐情绪的偶然产物，这个闪闪发光的精神游戏——《愚人颂》最有生命力。

这部作品无与伦比、绝无仅有的诀窍是天才的假面舞会化装。为了讲出他希望这个世界上有权势之人能够得知的所有这些严酷的真理，伊拉斯谟本人并不发言，他也不把自己，而是把愚人打发到讲台上去，以便让她自己赞美自己。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有趣的误认。人们决不会知道到底是谁在讲话：是伊拉斯谟在一本正经地讲话呢，还是大家势必会原谅其粗俗不堪和肆无忌惮的愚人亲自在讲？伊拉斯谟使用这种模棱两可的手法为一切困境创造了无懈可击的状况。他自己的看法无法捉摸。他在这里向四面八方大量传播这种看法时，如果有某一个人会因为一次难以忍受的鞭笞，因为一句尖酸刻薄的讽刺话想起向他求助，那他就可以开两句玩笑，加以拒绝："这不是我说的，是愚人太太说的；谁会把愚人讲的话当真呢？"在书刊检查所和宗

①狄摩西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古希腊政治家、雄辩家。

教裁判所恣意妄为的时代，通过讽刺和象征将对时代的批评偷偷贩运到人世上，历来就是黑暗时代自由思想家的唯一出路。但是很少有人在利用讲话自由这一神圣的愚人权利方面，比伊拉斯谟在这部讽刺作品中更巧妙的了。伊拉斯谟这部作品是他同时代人中第一部最大胆的，同时也是最有艺术性的作品。严肃与诙谐、知识与开心的愚弄、真实与夸张绕成一个多彩的线团，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它，认真地把它绕在卷筒上，那它就会一再给我们高高兴兴地展现出来。如果把它同他同时代的那些粗暴的论争，那些空洞无物的谩骂作一番比较，就完全可以理解，这样一种吸引人的、有声有色的讲话在精神黑暗中是如何使整整一个世纪心醉神迷并拯救了这个世纪的。

讽刺一开始就引人发笑。身穿学者长袍，头戴滑稽小帽的愚人太太（霍尔拜因就是这样画她的）登上讲台，致学究式的颂词，向她自己表示敬意。她自夸，只有她一人才是那种同自己的女仆们、同谄媚和自爱一道使世道继续维持下去的人。“没有我，生活中就没有一个社团，没有一个组织会令人愉快，会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彼此之间不是时而互相欺骗，时而相互吹捧和明智地让步，如果最后不是一切都通过愚蠢的一种附加物来调味，人民就不会长期容忍他们的君王，主人就不会容忍他们的奴仆，侍女就不会容忍她们仁慈的夫人，教师就不会容忍他们的学生，朋友就不会容忍自己的朋友，妻子就不会容忍夫君，店主就不会容忍客人，伴侣就不会容忍伴侣，简而言之，没有一个人会容忍别的人。”只是由于对金钱作了过高的估价，商人才孜孜以求；只是由于“虚名的引诱”，由于不朽的鬼火，诗人才进行创作；只是由于其疯狂，士兵才变得大胆。一个头脑清醒的聪明人会逃离任何斗争，他只是因为职业的缘

故才去做非做不可的事情。如果不是把这种使人渴求永生的愚人草移植到他身上的话，他是绝不会动手做事，动脑想问题的。如今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只有她这位给人以幻想的愚人，只有她一个人才感到幸福，每一个人越感到幸福，他就越盲目地追随自己的激情，他的生活就不明智。因为一切反思和费心都会使灵魂变得阴暗。兴趣从来就不寓于明白和聪明之中，而往往只存在于心醉神迷、过分热情、无法自持和神经错乱之中。少许愚蠢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更何况正大光明之人、洞若观火之人、不受激情摆布之人决非正常之人，而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只有那种在生活中变得愚蠢的人，才真正称得上人。"因此愚人鼓起腮帮子自吹自擂，把自己奉为一切人类成就真正的推动力，她在有诱惑力的、滔滔不绝的讲话中说明，世界上备受赞扬的美德、洞若观火和预见、正直和诚实本来就只能用来使那些具有这些品德的人对生活失去兴趣。此外，既然她是一个有学问的女士，因此为了对自己有利，她便自豪地引用索福克勒斯① 的话："只有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时生活才舒适。"

为了严格按照学院式的方式逐条逐款地证实自己的论点，她不厌其烦地愚弄证人。在这次大检阅中，每一个等级都显示出他们独特的愚蠢。所有的人都从她面前走过，他们是：喋喋不休的演说家、吹毛求疵的法学家、其中每一个人都想在自己特别的口袋中创造宇宙的哲学家、傲慢自大之人、攫取金钱之人、经院哲学家和作家、赌徒和士兵，最后还有自作多情的永恒的傻瓜——那些情侣们。在这些人当中，每一个人都以为在

①索福克勒斯（Sophokles，约前496—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其情人身上聚集起来的只是所有兴趣和美的总和。伊拉斯谟用他那无与伦比的世界知识组建了一个富丽堂皇的、人类愚蠢行为的画廊。这样一来，伟大的喜剧作家莫里哀① 和本·琼森② 只需要把手伸进这个木偶剧里，就可以从他轻描淡写的漫画中塑造出真实的人物来。没有一种人类愚蠢行为的品种受到姑息，没有一个品种被遗忘，正是由于这种完整性，伊拉斯谟才保护了自己。因为在别人的情况都不如他的情况时，谁能够赞同进行极其辛辣的讽刺呢？伊拉斯谟整个广博的学识，他所有的智力，他的诙谐和知识，他敏锐的目光和幽默，终于而且也是第一次能够发挥作用了。他世界观里的怀疑和慎重在这里就像发射升空后的焰火那上百的火花和颜色一样协调和谐。在这里，在完美的游戏中洋溢着一种崇高的精神。

但是在内心深处，这部作品对于伊拉斯谟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一个玩笑，他恰恰能够在这本杜撰的小书中比在其他任何一本著作中，更加充分地吐露自己的心事，因为他最喜爱的这本《愚人颂》也是对他内在本质的一次心灵上的自我清算。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没有低估的伊拉斯谟知道那种神秘弱点最深层的、妨碍他进行文学创作、进行真正创造性工作的原因，就是他往往过于理智，过于缺乏激情地感到，他的不偏不倚和超然万物之上使他站到了生动活泼的事物之外。理智往往只是一种有调节作用的力量，其本身绝非创造性的力量；但是这种真正的创造性事实上往往又是以一种幻想为前提。因为伊拉斯谟如此缺乏幻想，所以他一生总缺乏激情，他永远都是一位冷静而

①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

②本·琼森（Ben Jonson，约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

伟大的、从不知道生命的临终幸福、从不知道彻底奉献、从不知道神圣的自我浪费的君子。由于这本书，现在人们第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预感到，伊拉斯谟暗地里害上了他的理智、正义、礼貌、温和的毛病。正如一个艺术家在他将自己所缺乏的东西，一种渴求的东西转化为形象时往往采用最保险的办法进行创作一样，就连在这里，恰恰是那种理智的人也就堂而皇之地成了负有使命之人，去创作轻松愉快的愚人颂歌，用最聪明的方式去嘲笑那些绝对聪明的宠儿。

不过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却不能由于书籍不受限制的化装艺术而低估了它的真实意图。这本表面上富有喜剧性的《愚人颂》在它那嘉年华会的面具后面，却是当时最危险的一本书。我们如今只感到是一些俏皮的、有声有色的讲话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却是为德国宗教改革开辟一条道路的一次爆炸。《愚人颂》是古往今来一本最有影响的论战性小册子。在罗马，教皇们和红衣主教们过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君王们那种穷奢极欲、放荡不羁的生活。当时德国的朝圣者怀着惊异和愤怒的心情从罗马归来，真正的宗教信徒越来越迫不及待地要求进行一次“彻底的教会改革”。但是奢侈的教皇拒绝任何一种异议，甚至拒绝最善意的异议：那些讲话太大声、太热情的人都站在柴堆上，嘴里堵住布团赎罪，只有在粗鲁的民间短诗或者粗俗的遗闻轶事中，才能悄悄发泄对于乱搞圣人遗物交易和赦罪的不法行为的愤怒。上面画有教皇这个大型吸血蜘蛛的传单在地下流传。伊拉斯谟现在把罗马教廷罪行目录公开钉在时代的墙壁之上——他这位妙语双关的大师利用他那伟大的诀窍，让一切危险的、必不可少的东西都从愚人嘴里说出来，对宗教的弊端进行一次关

键性的进攻。虽然那只挥舞鞭子的手只不过是所谓的愚人之手，但是大家立即就理解了这些话语的批评意图，例如："如果这些最高级的教士、这些教皇、这些耶稣基督指派的地方长官都努力在生活中变得与耶稣基督相似，如果他们忍受他的贫穷，承受他的辛劳，承担他的十字架，分担一切世俗之人对他的蔑视，那么世界上谁又会比他们更该受到人们的祝福呢？只要有那么一次智慧强占了圣父们的精神，那他们又会失去多少财宝啊！将那些巨大的财富，那些神圣的荣耀，将对于如此众多的高官显位，如此不可胜数的豁免、花样如此繁多的赋税、享受和娱乐的分配权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一些不眠的夜晚、斋戒日、祈祷和眼泪以及礼拜和上千种别的辛苦。"愚人的言行一下子失于检点，居然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宣布未来宗教改革的要求："既然耶稣基督的全部学说没有别的依据，仅仅以温良、忍耐和鄙视凡尘为根据，那它就非常清楚这里指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确实想按照他的意愿来武装他的代理人，因此要求他们不仅要脱下鞋子，放下口袋，而且还要脱下他们的衣服，以便精赤条条地去担任他们使徒的职务。他们身上除了佩有一把宝剑之外，不应该有任何别的东西。不过这把宝剑并非那种为杀人越货服务的、引起灾祸的剑，而是精神的宝剑。这种剑一直刺到灵魂的深处，一下子就将所有的激情都置于死地，以便今后只有虔诚庄重地端坐在心中。"

戏谑突然变得声色俱厉。伟大的时代批评家那只可靠的、严厉的眼睛，从丑角戴的那顶有小铃的帽子下面往外看，愚人讲出了成千上万的人憋在嘴边的话。它比当时其他任何一本著作都更加有力、更加透彻、更加清楚地向世界的意识表明了进行一场严肃的教会改革的必要性。在新生事物得以建立起来之前，

往往必须首先动摇现存事物的权威。在所有的思想革命中，批评家、启蒙运动者总走在创造者和改革家前面——先松土，后播种。

但是，仅仅只有否定和徒劳无益的批评在任何领域都不符合伊拉斯谟的思想观点。他指出有错误的东西，仅仅只不过是为了要求正确的东西，但他所进行的指责从来就不是出于高傲自大、吹毛求疵的嗜好。没有任何东西比粗暴的破坏圣像运动对天主教的攻击离这种宽恕的气质更遥远的了——伊拉斯谟作为人文主义者并不梦想反抗教会，而是梦想“重新繁荣”，梦想宗教的复兴，梦想通过恢复基督教昔日拿撒勒人的纯洁来革新基督教的观念。就像在文艺复兴时期正好艺术与科学因为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典范因而焕发青春一样，伊拉斯谟希望通过挖掘教会本身的源泉，通过教义返归福音，因而也就返回到耶稣基督自己的言说上面，“通过发掘隐藏在教条主义教义下的耶稣基督”来纯洁外表上被窒息的教会。伊拉斯谟怀着这个一再提出的愿望——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也是先驱——走到了宗教改革的前列。

然而人文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从来就不是革命，尽管伊拉斯谟通过其进行教会改革的倡议做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开路先锋的工作，但由于他那保持联系的思想，他那极端温和的思想，非常害怕公开的教派分裂。伊拉斯谟决不会以路德、茨温利或者加尔文那种激烈的、清除任何矛盾的方式来确定，在天主教里什么是对的，或者说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样的圣事是允许的，什么样的圣事不合礼仪，圣餐是否应该理解为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他仅仅满足于强调，遵循外在形式本身并非基督教虔诚的真正本质——一个人真实的信仰程度只有在内部才能决定。并

非圣徒崇拜，并非朝圣和吟唱赞美诗，并非神学经院哲学及其徒劳无益的“犹太教”，而是人们的心理表现，是他富于人情味的、基督徒的生活状况把人变成基督徒。把圣徒侍候得最好的人，并非那种收集并崇拜他们的遗骨的人，并非那种去朝拜他们的坟墓，蜡烛烧得最多的人，而是那些在自己的私生活中试图完全模仿他们虔诚的转变的人。比起严格遵守所有的礼拜式和祈祷规定，比起斋戒和做弥撒来，按照耶稣基督的精神生活的个人生活方式更为重要：“我们宗教的核心是和平与同心协力。”伊拉斯谟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不是拼命将活生生的东西窒息在种种套话之中，而是努力将它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他试图有意识地把基督教同广泛的人道联系起来，使它脱离纯教会的范畴。他尽量将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中曾经有过的、道德上完美无缺的一切东西，都作为富有成果的因素吸收到基督教观念中来。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对受到局限的、教条主义狂热的一个世纪说出了这句绝妙透顶、风靡世界的话：“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见到真理，都把它看成是基督教吧。”这样，便架起了这座通往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桥梁。谁像伊拉斯谟那样，以自由思想家的方式处处将智慧、人道和美德视为至高无上的人性的形式，并进而将其视为基督教信仰，就不会再像修行的宗教狂那样将古代的哲学家们放逐到地狱里（伊拉斯谟有一次满怀热情地大声叫着“神圣的伊拉斯谟”），而是昔日一切高尚的和伟大的东西都转移到宗教中去，“这就像犹太人撤出埃及时带走他们的金银器具，好用这些东西来装饰庙堂那样”。按照伊拉斯谟的宗教观，固定的界限不应当把任何一种曾经成为人类道德或者道德精神的一项重要成果的东西，同基督教分割开来，因为在人类当中并不存在基督教的和非基督教的真理。

就其所有形式而言，真理都是神圣的。因此，伊拉斯谟从来也不讲救世主神学、教义学，而是讲“救世主哲学”，也就是生活学——在他看来，基督教只不过是高尚、人道的美德的别名而已。

伊拉斯谟这些基本思想产生的影响同天主教诠注的结构力量和神秘主义者抑制不住的性欲相比，也许显得有些平淡、一般，但这些思想却是人道的。在这里，就像在任何一个知识领域一样，伊拉斯谟的影响涉及到的并非深度，而是广度。他的 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基督教战士手册》）作为即兴作品，是按照一位虔诚的贵妇人的愿望为她丈夫写的警世之作。这部作品变成了一部民间神学手册，宗教改革及其好斗的、极端的要求也一定会通过这本书找到一块事先犁好的田地。不过，并非宣布这场斗争开始，而是通过最后一刻还提出进行调解的建议，缓和这场即将发生的斗争。这就是这位孤独的白费口舌之人的使命。这位大声疾呼之人在一个为了教义方面鸡毛蒜皮的细枝末节在教皇主持的宗教会议上争吵不休的时代，梦想宗教信仰所有正当形式的最后综合，梦想应当使全世界永远摆脱争执和斗争，从而信仰上帝真正上升为人类宗教的这种基督教的复兴。

伊拉斯谟的多才多艺也表现为：他善于用多种方式来表达同样一种思想。这位坚定不移的时代批评家在《愚人颂》里阐明了天主教内部滥用教规的情况，在《基督教战士手册》中，事先梦见有丰富内心生活的、拟人化的虔诚的一种老妪能解的理想。但与此同时，他作为校勘者、语言学家和诠注者，把四福音书从希腊文重新译成拉丁文，将自己关于必须“发掘基督教源泉”的理论付诸实现。四福音书的翻译是一项为路德的德文

《圣经》翻译开辟道路的业绩，对于时代具有几乎同样深远的意义。

回复到真正信仰的源泉，在它们还非常纯洁，尚未同任何教条混流在一起之处寻找它们——这曾经是伊拉斯谟对新人文主义神学提出的要求。他凭着对于时代需要的直觉，比路德早十五年就暗示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他在一五〇四年写道："我不能说，我怎样全力以赴地致力于《圣经》翻译，而一切妨碍我翻译《圣经》或者仅仅是耽误我这项工作的事情，都使我感到多么讨厌。"就像四福音书中所讲述的那样，耶稣基督的生平不应再成为僧侣和教士、通晓拉丁文的人的特权，整个民族都应当而且也必须参与这件事情，"农民应当在犁边，织工应当在织机旁阅读四福音书"，妇女应当能够向她的孩子们传达所有基督教信仰的这一核心。但在伊拉斯谟敢于推动把四福音书翻译成各民族语言的这一伟大思想之前，这位学者就已发现，就连《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这一唯一为教会所容忍、所认可的拉丁文《圣经》译本事后也多次掩盖真相，而且从语言的角度看也是可以争辩的。但是真理不该有尘世的污点，所以他才从事这一巨大工程，将《圣经》再一次译成拉丁文，附上详细的评论，用批判的口气道出他的不同意见和更为自由的见解。这部由弗罗本于一五一六年在巴塞尔同时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出版的、新的《圣经》译本，再一次意味着革命性的一步：自由意志者的研究甚至已经借此机会胜利地推进到最后的学科——神学。但是对于伊拉斯谟而言，典型之处却在于：就连在他进行彻底变革之处，他也在非常巧妙地维护外部形式，最强有力的碰撞也不会变成愤怒。为了挫伤神学家们进攻的锐气，他把这第一部自由的《圣经》译本献给教会的主人——教皇。这位利

奥十世① 教皇本人具有人文主义思想，他在教皇通谕中友好地回答道“我们感到高兴”，他甚至还赞扬伊拉斯谟为这部神圣的著作所作出的努力。伊拉斯谟出于他那妥协的天性，个人往往善于克服教会研究与自由研究之间的矛盾——须知，这种矛盾在别的人那里往往会导致最可怕的敌视。他那调解的天才和他那和解的技巧甚至在这极为紧张的领域内也无往而不胜。

伊拉斯谟以这三本书赢得了他的时代。他澄清了他那一代人的重大问题，他用来描述当时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的那种心平气和、老妪能解的方式，那种和善的方式使他得到极大的同情。人类往往对于那些凭借理智认为有可能取得进步的人怀着深深的谢意，人们理解新世纪的喜悦。这种喜悦是在所有那些激动的僧侣、好争吵的狂热信徒、不可救药的嘲讽者和不可理解的经院哲学教授之后，终于知道了欧洲的一个唯一从人的角度来评价精神事务与宗教事务的人，知道了一个对世界友好、虽然世界存在各种弊端，但仍然相信这个世界，并愿意弄清这个世界的人。这样，便会出现某一个人决心接近他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在他周围聚集着他的信徒，他的创造力同这些信徒默默的期待一道，在不断增长。针对由新兴科学提出的人类道德化和提高人的本质的所有力量、所有希望、所有急躁性，终于在这个人身上找到了它们的焦点：它们认为，要么是他，要么就没有人能够解决这充斥整个时代的尖锐的敌对状态。伊拉斯谟的名字在十六世纪初，从单纯的文学声望变成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要是他大胆的话，他也许可以独断专行地将这种力量用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行改革的行动。可

①利奥十世（Leo X.，1475—1521），意大利籍教皇。

是行动不是他的世界。伊拉斯谟只能澄清，却不能塑造，只能准备，却不能完成。宗教改革前额上写着的将不是他的名字，他播下的种子，别人会来收获。

人文主义的伟大与极限

鹿特丹人伊拉斯谟在四十到五十岁时达到了他荣誉的顶峰——几百年来，欧洲没有比他更伟大的人了。同时代人中没有谁的名字，在那个时代，在那些丢勒的、拉斐尔的、芬奇的、帕拉切尔苏斯的，或者说米开朗琪罗① 的名字中，没有谁的名字在精神宇宙中为人们以同样崇敬的心情提到过，没有哪一位作家的作品以如此不计其数的版本广泛流传，没有哪一位道德的或者艺术的声望能与他的声望相提并论。伊拉斯谟这个人在十六世纪初期简直就意味着智者的典范，意味着“Optimum et maximum”——极其美好和极其崇高，

①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1520）、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三人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瑞士医生，发现及使用了许多新药，对现代医学的兴起作出了贡献。

正像梅兰希顿①在他的拉丁文颂歌中所赞美的那样，意味着科学、文学、世俗与精神事物中的权威。人们时而赞美他是“万能博士”，时而颂扬他是“科学之王”，时而把他誉为“研究之父”和“正当神学的保护者”，人们称他为“世界之光”或者“西方国家的女预言家”，“无与伦比的男人和福尼克斯老师②”。无论怎样赞美他都不过分。“伊拉斯谟，”穆蒂安③写道，“超越了人的范围。他应当像天神一样，受到神灵般的膜拜顶礼。”另外一位人文主义者卡梅拉里乌斯④报道：“每个人都钦佩他、颂扬他、赞美他这位不愿在诗歌王国中被视为陌生人的人。如果有人能诱使他拿出一封信，那么此人的名声就会大振，他就会庆祝这一极其辉煌的胜利。谁能同他讲话，谁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事实上，为获得这位在不久前尚不知名的学者之喜爱的竞争已经开始。这位学者迄今还在用献词、授课和乞讨的书信艰难度日，还在用丢人现眼的奉承话从有权有势者那里得到可怜巴巴的一点牧师薪俸——而现在，有权有势者在追求他。当尘世的权力和金钱不得不为有才智之人服务时，每次都可以看到辉煌的场面。皇帝和国王、王侯和公爵、大臣和学者、教皇和高级教士都必恭必敬地竞相讨得伊拉斯谟的欢心。两个世界的

---

①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德意志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

②福尼克斯（Phoenix），希腊神话人物，阿克琉斯的教师。

③穆蒂安（Mutianus Rufus，1470—1526），德国人文主义者、主教大教堂教士会成员。

④卡梅拉里乌斯（Joachim Camerarius 1500—1574），德国古典学者、基督教信义宗神学家。

主人卡尔皇帝给他提供一个顾问的位置，亨利八世想把他弄到英国，奥地利的奥迪南德想把他弄到维也纳，弗兰西斯一世想把他弄到巴黎。从荷兰，从布拉班特，从匈牙利，从波兰和葡萄牙来了极其诱人的建议。五所大学为获得授予他教职这一荣誉争执不休。三位教皇给他写了表示崇敬的书信。在他的陋室里堆放着富有的崇拜者自愿馈赠的贡物，堆放着金杯和银器。好几车的葡萄酒和很有价值的书籍送来了。一切都在引诱他，一切都在呼唤他，用他的荣誉来增加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位既聪明、同时又持怀疑态度的伊拉斯谟却彬彬有礼地接受所有这些馈赠和荣誉。他允许别人馈赠，允许别人称赞和颂扬，心里甚至还是乐滋滋的。他以毫不掩饰的愉快心情接受这一切，却不出卖自己。他允许别人效劳，却从不接受任何人的服务。他把艺术家的内心自由与坚定不移视为各种道德作用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他就是这种内心自由与坚定不移的不可动摇的先驱。他清楚，他本身永远都是最强大的，不管这是怎样多余的蠢事，他还是愿意循着他的荣誉从一个宫廷走到另一个宫廷，而不把荣誉像一颗闪闪发光、静止不动的明星那样置于自己家园上空。伊拉斯谟早就不再需要去强求任何人了，因为大家都到他那儿去。巴塞尔由于他的存在成为一个国都，成为世界的一个精神中心。没有一个王侯，没有一个学者，没有一个注重声望的人不会在路过时向这位伟大的贤人表示敬意，因为同伊拉斯谟讲过话已经逐渐被视为一种文化上的骑士晋封仪式，拜访他（就像在十八世纪拜访伏尔泰，十九世纪拜访歌德一样）被视为对于看不见的精神力量的象征性代表人物所表示的最明显的崇敬。为了得到他亲手写在他们宾客题词留念册上的缩写签名，那些高贵的贵族和学者走好几天路，从老远的地方来朝拜他。有

一位红衣主教是教皇的侄子，曾经三次邀请伊拉斯谟赴宴，均遭拒绝。这位红衣主教在其邀请遭到拒绝时，并不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他居然到弗罗本肮脏的印刷室去拜访伊拉斯谟。伊拉斯谟写的每一封信，收信人都把信包上锦缎，就像对待圣人的遗物一样，怀着十分崇敬的喜悦之情把它揭开，甚至连大师的一封推荐信也会把它当作开启所有的大门的万能钥匙——还没有一个人仅仅凭借其精神存在而在欧洲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歌德没有，伏尔泰几乎也没有。从我们当代的立场来看，对于伊拉斯谟的这种重要地位，不管从他的著作，还是从他的本性，暂时都还无法完全理解。如今我们把他视为聪明、宽厚的人，多才多艺、变化多端的人，活泼、可爱的人，但又并非具有吸引力的、改造世界的人。不过伊拉斯谟对于他那个世纪而言，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他已经成为他那极为隐蔽的精神渴望具有象征性的标志。每一个想要更新的时代都把自己的理想首先反映到一个形象上，时代精神总在进行自我选择，以便自己能清清楚楚地理解自我的本质，并把一个人视为典型。当他把这种个别的、而且往往是偶然的个体提到远远超过其实际程度的高度时，他几乎为自己的热情感到欣喜若狂了。新的感情和想法往往只能为出类拔萃的人所理解，广大群众永远也无法 按照抽象的形式去理解它们，而只能从感性和人神同形同性方面去理解。因此他们喜欢用一个人、一个形象、一个他们试图虔诚模仿的榜样来取代观念的位置。这种时代愿望有一阵在伊拉斯谟身上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这个“多才多艺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无所不知的人、自由自在地观察未来的人已经成为新一代人的典范。时代用人文主义来欢庆自己思考的勇气和新的希望。精神力量第一次被置于仅仅是遗传的和流传的力量前

面。旧的统治者本人自愿从属于新统治者这一事实证明，这种重新评价实现得多么有力，多么迅速。如果说卡尔五世① 竟然弯下腰去为牧人之子提香② 拾起掉到地上的画笔，因而使他的廷臣感到惊恐万分；如果说教皇居然听从米开朗琪罗粗暴的命令，离开西斯廷教堂，以免干扰大师；如果说王子们和主教们不去收集武器，而突然搜集起书籍、绘画和手稿来，那也只是一个象征而已。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自觉地屈服于这样一种认识：在西方国家，有创造性的英才的力量已经上台执政，艺术作品的寿命肯定会超过战争的和政治的时代建筑物。欧洲第一次在精神统治地位中，建设统一的西方国家的文明中，在堪称楷模的创造性世界文化中看到了自己的意义和使命。

时代把伊拉斯谟选作这种新思想的旗手。它把他作为“反野蛮之人”，作为反对一切落后性、一切传统主义的战士，作为一种更加高尚、更加自由和人道的人性的宣布者，作为即将到来的世界主义的指路人，置于所有人的前面。我们今天当然感觉到这种大胆寻觅的勇气，这种顽强奋斗的意志。那个世纪这种浮士德③ 式探索真理、追求理想的精神，在“多才多艺的人”另外一种深刻的类型中，在芬奇和帕拉切尔苏斯身上表现得要出色得多。然而恰恰是那种最终有损伊拉斯谟的伟大的东西，他那明显的（往往是过于明显的）悟性，他对于可见事物的满足，他那温文尔雅的本性，在当时使他交了好运。时代凭

①卡尔五世（Karl V.，1500—1558），西班牙国王。

②提香（Tiziano Vecellio，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家。

③歌德诗体悲剧《浮士德》的主人公，以其不断追求、永不满足著称于世。

借直觉进行了正确的选择：每一次世界革新，每一次全面的变革都要试一试最温和的改革家是否正确，而不会去试那些暴躁的革命者；时代把伊拉斯谟视为不声不响地、但又是连续不断地发挥作用的理性的象征。有一个美妙的瞬间，欧洲在同样文明的人文主义梦想方面达成共识。这种文明将会用一种世界通用语，一种世界宗教，一种世界文化结束古老的、灾难性的纷争。这种令人难忘的尝试不能不使人想起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形象和名字来。他的思想、愿望和梦想有一段时间曾经一度风靡欧洲。实现西方国家的最后统一与和平这一纯洁的精神意愿，在我们共同的祖国那用血写成的悲剧中仅仅只不过是一个迅速被人遗忘的插曲而已。这种情况既是他的，同时也是我们的灾难。

伊拉斯谟这个第一次——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包括欧洲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和所有语言的帝国实行的是一种温和的统治。因为并不使用暴力，唯一的办法是通过精神成就那招徕人的和令人信服的力量来达到目的，所以人文主义厌恶任何暴力。因为唯一的渠道是通过大声疾呼来进行选择，所以伊拉斯谟不实行任何自以为是的独裁。自愿和内心的自由是他那看不见的帝国的根本大法。伊拉斯谟的思想观点不像以前的所有王侯和一切宗教那样采取不宽容的态度，要人们都听命于他们人文主义的和博爱的理想，而是像一盏开着的灯，把在黑暗中到处乱窜的动物引诱到它那纯洁的领域中去那样，用和风细雨、以理服人的方法把那些仍然无知无识的人和古怪的人引入开朗的境界。人文主义没有帝国主义的思想，它没有仇敌，也不想要奴仆。谁不愿意进入上流社会，谁就可以待在圈外，人们并不强迫他，不用武力迫使他相信这种新的理想。每一种不

宽容——这种不宽容甚至往往来源于内心的不理解——对于世界谅解的这一学说都是陌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拒绝任何人进入这一新的精神协会。每一个渴望教育和文化的人都可以成为人文主义者。任何等级的任何人，不管是男是女，是骑士还是教士，是国王还是商人，是俗人还是僧侣，都可以进入这一自由的团体，而不会向任何人提出问题，问及种族和阶级出身，问及语言或者民族归属。这样一来，在欧洲人的概念中便出现了一种新的概念——超越国家的概念。各种语言迄今为止还是横亘在人们之间的那道难以通过的隔墙，现在这些语言再也不会把各族人民分割开来了。通过普遍通行的古拉丁文这一共同语，在他们所有的人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同样，关于祖国的理想也会成为不充分的理想，因为这种理想是一种过于狭隘的理想，它将被欧洲理想，即超越国家的理想所战胜。"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共同的祖国。"伊拉斯谟在他的《和平怨》中这样宣告。关于欧洲立场的这个重要阶段在他看来，就是国家之间杀气腾腾的纷争，在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任何一种敌对都是荒谬："为什么所有这些愚蠢的名字拆散我们的能量，要比耶稣基督这一名字联合我们的能量更胜一筹?"欧洲内部所有这些纷争对于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人来说，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误会而已，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了解太少，教育太少。因此，未来欧洲人的任务就应当是：不要凭直觉去参与提出小王国的、宗教狂的、国家利己主义者的那些只图虚名的要求，要经常强调结合和联系，强调欧洲高于各个国家，全人类高于祖国，要把仅仅作为宗教团体的基督教界的概念转变为普遍的基督教信仰的概念，尽心尽力为他人服务的、恭顺的人类之爱的概念。因此，伊拉斯谟的思想所要达到的目的，比起

只是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团体来，更为崇高。在这种思想当中，已经有一种要求实现西方国家新型的、精神上的统一形式的坚定意志在发挥作用。虽然从前已经有个别人士试图实现欧洲的一体化，他们之中有罗马的凯撒们，有卡尔大帝，后来拿破仑也这样做，但是这些独裁者都力图用火与剑将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征服者的拳头和暴力的铁锤将弱国打得粉碎，以便把它们同强国连在一起。但在伊拉斯谟这里——这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区别！——欧洲却显现为一种道德理想、一种完完全全非利己主义的、精神上的要求。同伊拉斯谟一道问世的是，在共同文化与共同文明前提下的欧洲合众国那个时至今日尚未实现的假定。

这些谅解思想和所有谅解思想的先驱伊拉斯谟的理所当然的前提是消除各种暴力，尤其是消除战争这种“使一切美好事物都毁于一旦的灾祸”。伊拉斯谟被视为和平主义的第一个文学理论家。他在持续不断的战争年间写了不止五篇反战文章。一五〇四年写了致（美男子）腓力四世① 的敦促信。一五一四年写了那封致坎布雷主教的请求信，谈到“他们为了耶稣基督的和平的缘故，喜欢以基督教的王侯自诩。”一五一五年写下了在《谚语》中的“那篇冠以永远名副其实的标题的著名文章”Dulce bellum inexpertis（《战争只有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才是美好的》）。一五一六年他在其《对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君王的指教》中提醒年轻的皇帝卡尔五世。一五一七年发表那篇用各种语言传播开来，而在所有民族当中又是闻所未闻的《和平怨》。这是“在欧洲所有国家和所有民族那里被拒绝、被驱逐、

①（美男子）腓力四世（Philip der Schöne，1268—1314），法国国王。

被束之高阁的和平的抱怨。”

但就是在当时，在距今差不多五百年前，伊拉斯谟已经知道，一个善于辞令的和平之友多么难以指望感谢与赞同。“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这种情况被视为兽性、傻气和异端邪说——有人居然反对战争”，张口讲出这种话来，这种话不会妨碍他在封建贵族动武权力和极其野蛮的暴行肆虐的年代，一再果断地宣布他对王侯们的争强好胜发起的进攻。按照他的意见，当西塞罗① 说“非正义的和平比最正义的战争还要好”时，西塞罗是对的。这位孤独的斗士提出时至今日仍然可以从中汲取丰富营养的那一武库论据来反驳战争。“如果说动物要相互袭击的话，”他抱怨道，“那我是理解的，我会原谅它们的无知。”不过人们要是认识到战争本身必然意味着非正义那就好了，因为战争通常并不殃及那些煽动和进行战争的人，而是几乎将它的全部负担往往都转嫁到无辜者，转嫁到既不该去赢得胜利，也不该去遭到失败的穷人身上。“大部分人都是与战争毫不相干的人，即便在战争中万事如意，一部分人的满怀喜悦也是另一部分人的损失与不幸。”因此，战争的观念与正义的观念决不会有任何关联，如此看来——他再一次问道——战争怎么可能会是正义的呢？在伊拉斯谟看来，无论是在神学领域还是在哲学领域，都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唯一的真理。对他而言，真理总是含义很广，五彩缤纷的，就如同权力一样。因此，“王侯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比走向战争更为谨慎，而且也不一定非得坚持自己的权力不可，因为谁又不把自己的事业视为正义的事业呢？”

①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哲学家。

一切权力都有两个方面，一切事物都“染上了某种色彩，涂上了某种颜色，而且受到各党派的糟蹋”，即便是某人在权力方面自命不凡，这种权力也不会由武力来决定，而且也决不会用武力来结束，因为“战争来自他人，来自第二者”。

因此；在有识之士看来，用武器来作出决定绝非一种有道德的、解决矛盾冲突的办法。伊拉斯谟明确宣布，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各国有识之士、各国学者不应中断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态度决不应该是用狂热的派性来增加各种见解、各国人民、各个种族和各个阶级的对立，他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守人性和正义的纯洁领域。他们永恒的使命仍然是：用世界联盟和世界基督教信仰的思想来对抗“战争那种不吉利的、非基督教的、野蛮残暴的荒唐”。因此，伊拉斯谟在指责教会这块至高无上的道德圣地时，没有什么比说它为了扩大尘世的权力而放弃了伟大的、“基督教世界和平”的奥古斯丁思想更为厉害的了。“神学家们和基督教生活方式的大师们不屑于成为我主耶稣如此深恶痛绝的那种事件的主使人、发动者和推动者，”他怒吼道：“主教的权杖同宝剑，主教的帽子同头盔，福音书同盾牌怎么能碰到一起？这同用唯一的喇叭来宣扬救世主与战争、上帝与魔鬼又有何干？”所以，“随军牧师”也就无异反《圣经》之荒谬，因为他否认了他在说“和平与你们同在”时，他的主和导师对他说出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福音。

每当伊拉斯谟提高嗓门反对战争、仇恨和偏见时，他总会充满激情。但是他这种愤怒的激情决不会影响他对世界的明白观察。同理想主义者是打心眼里，怀疑论者是从理智方面意识到所有的阻力一样，伊拉斯谟也意识到在现实范围内实现那种“基督教的世界和平”，那种人道理性的绝对统治所遇到的所有

阻力。这位在其《愚人颂》中描写了人类形形色色的、无可救药的空想与荒谬之人，并非那种理想主义的梦幻者——那种梦幻者认为，人们用文章、书籍、布道和宣传小册子就可以去掉人性内在的暴力欲念，或者说仅仅抑制一下这种欲念。他对这一事实决不会视而不见：自野蛮人时代开始，人类若干世纪，多少千年以来，这种力量欲望和好斗性，对于过去披着人皮的野兽对另一些披着人皮的野兽的原始仇恨的模糊回忆，都在鲜血之中酝酿着；为了彻底根除人类的兽性，使人类具有人的属性，还必须进行若干世纪，也许是好几千年的道德教育和文化薰陶。他知道，不可能用温和的和道德说教的言词把基本的欲望一笔勾销，他把这个世界上的野蛮当作一种既成事实，首先是当作一种不可制服的东西接受下来。因此，他真正的斗争在另外的领域进行。他作为一个有才智的人往往只能向有才智之士救助，他不求助于被领导者和被诱骗者，而求助于领导者，求助于王侯、祭司、学者、艺术家，求助于他所知道的那些对于欧洲世界的每一次纷争都负有责任的人。他作为一位有远见的思想家，早就已经看到，暴力欲念本身没有世界性的危险。只是暴力不能长久，它的打击既盲目，又疯狂，但在其意愿方面却又漫无目的，在其思想方面却又鼠目寸光，在经历了这样一些突然发作之后，它便软弱无力地瘫了下去。甚至就在它像瘟疫般四处蔓延，在心理上激怒一批又一批人之处，那些误入歧途的人群也只不过是一些放荡不羁的人群，一旦一时的冲动冷静下来，他们又会四散而去。在历史上，各次起义和战争的爆发如果没有思想引导，是绝不会危及现存制度的。只有当权力欲望为某种思想服务，或者说这种思想利用那种暴力欲念时，才会出现真正的骚乱，出现流血的和具有破坏性的革命，因为只有通过某

种口号，团伙才能结成党派，只有通过组织才能组成军队，只有通过某种信条才会形成运动。在人类所有的大规模暴力冲突中，人类与流血事件密切相关的暴力意志所欠下的债务，比起引起这种暴力意志并促使该意志去反对事先确定的另一部分人的意识形态来还要少。首先是狂热，是这种企图将某种思想，也就是自己思想的专政作为唯一允许的信仰形式和生活方式的专政，强加于整个宇宙的、精神和暴力的杂种，将人类的集体分裂成敌人或者朋友、追随者或者反对者、英雄或者罪犯、信徒或者异教徒。因为这种狂热只承认自己的体系，只相信自己的真理，因此它就必然采用暴力，以镇压上帝所希望的形形色色的现象中的任何一种别的现象。并非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所有武力限制，并非宗教裁判所和检查机关，焚烧异教徒的木柴垛和断头台，而是死板的狂热，才是这种片面性的天才和普遍性的死敌。这种某一思想的俘虏——这个总在试图将整个世界拉进他的监狱并将其禁闭起来的俘虏，才在盲目地使用暴力。

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总是指出人类的共同性即他们至高无上的、最神圣的财产，因此在他看来，有才智之人所犯下的过失，不可能比他用片面的意识形态给群众时刻准备从事暴力活动的意志提供关键性借口更为严重的了，因为他以此激起那些野蛮突破他的原始想法，摧毁他最纯洁的意图的原始自然力。一个人就可以使群众群情激昂，但他却几乎无法将这种热情拉回原处。谁对压下去的火焰低声耳语，谁就必须明白，一股毁灭性的烈焰会冲天而起；谁由于将生活、思想和信仰的某一种体系宣布为唯一适用的体系而激起狂热，谁就必须认识到这种责任：他这样做是在号召世界分裂，号召进行一场反对其余任何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精神上的，或者实际上的战争。一种思

想的每一种专政都是对人类思想自由的宣战。谁像伊拉斯谟一样，为各种思想寻找一种至高无上的综合，一种全人类的和谐，谁就必须将思想片面性的，极其盲目的不愿意理解的各种形式，视为对于自己相互理解思想的进攻。因此，受到人文主义教育的、具有伊拉斯谟式人道思想的人，无权献身于任何意识形态，因为一切思想就其本质而言，都在谋求霸权地位。他不应同任何党派结合，因为任何党派成员的义务都是：站在党派的立场去观察，去感觉，去思考。他有各种理由维护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因为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正义，而正义又是唯一应当成为全人类最高理想的共同观念。因此，伊拉斯谟式的思考就是独立思考，伊拉斯谟的作用就是按照相互理解的精神发挥作用。伊拉斯谟学说的信徒——人性的信仰者不能促进其生活范围内的分裂倾向，而应当促进联合，不能支持主观片面的人的片面性，不能支持相互对立的人的敌对情绪，而应当传播理解，促成谅解。时代在其偏见方面越是狂热，他在自己的不偏不倚方面就应该更加坚定。须知，这种不偏不倚关注的是所有这些谬误和混乱当中的人类共性，他是世界上思想自由与正义不可贿赂的律师。因此，伊拉斯谟承认各种思想都有自己的权利，但不允许任何一种思想有自以为是的权利。他这位自己就试图去理解和颂扬愚蠢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有站在任何理论和命题的对立面，而只是在这种理论和命题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理论和命题时，才同它处于敌对状态。博古通今的人文主义者恰恰因为世界的多样性才热爱这个世界，它的种种矛盾对立并不使他感到害怕。没有什么东西比想要按照狂热分子和系统化者的方式消除世界上的对立离他更远的了，因为这种狂热分子和系统化者试图把所有的价值都统一起来，把所有的花都变成一

种形式和颜色。恰恰是这一点——不把对立视为敌对，为所有表面上互不相容的东西寻找高一级的统一，人类的统一，成为人文主义精神的标志。既然伊拉斯谟善于使平常势不两立的因素——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文化，自由信仰与神学，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握手言和，他必然以为，甚至就连整个人类有朝一日都会将其表现的多样性转化成一种令人高兴的和谐，将其矛盾转化成一种更为高级的一致。欧洲谅解、精神谅解这种最后的世界谅解，本来就是通常所说的冷静、合理的人文主义唯一的宗教信仰成分。他像这个黑暗世纪的其他人宣布自己信仰上帝那样，以同等的热情宣布他信仰人类的消息：不带人类片面性地献身于人类的共同性，因而也就变得越来越人道，越来越具有人情味，这就是世界的意义、目的和未来。

人文主义只知道进行这种人性教育的一个途径——教育途径。伊拉斯谟和伊拉斯谟主义者认为，只有借助于教育和书籍，人类身上的人性才可能得到增强，因为只有那种没有教养的人，那种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才会毫不迟疑地沉醉于激情之中。有教养的人，文明的人——他们思想方面悲剧性的错误结论就在于此——再也不会运用暴力。如果有教养的人、有文化的人和文明的人占了上风，混乱和暴行自然而然就会逐渐减少，战争和精神迫害就会变成业已过去的时代错误。人文主义者由于对文明程度估计过高，因而错误理解了具有不可驯服的暴力这一欲望世界的原始自然力，并且通过他们的文化乐观主义，使群众仇恨和人类精神狂热变态的那个可怕的、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变得平庸乏味。他们的计算过于简单：在他们看来，存在着两个阶层，即下层和上层，下面是不文明的、粗野的、热情的群众，上面是有教养者、通情达理者、人道之人、文明之人秩序

井然的领域。在他们看来，只要把越来越多的下层人物成功地吸收到文化的上层中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就算完成了。正如像在欧洲有越来越多昔日曾经是猛兽横行的不毛之地被开垦出来一样，在人们身上也必须逐渐根除我们欧洲范围内的愚昧和野蛮，创造人性的一个自由、开化和富有成果的地区。所以，他们以人类不断向上攀登的思想取代宗教思想。这种进化论思想早就通过达尔文形成一种科学方法，它通过人文主义者变成道德理想：十八、十九世纪就把这种理想作为精神支柱，伊拉斯谟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主要原则。尽管如此，却没有任何事情比把人文主义，尤其是把伊拉斯谟视为自由主义的先驱更不合适的了。伊拉斯谟及其信徒任何时候都没有想到给予人民，给予缺乏教育的人和未成年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缺乏教育的人都是未成年的人——哪怕是少得可怜的一点权利。尽管他们在抽象地爱着全人类，但他们却非常谨慎，避免同外面的平民接近。如果再仔细观察，就可以见到在他们身上没有旧式贵族的高傲自大，而只有新式贵族的高傲自大，即那种影响三个世纪的、学术上的狂妄自大。这种狂妄自大只赋予懂拉丁文的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以确定是与非、道德与不道德的权利。同王侯以权力的名义和教会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治理世界一样，人文主义者也同样坚决地以理性的名义治理世界。他们梦寐以求的是一种寡头政治，一种文化贵族的统治：按照希腊人的意思，只有那些精英，那些最有教养的人，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才应当担任城邦的领导，国家的领导。他们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凭借自己更有预见性的、更为人道的观点，觉得只有自己才有资格作为调解人和领袖，介入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他们看来似乎是愚蠢的、落后的纠纷。但是他们根本

不想借助于民众，而是通过民众来改善现状。因此，人文主义者从根本上来讲并没有抛弃骑士制度，而是用思想形式来复兴这种制度。他们希望像那些人用剑征服世界一样，用笔来征服世界，他们像那些人创造一种独特的、脱离“野蛮人”的社交惯例一样，给自己创造了一种彬彬有礼的礼仪。他们将自己的名字译成拉丁文或者希腊文，以掩盖其出身平民的身世，使自己的名字显得高贵。他们自称梅兰希顿，而不称施瓦茨埃尔德，自称迈柯尼乌斯，而不称盖斯许尔斯勒，自称奥利安尼乌斯，而不称厄尔施莱格尔，自称季特拉乌斯，而不称科赫哈费，自称科克拉乌斯，而不称多布尼克。他们特别仔细地穿上飘动的黑色长袍，以便从外表上就能同其他市民阶层保持一段距离。他们认为用母语来写一本书或者一封信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就像一个骑士解除了武装，人们要求他别骑着骏马走在队伍前面，而要在队伍中同普通的士兵一道前进一样。每一个人都感到，通过共同的文化理想有义务在交往中保持一种特别高尚的举止，他们避免激烈的言词，把在粗鲁与野蛮的时代培养文雅的礼貌当作一种特殊的义务。这些精神贵族在讲话和文章，在言谈和举止方面刻意追求思想和表达的雅致。这样，便在这个不用十字架，而用书作为旗帜的教士团中，再一次映现出同马克西米连皇帝① 一道进入坟墓的骑士制度那最后的光辉。就像高贵的骑士为大炮那粗暴的、喷射出铁砂的威力所制服那样，这一群高尚的理想主义者也会十分美妙，却又是束手无策地屈服于某个路德、某个茨温利的人民革命那愤怒的、农民力量的冲击。正

①此处应为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是这种对于民众的忽视，这种对于现实的漠不关心，从一开始就使伊拉斯谟帝国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任何可能性，使他的思想失去了直接发挥作用的力量。人文主义器官上的根本性错误就在于：它想要居高临下地教育民众，而不是去试验一下，去理解百姓，去向他们学习。这些学究式的理想主义者以为已经在统治世界，因为他们的帝国地域辽阔，因为他们在所有国家、宫廷、大学、修道院和教堂都有自己的仆人、公使和使节。这些人在迄今为止仍然野蛮的地区自豪地报告着“教育”和“雄辩”的进步。但是这个帝国在其深处只有一个人数不多的上流社会，它同现实的联系十分稀少。每当来自波兰和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葡萄牙的信件每天每日给伊拉斯谟带来鼓舞人心的消息时，每当来自五洲四海的皇帝、国王和教皇寻求他的恩宠时，伊拉斯谟在某些时刻却情愿把自己关进书斋，沉醉于幻想之中——这个理性的帝国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但是他在这些拉丁文信件上面看不见千百万群众的沉默，也听不见发自无法测定其深处的、越来越激烈的怨言。因为对他来说民众并不存在，因为他认为这些人粗俗无礼，认为企图得到群众的欢心，竟然与毫无教养的人、与“野蛮人”为伍，有失一个有教养的人的身份，所以人文主义往往只是为了幸福美满，几乎没有，甚至从来没有为民众而存在过，它那柏拉图式的人类王国终究是一个虚幻境界。它照亮全世界的时间极其短暂，它可以用神奇的目光去注视一个纯粹的创造性英才的形象，而且极其快乐地从高处俯视那个阴暗的世界。然而这个冷酷的、矫揉造作的形象却经不起一场真正的风暴——这场风暴正在黑暗中形成——它只有束手待毙，转瞬即逝。

人文主义思想伟大，但大声讲出这些思想的人却并不伟大

——这就是人文主义最大的悲剧和它迅速失败的原因。这些闭门造车的理想主义者就像纯粹的学究式社会改革家一样，总免不了有点滑稽可笑，这些干瘪的人们全都是些友善、正直、有点自负的书呆子，他们就像在用精神化妆一样，都有自己的拉丁文名字——学校教师式的书生气使他们身上最活跃的思想蒙上了灰尘。伊拉斯谟这些身材矮小的同事带有一种学究气的幼稚，令人感动，他们有点像那种老实人，就是现在，人们在慈善与社会改革家联合会中还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是一些信仰进步就像信仰宗教那样的理论上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些在斜面写字台前设计一个有道德的世界、写下持久和平命题的、清醒的梦幻者，而这时在现实世界中战争却接二连三，持续不断，就是那些向他们的相互理解思想热烈鼓掌致意的教皇、皇帝和王侯，与此同时却彼此串通一气，将世界置于熊熊烈火之中。如果能找到一部新的西塞罗手稿的话，那么人文主义部族就会认为：宇宙也许就会在它的赋格曲中由于欢腾而发出轰鸣。每一种论战性的小册子都会使他们变得激昂慷慨。但是，是什么东西使街头巷尾的人们激动不已，是什么东西在群众内心深处起着根本性的支配作用，他们却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既然他们闭门不出，所以他们善意的话语也就在现实中引不起任何共鸣。由于这种灾难性的隔离，由于缺乏激情与普及，人文主义从来就没有使它那些有益的思想结出丰硕的果实。在骨子里包含着人文主义学说的那种杰出的乐观主义，不能创造性地成长，也无法得到发展，因为在这些人类思想的理论教育家当中，还没有一个善于运用语言未削弱的自然力，眼光向下，呼唤庶民百姓的人。一种伟大的思想、神圣的思想在软弱无力的一代人中枯萎了几个世纪。

然而，在人类信任的神圣云雾用它那柔和的、不流血的光辉使我们欧洲大陆闪闪发光的这一世界性时刻，它却是美好的，尽管它的幻想是一种仓促的幻想，但各国人民却已经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得到和平安定，并且联合起来。我们应当向它表示敬意和感谢。在世界上，这样的人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拒不承认历史无异于麻木不仁、单调乏味的自我重复，无异于披上另一种外衣，变换花样，做出的同样荒唐的游戏，而是相信：历史在道德方面意味着进步，我们这一代人在看不见的阶梯上可以从兽性上升到神性，从血腥的暴力上升到明智有序的精神，完全谅解的最后的，也是最高的阶段已经临近，几乎已经实现。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创造了这样一种世界信仰的乐观时刻，因此，我们要热爱这个时代，要尊重它那富有成果的幻想。这在当时到底是第一次使我们欧洲的一代人产生了自信心，去超越过去所有的时代，去塑造甚至比希腊和罗马更加高尚、更有学识、更为聪明的人类。而现实似乎也同意这第一批欧洲乐观主义的宣告者的观点，这些美好的事情难道不就是发生在超过昔日的一切那些日子吗？在丢勒和芬奇身上不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宙克西斯① 和阿佩莱斯②，在米开朗琪罗身上不是出现了一个新的菲迪亚斯③ 吗？难道不是科学按照明确、新颖的法则来整理日月星辰和凡尘世界？难道不是从新的国家涌流而入的大量金钱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财富，而且这些财产又创造了新的艺术？

---

①宙克西斯（Zeuxis，公元前5世纪末），古希腊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以其壁画和镶板画著称于世。

②阿佩莱斯（Apelles，公元前4世纪），希腊划时代早期画家，被誉为古代绘画大师。

③菲迪亚斯（Phidias，约前490—前430），希腊雅典雕刻家。

难道不是如今将创造性的文字、将创造文化的文字成千倍地撒向人间的谷登堡① 的魔术得到了成功？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伊拉斯谟及其同伴都在这样欢呼。人类在规劝和馈赠方面如此浪费自身的力量，他们不能不认识到自己的道德使命：在将来只需要更多地友好相处，行为端庄，最后根除他们野兽本性的一切残余。胡滕② 的话就像短促的喇叭声，响遍世界："这是一种生活的乐趣"，新欧洲的公民们从伊拉斯谟王国的城垛上深信不疑、焦急万分地看到未来地平线上的一道光线在闪光。看来，这道光线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精神黑夜之后似乎是在宣告世界和平的白昼终究来临。

但是，这并非黑暗世界上空天色破晓的神圣曙光。这是一场将要摧毁他们那理想世界的火灾。就像日耳曼人进军古典的罗马一样，路德这位狂热的、行动迅速果断的人，用一种爱国民众运动不可抗拒的冲击力，便闯进了他们越超国家的、理想主义的美梦之中。还在人文主义真正开始其世界联合的行动之前，宗教改革已经用铁一般的锤击打破了欧洲最后的精神统一，捣毁了普世教会。

---

①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约 14 世纪 90 年代—1468），德国工匠和发明家，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一直沿用到 20 世纪。

②胡滕（Ulrich von Hutter，1488—1523），德国法兰克尼亚骑士和人文主义者。

伟大的对手

人们很少在未得到警告的情况下就面临着决定性的势力，面临着命运和死亡。它们每一次都要事先派出一位谨慎的使者，但要掩盖其面貌，而对方往往并不理会这种神秘莫测的呼喊。在那些年代，不计其数表示赞同和崇拜的书信堆满伊拉斯谟的书桌。在这些书信当中，可以找到一封一五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由萨克森选帝侯秘书施帕拉丁① 写来的信。施帕拉丁在表示钦佩的客套话和学术性的通告之间讲道：在他那个城市，有一位对伊拉斯谟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年轻的奥古斯丁教团僧侣在原罪问题上与他意见不同。他不赞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说什么人们公正地行动，就会公正地评价，而是相信，只有当一个人有正义

①施帕拉丁（Georg Spalatin，1484—1505），德意志人文主义者。

感时，他才可能公正地行动；“个人必须转变，然后才有行动。”

这封信表述了一段世界史。因为这是马丁·路德博士——那位未署名的、名不见经传的奥古斯丁教团僧侣并非别人——第一次对伟大的大师讲话。他的异议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已经接触到宗教改革的这两位伟大武士后来会在这方面相互对立的中心问题。可是伊拉斯谟当时看那封信时却并不在意。这位受到全世界竞相争取的大忙人，哪里还会有时间同萨克森某地的一个毫无名气的小僧侣认真争论神学问题。他把信看完了，却丝毫没有想到，从这一时刻起，他生活中的和世界上的一种转折已经开始。迄今为止，他仍然独自一人，成为欧洲的主人和福音新教学说的大师，但现在却冒出了这个伟大的对手。他用手指轻轻地、几乎听不到声音地敲打着他的房子和他的心窝。马丁·路德这位在此还不愿说出姓名的人，世界很快就要将他称之为伊拉斯谟的继承人和胜利者。

路德与伊拉斯谟之间在精神空间这初次的相遇之后，在他们一生之中却再也没有尘世空间的个人相逢。这两位男子汉出于本能，从最初一刻直至最后一刻，相互都在回避，而在不可胜数的文章和不计其数的铜版画中，他们却画像挨着画像，名字挨着名字地作为摆脱罗马人奴役的解放者，作为德国最早的、正直的福音传教士，受到人们的颂扬。历史由此给我们带来一种巨大的、戏剧性的效果，因为谁会错过观察这两个伟大的对手相互之间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机会哩！世界命运很少对两个人像伊拉斯谟和路德那样，从性格学方面和身体方面，强调其如此全面的对比。他们在肉体和血液中，在标准和形式方面，在思想观点和生活状况方面，从外在的躯体直至最深层的神经，仿佛都属于各不相同的、天生敌对的性格类型——和蔼对狂热，理

性对激情，文化对原始自然力，世界主义对民族主义，进化对革命。

这种对立已经在身体方面从感官上显露出来：路德这位矿工的儿子和农民的后代，长得五大三粗，全身抖动着，简直被他身上聚集着的力量逼成了危险人物。他充满活力，而且也对这种活力具有极大的乐趣——“我吃起东西来像个波希米亚人，喝起酒来像个德国人”——整个民族一段挤得满满的、过多的，几乎是在爆裂开来的生命力、冲击力和野性，都集中在一种多余的天性之中。只要他提高嗓门，整个管风琴都会用他的语言发出轰鸣。他的每一句话都使人感到兴趣，都有力、粗俗，活像农民刚烘出来的褐色面包。人们从中感到大自然的所有自然力，感到地球及其气味和泉源，粪肥和肥料——这火一般的讲话闯入德意志，它像雷雨的威力一样野蛮，具有破坏性。路德的天才在他这种充满感性的激烈方面的表现，比起它在他的理性中的表现来，要胜过一千倍。就像他说口语，但要大量补充形象化的语言一样，他并未意识到这是由于群众的缘故，他竭尽满怀激情的潜力来表达他们的意愿。他的特性仿佛就是突破一切德意志传统，突破德国一切抗议的和反叛的、意识到世界有本能。在这个国家接受他的思想的同时，他已经进入了自己国家的历史。他将自己基本的原始自然力又交还给了自然力。

看到这个长得敦实、皮肉粗糙、骨骼粗壮、精力充沛的凡夫俗子路德，看到意志那成堆的小丘咄咄逼人地从低低的前额向外突出的这个人，人们就会想到米开朗琪罗那个摩西额上的肉瘤；看到这个血气方刚的人，人们就会想到智慧之人伊拉斯谟，想起那个羊皮纸色、细皮嫩肉、瘦骨嶙峋、虚弱衰老、谨小慎微的人；只要看看这两个人的身体，就可以理解：在这样

的对手之间，长时间的友谊或者谅解是决不可能的。伊拉斯谟总是体弱多病，总是在他房间的阴影里冷得发抖，总是裹在他的皮大衣里面，就像路德几乎使人痛苦不堪的过于强壮一样，他永远都是过于虚弱。路德知之甚多的事情，他却知之甚少。当这个弱不禁风的人往往不得不用浓烈的勃艮第葡萄酒来保持自己那可怜的、苍白的血液的温度时——在小事情上的对立也是极其明显的——路德每天每日都需要他那“浓烈的维滕贝格啤酒”，以便抑制他那又热又红、胀得很粗的血管，让他晚上睡个好觉。路德讲话时，房子会轰鸣，教堂会震动，世界会摇晃，甚至在同朋友一道用餐时，他也会哈哈大笑。除神学之外，他多数情况下还表现出对于音乐的爱好，他喜欢引吭高歌，唱男声洪亮高亢的歌曲。伊拉斯谟则相反，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细声细气，活像一个肺病患者。他字斟句酌，使句子变得完满，他刻意雕琢，使它们成为精细纤巧的噱头。而路德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甚至他的笔也“像一匹盲马”那样横冲直闯。从气氛看，威力来自路德的特性：他通过自己那家长式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本质，用一种臣服的从属性方式，抓住了所有环绕在他周围的东西，抓住了梅兰希顿、施帕拉丁甚至王侯们。伊拉斯谟的力量则相反，它在自身不抛头露面的场所，在书信中，在文章里，在文字上表现得最为有力。他丝毫不感谢自己那矮小、可怜、被人忽视的肉体，而将一切都仅仅归功于他那极高的、广泛的智慧，他那渊博全面的智慧。

然而就连这两个人的智慧也来自思维世界截然不同的种类。毫无疑问，伊拉斯谟更有远见，知识更渊博，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他不熟悉。他那抽象的理智朗如白昼，穿过奥秘的一切裂缝，照亮各种现象。路德则相反，比起伊拉斯谟来，他的

视野要窄得多，但却更有深度。他的世界比伊拉斯谟的世界更狭窄，要狭窄得多，但他却善于赋予他的每一种思想，他的每一种信念以自己性格的活力。他把一切都往里面拉，然后在那里，在殷红的血液里加温。他使各种思想都充满他那生气勃勃的力量。他煽起对于这些思想的狂热，他一旦认识到的和承认的东西，他决不放掉。每一种看法都同他整个的本质生长在一起，从他那里得到巨大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路德和伊拉斯谟几十次道出同样的想法，但是在伊拉斯谟那里，只不过对有智慧之人产生一种细微的精神刺激的东西，在路德那里却由于他那吸引人的方式，立即变成口号、进军的号召、形象化的要求。他怒气冲天地提出要求，就像《圣经》上的狐狸用大火来提出要求一样，使它们能够唤起整个人类的良知。所有的伊拉斯谟式言行最终都针对精神的宁静与安定，所有的路德式言行都针对情绪的高度紧张和激动。因此，伊拉斯谟这位“怀疑论者”在他讲话讲得最清楚、最冷静、最明确之时，是最强有力的；路德这位“煽动者之父”则相反，他最强有力的时候是在他的愤怒和仇恨最放肆地从嘴里脱口而出之时。

这样一种对立甚至在奋斗目标相同时，也必然导致敌对。开初，路德和伊拉斯谟追求同一个目标，但是他们的气质却要他们采取针锋相对的方式，致使这一目标按照他们的本性变成了矛盾。敌对行动来自于路德。在世界上所有的天才人物当中，路德也许是最狂热的人，最不听劝告、最胡作非为、最不和善的人了。他周围只需要唯唯诺诺的人，以便利用他们；只需要老是唱反调的人，好向他们发脾气，并进而压垮他们。对于伊拉斯谟而言，不狂热简直变成了宗教信仰。路德那种生硬、专横的口气——不管他说什么，都无所谓——像一把邪恶的利刃刺

进伊拉斯谟的心灵。这种挥舞拳头的做法和唾沫四溅、大发雷霆的谈话方式，使他这位把在有才智的人之间的世界主义的谅解视为最崇高目标的人，在身体方面感到简直难以忍受。路德的自信心（路德这种自信心称为他的神的自信）在他看来，似乎是我们这个迷恋谬误与空想，但却必然一再没落下去的世界上具有煽动性的、几乎是亵渎神灵的骄傲自大。当然，就路德而言，又不能不仇恨伊拉斯谟信仰中那种不冷不热的、不坚定的东西。这种犹豫不决，这种从来就没有确定信念的油滑、顺从和难以捉摸的态度，以及恰恰是这种美学方面的完美无缺，没有明确信仰的“矫揉造作的讲话”使他大为光火。在伊拉斯谟内在的本质当中，有某种不能不强烈刺激路德的东西，而在路德内在的本质当中，也有某种不能不强烈刺激伊拉斯谟的东西。因此，认为这两个福音新教学说的第一批使徒，认为路德和伊拉斯谟之所以不会为共同的事业联合起来，其原因仅仅在于形式和偶然性的观点是愚蠢的。就连最相似之处也由于他们的血液和精神具有截然不同的颜料而不能不染上另外的颜色，因为他们的不同是互相关连，不可分割的。这种不同从智力的人世间渗透到本能的编织物，通过血管渗入到那个有意识的思维意志再也控制不了的深处。因此，他们出于政治的原因和共同事业的缘故，可以长时期地相互体谅，他们像两截树干，可以相互在一起，在同一水流中漂浮一段时间，但是在转第一个弯，遇到第一个转折点时，他们不得不命中注定要相互摔打：这种世界史上的冲突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

这场斗争中的胜利者必然是路德——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已确定——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他是更为强有力的天才，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更习惯于战争，而且乐于打仗的战士。路德

曾经是，而且一生都是一个好斗的人，一个天生好同上帝、人类和魔鬼打架的人。对他而言，斗争不仅仅是一种乐趣和一种释放他的力量的形式，而且对于他那过于饱和的本性还是一种拯救。对他来说，用强硬手段干预争端、吵架、谩骂、争执意味着一种放血的方式，因为只有在脱口而出，在猛揍猛打时，他才觉察和感到他整个人的分量。因此他怀着极大的兴趣投身到各种正义的或者非正义的事业当中去。“只要我想到他这个人一旦同某个对手打交道时便会发出的那种冲天的怒气，”他的朋友布塞尔① 写道，“就会毛骨悚然，吓得要命。”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路德斗争起来活像个着了魔的人。他一争斗，往往都是全身心的，就要大动肝火，就要横眉怒眼，就要唾沫四溅。这就仿佛他要用这种狂怒的条顿语将发烧的毒物从身体内驱走似的。而事实上，往往也只有在他火冒三丈，猛力击打，发泄了他的怒气之后，他才会感到轻松，“这时我全身的血液都显得新鲜，天才变得明亮，种种诱惑都销声匿迹”。这位很有教养的神学博士立即变成了雇佣兵：“要是我来，我就要用木棒揍。”他突然变得发狂似的粗鲁，蛮汉似的疯癫。他肆无忌惮地顺手操起任何一种武器，既拿起闪闪发光的辩证法的宝剑，又抡起满是辱骂和粪便的粪叉。他肆无忌惮地排除任何障碍，在必要时竟敢用谎言和诽谤将对手除掉。“为了更美好的事情和教会，不要怕撒下善良的弥天大谎。”彬彬有礼的那一套对这位农民战士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就连对待已经被战胜的对手，他也是既无优雅的风度，又无同情心，甚至对那种躺在地上、毫无抵抗能力的人，他还要火冒三丈地继续痛揍一顿。当托马斯·闵采尔

①布塞尔（Martin Bucer，1491—1551），法兰西基督教新教改革家。

和上万农民被可耻地处决之时，他欢呼，他用响亮的声音炫耀说，“他要为他们的鲜血负责，”他欢呼那个“下流的”茨温利和卡尔施塔特①以及所有曾经反对他的人悲惨的毁灭——这恨人心重的急性子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在他们死后说过一句公正的盖棺定论的话。路德在布道坛上是一种吸引人的、有人情味的声音，在家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家长，作为艺术家和诗人，是高度文明的标志，但他一开始论战，就会立即变成狼人，成为被巨大的愤怒迷了心窍的人，没有一种顾忌和公理能够阻挡他。他出于自己天性中的这种野蛮的强制，一生都在一再寻找这种战争，因为战斗在他看来似乎不仅仅是生命充满乐趣的形式，而且也是道德上最正确的形式。“奇怪的是一个人既是一个基督徒，又必须是一名战士，”他对着镜子自豪地说，在后来（一五四一年）的一封信中，他用“肯定上帝也在战斗”这一神秘莫测的断言将这种信仰捧到了天上。

但是伊拉斯谟作为基督徒和人文主义者，却不知道好争论的救世主和战斗着的上帝。他这位文化贵族觉得仇恨和报复心是向粗俗和野蛮的一种倒退。一切喧嚷、斗殴，每一种野蛮的争吵都使他反感。他作为一个天生就友好的人，对争吵不感兴趣的程度，就同这种情况给路德带来的乐趣一样大。有一次他在讲到自己怕争吵时，说了一句很独特的话：“要是我能够得到一个大庄园，但却又不得不为此提出诉讼的话，那我宁愿放弃这个庄园。”毫无疑问，伊拉斯谟作为一个有才智的人，喜欢与同行进行讨论，不过却是像骑士喜欢马上比武并把它当作高贵

①卡尔施塔特（Andreas Rudolf Bodensteinvon Karlstadt，约1480—1541），德意志神学家。

的游戏那样——在那时，文雅的人、聪明的人、随机应变的人能够在受到人文主义熏陶者的论坛上展示他在古典烈火中炼就的剑术。让其溅出几点火花，耍出几下新鲜、机智的虚招，将一个蹩脚的拉丁骑士拉下马来。伊拉斯谟对这样一种精神骑士的游戏并不陌生，但他却从来不会理解路德践踏敌人的兴趣，在他不计其数的论战中从来不会无视礼貌，沉醉于路德用来攻击对手的那种“凶残的”仇恨。伊拉斯谟天生就并非战士，因为他终究没有他为之奋斗的固定信念。客观的本性很少具有自信。他很容易就会怀疑自己的观点，准备至少也要考虑一下对手的论据。不过让对手讲话，就已经意味着给他留有余地了——能够很好地进行战斗的，只有那种怒气冲天的人，这种人顽梗不化，对一切都充耳不闻，他自身的狂热在斗争中就像保护一层茧子那样保护这样一种人。对于极度兴奋的僧侣路德而言，他的每一个论战对手都是应当根除的地狱的使者、基督的敌人；而迫使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不得不甚至于疯狂夸大对手的，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充满同情心的怜悯罢了。茨温利早就非常巧妙地将这两个对手的性格对立汇入了一幅画像之中，他把路德同埃阿斯① 相比，把伊拉斯谟同奥德修斯② 相比，埃阿斯—路德这位勇士和战士天生好斗，无以为家；奥德修斯—伊拉斯谟本来就只是出于偶然才上了战场，他幸运的是重新回到了他宁静的伊塔刻，回到了他沉思冥想的极乐岛。他从行动世界回到精神世界，在这里，在柏拉图思想不可战胜的、坚定不移的现

①埃阿斯（Ajax），这里指小埃阿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勇敢善战。

②奥德修斯（Odysseus），希腊英雄，伊塔刻王。

代面前，一时的胜利或者失败都显得空洞无物。

伊拉斯谟天生就不会打仗，他也知道这一点。只要违背自己天性的法则，去参与争论，他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往往都是如此，如果艺术家、学者超越自己的界限，挡了行动迅速果断之人、大力士、时代巨人的道，他就要节制自己。有才智的人不应站在某一方，他的王国就是处处都要超然各种纠纷的公正。

伊拉斯谟没有理睬路德那第一次轻轻的敲门声。但是很快他就不得不谛听，并把这个新的名字埋葬在自己心里，因为这个奥古斯丁教团僧侣用来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锤上维滕贝格教堂大门的那无情的打击声，响彻整个德意志帝国。“就好像是天使本人变成了送信人似的”，这些传单油墨未干就已经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一夜之间，在整个德意志民族中除了这个名叫伊拉斯谟的人之外，那个马丁·路德被称为自由基督教神学最卓越的先驱。这位未来的民族巨人以天才的本能恰恰接触到这样一个敏感的地方。在这里，德意志民族最痛苦地感到罗马教廷的压迫——赦罪符。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东西比忍受由外国势力强令其纳贡更不情愿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教会通过按百分比入股的代理人，通过专业赎罪券出售商，让人把创造物的原始恐惧运用到金钱中去。这笔用事先印好的付款单从德国农民和市民那里榨取到的资金正在国外运转，通向罗马。这种事情早就在全国聚集了一种深沉的、而且还是无声的民族怒火——路德其实只不过用他坚决的行动点燃这种怒火罢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更清楚地说明，并非滥用的谴责，而是谴责的形式在世界历史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就连伊拉斯谟和其他人文主义者都对赦罪符、对炼狱的赎罪券大肆进行他们饶有风趣的嘲笑。但是嘲笑和诙谐只瓦解那些以否定的面貌出现的力量，它

们无法聚集新的力量，以进行创造性的撞击。路德则相反，他具有一种戏剧性的天性，也许是德国历史上唯一的、真正戏剧性的天性，他出于不学自会的本能清清楚楚地了解各种事物，善于对待所有的人。他从最初那一时刻开始就具有能给人深刻印象的姿势，能发表纲领性讲话的那种天才的民众领袖的才能。当他简明扼要地讲他的论纲："教皇不能宽恕罪过"或者"教皇只能赦免由他自己所定下的处罚"时，这些词句犹如闪电，犹如雷鸣，震撼了整个民族的良知，彼得大教堂开始在它们下面摇晃。在伊拉斯谟及其同行用嘲笑和批评来引起有才智之人的注意力，但却不向前推进到群众激情的地区时，路德却一下子就达到了民众感情的深处。路德在两年之内就成了德国的象征，成了所有反罗马的民族愿望和要求的护民官，成了一切反抗的集中代表。

像伊拉斯谟这样一个听觉灵敏、好奇心重的同时代人想必很快就听到了路德的所作所为。本来他应当感到高兴，因为一个为自由神学而斗争的盟友站到了他的一边。最初也听不到指责的言词。"一切善良的人都喜欢路德的爽直"，"迄今为止，路德的确对世界有帮助"——他用这种赞许的口气对他那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朋友谈起路德的出现。这位有先见之明的心理学家当然已经开始产生顾虑。"路德对很多事情的谴责都切中要害，"但是有一种轻声的叹息在回响，"要是他更有分寸就好啦。"这位感觉灵敏的人本能地感到路德那种过于激动的气质是一种危险，他赶快让人提醒他，不要老是动不动就如此粗暴地脱口而出。"我觉得，谦逊比狂热得到的东西还要多。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征服世界的。"由此可见，并非路德的言词，并非路德的命题使伊拉斯谟感到不安，而是报告的语调，是路德在所写的一

切文章、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中那种煽动性的、狂热的腔调。按照伊拉斯谟的观点，对于这样一些棘手的神学问题，更好的办法是在学术范围内用心平气和的口气来讨论，把平常那种亵渎的言词弃置一旁，代之以学术上用的拉丁文。但是人们谈论神学不能高声大叫，叫得满街都能听到，以至那些干活马虎的人和小商小贩都会为这些敏感的事情大发脾气。从人文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每一次在观众面前而且为了观众进行的讨论都降低了水准，因而不可避免会引起“骚乱”、暴动、群情激昂。伊拉斯谟憎恨为真理而进行的各种宣传和鼓动，他相信真理自身继续发挥作用的力量。他认为，一种认识先通过言词传播开来，然后就必须通过纯粹精神的道路贯彻执行。为了在其本质方面变得更真实，更现实，它既不需要人们的掌声，也不需要组合成派别。根据他的感觉，有才智的人所要做的不外乎确定和表达真理和清楚的概念罢了，他用不着为这些真理和概念而斗争。由此可见，伊拉斯谟并非像他的论敌指责他那样出于忌妒，而是出于一种实实在在的忧虑，出于精神贵族的职责，很不满意地看到，在路德的言语风暴之后就像满天飞扬的灰尘那样，出现了民众的激动。“要是他更有分寸就好啦。”伊拉斯谟对这个毫无分寸之人的责怪在一再重复着，一种意识到的预感暗地里使他心情沉重。这种预感就是：他那高尚的、真正文学的、科学的人性的英才王国经受不住这样一种世界风暴。然而伊拉斯谟与路德之间仍然没有交谈过一句话，德国宗教改革的这两位最知名的人物依旧默然相对。这种沉默逐渐变得引人注目。伊拉斯谟这位谨小慎微的人没有理由同这个反复无常的人有私人交往；而路德呢，自身的信念越驱使他进行斗争，他对怀疑论者显而易见地也就更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人类的事情比神的

事情更重要，”他谈到伊拉斯谟时写道，并以此出色地表明了他们相互之间的距离：对于路德而言，宗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对于伊拉斯谟来说，至关紧要的东西是人道。

不过在这些时候，路德再也不是孤军奋战了。他没有这种愿望，也许并不完全理解这种状况，他同自己那些仅仅是精神上的要求一道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尘世利益的代表人物，成了德意志民族事业的打桩机，成了教皇、皇帝与德国王侯之间政治象棋中的一个重要的棋子。享用他的成果的那些完全陌生的、十足的非福音新教的受益者们开始争取他个人，以便充分利用他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逐渐地，在这个人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未来派别的、一个未来宗教体系的细胞核。但是早在新教教会伟大的群众大军聚集起来之前，与德国人的组织天才相适应，在路德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政治的、神学的、法律的总参谋部，其组成人员有：梅兰希顿、施帕拉丁、王侯、贵族和学者。外国公使们都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库尔萨克森，看看是否能将这个冷酷无情的人砍成一个他们能将其打进强大帝国的楔子——一种网眼细密的政治外交手腕将他们的线同路德从纯道德角度考虑的要求交织在一起。正好是他那狭隘的范围在寻找同盟者，而梅兰希顿可能也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骚乱，如果路德的《致德意志民族的贵族》一旦发表的话，他就会紧急要求争取公正的伊拉斯谟这样一个重要的权威站到福音新教事业一边来。路德最终作出了让步，于一五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亲自去向伊拉斯谟求教。

谄媚奉承的客套话，那种简直是中国式的过分的自我贬低，不可避免地成为人文主义书信的本质，因此没有丝毫特别的东西值得一说。路德的信以颂歌式的词句开始：“谁的思想不充满

伊拉斯谟的精神？谁没有受到他的教诲，谁不受到他的控制？”他用一双脏手表明自己是一个愚蠢的小伙子，还没有学会怎样通过书信向一位真正的大学问家求教。但当他听说自己的名字通过对赎罪券“毫无意义的”评论已为伊拉斯谟所熟知时，他们两者之间继续保持沉默就会被视为误解了。“因此，如果你方便的话，你这个善良的人，也来赞扬耶稣基督的这位身材矮小的教友吧，这个人当然只是在以其无知埋头于阴暗的角落，而且不在同一天空下面和同一世界上出名时才有价值。”整个一封信都是为了这样一句话的缘故而写的。这句话包含了路德期望从伊拉斯谟那里得到的一切：一封表示赞同的信，任何一句对他来说表示友好的(我们也许会说:政治文章中可以利用的)话。这一时刻对于路德来说，既神秘，又关键。他已经对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宣战，在罗马，逐出教会的通谕已经发出。在这样一场斗争中有伊拉斯谟作为道德上帮助其摆脱困境的人，对于路德的事业意义重大，也许还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为这个名字由于其主人的坚定不移才有作用。无派别人士往往是有派别之人最重要、最合适的旗帜。

不过，伊拉斯谟从来都不愿意承担义务，也非常不愿意为一笔根本就无法计算的债务充当担保人。因为现在公开肯定路德，就意味着事先就已经对他未来的著作、文章和攻击表示赞同，对一个没有分寸、毫无节制的人表示赞同，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人那种“强词夺理、煽动性的文风”使伊拉斯谟这个平和的人在内心深处感到尴尬。再说，什么是路德的事业？它今天，也就是一五一九年是什么，明天又会是什么？站在某一个人一边，为这个人承担义务，就意味着放弃一部分自身道德上的自由，为那些还无法通观其效果的要求承担责任。伊拉斯谟决不

会让人来限制自己的自由。也许这位老教士嗅觉灵敏的鼻子也闻到了路德文章中散发出来的一种轻微的异教徒气味。毫无必要地损害自己的名誉，从来就不是谨小慎微的伊拉斯谟的美德和力量。

所以他在回信中极其谨慎地避开明确的肯定或者否定。他的解释东一句西一句的，就好像他根本就没有好好地读过路德的著作似的。通过这种办法，他首先就十分灵巧地为自己建造一道防御工事。实际上要是死抠字眼儿的话，伊拉斯谟作为天主教的神甫，没有上司的明确许可，是不准阅读敌视教会的书籍的。伊拉斯谟这个老练的写信人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一点作为表示歉意的理由，以避开关键性的陈述。他感谢这位“教友”，谈到自己无比激动的情况，说路德的著作在社会名流当中得到一片喝彩声，而论敌又怎样卑鄙地对它们进行攻击——他借此便转弯抹角地表达了某种同情。这位充满激情的独立者以何等高超的技巧避开了人们可能用来抓住他，使他承担义务的各种明确表示赞同的言词啊！他明确强调，对路德的《旧约·诗篇》评注只不过是“粗略地翻了翻”（体验一下）而已，也就是说，没有看过。他“希望”这篇评注对人们会大有裨益——再一次使用了委婉表达的愿望，以代替评价。仅仅为了同路德保持距离，他嘲笑那些说他自己参与撰写路德著作的所谓谣传愚蠢，居心不良。但是最后伊拉斯谟终于明确表态了。他清清楚楚地宣布，不愿意被牵涉到非常讨厌的争执当中去：“只要可能，我要保持中立（公正），以便能够更好地促进重新繁荣的科学。我相信巧妙运用的克制比拚命参与更能达到目的。”然后，他还急切告诫路德要克制。该信以无法实现的、干巴巴的愿望结尾。但愿耶稣基督每天每日都将自己的精神更多地赋予路德。

这样一来，伊拉斯谟便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同他在罗伊希林① 争论中的态度一样，当时他说：“我并非罗伊希林派，也不参加任何一派，我是基督徒，只认耶稣基督，而不认罗伊希林派或者伊拉斯谟派。”他下定决心不再超越自己真正的愿望，往前迈进一步。伊拉斯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不过恐惧也有着可观的力量——有时候它从感情引人注目的突然明朗之中幻觉似地预见到未来的事情。伊拉斯谟比其他所有向路德欢呼，视路德为救世主的人文主义者更清楚地预见到，路德这种好攻击的、无限制的方式是一种“骚乱”的征兆。他看到的不是宗教改革，而是一场革命，他绝不愿意走这条危险的道路。“我把自己变成与路德的危险为伍的同伴，除了两个人而不是一个走向毁灭之外，还能对他有什么帮助呢……他非常精辟地讲出了一些问题，提出善意的警告。我希望他不会由于其无法容忍的错误而妨碍这些美好的东西。可是，即便他为了真理的缘故，用虔诚的方式写下了所有这一切，我也不会拿我的脑袋去冒险。并非每一个人都有力量成为殉道者，我不得不悲伤地担心，在发生骚乱的情况下，我会步佩特利② 的后尘。如果教皇和王侯的命令公正的话，我会遵守这些命令的，我还要忍受他们令人讨厌的法令，因为这样做更安全。我相信，当善意的人们不寄希望于卓有成效的反抗时，这样一种行为同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相称的。”伊拉斯谟出于他那心灵上的畏惧以及他那不可动摇的独立情绪，下定决心不同任何人，也就是说不同路德一道从事共

①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 1455—1522），德国人文主义者。

②佩特利（Olaus Petri，1493—1552），瑞典基督教信义会教士，曾任首相，后因反对国王，一度失宠。

同的事业。路德应当走自己的路，而伊拉斯谟也应当走自己的路，所以他们只是达成一个人不应敌视另一个人的协议。结成盟友的建议被拒绝了，签定了一个中立的协定。路德已经决定演出这出戏剧，而伊拉斯谟则希望——徒劳无益的希望——能允许他只当观众，只当“旁观者”：“如果在路德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出现的上帝非常喜欢这一切，而且也许还认为对于这些年代的道德堕落来说有路德这样一位粗暴的外科医生是必要的话，那么与他抗争就不是我的事情了。”

但是在政治斗争的年代要站在局外，不偏袒任何一方，这比偏袒某一方还要困难。新的派别试图以伊拉斯谟为证，使他非常烦恼。伊拉斯谟为宗教改革对教会的批评奠定了基础，后来路德将这种批评变为对教皇统治的一种攻击。伊拉斯谟像天主教神学家那样，怒气冲冲地说，“生的是路德孵出来的蛋。”不管他愿意与否，直至某种程度上来讲，伊拉斯谟作为开路先锋应对路德的行为负责：“伊拉斯谟指向哪里，路德就奔向哪里。”在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大门之时，别人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了进去。伊拉斯谟自己不得不对茨温利承认：“路德所要求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教的，只是没有这么激烈，没有那种追求极端的语言罢了。”把这两个人区分开来的，只不过是方法而已。两人都作出了相同的诊断——教会已经生命垂危，内部正在走向毁灭而且已经表面化。而正当伊拉斯谟建议进行缓慢的、逐渐深入的治疗，即通过理性与讽刺的盐注射来完成小心谨慎的、缓慢的清血过程时，路德却在割出鲜血直流的伤口。伊拉斯谟出于对流血的畏惧，不得不摈弃这样一种有生命危险的处理方法。一切暴力都与他的意愿背道而驰：“我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宁肯让人把我碎尸万段，也不包庇纷争，尤其是在信仰问题上的

纷争。虽然路德的不少追随者都以福音新教这样一句格言为依据：我并非为了带来和平，而是为了带来战争才降临人世的。尽管我认识到有些事情为了教会的利益也是可能改变的，可是，我并不喜欢导致这类骚乱的一切东西。”伊拉斯谟以一种使人想起托尔斯泰① 来的坚定态度，拒绝暴力发出的任何一种呼吁，宣布宁肯准备继续忍受令人讨厌的状况，也不愿用“骚乱”，用“流血”换来这种改变。正当别的人文主义者更加目光短浅、更加乐观地对路德的行动表示欢呼，把它说成是解放教会、拯救德国之时，他却从中看到了全世界的教会从世界教会四分五裂成各国教会，德国会脱离西方国家的统一体。他更多的是从内心里预感到，而不是由于理智而得知，德国和其他日耳曼语国家这种摆脱教皇赦罪权的行动在没有鲜血淋淋、杀气腾腾的冲突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在他看来，既然战争意味着退步，意味着向早已过时的时代的野蛮倒退，他就要竭尽全力地去阻止基督教界内部这一最大灾祸。这样，一个在精神上超过其力所能及的范围的历史任务，便突然落到了伊拉斯谟的肩上。这个任务就是：独自一人在所有过分兴奋的人们当中体现清醒的理性，单枪匹马地用笔来保卫欧洲的统一、教会的统一、人性和世界主义的统一，以防止崩溃和毁灭。

伊拉斯谟试图使路德安静下来，开始他的调解使命。他经常通过朋友恳求那种不听劝告的人，不要写这种具有煽动性的东西，不要用这种“非福音的”方式讲授福音：“我希望路德放弃一段时间的争执，单纯地、不掺和任何东西地从事福音新教

①此处指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i，1828—1910），俄国作家，在其作品中宣扬不以暴力抗恶的观点。

的事业。如果这样，他也许会获得更大的成就。”首先，并非所有的东西都得公开讨论不可，任何情况下都不该把教会的改革要求大声告诉急躁不安、爱好行动的群众。伊拉斯谟这位外交家面对雄辩术那宣传鼓动的力量，对有才智的人那另外一种高超的技能——在适当时刻保持沉默的高超技巧多么意味深长地赞美道：“不要总是把全部真理都和盘托出，很多时候都要看这种真理是如何说出来的。”

认为真理因为有时间上的优点，只能隐瞒片刻之久的这种观点对于路德来说，似乎是无法理解的。对于他这位宗教的信仰者而言，良知最神圣的义务就是：也要承认心灵曾经一度认识到的各种一丝一毫、一点一滴的真理，将它们大声地讲出来，而不管是否会由此引起战争、骚乱和天崩地裂，都无所谓。路德从来都无法而且也不愿意学会沉默的艺术。在这四年当中，他嘴里使用的是一种新的、强有力的语言，整个民族所蕴藏的怨恨都掌握他的双手之中；整个德意志的民族意识都在迫切期待用革命的方式奋起反抗一切罗曼国家的①和皇帝的统治；对僧侣的仇恨，对外国人的仇恨，自从鞋会②时代以来在农民当中郁结的那种神秘的、社会的、宗教的热烈感情，所有这一切都被路德锤向维滕贝格教堂门上那一击所唤醒。所有的阶层——王侯、农民、市民都感到自己个人的和等级的事业由于福音而变得神圣起来。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因为把路德视为一个有勇气、有业绩的人，而把自己迄今为止还是分散的激情倾注在他的身

①指意大利、西班牙或法国。

②指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德国中部和西南部起义农民的革命组织。因该组织以农民皮鞋为标记，遂得此名。

上。但是往往当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在宗教狂热的烈焰中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发生那些震撼宇宙的强烈地震，如果像路德的情况那样，只有一个人在场——无数的人都认为在他身上可以实现他们下意识的意愿——那么神秘力量就会降临到他的身上。整个民族在听到第一声呼唤时就将它的力量凝聚成谁的力量，谁就很容易试图将自己视为永恒的使者。在若干年以后，在德国有一个人又重新操起了预言家的语言。“上帝命令我在德国授业，并作为一名使徒和福音传教士进行审判。”这个极度兴奋的人觉得纯洁教会，从“基督之敌”、从教皇这个“伪装起来的、真正的魔鬼”手中将德国人民拯救出来，用文字，如果不行，则用剑与火与血来拯救这个任务是上帝委托给他的。

对这样一个两耳充满着百姓欢呼的声浪和上帝的命令之人提出劝告，并告诫其小心谨慎，必然是白费力气。路德很快也就差不多再也不去倾听伊拉斯谟所写的或者所想的东西了，他再也不需要伊拉斯谟了。他迈着坚定不移、残酷无情的步伐，走着自己历史性的道路。

不过与此同时，伊拉斯谟也怀着与转向路德时同样的迫切心情，转向对立面，转向教皇和主教，转向王侯和君王，以便提醒他们对于路德别急于严厉处置。他甚至在这里也看到了他事业上的老仇敌——不愿认识自己错误的、自满自足的、盲目的狂热。因此他提醒人们，绝罚也许过于严厉，在路德这件事情上毕竟涉及到一个完全正派的人，这个人的生活一般说来是可以称道的。当然，路德对于赎罪券有怀疑，但是在他之前也有别的人已经勇敢地表示过同样的看法。“并非任何错误都一定是异端邪说，”这位永恒的调解人提醒道，他为自己势不两立的对手路德辩解，说路德“写的很多东西都是因为操之过急，而

不是心怀恶意”。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老是叫嚷着要求立即用火刑，不要指控每一个值得怀疑的人都肯定是异教徒。去警告和劝导路德，而不是去辱骂和刺激他是不是更可取呢？“要使人安静下来，最好的办法也许是，”他在致坎佩基奥①枢机主教的信中写道，“教皇要求每一个派别都发表一个公开的关于宗教信仰的声明。这样做可能会纠正虚伪表演的滥用，缓和讲话和写作的疯狂行为。”这位和事佬一而再、再而三地坚决要求召开宗教会议，他建议在学术界和宗教界召开一次秘密的、讨论所有这些论点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应当促成“与基督教精神相称的谅解”。

但是罗马同维滕贝格一样，并不倾听这警世之言。这些日子，使教皇感到忧虑的是别的事情：他心爱的拉斐尔——文艺复兴赠予重新复活的世界的这件神圣的礼物在这几天突然去世。现在谁有资格来完成梵蒂冈教皇宫中的壁画呢？谁来完成这座建筑物，完成圣彼得教堂这座如此大胆追求的建筑物？对这位出身梅迪契族的教皇来说，艺术是伟大的，经久不变的，它比在那边的某个地方，在一个偏僻的萨克森小城里的这次小小的僧侣之间的争吵要重要一百倍。正因为这位教会的君王如此宽宏大量，所以他对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僧侣也就漠然置之，不屑一顾。他的红衣主教们又变得傲慢自大、信心十足——人们不是刚刚把萨伏那洛拉②用火刑烧死了，把西班牙的异教徒驱

①坎佩基奥（Lorenzo Campeggio，1474—1539），意大利天主教枢机主教、人文主义者、律师。

②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基督教宣教士、改革家和殉教士。

逐出境了吗？——他们要求用绝罚作为对路德反叛行为的唯一回答。听他的意见到底有什么用，同这个农民神学家还有什么可争论的？伊拉斯谟那些告诫信件被束之高阁。在罗马的公事房里匆匆忙忙地便签发了逐出教会的通谕，命令教皇的使节要竭尽全力，严厉处置这个德国的叛乱者：由于对右派采取顽固态度，对左派也坚持顽固立场，因此失去了最初的，因而也是最好的和解的可能性。

虽然如此，在那些关键性的日子里——这种背景太不受人重视——德国宗教改革的全部命运却有短暂时刻落到了伊拉斯谟手中。卡尔皇帝已经将帝国议会召到沃尔姆斯，如果路德在最后时刻不屈服，就要在那里谴责路德的所作所为。就连路德的邦主——当时还未公开成为路德信徒，而仅仅只不过是其庇护者的弗里德里希①也应邀出席帝国议会会议。这一位引人注目的人对教会十分虔诚，是德国最大的圣人遗物和圣人遗骨收藏家，也就是路德认为不屑一顾，带着嘲讽的口气称之为不值一文的小玩意儿和魔鬼游戏的那些东西的收藏者。他对路德有些同情，他为这个人而自豪，因为正是路德赋予他的维滕贝格大学在世界上以如此高的声誉。但他不敢公开为他辩解。出于谨慎，也因为心里还不坚决，他深居简出，非常老练地节制同路德的私人交往。他不接见他，以便（完全像伊拉斯谟那样）在紧急情况下能够为他打掩护，他假装与路德不相干。但是出于政治原因，因为他在与皇帝对阵的棋局中可以好好地利用这个健壮的农民，而最终也是出于对自己司法权的一种地方主义的

①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Ⅲ.，1486—1525），萨克森选帝侯，又称智者弗里德里希，路德的庇护者。

自豪感，迄今为止他都在庇护路德，尽管有教皇绝罚的命令，却仍然给他保留讲道坛和大学的教席。

然而如今甚至连这种小心谨慎的保护也变得危险了。正如所估计的那样，路德触犯了剥夺法律保护令，在这时他表示要继续庇护路德，表现了一个地方王侯对其皇帝的公然反叛。那些刚开始部分信仰新教的王侯们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进行这种公开的反抗。他们虽然知道皇帝在军事上软弱无力，他的双手都被对法和对意战争束缚住了，这个时候也许有利于扩充自己的势力。对于这样一种进军来说，福音新教的事业是最充分、是历史上最光彩的理由了。但是弗里德里希这位虔诚正派的人在内心深处仍然不能肯定他的这位教士和教授是否真的是真正的福音新教学说的使者，或者只不过是无数宗教狂和宗派主义者当中的一个罢了。他还没有决定自己该不该在上帝和尘世的理性面前为继续庇护这位伟大而又危险的英才承担责任。

弗里德里希怀着举棋不定的心情，在科隆周游时听说，伊拉斯谟同样在该城作客。他立即通过他的秘书施帕拉丁把他请来，因为伊拉斯谟往往被视为世俗与神学事务方面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往往还给他戴上彻头彻尾的无党派这样一种非常崇高的荣誉的桂冠。选帝侯在举棋不定时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最可靠的建议，他向伊拉斯谟提出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路德能否打赢这场官司。现在伊拉斯谟本身并不怎么喜欢那些要求明确回答是与非的问题，特别是这一次他的判断要承担无比巨大的责任。因为他赞同路德的言行，弗里德里希心里由此得到支持，又继续庇护路德，因此路德以及德国的宗教改革得到了拯救。如果他的君主垂头丧气地抛弃他，路德就只好逃出国门，以免遭火刑之灾。在这个是与非之间存在着一种世界命运，如果

伊拉斯谟真的像他的对手所说的那样，忌妒他伟大的同志或者对他怀有敌意的话，那么现在，或者根本不会给他提供完成他不朽事业的机会。一句断然否定的话很可能会促使这位选帝侯放弃对于路德的庇护。一五二〇年十一月五日这一天，德国宗教改革的命运，世界史很可能都完全掌握在伊拉斯谟这只柔弱的、战战兢兢的手上了。

在这一时刻，伊拉斯谟保持了诚实的态度。这并非勇敢的行为、伟大的行为、果断的行为、英勇的行为，但却是（而且这种做法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一种诚实的行为。对于选帝侯问他是否能把路德的观点视为某种错误的和异端邪说的东西这一问题，他最初试图用句开玩笑的话把它岔开（他不想站在某一边）：路德的主要错误就是，他抓了教皇的皇冠和僧侣的肚皮。不过后来因为要求他严肃地表示自己的看法，他才用他称之为格言的二十个短句如实地确定了对于路德学说的个人意见。其中有几句不赞成路德的话，譬如："路德滥用教皇的宽容"，但在关键性的论题上他却勇敢地站到了受威胁者一边："在所有的大学当中只有两所学校谴责路德，这两所学校没有驳倒。因此当路德要求进行公开讨论和要求让不涉嫌的法官进行调解时，他所要求的都只不过是一些最起码的东西罢了。"更何况，"甚至对于教皇来说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受人尊敬的、不涉嫌的法官来调解这种事情。世界渴望真正的福音，时代的整个趋势都是如此。人们不应采取如此仇视的方式来对付他。"他最后的建议是：在这件事情酿成"骚乱"，会使世界在几个世纪动荡不安之前，应当通过迁就和一次公开的宗教会议来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这一席话（路德在这方面对伊拉斯谟以怨报德）引起了有利于宗教改革的意义深远的转变。因为尽管选帝侯对于

伊拉斯谟表述中的某些双关语和谨小慎微感到有些惊奇，但他完完全全按照那天晚上谈话中伊拉斯谟给他提出的建议行事。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六日，弗里德里希对教皇使节提出要求：路德应当让公正、独立、不涉嫌的法官公开听听他的意见，在此之前不能焚烧他的著作。因此他抗议罗马和皇帝的粗暴态度——德国王侯的新教教会第一次提高了嗓门。通过他的秘密帮助，伊拉斯谟在关键时刻对宗教改革给予了关键性的帮助，他不该得到后来宗教改革抛向他的石头， 而应当得到一块纪念碑。

这时在沃尔姆斯举世注目的时刻来到了。整个城市直至屋顶和屋脊都挤满了人，一个年轻的皇帝由教皇使节、公使、选帝侯和秘书陪同，在火红颜色的骑兵和步兵簇拥下走进会场。几天以后，一个小小的僧侣从同一条路走了进来，他孑然一身，遭到教皇的绝罚，只是由于有一张他折好放在口袋里带来的安全通行证，才免遭异教徒被烧死的厄运。但是大街小巷却再一次汹涌着、澎湃着欢呼和激情的声浪。德国的王侯们把这一个人，把皇帝选为德国的领袖，而德国人民却选了另一个人作为领袖。

第一次谈话就推迟了命运攸关的决定。伊拉斯谟的想法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对进行调解的可能性所抱的微弱希望仍然存在。但在第二天，路德却说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句话："我就站在这里，我只能这样。"世界分裂成了两部分——自约翰·胡斯那些日子以来，一个人第一次当着皇帝和全体宫廷臣仆的面拒绝听从教会的命令。宫廷上下都打了一个寒战，他们窃窃私议这个放肆的小僧侣，对他表示惊奇。但在下面，步兵们却向路德欢呼。他们是否预感到，对他们来说这种拒绝是一个好的兆头呢？他们这些管鼻鸟是否已经嗅到了行将来临、即

将发生的战争的气味?

那么伊拉斯谟此时此刻又在哪里呢?在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他却诚惶诚恐地待在自己的书斋里。这便是他那悲剧性的过错。他作为教皇使节阿莱安德尔——他同他在威尼斯同窗共宿——青年时代的朋友,作为皇帝所尊敬的人,作为福音新教的志同道合者,在这里只有他还能阻止作出严厉的决定。但是他这个总是胆小怕事的人害怕抛头露面。只是当他听到那个坏消息时,他才明白这一错过的时机已无可挽回:“要是我自己在场的话,我会尽力而为。这个悲剧通过适当的审理程序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是无法再来的。缺席者往往都没有道理,伊拉斯谟在这举世注目的时刻没有将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出场全部投入到他的信念中去,所以他的伊拉斯谟事业失败了。路德以极大的勇气全力以赴,并且竭尽他那胜利者意志百折不挠的一切力量,所以他的意志变成了行动。

争取独立的斗争

随着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会议的召开，随着教会绝罚和皇帝革出社会命令的发布，伊拉斯谟认为——而大多数人都有同感——路德宗教改革的企图已经实现。剩下的就是对国家和教会的公开反叛，是一种新的阿尔比派①、韦尔多派② 或者很可能立即就会被残酷地消灭掉的胡斯派。伊拉斯谟不希望知道的恰恰是这种战争的解决办法。他梦想的是用宗教改革的方式插入教会的福音新教教义。对于这样的目标，他也许乐于提供帮助。“如果路德留在天主教内，那我愿意站到他一边。”他公开许下诺言。但是这个残暴的人一下子就永

①阿尔比派（Albigensertum），12及13世纪法国异端派别、特别是清洁派的通称。

②韦尔多派（Waldensertum），也称“里昂穷人派”。中世纪西欧基督教的一个派别。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信徒大都参加新教。

远脱离了罗马。现在这已经成为过去。“路德悲剧已经结束。啊，这种悲剧也许还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出现过哩。”这位失望的和平之友抱怨道。福音新教教义的火星熄灭了，闪耀着智慧之光的星星已经坠落，“行动来自明亮的福音新教之星。”现在刽子手和大炮将决定耶稣基督的事业，而他自己也下定决心，在即将到来的任何冲突之中都避往一边，他感到要做试验的名人，自己太软弱。他谦恭地承认，在作出这样一种非同寻常、责任重大的决定时，不具有那种最后的神的确信和自信，而对于这种自信，别的人是引以为自豪的：“但愿茨温利和布塞尔具有这种精神！伊拉斯谟只不过是一个人罢了，他无法听到神讲的话。”这位年已五十，早已对神学问题的神秘莫测有着深刻认识的人，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在这场争论中充当发言人。他只愿意在那永远清清楚楚之处，在科学中、艺术中悄悄地、谦恭地服务。所以他从神学中、从国家的政治中、从教会纷争中逃到他的书斋里，从无休止的争吵中逃到书籍崇高的沉默中。他在这里对世界还有所裨益。由此可见，老人家还是回到小屋，把朝向时代的窗户遮上吧！把斗争留给另外那些在他们心中感到上帝的呼唤的人，去完成在艺术与科学高尚的领域里捍卫真理这一更加隐蔽的任务吧。“如果连罗马天主教教士腐化堕落的道德也要求特殊药物的话，那么我和我的同行都无权去做治病救人的工作。我宁肯忍受事物的这种状况，也不去引起新的不安——这种不安的趋向往往导致相反的目的。我是有意识的，我绝不会成为骚乱的指挥者或者参与者。”

伊拉斯谟退出教会的争执，回到艺术中、科学中、他自己的事业中。他对这种宗派之间的怒骂和纷争感到厌恶。“讨论心平气和地进行”，他只希望安宁，只希望艺术家神圣的悠闲。但

是这个世界发誓不让他得到安宁。有这样一些时候，在那时中立被称之为犯罪。在政治上激动不已的时刻，世界要求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是站在路德一边还是站在教皇一边。他居住的那个城市勒文给他的和平态度制造麻烦。当整个宗教改革的德国都在指责伊拉斯谟，说他是一个过于冷淡的路德之友时，严厉的天主教学院却在这里攻击他，称他为“路德灾祸”的主谋。大学生们往往是各种极端主义的突击队，他们举行吵吵嚷嚷的游行，反对伊拉斯谟。他们推翻他的讲台，与此同时还在勒文的讲台上拚命反对他，教皇的使节阿莱安德尔不得不运用其整个的权威，以便至少能压一压对他老朋友的公开谩骂。勇气从来就不是伊拉斯谟的事情，所以他宁愿逃跑，而不去斗争。他就像往常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仇恨，逃去他多年在那里从事其著述的那个城市。这个四处漂泊的老人匆匆忙忙地把几件东西包在一起，外出漫游。“我不得不留神，在我离开德国之前，不要被现在像着了魔似的德国人撕成碎片。”这位不偏不倚的人往往陷入最激烈的争执之中。

伊拉斯谟再也不愿意住在天主教势力特别强的城市，不愿意住在宗教改革气氛很浓的城市，只有那种保持中立的地方才是命中注定适合他的地区。所以他在完全独立的永久的庇护所，在瑞士寻找庇护。现在巴塞尔成为他选来居住几年的城市。该城位于欧洲的中心，宁静雅致，街道清洁，人们都文静、理智，不用听命于好战成性的王侯，而是充满着民主自由的气氛，它可以给独立的学者提供所渴望的宁静。他在这里找到一所大学和学术上有造诣而且又认识他、崇拜他的朋友，在这里找到由高年级学生担任的教师助手，他事业上满意的帮手。在这里找到像霍尔拜因这样的艺术家，而主要的是找到弗罗本这位印刷

家，这位印刷手艺的巨匠，多少年来，共同爱好的工作已经将他同伊拉斯谟联系在一起。通过他的崇拜者的努力，给他准备了一座舒适的房子，这个永远漂泊的人在这个自由的、适于居住的城市里第一次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在这里他可以献身于那种思想，也就是他那真正的、现实的世界。只有在他能够安静下来撰写他的著作的地方，只有在人们小心谨慎地印刷这些著作的地方，他才能够感到愉快。这个永远的漫游者在这里待的时间比在任何地方都久，待了整整八个年头。在这段时期，这些名字相互结合，共享盛誉：自此以后，没有巴塞尔，人们就再也无法想象伊拉斯谟；没有伊拉斯谟，就无法想象巴塞尔。在这里，他的住所至今还保存完好；在这里，保存着霍尔拜因画的几幅肖像，这些肖像使他的面貌永世长存；在这里，伊拉斯谟写下了许多极其优美的文章，主要是《对话》这部闪烁放光的拉丁文对话录。这些最初打算作为教材送给小弗罗本的对话，指导了好几代人学习拉丁文散文艺术。在这里，他完成了基督教早期教父的大型版本，他将一封又一封的书信从这里寄往世界各地；在这里，他躲在工作的壁垒中，远离尘嚣，潜心著述。当欧洲的思想界想看看他们的领袖时，他们就会向莱茵河畔这座国王属下的古老城市望去。巴塞尔由于有伊拉斯谟，在那些年月成了欧洲精神之都。在这位伟大的学者周围聚集了一批人文主义的门生，譬如奥科兰帕迪乌斯、雷瑙努斯和阿梅尔巴赫。没有一个重要人物，没有一个王侯和学者，没有一个艺术爱好者会错过在弗罗本的印刷厂里和在“卢夫特”寓所拜见他的机会。人文主义者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来到这里，觐见这位正在工作中的备受尊敬的人。正当在维滕贝格、苏黎世和所有的大学爆发一场神学上的争论，为艺术和科学建立一个最后的庇

难所时，在这里却再一次地显得一片沉静。

但是老人家，你可别误会啦。你真正的时代已经过去，你的农田已经荒芜。斗争正在世界上进行，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精神已经变得不公正，人们结成相互敌视的帮派——自由的人、独立的人、古怪的人再也不受欢迎。这场世界性的斗争是一场赞成或者反对福音新教改革的斗争。现在关上窗户，逃到书籍后面再也无济于事。现在，当路德从欧洲的一端到欧洲的另一端，把基督教世界搞得四分五裂之时，将头埋进沙里，试图继续幼稚的逃避叫人无法忍受，人们很可能不会再看他的作品。现在左右两边怒吼着永远令人恐怖万分的、咄咄逼人的言词："谁不赞同我们，谁就在反对我们。"当一个宇宙分裂成两个部分时，这道裂痕深入到每一个人心中。不行，伊拉斯谟，你的逃避是白费力气，人们会用熊熊烈焰将你从你的壁垒中熏出来。这个时代需要表白，这个世界想要知道它的精神领袖伊拉斯谟站在哪一边，是赞成还是反对路德，是赞成还是反对教皇。

现在开始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世界非常想把一个疲于斗争的人硬拉到斗争中去。"这是一种不幸，"这位五十五岁的人抱怨道，"这场世界风暴恰恰是在我能够希望由于我众多的工作理应得到休息的时刻，向我袭来。为什么人们不允许我在这出悲剧中仅仅当一名观众呢？我是很不适于在这个剧中充当演员的啊，更何况还有那么多人都渴望登上舞台哩。"但是荣誉在这些关键性的时候变成了义务，变成了灾难。一个伊拉斯谟过多地引起了世界的好奇，他说的话太重要，因此那些右派和左派的人士都不想放弃他的权威。两边的领袖们都千方百计拉拢他，争取他赞成自己的事业。他们用金钱和奉承来引诱他，他

们讥讽他，说他缺乏勇气，好把他从自作聪明的沉默中驱逐出来。他们用假消息来吓唬他，说他的著作在罗马遭到禁止，被焚烧。他们伪造他的书信，他们歪曲他的讲话。在这样的时刻，一个独立的人真正的价值是非常清楚的，因为皇帝、国王和三个教皇以及站在另一边的路德、梅兰希顿和茨温利，他们现在都在谋求伊拉斯谟一句表示赞成的话。只要他愿意加入这一派或者另一派，尘世间的一切事情他都办得到。他知道，只要他明确表示拥护宗教改革，他就可以"站到宗教改革的最前列"；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要是我写文章反对路德，我就可能有一个主教管区。"然而正是在信仰的这种绝对性和片面性面前，伊拉斯谟的诚实感到不寒而栗。他不能用真诚的心去捍卫教皇的教会，因为他在这场争论中第一个抨击教会滥用权力，要求改革教会。他也不愿意对福音新教人士承担全部义务，因为他们不把他那和平的耶稣基督思想带到世界上，而是变成了放荡的宗教狂。"他们不断地叫嚷：福音，福音！他们自己想成为福音的宣讲者。从前福音使狂暴的人变得温柔，使强盗变得慈善，使好争论的人变得温和，把好咒骂之人变成为他人祝福的人。但是这些人像着了魔的人那样，开始从事各式各样的骚乱活动，背地里说那些理应受到报答之人的坏话。我看到的是一些新的伪君子，新的暴君，却看不到一点福音精神的火花。"不行，伊拉斯谟不愿意作为信徒，公开表态信奉两者当中的任何一方，既不承认教皇，也不信奉路德。他只信奉和平，和平，和平，只信奉偏僻与宁静，只信奉一种促进整个人类的工作！"我信奉的是心平气和的讨论。"

但是，伊拉斯谟的名气太大，因此，对于他的认可的期待太难约束。来自世界各地的呼吁越来越多，他们呼吁他应当站

出来，为了他自己和大家，他应当说出决定性的一句话。一种来自一个伟大的德国人内心深处的令人震惊的警告说明，整个知识界对他这样一个高尚的、坚定不移的人是多么信赖。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在他的荷兰之行途中结识伊拉斯谟的；几个月之后，当德国宗教事业的领袖路德去世的谣言传播开来时，丢勒就把伊拉斯谟视为唯一有资格将这一神圣事业继续进行下去的人。他在内心震动之时在自己的日记中用这样的话呼唤着伊拉斯谟："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你在哪里？听着，你这位救世主的骑士，在我主耶稣身旁走出来吧，捍卫真理，去获取殉教者的桂冠吧！要不然你就是个小老头。我听说过你本人的事情，说你自己两年前就已经同意做你适合做的事情。你也许会将这同样的东西献给福音和真正的、上帝的基督教，若是如此，那你就听听别人是怎么说的吧。这样一来，罗马教廷和救世主就会说，地狱之门不会对你开放……伊拉斯谟啊，你就在这儿顶住吧，我会像大卫所写的那样赞美你的上帝。你大概会这样做，而且真的去做，你也许会把巨人歌利亚① 砍倒在地。"

丢勒是这样想的，整个德意志民族对他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困境中的天主教也同样期待着从伊拉斯谟那里得到一切。救世主在尘世的代理人教皇的一封亲笔信中几乎是一字不差地提出了同样的劝告："站出来，站出来支持上帝的事业吧！把你光辉的才干用到上帝的荣誉上面去吧！你要想到，当被路德诱惑的大部分人重新回到正道上来之时，当那些还没有沉沦的人都已挺住，那些接近陷阱的人受到保护之时，是否能得到上帝

①歌利亚（Goliath，前11世纪），在《圣经》中被大卫杀死的非利士巨人。

的帮助就取决于你了!”基督教界之主及其主教、世界的主宰者们——英国的亨利八世、奥地利的卡尔五世、弗兰茨一世和费迪南德、勃艮第的大公为一边，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为另一边，他们都拥挤在伊拉斯谟面前向他请求，就像从前荷马史诗中的王侯们站在愤怒的阿喀琉斯帐篷前向他请求，好让他放弃无所事事的做法，投入战斗。这个场面蔚为壮观。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们如此争夺一个有才智之人的一句话，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精神力量对尘世力量的最高统治权如此大获全胜地经受了考验，这也是罕见的。但在这里也暴露了伊拉斯谟性格中隐蔽的缺陷。他对所有这些争取他认同的人都没有说一句清清楚楚的、具有英雄气概的“我不愿意。”他始终不能说出一句坦率的、清楚的话，说一个“不”字。他不愿意同任何派别站在一起，这样做是在尊重他内心的独立。然而可惜的是，与此同时他也不愿意同任何派别搞坏关系，这样做有失他那非常正确的态度的体面。因为他不敢对这些有权有势者——他的这些资助人、钦佩者和支持者进行公开的反抗，而是用含糊其辞的借口拖延时间，他会演戏——在这里不能不故意选择极其艺术的语言来说明他的举止行为的矫揉造作——他许下诺言，但又拖延时间；他阿谀奉承，但又装腔作势；他写上亲切友好的话语，但不承担责任；他一会儿以疾病，一会儿以劳累，一会儿又以非职权范围之事为借口为自己的矜持观望辩解。他以过分的谦虚来回答教皇：怎么？他这样一个渺小的人，他这个只受过中下水平教育的人，居然要去做铲除异端邪说这样一件惊天动地之事？他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用空话来敷衍英国国王。与此同时，他又站在另一方用一些恭维信来抚慰梅兰希顿和茨温利。他找到并且制造出上百种借口，往往是一次一个借口，一次一个借口。

但是在所有这些令人感到不愉快阴谋诡计后面却隐藏着一种坚定的意志："如果说一个人无法尊敬伊拉斯谟，是因为在他看来伊拉斯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基督徒的话，那他愿意把我看成什么样子，就让他去看吧。我就是这样。要是另外的人从救世主那儿获得更大的精神才能，因而比我更为自信，那他就可以为了救世主的名誉运用这些才能。从我的思想方法看，更适于走一条更为宁静、更为安全的路。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憎恨分裂，热爱和平与谅解，因为我已经认识到所有人世间的事情是多么黑暗。我知道制造混乱比起消除混乱来，要容易多少。既然我在处理所有的事情时都怀疑自己的理智，那我就宁肯别去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谈论他人的思想方法。我的愿望是：大家一起为基督教事业与和平福音的胜利而奋斗，也就是说，没有暴行，只有按照真理和理性的本义行事；我们彼此相互理解，既在教士的尊严方面，也在我主耶稣自己所需要的民众的自由方面。伊拉斯谟愿意同所有那些竭尽全力谋求这一目标的人站在一边。但是如果有某一个人想把我卷入混乱之中的话，那他就别想让我成为领袖，也别想让我成为同伴。"

伊拉斯谟的决心无法改变。他让皇帝们、国王们、教皇们和宗教改革家们——路德、梅兰希顿、丢勒、整个巨大的、好斗的世界等了又等，等了一年又一年，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迫使他说出一句关键性的话。他的嘴上露出一丝微笑，对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却又总是守口如瓶，不说出那句决定性的、关键性的话。

不过那时候有一个人不愿意等待，这是一个异常坚决地斩

断戈尔迪之结① 的、热诚、急躁的精神战士，此人就是胡滕②。这个“反对死神和魔鬼的骑士”，这个德国宗教改革的大天使米迦勒用深信不疑的、爱戴的目光，就像仰望慈父一样，仰望伊拉斯谟。在以满腔热情地献身于人文主义之时，这位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就是“成为苏格拉底③ 的亚西比德④”。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十分信任地交给了伊拉斯谟手中，“全部交给你，只要神灵保佑我，只要你为了德国的名誉不抛弃我们，我就会拒绝一切东西，以便能够同你继续站在一起。”伊拉斯谟任何时候都很容易受到人们的钦佩，他由衷地支持“缪斯的这位绝无仅有的宠儿”。他喜欢这个热情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将无法比拟的欢呼像一只顽强不屈的云雀那样抛向天空：“啊，时代精神，啊，科学文化！青春万岁！”这是一句极其快乐、充满信心的口号：“活着是一种乐趣！”他真心诚意地希望把这个年轻的、四处漫游的大学生培养成世界科学的一位新的大师。但是很快政治就把年轻的胡滕拉了过去，陋室的空间、人文主义的破书对他来说逐渐变得过于狭窄，过于沉闷。这位年轻的骑士和骑士之子又重新穿起臂铠，他再也不愿意仅仅摇摇笔杆，还要用剑来对准教皇和僧侣。他虽然头上戴着拉丁文诗人的桂冠，但他

---

①戈尔迪（Gordius），希腊神话中佛律癸亚国王。他所系之结，牢固难解。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用利剑斩开。斩断戈尔迪之结被转义为快刀斩乱麻或大刀阔斧地解决复杂问题。

②胡滕（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法兰克尼亚骑士和人文主义者。

③苏格拉底（Sokrates，前 469—前 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④亚西比德（Alkibiades，约前 450—前 404），雅典政治家，对苏格拉底非常钦佩。

却抛弃了这种陌生的学术语言，以便能够用更多的德语词句唤起时代为德国的福音拿起武器来：

过去我用拉丁文写作
这是并非人人都懂的语言
现在我对祖国大声叫喊

然而德国却把这个胆大妄为的人驱逐出境。在罗马，人们要把他当作异教徒烧死。这个差不多还不到三十五岁人的全部家业被剥夺，一贫如洗，早早地就衰老了，可怕的梅毒已经病入膏肓，全身化脓，这只几乎是衣衫褴褛、被人射伤的野兽，用最后的力气，拖住沉重的步子走向巴塞尔。在那里到底住着他伟大的朋友——“德意志之光”、他的导师、他的师傅、他的保护者伊拉斯谟。他宣扬过他的荣誉，伊拉斯谟的友谊伴随着他，伊拉斯谟的劝告促进过他，他把自己那业已失踪、差不多已经遭到毁灭的艺术力量当中的优秀部分都归功于伊拉斯谟。这个发狂的被驱逐者在濒于毁灭之际逃到伊拉斯谟那里。这个乘船遇难的人已经被黑暗的波浪所吞没，赶紧抓住最后一块木板。

但是伊拉斯谟——他心灵上的这种令人遗憾的恐怖从来没有比在这次惊心动魄的考验中暴露得更充分的了——并没有让这个被革出社会之徒走进他的家门。这个老爱争吵和无故挑起争端的人早就使他感到难受和讨厌，早在勒文期间，当胡滕要求他应当对教士公开宣战时，他就断然拒绝：“我的任务是促进教育事业。”他不愿意同这个将文学创作奉献给政治的狂热分

子，不愿意同这个“路德的皮拉得斯①”有任何交往，至少不愿意公开地在有上百个密探在窥视他窗户的这个城市同他有丝毫往来。伊拉斯谟害怕这个不幸遭到驱赶、差不多是疲于奔命的人。他有三方面的惧怕：第一，这个害有瘟疫的人——伊拉斯谟怕传染比怕任何东西都厉害——可能会请求住在他家里；第二，这个“既贫困又遭到抛弃的人”，这个乞丐和被夺去所有产业的人，以后会长期成为他的负担；第三，这个辱骂教皇、煽动德意志进行僧侣战争的人，会使他自己那种明确表示的不偏不倚大丢其丑。因此，他拒绝胡滕在巴塞尔的拜访，而且是按照他的方式——不用公开的、坚决的“我不愿意”这种话，而是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借口，说他因为结石和绞痛，不能在一间生了火的房间里接待需要室内暖和的胡滕，他自己忍受不了任何一种炉子的烟雾——这是一种明明白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令人怜悯的托词。

现在，当着全世界的面演出了一场令人汗颜的戏剧。在巴塞尔这座当时还只有总共也许是百来条街道和两三个广场的小城市里，在这个每个人都相互认识的地方，一个令人同情的病人——乌尔里希·封·胡滕这个伟大的诗人、路德和德国宗教改革悲惨的雇佣兵，好几个星期在小巷里和客栈中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他一再从他昔日的朋友、就是那个福音事业最早的促进者和复兴者居住的房前走过。有时候，他站在广场上，用愤怒的目光瞧着那道闩上的门，那个人那些小心翼翼关上的窗子。就是那个人当时满腔热情地向世界宣布，称他为“新卢奇

①皮拉得斯（Pylades），希腊神话人物，俄瑞斯忒斯的朋友，帮助该朋友报杀父之仇。

安①，当代伟大的讽刺作家。伊拉斯谟这个干瘦的小老头就像呆在屋里的蜗牛一样，又坐在冷酷无情地紧闭着的百叶窗后面，他不能指望这个捣乱者，这个令人厌烦的流浪者又会离开他这座城市。秘密地流传着种种消息，因为胡滕总是还在等待，是不是这扇门会打开，老朋友是不是会终于对他的苦难伸出友谊之手。可是伊拉斯谟却沉默着，怀着内疚的心情拒绝着，躲在他的屋子里防备着。

胡滕带着受到毒害的血液，如今还带着一颗受到毒害的心，终于走了。他到苏黎世去找茨温利，茨温利会毫无畏惧地接待他。他步履维艰地继续从一个病床走向另一个病床。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几个月，人们就在乌弗瑙岛为他准备了一座孤独的坟墓。但在他倒下之前，这个勇敢的黑衣骑士还最后一次举起那柄差不多已经破烂不堪的剑，至少还要用其剩余部分给伊拉斯谟以致命的打击。他这位信徒要给那位不肯表态的、过于谨小慎微的人以致命的一击。他用可怕的、愤怒的文字——对伊拉斯谟的抱怨——对这位昔日的朋友，昔日的领路人进行突然袭击。他当着全世界的面指责伊拉斯谟贪得无厌的追逐名誉，正是这种对于名誉的追逐使伊拉斯谟嫉妒他人不断增长的力量（这就是伊拉斯谟在路德事业上的精神失常）。他指责伊拉斯谟很不可靠，辱骂他的思想品质，愤怒地大叫大喊着，其叫喊声传遍整个德国。他说伊拉斯谟虽然内心赞同民族的事业、路德的事业，但他却抛弃了它，而且卑鄙地出卖了它。他用热情的语言从病榻上叫着伊拉斯谟的名字，说他在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捍卫福音新教学说时，至少也想去公开地攻击它，因为在福音

①卢奇安（Lukian，约120—约180），希腊修辞学家、讽刺作家。

新教徒的队伍里，人们早就不怕他了："系上带子，该是行动的时候了，这是一项值得你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去完成的任务。集中一切力量，把它用到事业上去。你将感到你的对手已经做好准备。你想从地球上赶走的路德派正等待着战斗，它不会拒绝同你斗争。"胡滕凭着对于伊拉斯谟身上隐藏着的内心矛盾的深刻认识，对他的对手预言道：他无法应付这场斗争，因为他的良知在很多问题上都同意路德的学说。"你的一部分言行并非完全针对我们，而是针对你自己早期的著作。你将不得不把你的知识转过来对付你自己，以口若悬河的方式对付你昔日的口才。你自己的著作相互之间将会矛盾百出。"

伊拉斯谟立即感到这一打击的厉害。迄今为止，只有一些小人物对他破口大骂。有时候有一些被激怒的拙劣作家指出他翻译当中有一些小错误、不够准确之处和不正确的引文。被这些并不危险的马蜂蜇了一下，就已经使这个敏感的人感到坐卧不安了。可是在这里他却第一次遭到一个真正的对手的突然袭击，当着整个德国遇到突然袭击和挑战。他开初大吃一惊，试图将最初只以手稿形式传播开来的胡滕文章的出版物压下去，但当他这一着不成功时，他就怒气冲冲地拿起笔来，用他的《Spongia adversus aspergines Hutteni》(《用海绵擦去胡滕的污蔑》)来回敬。他毫不手软地加以回击，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当他知道胡滕已经受伤而且已经遭到致命的打击时，还会毫不畏惧地束好腰带，准备战斗。他分别在四百三十四个条款中驳斥每一种污蔑，以便最终——当涉及到他那关键之处，涉及到独立性时，伊拉斯谟总是伟大的——表白自己强有力的、明确的信仰："我在如此众多的著作中，在如此众多的书信中，在如此众多的论争中坚定不移地宣布，我不愿意同任何一个派别的

事情搅和在一起。如果说胡滕生我的气，是因为我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支持路德的话，那我在三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过，我对这个派别非常陌生，而且愿意继续如此；更有甚者，我不仅仅自己要继续置身于派别之外，而且还鼓励我所有的朋友都采取这种态度。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是不会动摇的。我把派别理解为坚信路德曾经写过的，或者正在写的，或者将来有一天会写的所有东西。有时候在优秀的人们那里会出现这样一种十足的自我牺牲。但我对我所有的朋友却公开宣布，如果他们只能把我当作绝对的路德派人士来喜欢的话，那他们对我愿意怎么想，就让他们怎么想去吧。我热爱自由，我绝不愿意、也不可能为某一派别效力。”

这无情的回击再也不能击中胡滕了。当伊拉斯谟这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印刷完毕之时，胡滕这位不朽的战士已经长眠地下，苏黎世湖用轻柔的湖水声环绕着他那孤独的坟墓。在他遭到伊拉斯谟那致命的打击之前，死神已经战胜了他。但在弥留之际，胡滕这位伟大的战败者还获得了最后的一次胜利——他赢得了皇帝和国王、教皇和教士竭尽全力也无法得到的东西，他用嘲讽的消毒剂将伊拉斯谟熏出了他那隐居之地。面对公开的挑战，面对世人对于他胆小怕事、优柔寡断的指责，现在伊拉斯谟不得不说明，他并不害怕同路德，同这个所有对手中最强有力的对手进行一场大辩论。他不得不表态，他不得不站在某一边。伊拉斯谟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心情去从事著述。这位老人除了希望得到安宁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奢求。他并没有低估这种情况：路德的事业早已变得十分强大，再也不能用一枝羽毛管做的笔将它压下去了。他知道自己不会去说服任何一个人，他不会有丝毫变化，也不会有丝毫改进。他参加这场强加于他头上的斗争

可以说是毫无兴致，毫无乐趣。但他再也无法退出。当他终于在一五二四年将反对路德的论文交到印刷工手里时，他轻松地叹了一口气："骰子已经掷出"，"事已决定"！

大辩论

文学史上的流言蜚语并非某一特定时期，而是一切时代的特性。甚至就在十六世纪，在那些有才智的人只是零零星星，看起来毫无联系地分散在各国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东西秘密地存在于这个永远好奇的、孔眼紧密的圈子里。还在伊拉斯谟动笔之前，还在人们完全肯定他是否会和何时会应战之前，人们在维滕贝格已经知道在巴塞尔所计划的事情。路德早就估计到这次攻击了。“事实胜于雄辩，”他在一五二二年致一位朋友的信中就已经写道，“信仰比博爱更伟大。我不会向伊拉斯谟挑战。如果他要攻击我，我就打算立即还击。然而在我看来，他没有必要把自己雄辩的力量都用来对准我……但是如果他敢于这样做，那他就会体会到，救世主既不惧怕地狱之门，也不惧怕天上之神。我愿意迎战著名的伊拉斯谟，我也并

不把他的声望、他的名誉和地位放在眼里。”

这一封显而易见是在明确通知伊拉斯谟的书信包含着一种威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警告。人们感觉到在那些言词后面隐藏着的是：路德在其困境中宁肯避免一场笔墨官司，更何况现在朋友们正在双方进行调解。不管是梅兰希顿还是茨温利，为了福音新教事业，都在试图再一次促成巴塞尔和维滕贝格之间的和解，而且看来他们的努力已经找到了最好的途径。这时路德突然决定亲自对伊拉斯谟讲话。

但是，自从路德以彬彬有礼的和过于礼貌的谦卑，用一个学生的鞠躬面对这个“大人物”以来，短短几年间这种口气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现在，对于世界历史地位的觉悟，对于自己德意志使命的感知，赋予他的言词以崇高的激情。对于已经置身于反对教皇和皇帝，反对世界上一切势力的斗争中的路德来说，再多一个敌人又有什么呢？他对秘密游戏已经感到厌倦。他不喜欢模模糊糊，不喜欢不冷不热地达成协议。“人们应当大力横扫模糊不清、疑云密布、模棱两可的言词和讲话，开足马力，把它们立即清除掉，不让它们舒舒服服。”路德喜欢清清楚楚。他最后一次把手伸给伊拉斯谟，但是这只手已经戴上了铁的手套。

开初那些话听起来还有礼貌，还审慎。“我亲爱的伊拉斯谟先生，我现在已经沉默得够久的了。虽然我已经在等待着，虽然您作为更为伟大的人和长者准备首先打破沉默，但在长期等待之后，这番好意却催促我要开始提起笔来。首先我没有什么好反对的，您对我们的态度显得拘谨，好使教皇们感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恰到好处……”不过紧接着内心里对于优柔寡断之人的怒气便非常猛烈，而且几乎是带着轻蔑的神情爆发出来。“因

为我们看到，您还不具备男子汉的这样一种坚定性，这样一种勇气和性格，让您同意进行反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斗争，站在我们一边满怀信心地迎战这个怪物，所以我们也就不要求您做出我本人也感到力不从心的事情……但我却宁愿看到：尽管您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口才可以办到很多事情，但您却把自己的才华弃置一旁，不干涉我们的行动。因为您不同我们一条心，所以便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更确切地说，您只能以托付给您的才智为上帝服务。”他为伊拉斯谟的弱点和矜持感到惋惜，但最后他还是毫不客气地说出了那句关键性的话：这个行动的重要性早已超过伊拉斯谟的目标。尽管他伊拉斯谟想方设法反对他，但对他而言，这却再也不意味着危险了，更何况伊拉斯谟只是偶尔才挖苦他，诽谤他，这对他就更不足以构成威胁了。路德用家长式的、几乎是命令式的口气要求伊拉斯谟“放弃一切尖刻的、花言巧语的和隐晦的讲话”，而首先，如果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的话，“那就只是当一名我们悲剧的观众吧”，别和路德的对手们同流合污。他不会写文章来攻击他，就像他路德不想对他采取任何行动一样。“如今都已经攻击够了，现在我们不得不看到，我们相互之间都在折磨自己、耗费自己的精力。”

人文主义世界帝国的主人伊拉斯谟还从未接到过这样一种盛气凌人的信。这位老人尽管性格十分温和，但还是不愿意被这个过去曾经恭恭敬敬地恳求他的庇护之人采用这种方式居高临下地痛斥一番，不愿意被人当作无足轻重的空谈家。“比起许多现在以福音自夸的人来，”他自豪地回答道，“我对福音的关心还要多得多。我看到这种改革毁掉了许多东西，造就了许多叛乱者。我看到美好的科学都在倒退，友情被弄得破碎不堪。我担心会出现一次流血的骚乱。但是没有任何东西会促使我将福

音交付给人类的激情。”他着重提起这件事：如果说他过去准备反对路德的话，那他在权贵们那里是会得到多少感谢和掌声的。不过，要是人们发表反对路德的言论，以取代那些傻瓜——这些人如此大声地为他讲话，而且为了这些人的缘故，便不是“仅仅当一名这种悲剧的观众”的问题——也许会真的更有益于福音吧。路德的坚强不屈使伊拉斯谟动摇不定的意志得到了证实：“但愿这不会真的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吧”，他怀着忧郁的预感叹了口气。紧接着他便拿起笔，拿起他唯一的武器来。

伊拉斯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迎接的是何等强大的对手。他也许内心深处甚至还明白路德好斗的优势，路德这个人凭借他的怒气，迄今为止将每一个对手都打倒在地。不过伊拉斯谟自身的实力却在于：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大，这种情况在艺术家身上是很罕见的。他知道这种智力竞赛是在全世界有教养的人们面前进行的，欧洲所有的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都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期待着这台好戏的开场：所以现在就该寻找难以攻占的位置了。伊拉斯谟在十分出色地选择这个位置，他没有草率地向路德和整个福音新教学说发起进攻，而是以锐利的目光发现路德教派教义中薄弱的、或者至少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一点：他选择一个看似次要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路德那个差不多还是摇摆不定、根基不牢的神学学说体系中的一个要害问题。甚至连主要参与者，连路德也将不得不“称赞”道，“在我所有的对手当中，只有你一个人把握了问题的要害；你是唯一看清了整个问题的脉络，在这场斗争中要跳上前去卡着别人脖子的人。”伊拉斯谟以其异乎寻常的艺术理解力，宁肯挑选神学问题那辩证的、平坦的地面进行这场决战，而不坚持某种信念的固定的立场。在这块平坦的土地上，这个挥舞着铁拳的人

不可能将他完全打倒在地，在那里，他善于让各个时代最伟大的哲人来保护自己，庇护自己。

使伊拉斯谟成为辩论的中心的那个问题，是任何一种神学的一个永恒的问题——人类意志的自由或者不自由的问题。对于路德那种奥古斯丁式的、严格的宿命论来讲，人类永远都是上帝的囚俘。他们没有丝毫自由的意志，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事先早就意识到的，由上帝事先确定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意志不可能由于有优秀的作品，由于有美好的事业，由于懊悔便会应运而生，这种意志也不可能摆脱过去经历过的罪孽的纠缠。只有上帝的恩惠才能作出决定，将一个人引上正道。一种现代观点也许会翻译成：我们在自己的命运方面完完全全受到遗传型，受到形势的控制。因此，只要上帝不愿意，这种独立的意志便会一事无成——按照歌德的话来说就是：

一切意志
都只不过是一种意愿，因为我们理应如此，
专横在意志面前悄然无声……

伊拉斯谟这个人文主义者，这个把尘世的理性视为一种神圣的、由上帝赐予的权利之人不赞成路德的这种观点。他坚定不移地相信，不只是单个的人，而是整个人类都可以通过一种诚实可靠、受过训练的意志实现越来越高尚的美德，因而不得不在内心深处反对这样一种僵硬的、几乎是穆斯林式的宿命论。但如果他不管对哪一种反对意见都说出一个生硬粗暴的不字，那么伊拉斯谟也就不成其为伊拉斯谟了。同在别的地方一样，他在这里只是反对激进主义，反对路德决定论观点中的那种粗暴做

法和绝对性。他用自己那种小心翼翼、摇摆不定的方式说，他本人“对固定不变的看法没有兴趣”，他个人往往喜欢怀疑，但他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听命于论文和教会的言说。另一方面，这些观点在《圣经》当中也以神秘莫测、尚未充分加以探究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他也感到，要像路德那样坚决地全盘否定人类意志的自由是危险的。他绝不会说路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他反对“有些东西”，反对这种看法，说什么一个人所做的一切好事在上帝面前都不起任何作用，因而也就是多余的。如果人们都像路德那样，一切都听命于上帝的恩惠，那么对于人们来说，行善事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他作为永恒的中间人，建议大家至少应该让人们有自由意志的幻想，使他们不会产生怀疑，不会认为上帝残酷无情、不公正。“我赞成那些在少数问题上，但不是在大部分恩惠方面听命于自由意志的人的意见。我们用不着试图去避开自尊心的斯库拉①，以防止被扯进宿命论的大漩涡中去。”

人们看到，伊拉斯谟这位温和的人甚至在争论中也十分迁就他的对手。他还抓住这个机会提醒大家，别人也许并没有过高估计这些讨论的重要性，也许自己还在考虑，“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论断，把全世界都搞得动荡不安的这种做法是否正确”。说真的，要是路德额外给予他哪怕是很少的一点东西，哪怕让他一步，那么这次思想上的纷争就会在融洽和睦的气氛中结束。但是伊拉斯谟却希望从这个本世纪最顽固的人那里，从这样一个人那里得到迁就的谅解。须知，这种人在信仰和信念这些事

①斯库拉（Scylla），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六头女妖，住在意大利墨西拿海峡的岩礁上。据传，船过此处必被打翻。

情方面，就是站在用火刑的柴堆上面时，也不会放弃一个字母，放弃丝毫东西的。这种人作为天生的、死硬的狂热分子宁可走向毁灭，或者让世界遭到毁灭，也不肯在他的学说最微不足道、最无足轻重的段落中放弃哪怕是一分一厘的地盘。

虽然这次攻击使这个易于发火的人恼羞成怒，但路德却没有立即回击伊拉斯谟。“当我为了有礼貌地讲话而用别的书籍来抹去这种高（压）……时，读完了伊拉斯谟这篇文章，可我真想把它抛到长椅后面去。”他用他那耸人听闻的方式说道。但是在一五二四这一年，他还有比神学讨论更为重要和更为棘手的事情要办。每一个革命者永恒的命运开始在他身上成为现实，如今就连他这个想用新的制度来取代旧制度的人也解放了混乱势力，同他的极端主义一道，陷入遭到还要激进的人发动的突然袭击的危险之中。路德过去要求言论和信仰自由，现在他们还为自己要求别的自由——那些茨维考的预言家们、卡尔施塔特①、闵采尔，所有这些人就像他所说的那样，都是些“狂热分子”，就连他们也以福音的名义聚集在一起，发动反对皇帝和帝国的叛乱。路德本人反对贵族和王侯的言论在自由青年联盟的农民群体中，成了长矛和有刺的棍棒。但是，只要路德希望进行一场思想上的，一场宗教方面的革命，现在这些受压迫的农民就会要求进行一场社会的和一场明显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这一年，在路德身上重演了一次伊拉斯谟的精神悲剧，他的言论变成世界性事件的程度，超过了他本人的愿望。就像他过去责骂伊拉斯谟的冷淡一样，现在那些鞋会会员、寺院破坏者和焚

①卡尔施塔特（Andreas Rudolf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约1480—1541），德意志神学家，因行为过分，终至被放逐。

烧圣像的人骂他是“罗马教皇新的诡辩家、头号异教徒和头号流氓”，是“魔鬼晚生的朋友”，骂他是“维滕贝格高傲自大的肉墩”。伊拉斯谟的命运是：他从精神的和宗教的角度来看待的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被广大群众和他们那些还要狂热的领袖们从“肉体的”、粗俗的鼓动性的角度来理解。永恒的革命形势使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说伊拉斯谟是吉伦特派成员，那么路德就是罗伯斯庇尔派成员，托马斯·闵采尔就是马拉派① 成员。他这个昔日公认的领袖不得不一下子同两个集团进行斗争，既要反对太温和的一派，也要反对太粗野的一派，而且不得不担当起社会革命，担当起德国若干世纪以来最可怕、血腥味最浓的起义的责任。因为农民们把他的名字铭记在心，只有他反对皇帝和帝国的起义和成果，才给所有这些低贱的起义者带来了奋起反抗他们的行政官和暴君的勇气。“我们现在收获你的思想的果实，”现在伊拉斯谟有权大声告诉他，“你并不承认这些起义者，但是他们却承认你……你并不反驳认为你的著作，尤其是你用德文写成的著作造成了这场灾祸这一共同信念”。

对于路德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决定：他这位曾经植根并且生活在民众之中、反抗过王侯的人，现在应当背弃那些按照他的意愿，并以福音的名义为自由而斗争的农民呢，还是应当背弃王侯？他第一次（因为他的处境一夜之间变得同伊拉斯谟的处境十分相似）试图按照伊拉斯谟的方式行事。他提醒王侯们要宽容，他提醒农民，“不要把基督教的名义变成你们不温和、

①吉伦特派为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1758—1794）和马拉（Marat，1743—1793）都是法国大革命的领袖。

不耐烦和异教徒行径的遮羞布。”不过，对于一个有自信心的人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粗野的民众再也不听他的话了，而宁愿听从那些到处许愿的人，听从托马斯·闵采尔和共产主义神学家。最后他不得不作出决定，因为这种没有节制的起义使他的事业丢尽面子，再说他也认识到，这种德意志内部的社会战争会妨碍他自己反对教皇统治的精神战争。“如果这些起义的杀人魔王同他们的农民不上我的当的话，现在很可能教皇的统治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当问题涉及到他的事业和他的使命时，路德是不会犹豫的。他自己是革命者，却不得不站在反对德国农民革命的一边，而路德一旦站在某一边时，那他作为激进主义者就只能以极其愤怒、极其片面、极其野蛮的方式行事了。在他所有的著作中，这篇产生于他遇到最大危险时期的文章，就是针对德国农民的论战性的小册子，是最可怕的、嗜杀成性的文章。“谁站在王侯一边遇难，”他劝说道，“谁就会成为死后升天的殉道者；谁站在另一边阵亡，谁就见鬼去吧。那时候只要办得到，这里就应当猛然关上大门，秘密地和公开地掐住脖子，用针来刺，就应当想到一个起义者绝不可能是一个恶毒的人、有害的人、残酷的人。”他经常站在当权者一边毫不留情地反对民众。“驴子需要抽打，暴民需要用武力来治理。”当获胜的骑士用极其残酷的暴行对可怜的战败者大发雷霆时，这个狂暴的斗士找不到一句温和、仁慈的亲切用语。这个天才的、在恼怒之中好走极端的人对不计其数的牺牲者没有丝毫同情。须知，在这些牺牲者中，有好几千人因为相信他的名望，相信他的叛乱行动才冲向骑士城堡的。最后，当符腾堡的原野上血流成河时，他用一种可怕的勇气承认：“我马丁·路德在叛乱中杀死了所有的农民，因为是我让人打死了他们：我对他们所有

人流出的鲜血要承担责任。”

当他将笔锋转向伊拉斯谟时，这种狂怒，这种可怕的仇恨的力量还存在于他的文章之中。也许他还会原谅伊拉斯谟在神学方面插进来的说明本身，但是这个要求自制的号召在人文主义世界整个范围内所得到的这种热烈的响应，却使他暴跳如雷。他的敌人现在居然唱起他们的凯歌——路德忍受不了这种想法。“你们告诉我，伟大的马加比① 在哪儿？他这个如此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学说的人在哪儿？”现在，当对农民的担心再也不使他心烦意乱时，他就不仅仅想要回击伊拉斯谟，而且还要彻底打垮他了。吃饭时，他当着聚集一堂的朋友们的面，用可怕的言词宣布他的打算：“因此我要求你们按照上帝的命令办事，你们要成为伊拉斯谟的敌人，要提防他的著作。如果你们在这些书堆中死去和沉沦，我就要写文章反对他。我要用笔把这个魔鬼杀死，”然后他差不多带着自豪的神情附上一句，“就像我杀死闵采尔那样，他流的血由我来负责。”

然而，路德即便处于盛怒之中，而且恰恰是在怒火中烧的时刻，仍然不愧为伟大的艺术家，不愧为德语语言的天才。他知道自己在攻击一个多么伟大的对手。在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时，他的著作本身也变得伟大了。它并非一篇战斗性的小文章，而是一部全面彻底、内容丰富、形象生动、充满激情的著作，一部除了他神学方面的博学外，比大部分力量，比他诗人的力量、他人性的力量都更加出色的著作。《论遵从自由的选择》，关于意志的不自由的论文，是这个好斗的人最有分量的论战文章，因此同伊拉斯谟的辩论也就成了当时德国思想领域在两个气质完

①马加比（Judas Makkabäus，？—前 161），犹太解放斗争的领袖。

全相反的人之间，但又是在极大范围内进行的那些极其重要的讨论的组成部分。不管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现代的感觉来说显得有多么古怪，这一场斗争却由于对手们的伟大而成为世界文学当中的一件文化大事。

路德在开战前，在拴好头盔、拿好长矛准备刺杀之前，有片刻工夫，不过仅仅也是片刻工夫，举起剑，致以彬彬有礼的、短暂的问候。“我谨对你本人致以极为崇高的敬意，以前我还从未对任何人表示过如此的赞誉。”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伊拉斯谟过去对待他“态度温和，处处都是和颜悦色的”。他承认，伊拉斯谟是他所有对手当中唯一“看清这整个事件的脉络”的人。但是路德在勉为其难地鸣放这种礼炮之后，却果敢地攥紧拳头，顿时变得粗暴无礼，因而也就感到得心应手了。他只回答伊拉斯谟：“因为保罗命令堵住没有用处的空谈家的嘴。”现在刀剑正劈头盖脸地砍将下来。他以雄伟壮丽、货真价实的路德式的形象性向伊拉斯谟开火，说他“到处都在鸡蛋上行走，但又不想踩坏一个鸡蛋，在玻璃杯之间走动，却又不碰到一个杯子”。他讥讽道：“伊拉斯谟不愿意坚决维护什么东西，却维护对于我们的这样一种评判；这真是躲过了小雨，却掉进了池里。”他用一道鸿沟来揭示伊拉斯谟伪善的深思熟虑和他自己毫不含糊的直率和绝对性之间的对立。那个人“把肉体宁静的舒适和安宁看得比信仰还要重”，而这时他自己却准备承认，“即使整个世界不仅会立即变得不安宁，而且还会完全沉陷下去，变成一片废墟。”当伊拉斯谟在他的文章里巧妙地告诫人们要谨慎，而且指出《圣经》中有些地方模糊不清时——对于这些模糊不清之处，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满有把握、认真负责地解释清楚——路德就对他大声表白这种信仰：“没有明确性就没有基督教。一个基

督徒应该相信它的教义和它的事业，要不然他就不是基督徒。”谁在信仰问题上犹豫不决、态度冷淡或者多猜多疑，谁就会永远放弃神学。“圣灵并非怀疑论者，”他对伊拉斯谟大声吼道，“他并没有把一种没有把握的幻想，而是把一种强有力有确定性写进了我们的心里。”路德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说什么一个人只有在心中装着上帝时才是善良的，而当一个人鬼迷心窍时，他就心术不正。他自己的意志也就空洞无物，面对上帝不可避免、不容更改的天空也就无能为力。逐渐地，超出这个问题之外，又从这另外的起因中产生了一种要大得多的对立；就像一道分水岭一样，这两个宗教改革家按照他们的气质，将他们截然不同的、关于救世主的本质和使命的观点分离开来。对于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来说，耶稣基督就是一切人性的宣布者，是献出自己鲜血，以便从世界上消除所有的流血事件和一切纷争的神；上帝的雇佣兵路德再次坚持福音中的话，说耶稣基督之所以降临人世，“并非为了要求和平，而是要求战争”。伊拉斯谟说，谁要成为基督徒，谁就必须按照他的意愿热爱和平，宽宏大量；坚持不屈的路德回答道，谁要当一名基督徒，只要涉及到《圣经》，谁就绝对不许让步，即使当时整个世界会遭到毁灭，也不能退让。他在几年前致施帕拉丁的信中所说的那番话就是他的座右铭：“我并不认为，这项事业没有骚乱、麻烦事和反抗就可以坚持到底。你无法把一柄剑变成一枝笔，无法把战争变成和平。《圣经》就是战争，就是麻烦事，就是毁灭，就是毒药——这就像路边的一只熊和林中的一只母狮挡住以法莲①

①以法莲(Ephraim)，约瑟的次子。约瑟的两个儿子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中不同支派的祖先。以法莲即昌盛的意思。

的儿子们的路一样。”因此他严词拒绝伊拉斯谟要求联合谅解的呼吁：“放弃你的抱怨和叫喊，没有一种药能治这种狂热。这场战争是我主上帝的战争，我主发动这场战争，在使《圣经》的一切敌人遭到毁灭之前，他不会停止这场战争。”伊拉斯谟软弱无力的废话无异于缺少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因此他应当离开他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值得赞扬的工作——用漂亮的德语来说就是：他那人文主义的把戏——而不该用他那“矫揉造作的言词”来染指那些只是出于一个信徒、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信徒内心对于上帝的信仰才可能变得明确的问题。路德专横地要求：伊拉斯谟应当永远放弃参加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宗教斗争的权利，“过去你对我们的事业来说是够强大的了，上帝还没有要求你这样做，而且也没有让你这样做。”他本人，也就是路德感到了这种呼声，因此也就感到了良心上的自信：“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谁，我是通过什么样的精神和事业参加到这场论争中来的，我把这件事托付给上帝。上帝无所不知，他知道我的这项事业并非由于我的、而是由于他那神圣的自由意志才开始进行，而且进行到现在。”

这样，便写出了人文主义和德国宗教改革之间的这封告别信。伊拉斯谟学说与路德学说、理性与激情、人性的宗教与信仰的狂热、超越民族的意识与民族意识、全面与片面、顺从与固执就像水与火一样，很难结合在一起。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它们在人世间争吵起来，在盛怒中就会发生火并。

路德永远也不会原谅伊拉斯谟过去曾经公开反对过他。这个好斗成性的人除了完全彻底地、无条件地消灭他的对手之外，不容许争论有别的结局。正当伊拉斯谟满足于一个无与伦比的答复，满足于那篇就他那逆来顺受的性格来讲是相当激烈的文

章《过于恶毒》，紧接着便重又回到他的研究中去之时，仇恨的火焰却在路德心中继续燃烧着。他不错过任何机会，对这个在其学说的某一点上敢于反对他的人大肆辱骂。正如伊拉斯谟所诉说的那样，他那“杀气腾腾的”仇恨不惜进行诽谤污蔑。“谁压死伊拉斯谟，谁就掐死了一只臭虫，而这只臭虫死了以后发出的臭味比活着时还要难闻。”他称伊拉斯谟为“耶稣基督最凶恶的敌人”。有一次，有人把伊拉斯谟的画像拿给他看，他当即警告朋友们，说这幅画上的人是“一个曾经嘲笑上帝和宗教这两者的”、“日日夜夜都在想出反复无常之话的、诡计多端、阴险狡诈的人。当有人认为他讲了很多话时，他却什么东西也没有讲。”他在饭桌上怒气冲冲地大声告诉朋友们：“在我死后，我要让人把这一点写进遗嘱当中去，为此，我要把你们所有的人都当作证人，证明我把伊拉斯谟视为一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耶稣基督最大的敌人。”最后他甚至竟敢说出亵渎神灵的话来：“当我祈祷你的名字被奉若神明时，我却在咒骂伊拉斯谟和所有亵渎和玷污上帝的异教徒。”

不过路德这个火气旺盛的人，这个在斗争中横眉怒目的人也并非总是一介武夫，为了他的学说及其影响的缘故，他也不得不暂时当一名外交家。很可能朋友们促使他注意到，他用如此粗野的漫骂和诽谤来攻击这位上了年纪、在整个欧洲备受尊敬的人这种做法是多么不聪明。所以路德放下了手中的宝剑，拿起橄榄枝，在他那可怕的争论后一年，他给这个“上帝的头号敌人”写了一封幽默信。他在信中对于“曾经如此严厉地对待他”表示歉意。然而现在却是伊拉斯谟粗暴地拒绝谅解了。“我还没有——”他声色俱严地回答道，“那么天真幼稚，在遭到别人大肆谩骂之后不久，一些小玩笑或者几句奉承话就可以使我

平静下来……所有这些讥笑嘲讽的注释和卑鄙无耻的谎言是干什么的，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信仰问题方面的怀疑论者，一个亵渎神明的人，我不知道还有些什么……我们两者之间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至少对于这个濒临死亡的人来说并不重要；不过使每一个像我本人这样正直的人感到气愤的是，你狂妄自大、厚颜无耻和犯上作乱的行为会毁掉整个世界……这场风暴由于你的意志，不会得到我为之奋斗过的那种心平气和的结局……我们的交易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可是这共同的困境和不可救药的困惑却使我感到痛苦，而这一些，我们不能归功于任何别的人，只能归功于你那不可驯服的方式，这种方式不愿意听从那些向你提出好的建议之人的话……我祝愿你有另外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你现在这种使你如此神魂颠倒的方法。你本人想祝愿我什么，就尽管说吧，但是你的精神状态要除外，除非主改变这种精神状态。”伊拉斯谟用一种平时连他自己也感到陌生的强硬态度，把这只将他的世界打得粉碎的手往后一推，他再也不愿意问候和认识这个破坏教会的和平、给德国和世界带来思想上最可怕的“动乱”的人。

但是动乱已经遍及世界，没有任何人能躲过它，连伊拉斯谟也不行。动乱是命运打算赐予他的法则，而且每当他渴望安宁之时，他周围的世界往往都会愤然而起。就连巴塞尔这个他因为其中立才逃到那儿去的城市，也受到宗教改革狂热的困扰。大量的人群冲进教堂，撕毁圣坛上的圣像，捣毁上面的木雕，然后在大教堂前把它们堆成三大堆烧掉。伊拉斯谟惊恐万分地看着他永远的敌人——狂热手持火把与刀剑在他住所周围大吼大叫。在这种动乱中唯一能给他的一点小小的安慰是：“没有流血——但愿总是这样。”可是现在，当巴塞尔已经成为宗教改革的

拥护者之城时，一切不公平之事都使他反感，他在这座城里再也待不下去了。为了工作安宁，伊拉斯谟六十岁时移居到比较宁静的奥地利管辖的弗赖堡去，他在那里受到市民和官方隆重的夹道欢迎，并给他提供了一座皇宫作为住所。但他谢绝了豪华住宅，宁愿选择修道院旁的一座小房子，以便能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工作，平平静静地死去。历史不能为这个调和折中、四处碰壁的人创造一个辉煌的象征，因为他哪儿都不愿站在某一边：伊拉斯谟不得不逃出勒文，因为那里天主教气味太浓；不得不逃出巴塞尔，因为那里新教势力太强。这个自由的英才、独立的英才、不受任何教义束缚、不愿选择任何派别的英才，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

尾　声

伊拉斯谟作为一个六十岁的人已经精疲力竭，现在又在弗赖堡重新埋头于他的著述之中——如今又像往常那样——逃避世界的冲击和喧嚷。这个又矮又瘦的身躯变得越来越干瘦，那张布满上千条皱纹的、皱巴巴的、敏感的脸越来越像一张用神秘莫测的符号和古文字写成的羊皮纸手稿。这个昔日曾经满怀激情地相信，通过精神就能使世界复活，通过更为纯洁的人性就能改造人类的人，逐渐变成一个尖酸刻薄、喜欢讽刺挖苦的人。他像所有的老鳏夫一样脾气古怪，总是抱怨科学的衰退，抱怨他的敌人恶毒，抱怨物价上涨和骗人的银行家，抱怨又次又酸的葡萄酒，这个伟大的失望者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越来越感到陌生，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愿意和睦相处，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每日都有理性遭到激情的暗杀，正义遭到武力

的刺杀。他的那颗心早已困倦，但是他的手，他那异常清醒、敏锐的头脑却没有困倦。他的智力恰似一盏明灯，将永恒的、完美无缺的照明范围扩展到进入他那坚定不移的精神的视野中去的万事万物上面。唯一的一个女友——那个年纪最大的、最亲密的女友在忠实地帮助他，这个女友就是工作。伊拉斯谟日复一日地写，写了三四十封信，他用早期基督教教父的翻译填满了整个大开本的著作，他补充了自己的学术讨论会，促进了一系列美学和伦理学著作。他凭着一个人的觉悟写作和工作，这种人相信理性的权利和义务就是亲自对忘恩负义的世界讲出理性不朽的话语。但在内心里他却早已明白：在这样一个世界发狂的时刻，要唤起人们实现人性是毫无意义的。他知道自己庄严崇高的人文主义思想失败了。他所希望、所追求的一切——谅解与和解，而不是野蛮的战争，由于宗教狂的顽固遭到了失败。他的精神王国，他在人世间的柏拉图王国，他的学者共和国在激动不已的派别之争的战场上没有立锥之地。在宗教与宗教，在罗马、苏黎世和维滕贝格之间，进行着狂暴的战争，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征战就像流动着的雷雨一样连绵不断，耶稣的名字变成了战地口号，成了军事行动的旗帜。上帝的管理人和发言人使用四福音书上的话就像使用战斧一样，从此以后还要撰写宗教宣传的小册子，还要劝告王侯们要三思而行，这是多么可笑；还要成为福音新教学说的代言人，这是多么荒唐。“他们所有的人嘴里都挂着福音、《圣经》、信仰、救世主和灵魂这五个词，可是我却看到他们当中好多人都在手舞足蹈，好像他们中了邪似的。”不，在这样一个政治过度刺激的时代，还想继续当一名中间人和调解人是再也没有意义的了。那个在道德上取得一致 的、欧洲人文主义世界帝国的崇高的梦

想，已经完结。他这个为人类做过这一美梦的人，他伊拉斯谟自己，一个疲惫的老人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他的话再也没有人听了。世界从他身边走过，它不再需要他了。

但是在一支蜡烛熄灭之前，它的火焰往往还要绝望地往上跳动一下。一种思想在被时代的风暴压下去之前，还要作自己最后的一次挣扎。伊拉斯谟的思想——和解与调停的思想照亮了每一时刻，尽管时光短暂，但却辉煌无比。两个世界的主人卡尔五世作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皇帝再也不是出现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会议上的那个缺乏自信心的孩子了。种种失望和经验使他变得成熟，他刚刚赢得的对于法国的伟大胜利，终究赋予了他必不可少的自信心和权威。他一回到德国，便决定最后在宗教争端中进行整顿，再一次恢复——哪怕是用武力——被路德分裂开来的教会的统一。但他并没有动用武力，他希望按照伊拉斯谟的意愿，试图通过相互理解，在古老的教会和新潮的思想之间进行调解。“召开一次既有见识、又无偏见之士 的宗教会议”，让他们抱着仁爱与缜密的态度倾听和考虑所有那些能够导致一个再次统一的基督教的论据。为了这个目的，卡尔五世皇帝在奥格斯堡召开了帝国议会会议。

奥格斯堡的这次帝国议会会议是决定德意志命运的一个最伟大的时刻，除此而外，它还是人类的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是本身就包含着后来几个世纪进程的那些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当中的一个机遇。奥格斯堡的这次帝国议会会议那样富有戏剧性，但在作出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方面却不见得比那次会议逊色。在这里就像当初一样，关系到西方国家思想上的——教会方面的统一。

奥格斯堡那些日子首先对于伊拉斯谟的思想，对于他一再

要求的、在思想上的——教会方面的敌人之间进行的那种和解的对话非常有利。因为新教与旧教这两种势力都遇到了危机，因此都准备大让其步。天主教自从看到宗教改革的事业就像一场森林大火 那样席卷整个欧洲北部，而且随时都会继续熊熊燃烧起来，它已经失去了许多使人难以接近的、在开始时用来观察渺小的德国异教徒的傲气。新的学说已经在荷兰、在瑞典、在瑞士、在丹麦，而首先是在英国获得胜利，那些经常陷于经济困境中的王侯们到处都发现，以福音的名义没收教会大笔财产，会给他们的财政状况带来多大的益处。自从唯一的一个奥古斯丁教团僧侣居然不受任何惩罚地在大庭广众之中，在熊熊烈火上面烧掉教皇逐出教会的通谕以来，罗马古老的斗争手段——绝惩和驱逐早就不像卡诺萨① 时代那样有力量了。但是，自从这个当家人不得不从他那天使般的城堡俯视被洗劫的罗马以来，教皇统治的自信心已经遭到了最可怕的命运。“罗马被过滤”有好几十年使罗马教廷的勇气和傲气消逝殆尽。就是对于路德及其同伙来说，自从沃尔姆斯那些辉煌、英勇的日子以来，充满忧虑的时刻也已经来临。甚至在福音新教的营垒里面，那种所谓的“教会可爱的和睦”也情况不妙。因为还在路德把他自己的教派组建成团结一致的组织之前，已经出现了对立的教派——茨温利和卡尔施塔特的那个教派，亨利八世的英国教派，以及“狂热分子”和再洗礼派教徒的教派。这个本人就是非常

①卡诺萨（Canossa），意大利埃米利亚雷焦西南方的十世纪城堡，因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皇帝亨利四世在此处会见（1077 年）出名。亨利为免废黜，以普通悔罪者身份到此等候三天，才得宽恕。在后世，卡诺萨包含着王权向教会屈服的意思。

正直的宗教狂已经认识到，他在精神上所希望的东西，被不少人从肉体的角度来理解，充分利用它来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弗赖塔格①非常精彩地道出了路德晚年的悲剧："谁被命运挑选出来重新创建最伟大的事业，谁同时也就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打得粉碎。他越认真，他内心里就越深刻地感到他给世界制度带来的创伤。这是隐痛，甚至是对那种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的悔恨。"现在，甚至在这个冷酷无情、平常是势不两立的人身上第一次表现出希望谅解的淡淡的意愿。再说他那些平常把他的意志之弦绷得紧而又紧的伙伴，甚至就连德国的王侯们自从发觉他们的君主和皇帝卡尔五世重新腾出双臂，用利剑武装自己以来，现在思想上都更加小心谨慎了。他们当中有些人这样想，别当犯上作乱者去同欧洲的这位君主作对也许是个好办法——顽固坚持很可能会失去脑袋和土地。

这就是说，破天荒第一次没有了昔日和往后在德国宗教信仰问题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那种可怕的坚定性。由于宗教狂热的热度下降，便出现了一种极大的可能性。这样也许就能按照伊拉斯谟的意愿，实现旧教与新教之间的谅解，然后德意志、全世界就会在思想方面重新统一起来，持续百年的宗教战争、内战、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以及所有对于文化与物质财富的极大破坏才可能避免。德国在世界上的道德宗主国的地位就会有保证，宗教迫害的耻辱就能避免。焚烧异教徒的火刑柴堆就不会燃烧，禁书目录和宗教裁判所也不需要用它们残酷的烙印来压制思想的自由，经过考验的欧洲再也不会遭受巨大的苦难了。本来也就只有一段小小的差距把对手们分割开来。如果这点差距通过

①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1816—1895）德国作家。

相互让步得到克服，那么理性、人文主义的事业、伊拉斯谟就会再一次获得胜利。

另外，这种情况对于这样一种谅解来说是大有希望的。这种情况就是：新教事业的代理职务不掌握在路德那寸步不让的手中，而掌握在梅兰希顿那双更能随机应变的手中。这位异常软弱和高贵的人被新教教会奉为路德最忠实的朋友和助手。但奇怪的是，他整个一生也是他伟大的对手忠实的崇拜者，是伊拉斯谟坚定不移的学生。就气质而言，他小心谨慎的天性甚至更接近伊拉斯谟所说的那种福音新教学说的人文主义的和人道的观点，而不是路德这种冷酷无情的、严格的训练。在维滕贝格，就在路德的身边，梅兰希顿感到自己对于路德的意愿百依百顺，唯命是从，他毕恭毕敬地用他清醒的、从组织的角度来考虑的思想的全部热情来为路德服务。可是在这里，在奥格斯堡，他的天性的另一部分，梅兰希顿身上的伊拉斯谟成分，终究能够破天荒第一次在领袖个人的催眠状态之外自由自在地发展了。梅兰希顿在奥格斯堡这些日子公开拥护最大限度的和解，他的妥协退让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几乎又重新跨到旧教里面去了。正如他所赞同的那样，因为路德“不能如此温顺轻声地挪动脚步”，所以由他本人起草的《奥格斯堡告白》尽管其措辞明确直率、艺术非凡，对天主教却没有使用任何粗暴挑衅的言词。在讨论中，有争议的重要问题又都小心谨慎地用沉默来处理。这样一来，路德同伊拉斯谟十分激烈争论过的宿命论也就没有进行探讨，同样没有探讨的还有诸如罗马教皇统治的神圣权利，永久的特征，教士无法摆脱的特性，圣事七件这样一些最棘手的难点。人们从两边都惊异地听到进行调解的话语。梅兰希顿写道：“只要罗马教皇不把我们逐出教门，我们就尊重罗

马教皇的权威和全部的宗教虔诚。”另一方面，一位梵蒂冈的代表用半官方的方式宣布教士的婚姻和普通教徒的圣餐、饮酒问题值得讨论。尽管有各种困难，与会者仍然怀着一线希望。要是现在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一位内心里充满着强烈的和平愿望的人在场的话，他就会投入自己调解口才的全部力量，投入自己逻辑的技巧，投入语言表达的高超技能。他也许还能够在最后时刻使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和解——他对他们双方都亲近，都心怀感激之情，对这一方出于同情，对另一方出于忠诚——这样一来，欧洲思想也就有救了。

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就是伊拉斯谟，两个世界的主宰——皇帝卡尔坚决邀请他出席帝国议会会议，他在以前提过伊拉斯谟的建议和调解。然而伊拉斯谟式命运的形式又悲惨地重复了一次。这个虽有远见、却又从来不敢向前迈进一步的人往往只善于认识别人不能认识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但由于个人的软弱，由于无可救药的胆怯，却耽误了作出决定的机会。在这里，他那历史性的过错又改头换面重演了一次。伊拉斯谟就像不参加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会议那样，也不出席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会议。他下不了决心亲自出场去面对自己的事业，去面对自己的信念。确实，他写了信，给两大派都写了许多信，许多非常明智、非常有人情味、非常有说服力的信，他试图促使两个营垒里的朋友，促使梅兰希顿和站在另一方的教皇使者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但是这种书面语言在决定命运的紧张时刻，从来就不具有热血沸腾的、生气勃勃的呼唤的力量。另外，就连路德也接二连三地从科堡发出通知，要梅兰希顿变得比自身内在的本性更严厉一些，更坚定一些。最后，因为这个恰当的、天才的调解人本人没有露面，双方的对立又重新加剧，在

无数次的讨论中，相互理解的想法恰似能高产的种子一样，在磨石之间被磨碎了，奥格斯堡的宗教会议把希望联合起来的基督教界分裂开来，最终分成两大宗教派别，笼罩世界的不是和平，而是纷争。路德态度强硬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如果要由此爆发一场战争，那就爆发一场战争吧。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而伊拉斯谟也悲观地说："当你以后看到世界上出现可怕的混乱时，你就会想起伊拉斯谟曾经预言过这种混乱。"

从他的"伊拉斯谟式"思想遭到最后的、决定性的失败那天起，这位蹲在他那弗赖堡书斋里的老人只不过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一个他昔日荣耀的阴暗的影子罢了。他自己对这一点感受最深：一个沉默寡言、百依百顺的人在"这个吵吵嚷嚷——或者说得更清楚一些——得了狂犬症的时代"是不合时宜的。继续长时间地拖住个弱不禁风、患着痛风病症的身子，走过这与和平的思想相去甚远的时代，还有什么意思？伊拉斯谟对于昔日如此珍爱的生命已经厌倦。从他的嘴里令人震惊地冒出了乞求的呼唤："上帝终于想把我从这个发狂的世界领走了！"当狂热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心灵之时，智慧哪里还有一席之地？他所缔造的人文主义的崇高王国遭到敌人的攻击，几乎已被敌人占领，"知识与辩才"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再也不听从典雅的、文学创作中那种反复推敲过的言词，而仅仅听从政治那粗俗、热情的话语。思维沉迷于群体的疯狂，它已经穿上路德或者教皇的制服，学者们再也不用文雅的书信和小册子来进行斗争，而是按照市场上泼妇骂街的方式，相互报以粗俗不堪的骂人话。没有人愿意理解别人，每一个人都想把自己一派的信仰，自己的学说像火印一样用武力强加给他人。那些想要置身局外、追随自己信仰的人是多么不幸啊！他们想要置身于两派之间，超然

两派之外，然而针对他们的却是双倍的仇恨！在这样的年代，一个仅仅留恋智慧的人多么寂寞孤独！啊，在不绝于耳的政治咒骂和叫嚷声中，在对于夹在其中的细微的声音和巧妙、恳切的嘲讽充耳不闻的时候，还应该为谁写作呢？自从上帝的学说落到空论家和宗教狂手中，作为他们刚愎自用最后的、也是最好的理由，唤起兵痞、骑兵和大炮以来，还应当同谁从神学的角度争论上帝的学说呢？对持不同思想者和自由思想者的围剿已经开始，这是片面性的专政：人们以为用带刺的棍棒和行刑的刀剑就可以为基督教服务。在信仰者当中，恰恰是那些最有才智的人，最有胆量的人在使用最残忍的暴力。他曾经预言过的动乱已经来临。骇人听闻的消息从各国传来，闯入他那绝望、疲惫的心里。在巴黎，人们将他的译者和门生贝尔克文放在火上慢慢烧死；在英国，将他最高贵的朋友，他所喜爱的约翰·菲舍尔和托马斯·莫尔拖去斩首（愿上帝让那些有力量成为自己信仰的殉道者的人进入天堂吧！）伊拉斯谟听到这个消息时，悲叹道："我感到我自己好像已经在他们当中死去了。"他们将同他有频繁书信往来和友好言词交往的茨温利在卡佩尔战场上杀死，对托马斯·闵采尔严刑拷打，活活打死。他们对异教徒的中国人都不会想出比这更严厉的办法来。他们割去再洗礼论者的舌头，用烧红的钳子来折磨传道者，把他们绑在惩罚异教徒的柱头上烘烤。他们抢劫教堂，焚烧书籍，烧毁城市。这些雇佣兵将世界的精华——罗马夷为平地。啊，上帝呀，以你的名义发泄的是多么残暴的本性！不，世界上再也没有为思想的自由，为谅解和宽容这一人文主义学说的原始想法留下立锥之地。艺术在这血流成河的土地上无法繁荣，超越国家的联盟已经成为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永远。甚至就连拉丁文这种联

合的欧洲最后的语言、他心灵的语言也渐渐死去，因此伊拉斯谟，你也要死去了！

但是生活的厄运再一次，然而却是最后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个四处漂泊的人又不得不再次外出漫游。他以差不多七十岁的高龄突然再一次逃出家门。他突然感到有一种简直无法解释的渴望，要离开弗赖堡，迁往布拉班特，公爵聘他去那里任职，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是另外一种东西在呼唤他。一种神秘莫测的不安困扰着他，这个作为世界主义者，作为自觉的无家可归者度过自己整整一生的人，感到对于故土的一种胆怯而深情的需要。这个疲惫的身躯要回到他来的那个地方去，他身上的一种预感很清楚，旅程已经完结。

但是他再也达不到目的了。人们把这个年老体弱的人放在一辆小小的、通常只用来载运妇女的轿式马车里，运到巴塞尔去。这位老人还要在那里待一些时候，等到冰开裂，他能够同春天一道回到布拉班特，回到故乡为止。在此期间，巴塞尔把他给牢牢地拴住了，在这里总还有些精神上的温暖，在这里总还有几个忠实的朋友，有弗罗本的儿子，有阿梅尔巴赫和其他人。他们给这个病人安排舒适的住处，他们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甚至就连那个老印刷厂也还在那儿，他又可以愉快地共同经历从想到的和书写的词语向业已付印的文字的转化过程，呼吸印刷机上那股油腻的气味，手里拿着印刷精美、清晰的书籍，同他们、同异常安静的人、同非常和气的人进行富有教育意义的对话。伊拉斯谟过着非常安静、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太累，已经没有力气在白天离开卧床呆上四五个小时，他在内心的严寒中度着自己最后的时刻。他有一种被人遗忘和遭到唾弃的感觉，因为天主教徒再也不争取他，而新教徒又在嘲笑他，再也没有人需要

他，再也没有人要求他作出判断，索取他的格言了。“我的敌人增多了，我的朋友减少了。”这位孤独者绝望地诉说道。对他而言，和善的精神交往已经成了生命中最美好、最愉快的事情。

但是请看：就像一只迟到的飞燕撞击在严冬已经冰冻的窗户一样，有一句表示崇敬和问候的话又一次撞进了他的孤寂之中。“我所做的一切，全来自你，要是我不承认这一点，那我就会永远成为忘恩负义之人。Salve itaque etiam atque etiam，pater amantissime，pater decusque patriae，litterarum assertor，veritatis propugnator invictissime。[1] 向你，再次向你问好，亲爱的父亲和祖国的荣誉，艺术的保护神，为真理而奋斗的不可战胜的斗士。”写出此话的这个人的名字将比他的名字更加光彩夺目。这个人就是拉伯雷。拉伯雷在他少年荣誉的曙光中向这位濒临死亡的大师的夕阳残照致意。紧接着，伊拉斯谟又收到了从罗马来的另一封信。他这位七十岁的老人迫不及待地打开信，他苦笑着，把信放下了。他们该不是在嘲笑他吧？新教皇要给他，给他这个为了自由的缘故，一生都在轻蔑地避开一切职位的人，提供薪俸极为优厚的红衣主教职位。他以轻蔑的口气拒绝了这种伤人感情的尊重。“我一个垂死的人应当去接受我一生都拒绝的负担吗？”不，就像曾经自由自在地生活过一样，应当自由自在地死去！自由自在地，穿着平民百姓的衣服，没有奖章和尘世的荣誉，就像所有的孤独者一样自由自在，就像所有的自由自在的人一样孤独。

但是，在所有孤独寂寞之中那位永恒的、极其忠实的朋友及其最好的安慰者——工作，它伴随着这个病人，直至最后时

①拉丁文，意思与紧接着的一段话完全相同。

刻。伊拉斯谟以痛得缩成一团的身躯，躺在病榻上，用颤抖的双手写着，日夜不停地写着他对奥利金① 的评论，写着小册子和书信。他再也不为名誉，再也不为金钱而写作，而只是为了一种神秘莫测的兴趣——通过使生活变得超凡脱俗的学习兴趣，通过学习重新变得更加强壮有力的生活兴趣，吸收知识和吐出知识的兴趣。只有这种一切尘世生活的永恒的舒张，只有这种循环才使他的血液还能够继续流动。他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通过工作的神圣迷宫逃离他不承认、也不理解的这个世界，逃离再也不想承认他、也不愿意去理解他的这个世界。伟大的和平使者终于来到了他的病榻前。如今，它——伊拉斯谟一生都极其害怕的死神已经来到面前，现在，这个 疲惫不堪的人静静地，差不多是带着感激的心情看着它。直至告别之时，他的头脑仍然清醒。他还把站在他病榻周围的朋友弗罗本和阿梅尔巴赫，同约伯②的朋友们进行比较，用极其熟练、极有风趣的拉丁语同他们交谈。可是后来，在最后一分钟，在他呼吸困难得已经透不过气来时，却发生了一件怪事：他这位伟大的、整个一生都只讲拉丁语的人文主义者，却突然忘记这种习以为常，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语言。在这个人最原始的恐惧中，僵硬的嘴唇突然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孩提时代就已学会的家乡话“亲爱的上帝”，他一生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话以同样的低的德语的口音表现出来。在这之后，又呼吸了一次，然后，他便拥有了他为了整个人类而非常渴望的东西——宁静。

①奥利金（Origen，约185—约254），早期希腊教会最有影响的神学家和《圣经》学者。

②约伯（Hiob，Job），《圣经·旧约》人物，后指极能忍耐的人。

伊拉斯谟的遗嘱

就在病势垂危的伊拉斯谟把他那欧洲和睦的精神遗嘱，作为最崇高的使命留给后代的同时，在佛罗伦萨发表了世界史上最重要、最大胆的一部著作——马基雅弗利① 那本臭名昭著的《君主论》。在这部肆无忌惮的强权政治和功利政治极其明确的算术教科书中，伊拉斯谟学说的对立原则就像在基督教教义问答手册中一样，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当伊拉斯谟要求王侯们和各族人民，要他们自愿地、态度温和地使他们个人的要求，他们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的要求服从于整个人类兄弟般的联盟时，马基雅弗利却把每个王侯、每个民族的权力意志、势力意志上升为他们思想和行动的至高无上的和唯一的宗旨。一个民众团体的

①马基雅弗利（Ni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作家。

全部人员都应该以一种宗教思想的献身精神为民众思想服务。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的明智，极大的发展自己的个性都必须成为一切历史发展唯一明显的目的本身和终极目的，毫不留情地贯彻执行这些东西，必须成为世界事件内部最崇高的使命。对于马基雅弗利来说，权力和权力发挥是最后的意义；而对于伊拉斯谟来说，正义才是最后的意义。

这样一来，一切世界政治的两种伟大的和永恒的基本形式便世世代代披上了智慧的外衣。这两种形式就是：实用形式和理想形式，外交形式和伦理学形式，国家政治和人性政治。在哲学方面的世界观察家伊拉斯谟看来，按照亚里士多德①、柏拉图② 和托马斯·阿奎那③ 的意思，政治属于伦理学的范畴：王侯、国家领导人首先应该是神的仆人，是道德思想的代表人物。在马基雅弗利这位熟悉国家机构具体活动的职业外交家看来，政治则相反，是一门非道德的、完全独立的科学。它同伦理学毫不相干，就像它同天文学和几何学毫不相干一样。王侯和国家领导人用不着梦见人性这个模糊不清、极为巨大的概念，而应该毫不伤感地考虑到人这样一种唯一喜欢感性享受的材料，竭尽心理学之能事，充分利用这些人的力量和弱点来为自己和他们的民族服务。他们就像一个棋手那样头脑清醒、冷静，对自己的敌人并不顾惜和宽恕，而是千方百计，使用允许的和不允许的手段，给他们的民族赢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和统治地位。对

①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

②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③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6—1274），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

于马基雅弗利来说，势力和扩张势力是至高无上的使命，其成果就是一个王侯、一个民族十分重要的权力。

很明显，马基雅弗利那种宣扬暴力原则的观点很善于在历史的现实范围内贯彻执行。并非那种调解的与调和的人性政治，并非“伊拉斯谟学说”，而是根据《君主论》的思想提出的这种坚决利用各种机会的封建贵族领地权政治，从那时以来就决定着欧洲历史的戏剧性的发展。世世代代的外交家都从这残酷无情、目光敏锐的佛罗伦萨人的政治算术教科书中，学到了他们冷酷的艺术，各国之间的界限已经用血与剑划定，然后又一再重新更改。是相互对立者，而不是相互合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拚命挖掘欧洲各国人民中蕴藏的能量。迄今为止，伊拉斯谟思想在谱写历史时从未对此采取行动，也没有对欧洲命运的形成产生明显的影响。本着正义的精神消除对立这一伟大的人文主义梦想，所渴望的以共同文化为前提的各民族的联合，都是乌托邦，无法实现，在我们的现实中也许永远也无法实现。

可是在精神世界里，一切对立都有可能：即便在现实中永远也不会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东西，在那里却会以生气勃勃的力量发挥作用，而且恰恰是这些未实现的理想证明自己是根本就不可征服的理想。因此，一种没有表现出来的思想，既未证明其可以被战胜，也未证明其错误，它是一种必然性，尽管它被拖延了，但却丝毫不会减少其必要性。相反地，只有那些没有由于付诸实现就消耗殆尽或者大出其丑的理想，才在每一代新人中作为良好社会风气的基本特点继续发挥作用。只有它们这些尚末实现的理想才会永远反复出现。因此，虽然人文主义理想、伊拉斯谟式理想这个促使欧洲相互理解的第一次明显的尝试从未占据统治地位，而且在任何时候几乎都未产生过政治

影响，但这在精神上却并不意味着贬值。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其原因不在于无党派意志的本质，不在于曾经结成党派成为多数派。很难期望歌德式冷静的那种极其神圣、极其崇高的生活方式，会在某个时候成为群众灵魂的形式和内容。每一种按照视野的广阔和心灵的圣洁程度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人文主义理想，都肯定会成为一种精神贵族式的理想。这种理想只适合于少数人，它犹如一种遗产从英才到英才，一代又一代地为这些人所掌管。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对某个时代我们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的信仰，却决不会完全丧失，哪怕这个时代是最混乱的时代也是如此。伊拉斯谟这位感到失望，但又并非过于失望的老人在战争和欧洲纷争的混乱中作为遗嘱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不外乎所有宗教和神话再度重复的、关于人类未来不断人性化的和关于清醒、正直的理性战胜利己主义的短暂激情的古老梦想。这是第一次用缺乏自信、而且往往是灰心丧气的手，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将它形成文字。从此以后，这种理想便以一再出现的新的希望使十代、二十代人的目光变得炯炯有神。没有一种用清醒的头脑，出于纯粹的道德力量曾经想过和说过的东西，是完全徒劳无益的。即便是用软弱无力的手很不完善地写就的东西，都会促使合乎道德的精神具有一再更新的形式。在人世间被战胜的伊拉斯谟的荣誉将永世长存。因为它以文学形象的方式给博爱思想，给这种虽然极其简单、但同时又是永恒的思想——人类最崇高的使命就是变得越来越和善，越来越有才智，越来越理解人——指明了通往世界的道路。在他之后，他的门

生蒙田① ——在他看来，“不人道意味着一切恶习当中最糟糕的恶习”——传出了“没有恐惧也就没有一点理解的勇气”的说法，传出了理解和宽容的信息。斯宾诺莎不要求盲目的激情，而要求“理性欲念”。狄德罗②、伏尔泰和莱辛既是怀疑论者、又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为了理解一切的宽容而反对思想的那种狭隘性。在席勒③ 的作品中，世界主义的信息诗意盎然、轻松愉快地重新复活。在康德④ 的作品中，持久和平的要求也一再出现。相互理解的精神用逻辑的力量，除了要求武力自卫权外，还一再要求它的道德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托尔斯泰、甘地⑤和罗曼·罗兰⑥。恰恰是在非常激烈的纷争时刻，一再出现可能使人类得到安宁的信念，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上升为道德的、令人欣慰的幻想，没有这种最后终于相互理解的幻想，今后就绝不可能生存和创造。就让那些聪明、冷静的算术家去一再重新证明伊拉斯谟学说的毫无希望吧，让现实看来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承认他们的观点正确无误吧。今后往往会迫切需要那些超然分

①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思想家、作家，怀疑论研究者，不仅怀疑自己，而且怀疑人类。

②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家、《百科全书》主编。

③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德国剧作家、诗人。

④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

⑤甘地（Mahatma 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主义领袖，20世纪非暴力主义倡导者。

⑥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随笔作家。

裂因素之外，预示联系各族人民的纽带，在人类的心灵中重新唤起对于更具人性的未来时代这一想法的信仰之人。在这篇遗嘱中，一个伟大的预言在发挥创造性的作用。只有那种引导英才超越自身的生活范围，走向全人类的东西，才赐予个人以克服自身力量的力量。每个人和每个民族只有在超越个人的、很难实现的要求当中，才能感到他们真实而神圣的分量。

麦 哲 伦

——其人及其业绩

序

不同的书出自各种不同的感情。人们写书是由于热情兴奋或一时灵感，可是怨恨、愤怒同样也能激起精神上的振奋。有时，在创作中好奇也会促使人们去弄清一些人和事，还有那捉摸不透的动机，诸如自负、贪财、自我欣赏一直频频地促使人们去写作。因此，作者在写每一本书时，本应说得清楚，由于什么样的感情，出自什么样的个人需要，他才选择自己的题材。就眼前这本书来说，我很清楚它产生的内在原因，它的写成出自一种不平常的、极其强烈的感情：内疚。

情况原是这样的。去年我终于首次有机会去南美旅行，这是我久所渴望的。我知道，在巴西我会看到世界上一些最美丽的风景，在阿根廷我与一些颇有才气的朋友们进行难以言状的欢聚。这种预感就使这次旅行五光十色，旅行途中又频

添了各种各样令人欣慰的事情：瞭望平静的大海，休息在航行快速而又宽敞的轮船上，摆脱了各种事务羁绊和日常烦恼和干扰。我尽情地享受着大海航船上的美妙时光。可是到了第七天和第八天，我突然烦躁不安起来。觉得眼前老是一片蔚蓝的天空，老是那蓝色的平静大海！在焦躁不安时，我感到旅途时间特别漫长。我内心里只想着，马上就能到达目的地。使我欣慰的，时钟每天都在不停地前进，一种懒散，打不起精神的空自享受使我备感压抑。同一类人的同样面孔上显得疲乏、困倦，单调的船上生活以其有规律的平静节奏使我感到不安。我只希望继续行驶，前进，快速行驶，更快地前进。突然间，我觉得这艘漂亮、舒适、设备完美的快轮行驶得太慢了。

也许只在很短时间，我曾意识到自己的不安情绪，并为此而深感内疚。我生气地自语着，此时你乘的是一条最稳妥的轮船，它正在完成最理想的美好航程，提供给你一系列豪华设施。夜晚，你要是觉得舱房里太凉，你只要伸手扭一下开关，气温就会升高一些。如果你觉得赤道的中午阳光太热，只要走动一步，就是装有致凉的电风扇的房间，十步之外的地方，还给你备有游泳池。有最完美的餐厅供你就餐，在那里你可以吃到任何菜肴，喝到可口的饮料，一切都会奇妙地出现，似乎是天使送来的，而且非常丰盛。你可以独身静坐，阅读书刊，或尽情地从事船上的娱乐，听听音乐，从事交际活动。向你提供一切生活方便和安全保障。你想去哪儿，可以知道到达的准确时间，还会得知，你将会受到热情的接待。同样，人们在伦敦、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纽约随时都会知道，你乘的航船在地球上的方位。只要沿着小梯子向上迅速地爬行二十级，无线电发报机就会由你任意地发出电讯，把你的问题、你的问候发往地球上

的任何地方，一个小时内你就可以从地球任何地方得到回音。你这个急躁的人，是这么不知足，你想一想吧，从前是什么样子！你把眼前的航行跟以前的航海漂泊比较一下吧，首先跟人们的第一次大胆航行作比较吧，他们发现了浩瀚无际的海洋，他们首次为我们发现了这个世界，面对他们，应该感到惭愧啊！你试想一下，想当初，他们如何驾着小小的渔船出海，驶向莫测的远方，不认识道路，在遥无边际的大海中会迷失方向，随时都会有死亡的危险，遭受风雨的袭击，历尽艰苦折磨。夜晚没有灯光，他们的饮用水只是木桶里那温热发臭的淡水，和航行途中接存的雨求，吃的是发硬的干面包 和腌制品，变味的熏肉，除此就没有其他的食品了。甚至往往日复一日连少得可怜的食物都没有。没有床铺，没有休息的地方，热得要死，冷得要命，加上身在这一片汪洋之中，孤独漂泊，无可奈何。长年累月家乡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身在何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已漂流到何方。灾难紧随着他们，死神千变万化地从水上陆上包围着他们，人和自然灾害一并威胁着他们，成年成月围绕着他们那破烂的可怜小船的是极度可怕的孤单。他们深深知道，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他们明白，他们多少个月也不会在这无人航行过的水域里碰上一条帆船。没有人会来拯救他们，脱离这灾难和险境，没有人会报道他们的沉船和死亡。因此，我开始由衷地想到海洋征服者们的最初航行，并为自己的焦急而感到深深的内疚。

这种内疚之感一下子在脑海里涌起，在整个旅行途中怎么也无法摆脱，想起那些无名英雄就使我一刻也不得安宁。我渴求更多地知道，他们曾作为第一批人勇敢地与大自然搏斗，也想更多地读一些书，向玄妙莫测的海洋了解首次航行的情况，那

些书中的描述早曾激荡着我童年的情怀。我走进船上图书馆，碰巧借到了几本书，在所有的人物和航行中，有一个最令我佩服，这个人的业绩，我认为在我们地球的历史上是最了不起的了。他就是斐迪南·麦哲伦，他率领五条小小的渔船，从塞维利亚港出发，环行全球，也许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奥德赛式的漂流，参加这次航行有二百六十五名果敢的勇士，这些人最后只剩下八十人，乘着破烂的小船回到了家乡，桅杆上飘扬着伟大胜利的旗帜，可是那些书中谈到他的情况并不多，无论情况如何，我觉得谈得太少了。于是我阅读和研究，回家后，继续钻研，令人奇怪的是，迄今有关这位英雄的业绩仍然是那么少，甚至很不可靠。正如过去多次情况一样，我懂得，要向自己说明一些难以理解的事物的最好和最有效办法，就是把它向别人描述出来。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才写了这本书。说句心里话：连我自己也没料想到。因为我根据自己接触到的文献资料，尽可能忠于事实、撰写另一部奥德赛漂流记，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叙述的是一些虚构的事情，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梦想和愿望，一个神奇的童话。没有比一个不真实的真实更为完美的事了，一些不可理解的事物总是存在于人类的伟大英雄壮举之中，因为它们远远地高于平庸的世俗。恰好正是由于获得了他们所做出的那难以相信的事业，人们才重又相信起自身。

斯蒂芬·茨威格

魏家国 译

第一次环球航行的这个人的名字，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不同形式）至少有四五个。据葡萄牙文献记载，有时是斐尔劳·德·麦加海斯，有时又是斐尔劳·德·麦哲哈斯，他署名较晚，在他转入西班牙服务后，文件上一会儿是麦哈伦斯，有时又是麦赫伦斯，制图员们后来把西班牙文的写法拉丁化，写成麦哲伦路斯。为了给本书选择一个统一的通用命名，我选定拉丁文和国际上早就熟悉的名字：麦哲伦，与哥伦布相似，我们同样没有把他说成是克里斯托夫罗·歌路博，或是克里斯托巴·哥洛。同样如此，使他得以成行的哈布斯堡王室的统治者还并没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尽管在他启程动身的那一年，还只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但他却一直使用了那更为著名的查理五世的名字。

有必要进行航海

最初航海是为了取得香料。从罗马人在航行和征战中第一次尝到了麻、辣、酸和喜人的东方调味品起，西方的厨房和餐厅里就无法离开印度的调味品了。直到中世纪末，北方的食品还是想象不到的淡而无味。马铃薯、玉米和西红柿今天已是极为普通的农产品，可是当时在欧洲还远没有落户，人们几乎还不知道利用柠檬来调配酸味，用糖来调制甜味，至于咖啡和茶的良好滋补兴奋作用还没有被人发现。甚至王公贵族进餐时，也免不了单调乏味，只是一味地狼吞虎咽罢了。可是很奇怪：只要在最简单的饭菜里放上一小粒印度调味品，少许胡椒和干豆蔻衣，一点点姜片和桂皮，人们就会感到异样可口，而且有着非常好的胃口。在明显的大调和小调之间，振荡起可口的烹调技术上的和音和中间音；很快那种中世纪

的粗犷的味觉神经就越发要求这些新的刺激性食品了。一道食物只有放够胡椒，非常刺鼻，才算是上等菜肴。甚至在啤酒里也要放进姜片，在葡萄酒里也要加上捣碎的香料，喝到喉咙里像火药似地烧得火辣辣的。西方需要如此大量的香料，不仅是为了厨房烹饪的需求。妇女们喜爱打扮也越发需要阿拉伯的香料。她们的喜爱越发新奇，诸如刺鼻的麝香，芳馥的龙涎香和香气四溢的玫瑰油，纺织工人和染色工人要为她们加工中国丝绸和印度绸缎，金饰工匠从锡兰竞购白色珍珠，从纳辛格尔购买蓝色宝石。天主教会更为强烈地要求消费东方的产品，因为在欧洲成千教堂里，神父们要在香炉里点燃神香，而制造十亿炷计的神香所需的成十亿计的香料颗粒，没有一颗产自欧洲本土，都是从海上或是从陆路，从看不到尽头的漫长道路由阿拉伯运来的。药剂师们成了众口称赞的印度特效药的老主顾，这些药物诸如鸦片、樟脑、贵重的树胶，他们从经验中知道，只要在盛装药物的小瓷瓶上看不到“阿拉伯”或“印度”蓝色的有魔力的铅字，即使任何止痛药、任何药剂都将会对病人没有治疗效用。所有东方的药剂对欧洲人来说，由于它们来自远方，珍奇，异国他乡的吸引力，也许还因为它们价格昂贵，都无法抗拒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迷人的诱惑力。“阿拉伯的”、“波斯的”、“印度斯坦的”这些形容词定语在中世纪（就像十八世纪初“法兰西的”这个词一样）跟“昌盛的”、“精巧的”、“雅致的”、“显贵的”、“珍贵的”、“昂贵的”这些词成了同义词。任何商品都不会像“调味品”那么受到人们青睐。几乎产生了这种印象，好似东方花朵所散发的芬芳，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迷住了欧洲人的心窍。

然而恰恰因为这样的追求时尚，印度商品的价格就昂贵起

来，而且越来越贵。今天人们几乎无法准确地推算当年价格的涨幅，因为根据经验历史上的货币价值表都是抽象的；今天在每一家餐馆的饭桌上都放着胡椒粉，任人随意地像沙子似地撒在菜肴上，倘若我们回想一下，在第二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它是一颗一颗地计算的，几乎与白银等价，由此人们就不难直接感觉到，香料价格被疯狂地抬高的情况了。由于它的价格如此稳定，因而有些国家和城市就像用贵重金属支付一样，用胡椒粉来核算。大家可以用胡椒粉去换取土地，置办嫁妆，购买公民权。有些公侯和城市用胡椒来衡量他们的税收。中世纪时要是有人想说一个富得流油的话，就可以打趣他是一个“胡椒袋”。姜、肉桂、金鸡纳树皮和樟脑都是使用珠宝店和药铺用的戥子去称重量的，而且在称重量时小心翼翼地关起门窗，唯恐穿堂风把珍贵的胡椒粉微粒吹走了。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过高评价胡椒粉似乎有些荒谬，可是只要我们想到运输这些东西时的艰难险阻，对此也就可以理解了。当时东西方之间的路途无比遥远，可想而知，航船、穿越荒漠的商队和大车队在途中必须要克服怎样的险阻！每一颗胡椒粒，每一朵花都要从马来群岛的翠绿灌木林一直运到海滨，再运到欧洲小商贩的出售柜台上，这需要经过多少“奥德赛”式的海上漂泊！就其本身而言，可以说每一种香料都并不珍奇。在地球另一侧虽然生长着蒂多雷的肉桂，安汶岛的丁香花，班达岛的肉豆蔻，马拉巴尔的胡椒同样茂密地生长着，正如我们这儿的飞帘一样自由地生长着。在马来群岛上一公担香料并不比西方一小撮香料的价格要贵。可是这种商品经过荒漠，大海运达买主——消费者面前，要经过多少人的手！第一手得到的报酬一向都是很少，马来亚的奴隶，他们采摘新鲜的花朵，用黝黑的脊背驮着植物

外皮编织的篓子，送到市场上，他们累得满身大汁，却什么也得不到。获得利润的是他们的主人。伊斯兰教的商人买下了他们的商品，冒着灼人的酷暑，用小船把这些商品从丁香群岛经过八天、十天甚至更长时间运送到马六甲（即今新加坡附近）。第一只吸血蜘蛛坐在网里等着他，港口的主人是有权势的苏丹，要他缴纳转运税。纳税之后，才可以把这些芬芳的货物转到一只较大的船上，这时划动宽大的木桨，挂上四角帆，这小小的运输工具开始慢慢地行驶，沿着印度海岸不断前进。数月之久，都是在这样单调的航行中度过，遇上无风时，只能在万里无云的酷暑蓝天下没完没了地等待着，有时突然要躲避飓风和海盗。这样的船运要经过两三个热带海洋，真是无比艰难，有着说不出的危险。运输途中五艘船少不了有一艘要成为风暴和海盗的牺牲品，在商人们幸运地绕过坎贝达，终于到达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时，他不由地感谢上帝，由此打开了前往阿拉伯和埃及的通道。从这儿开始有一种新的运输方法，但所遇到的艰险并不少。那数以千计的骆驼，在转运港里排成长长的行列，耐心地等待着。只要主人一做出手势，它们就驯服地俯伏，跪倒在地，绑好的一捆捆胡椒和豆蔻花，一袋袋装到它们的背上，这四腿船队慢慢摇摇晃晃驮着它们的货物穿越沙漠海洋。这些穿越沙漠的阿拉伯商队，行程数月之久，运送着印度货物——想起了“一千零一夜”的那些名字——经过巴士达和巴格达，大马士革到贝鲁特和特莱比茨德，或是经过吉塔抵达开罗；从远古埃及法老和巴壳特里亚人的年代起，商人们就熟悉这些穿越沙漠的漫长道路。可是危险的是他经常碰到沙漠中的盗匪贝督

因人①；一次野蛮的袭击，往往会一举抢走无数月的辛勤劳动果实。即使幸运逃过沙漠风暴和贝督因人的袭击，又会碰上另一些强盗：赫查的艾米尔，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都强迫每一头骆驼运载的货物和每一个货包纳税，而且数量相当可观。每年埃及暴徒们从香料交易上所征收的税，估计就达数十万杜卡特②。当最后到达亚历山大港附近的尼罗河口时，在那儿等着的是一个最后的、但却不是要价很少的受益者，威尼斯舰队。自从竞争对手拜占庭这座城市被用奸诈手段打败以后，这个小小的威尼斯共和国一下子完全垄断了西方的香料贸易市场。这些货物不直接运达目的地，而是首先运到里阿图，拍卖给德国的、佛兰德的和英国的经纪人。然后这些曾由热带阳光培育了两年的花朵，才会装在大轮车上，沿着阿尔卑斯山峡谷，运给欧洲商人，由他们再转入消费者手中。

马丁·彼海姆在一四九二年曾忧郁地给他著名的“大地苹果”——地球仪写道，印度香料在到达消费者这最后一只手中，受到层层剥削，起码要经过十二道手。“很清楚，东方印度群岛上的香料，在到达我们国家之前，也要经过若干道手。”然而尽管经过这十二道手牟取暴利，每一道手还会从这些印度香料中榨取可观的金汁。虽然有重重险阻，贩卖香料还是被看作为中世纪时最为有利的交易，因为尽管商品数量很小，可是赚取的利润却很大。麦哲伦探险队证实了如下估计：即使五艘船中有四艘连同装载的货物一起沉入海底，二百六十五人中有二百人不能活着回来，也只说明水手和船长丧生，但是商人在这场交

①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游牧和半游牧的阿拉伯人。

②14到19世纪在欧洲通用的金币。

易中却总会捞到很多利益。即使三年后五艘船中只有一条小船满载着香料归来，所载的货物就可赚取丰厚的利润，以弥 补其它船只的损失，因为在十五世纪一袋胡椒的价格就比一个人的生命还贵重。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的生命毫无价值，人力可以得到大量提供，另一方面是疯狂地需求昂贵的香料，因而这样的算计总是有利可图的。威尼斯的宫殿、弗格尔和威色尔的府邸几乎都是用印度香料的利润建起的。

可是就像铁会生锈似的，巨大的利润必然引起人们极度的嫉妒。所有的优先权总是会被其他的人认为是不正当的行为。在一小群人富得流油时，另一部分没有捞到好处的人，自然会联合起来。热那亚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开始向威尼斯投以鄙夷的目光时，威尼斯人早已巧妙地把金色的海湾暖流引进了大运河，并且越发愤恨地盯着埃及和叙利亚。伊斯兰教用一条坚不可摧的铁链把印度和欧洲分隔开来，不允许任何基督教船队航行红海，也不允许任何基督教商人穿越红海。毋庸分说，跟印度人进行任何贸易只能通过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这样一来不仅对欧洲消费者不利，商品也要上税，夺走了基督教商人的利润，而且造成威胁，使大量的贵重金属流入东方，因为欧洲的商品远远赶不上印度贵重物品的交换价值。仅仅是由于这一明显的贸易赤字，西方人越来越迫切地希望摆脱这种招致破产、遭受屈辱的控制，于是他们集结力量，联合起来。十字军远征绝不只是（正如理想化所描述的那样）一种神秘的宗教尝试，从不信真主的人手里夺回上帝的灵柩。这第一次欧洲基督教联合，同时也显示了第一次合乎逻辑的努力，旨在冲破那封锁红海的锁链，使欧洲和基督教世界能自由地与东方人通商。由于这一举措未获成功，埃及未能摆脱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依旧挡住了

去印度的通道，因此必然产生了这一愿望，要寻找另一条自由通道前往印度。哥伦布向西航行，巴托洛梅依·第亚茨和瓦斯柯·达·迦玛向南，卡博特向北，朝着拉博拉杜尔航行的那种勇气，首先出于自觉的意愿，最终为西方世界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自由的、无需纳税的、畅通的海上通道，从而打破了伊斯兰教的无耻的霸权地位。就重大发明和发现来说，精神和道德的推动往往是一种鼓舞力量，可是大多都是由于物质的动机，最后才完成这些发现。当然，由于大胆设想的原因，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才非常热衷于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建议，可是要不是同时指望着，在航海发现时使所消耗的资金能成千倍地得到补偿，那是绝不会对他们的计划投入必需资金的，君侯和他的投机商们也不会为他们装备一支船队。商人们作为推动力量支持着那个大发现时代的英雄们，英雄们第一次热情满怀去征服世界，这些都出自极为普遍的动机——一开始就是为了香料。

一旦一个人的天才跟整个时代的天才结合起来，当个别人目光敏锐地理解到他的时代的创造欲望时，在历史的进程中就会出现奇迹。在欧洲各国中，就有一个国家迄今还未完成全欧任务的她那一部分，这就是葡萄牙，她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摆脱了摩尔民族的统治。现在她取得胜利和独立了，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家有着旺盛的精力，但却不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上升的民族都会自然产生扩大边界的愿望，但却很难向外冲出。葡萄牙整个大陆边界是与一个友好的兄弟国家西班牙接壤，因此这个贫穷的小国只有通过贸易和殖民向海上扩张。倒霉的是——首先似乎是——在欧洲所有航海国家中，葡萄牙的地理位置最为不利，因为大西洋的波涛从西面冲击着她的海岸，根据

普托莱迈（中世纪的唯一权威）的地理学，大西洋被认为是一个不能航行的无边的水上荒漠。普托莱迈的世界地图把沿着非洲海岸南去的道路解释为同样无法通行，要想乘船绕过这片沙漠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片贫瘠的不毛之地一直伸向南极，在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海峡，非洲是跟南极联在一起的。根据古代地理学观点，葡萄牙位于唯一通航的地中海之外，所以在欧洲所有航海国家中，她处于想象中最糟糕的地位。

一名葡萄牙亲王的遐想，是把所谓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根据《圣经》进行大胆尝试，后者是否就不能居先。倘若普托莱迈是地理学上的教皇，他怎么会弄错呢？如果这个海洋以它巨大的波涛把那些奇怪而陌生的树木（它们想必是生长在某个地方）冲到葡萄牙岸边，那么这海洋根本就不是遥无边际，要是这个海洋通往一些新的、不知名的国度，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要是这个聪明绝顶的希腊人大肆吹嘘他的论断：这个玄妙莫测的大洋从海上无法绕过，没有道路通向印度洋，情况又怎样呢？如果是，葡萄牙恰好因为她位于欧洲的最西部，就会成为通往印度的最近航路，成为一切发现的真正跳板，因此她不会被海洋排斥，比欧洲任何其它国家都更负有航海使命。这个并不强大的小小葡萄牙要成为海上强国，把迄今一直被看作为障碍的大西洋变成一条通道，这一梦想曾经是恩尼克亲王毕生的向往，历史贴切或不贴切，人们都把恩尼克称作航海家亨利。就不贴切而言，且不谈一次短程征讨策依塔，恩尼克从来未上过船，也从未写过一本书，也没有写过航海方面的文章，也没绘制过地图，可是历史却有理由授予他航海家称号，因为这位亲王把毕生和他的财产全都献给了航海和航海家们。早年在与摩尔人的战争中围攻休达（一四一二年）经受了考验，同时他又是全国

最富有的人之一，这位葡萄牙国王的儿子，英国国王的外甥，他原可以在极其显眼的场合展示他的抱负，各国宫廷都邀请他，英国人要委任他当总司令。这位不寻常的空想家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不同一般的孤独。他退隐到萨克里海角去，这儿曾经一度是古老的神圣海角。他在那儿几乎花了五十年时间，准备航海去印度，打算对神秘莫测的海洋作声势浩大的进军。

是什么给了这个孤寂而大胆的空想家勇气，去顶撞他那个时代的宇宙结构学的最高权威，违反普托莱迈及其志同道合者和追随者，并维护这一信念，非洲并非是跟南极冻结一起的大陆，完全可以绕过去，通往印度的真正航路——这最后的秘密一定会揭开的。可是（被希罗杜特和施特拉博所记下的）那流言蜚语从未彻底消失：在法老那久远的模糊日子里，一支腓尼基的船队有一次驶进了红海，两年后竟想不到由赫拉克勒斯的石柱①（直布罗陀海峡）而返回了故乡。也许这位亲王从贩卖奴隶的摩尔人那里打听到，在荒漠的利比亚，即撒哈拉大沙漠那边，有一个“富饶的国家”，即“比拉特——加纳”，事实上，有一位阿拉伯宇宙学家为诺尔曼国王罗吉尔二世绘制的一张地图，图上可以看到在“比拉特——加纳”的名称下面画上了今天的几内亚。这就意味着，恩尼克由于勘探人员的出色工作更了解非洲的真实面貌，胜过那些地理学家，他们只是重视普托莱迈法典，首先否定马可·波罗和伊博恩·巴杜塔的报告，是虚伪的吹嘘者，可是恩尼克原先的道德含义，在于他意识到这一目的的伟大，同时也认识到要达到这一目的的巨大困难，还

①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古希腊勇士，赫拉克勒斯石柱指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山崖。意味着这是水陆的尽头。

因为高贵的谦逊，他认识到他本人将永远看不到他的梦想的实现，因为要准备一个如此巨大的大胆壮举，需要比一个人毕生时光还要更长的时间。当时没有海洋知识，也没有航行的船只，当时又怎么敢从葡萄牙航行到印度去呢？恩尼克着手他的工作时，欧洲地理和航海知识在当时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原始。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在那黑暗的可怕的几个世纪之中，中世纪把希腊人、腓尼基人和罗马人在勇敢的漫游中所得悉的一切知识几乎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有一个人名叫亚历山大，早曾向前推进到阿富汗边境，一直深入到印度，这在那限于狭小空间的世纪里，简直像童话似的不可相信，罗马人绘制的杰出地图和世界景象都已散失，他们的大军所走过的道路都失修和荒废了，直接深入不列颠和比提尼亚的里程碑也看不见了，那堪称典范的政治和地理通讯中心已荡然无存，旅游能力已渐趋丧失，渴望发现的兴趣也已消失，航海技艺已经衰退，没有任何远大目标，没有任何大胆设想，没有精确的罗盘和准确地图，只有一些破旧的船只沿着可怕的海岸，从一个港口慢慢地驶向另一个港口，时刻担心着风暴和跟风暴一样危险的海盗的袭击。在宇宙学水平如此低下，船只又少得可怜的情况下，征服地球上的海洋和海外王国的时刻显然还为时尚早。人们毕生献身就是要弥补几个世纪所耽误的事情。而恩尼克矢志要把毕生精力献给未来事业，这无疑是他的伟大之处。

恩尼克亲王过去在撒克里海角修建了几座城堡，遭到他事业的继承人弗朗西斯·德雷克忘恩负义地抢劫和破坏，现在只留下了一些颓垣断壁。透过传说的蛛丝马迹和薄雾，今天已无法再弄清楚，亨利亲王是如何制定葡萄牙人掠夺世界的计划的。

根据他家乡的编年史（也许是空想的）记载，他需要世界

各地的所有有关书籍和地图，他召集了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吩咐他们制造更完美的航海仪器和图表。他询问航海归来的所有水手和船长，把所搜集的各种情况和资料，小心地放入秘密档案里，同时组建了许多探险队。他专心致志地发展造船事业，没有几年时间就从过去的一种载 18 人的敞篷小渔船，发展到了排水量达 80 到 100 吨的宽敞机帆船，即使天气恶劣也能在辽阔的海洋上行驶。这种适宜于航海的新型船只需要新型的航海人员。"星占学家"参加了舵手的行列，这样的航海专家会看航海图，确定罗盘偏差，并能在图上标出子午线。他们能把理论和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一代新的航海家和考察人员逐渐有条不紊地由渔民和水手组建起的探险队成长起来了。他们的事业有待未来去进行。正如菲力普·冯·马其顿给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留下了征服世界的不可抵挡的精锐部队，恩尼克给他的葡萄牙留下了他的那个时代的最好最现代化的船只，以及征服海洋 的最卓越的水手。

可是先驱者的悲惨命运是没有看到那片向往的土地就长逝了，恩尼克没有看到任何伟大的发现，未能使他的祖国在世界探险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在他逝世的一四六〇年，国外在地理领域几乎还没取得任何令人注目的业绩。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的发现，曾轰动一时，但这实际上也只是一次重新发现（一三五一年在劳伦蒂罗航海图上就已标出了）。他的船队沿着西海岸航行，一次也没到达过赤道，进行了一笔小小的不太光彩的白色象牙，主要是"黑色象牙"交易，就是说，他们在塞内加尔海岸大肆绑架黑人，到里斯本奴隶市场上去出卖，同时还找到了一些砂金。恩尼克从他梦寐以求的事业中，看到的只是这样小小的、并不完备的开端。可是实际上已取得了决定性

的成就。因为当时葡萄牙人航海的最初胜利，并不在于他们所抵达的广阔空间，而是在于他们精神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激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消除了那些有危害的圣徒传说。几个世纪之久，海员们一直在暗地里传说着，在不能通行的诺思海角那边无法航行。那边就是“昏暗的绿海”，胆敢闯进这一致命地带的船只，其命运会无比惨痛。由于太阳的烤晒，回归线上的大海煮沸翻腾。船舱上的木板和篷帆会着火燃烧，任何试图踏进这火山口一样的“撒旦王国”的基督教徒们，立即会变得象黑人似的。这样的虚构编造去南方航行的恐惧，简直无法自抑，因而为了设法给恩尼克的最初探险寻找水手，教皇不得不许诺给探险的参与者彻底赦罪，这才招募到了几名大胆的人，参加最初的航海探险活动。当吉尔·恩涅斯一四三四年绕过这个被称作不能逾越的诺恩角，就从几内亚发出报告，那个喧闹一时的普托莱迈露馅了，他只是一名恶劣的说废话的家伙，他说：“在这儿扬帆远航就像在我们家乡一样容易，这个国家极其富饶美丽。”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禁欣喜若狂。这样一来，局面改观了。葡萄牙人不再需要去寻找水手，冒险家和热中于冒险的人从各国纷至沓来，每一次新的航行成功使航海的人们倍增勇气，突然间出现了一代年青人，他们把冒险看得高于生命。“有必要进行航海”这古老的海员格言重又主宰着人们。新的一代团结起来，决心干一番伟业，世界自会改观。

因此，恩尼克的死只是意味着要进行大步跨越之前的最后瞬间的喘息。可是强有力的国王约奥二世一登上宝座，立即有了出人意料的活泼生机。迄今一直是蜗牛爬行，一下子变成了冲锋前进和狮子般的腾跃。如果说航行到博赫阿多尔海角并没多远，就需要十二年时间，人们用十二年时间慢慢地航行，就

可平安地到达佛得海角，如果说，这在昨天是一件了不起的成绩的话，那么今天向前行驶一百或一百五十海里就不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了。或许只有我们这一代体验过征服天空的人，要在空中飞行三千，五千或一万公尺，我们同样就开始欢呼了，而十年之后我们见到了飞越大陆和海洋，只有我们能充分理解那种热烈的情趣和狂热的欢呼，整个欧洲都兴致勃勃地随着葡萄牙人突然向莫测的世界冲进。一四七一年人们到达了赤道，一四八四年迪戈·卡姆已经在刚果河口登陆，一四八六年恩尼克预言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葡萄牙航海家巴托洛毛依·迪亚士到达了非洲的最南端好望角，他由于在那儿碰上了风暴，最初把它称之为“风暴海角”。尽管风暴吹烂了布帆，折断了桅杆，可是这位勇敢的征服者却坚定地继续航行。他已抵达非洲的东海岸，那儿的伊斯兰教引水员原本可以很方便地把他一直带往印度，可是海员们这时突然哗变。这一次就够了。巴托洛毛依·迪亚士很痛心，不得已掉转船头，他未能光荣地作为第一个欧洲人征服通往印度的这条海路，这应归咎于别人。由于这一英雄业绩，瓦斯科·达·迦玛由于曾建立这一英雄业绩，加蒙后来写了不朽长诗，对此加以颂扬。正如一贯情况似的，发起人和悲剧的主谋者总是由于有了幸运的完成者而被人们忘怀。可是重大的事情已经付诸实现。首先已经明确地确定了非洲的地理轮廓，第一次与普托莱迈的结论相反，证明：完全可能有一条自由的海上通道通往印度。恩尼克的毕生梦想由他的学生继承者们在他们的老师逝世后一年实现了。

如今全世界都惊异和嫉妒起来，他们把目光转向欧洲一隅的这个小小的不显眼的海滨民族。正当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大国进行非比寻常的战争，互相厮杀之际。葡萄牙这个欧洲

的灰姑娘① 却成千成万倍地扩大了她的生存空间，任何人竭尽全力都无法赶上她那巨大的前进步伐。一夜之间，葡萄牙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航海民族，由于她取得的成就，她不仅获得了一些新的省份，而且获得了整个世界。再过十年，欧洲各国中的这个小国将会谋求占领和控制更大的空间，远远超过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巨大版图。很自然，要实现这样一个帝国主义的贪欲必然会很快地耗尽葡萄牙国力。连所有的小孩都能计算出来。这样一个小国，人口不到一百五十万，是不可能持续地占领整个非洲、印度和巴西，对他们进行殖民统治，甚至连垄断贸易都很难。更谈不上永远保护这些国家，不受其它民族的入侵了。一滴油不可能使波涛汹涌的大海平息下来，一个针眼大的小国不可能使几十万倍大于自己的大国俯首臣服。就理智而言，葡萄牙这样毫无约束的贪婪扩张乃是一种荒唐之举，是一种最危险的唐·吉诃德精神。所谓的英雄行为总归是反理性的、荒谬的。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敢于承担超过他们自身负荷的这一任务时，他们的力量就会恶性膨胀起来。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十五世纪末的葡萄牙更卓越，她的奋斗目标举世无双，志在必胜。这个国家不仅突然在阿尔布开克培养成了亚历山大和阿哥船上的远航人员瓦斯科·达·迦玛和麦哲伦，而且在加蒙作品中还找到了自己的荷马，在巴罗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李维②。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批学者、建筑师和巨商，就像伯里克利斯③ 统治下的希腊，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拿破仑统治下

①《格林童话》中的人物，是受继母驱使，与煤渣为伍的美丽姑娘。

②铁托斯·李维（公元前 59—17 年），古罗马历史学家。

③伯里克利斯（公元前 499—429 年），古雅典政治家。

的法国那样，一个民族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实现了她内心的理想，并让这种理想在全世界面前成为有目共睹的业绩。在举世难忘的时刻里，葡萄牙曾久久地是欧洲的第一个航海国家和人类航海的首领。

然而个别民族的任何壮举都会有益于各个民族，大家都觉得，首次闯进那完全陌生的世界，同时也彻底改变了迄今公认的尺度、概念和距离感觉，因此所有的王宫和高等学府都迫不及待地关注着来自里斯本的最新消息。由于一种奇特的预见性，欧洲人明白了葡萄牙人在扩大世界范围的这一业绩的创造性，并且认识到，航海和新领域的发现，不久将比战争和加仑炮更能决定性地改变整个世界，那千百年的中世纪最终趋于结束，一个新的时代——《近代》开始了，这是一个向其它空间进行思考和创造的时代。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波利蒂安是和平理智的代表人物，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历史性时刻，郑重地颂扬了葡萄牙的声望。他那热情洋溢的话语表明了整个文明欧洲对葡萄牙的感激之情："不仅越过了赫拉克勒斯的石柱和制服了波涛汹涌的海洋，而且重建了这个有人烟的、迄今一直被阻隔的世界的统一，我们多么盼望着新的可能性和经济效益！期待着如何证实那被人怀疑、一直遭到抵制的古老的科学论断！新的国家、新的海洋、新的世界出自一个世纪的黑暗之中。葡萄牙成了第二个世界的保卫者、守护神！"

一个惊人事件中断了葡萄牙向东方的宏伟进军。好像"另一个世界"已经到达了，印度的王冠和所有的珍宝似乎已归约奥国王所有，因为自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之后，再也没有人走在葡萄牙人前面了，在欧洲列国之中，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在这

条漫长的安全航道上步着葡萄牙的足迹。因为航海家恩尼克早曾预见地让教皇书面确认：在波亚杜尔海角后面被发现的所有国家、海洋和岛屿统通归属葡萄牙所有，后来的三个教皇也都确认了这一独特的“赠礼”，他们大笔一挥，把数百万欧洲人尚不了解的整个东方，作为合法的王室领地，赠送给了维索乌王室，所有的新世界都属于葡萄牙，也只能归葡萄牙所有。人们手里牢牢地掌握了这种保证，一般是不会热衷那些不安全的事情，因此幸运者约奥国王二世对一个无名的热那亚人的乱七八糟计划——为了从西面抵达印度，情绪激昂地要求一支船队——并没表示兴趣，不像多数历史学家后来所写的那样简单和令人奇怪了。人们虽然在里斯本宫廷里听取了克里斯夫罗·哥伦布的意见，但却并没粗暴地对他进行否定。可是人们清楚地记得，迄今对安蒂哈和巴西等传奇性的探险以失败而告终了。此外：为什么为了探索一条通往印度的极不可靠的道路竟要冒风险花费一笔葡萄牙金币呢？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泰约河上的造船厂已经日以继夜地在建造一支大的船队，要绕过海角直驶印度。

因此，那个大吹大擂的热那亚冒险家果真驾驶着悬挂西班牙国旗的船只，越过莫测的大洋，仅仅五个星期之后就抵达了西边的大陆，这一消息突然传到里斯本王宫，就像石子投到窗户上发出铿锵之声。一个奇迹出现了。一夜间，塞尼卡的《麦迪亚》①的神秘预言付诸实现了，这个预言多少年来一直激励着航海家们环游世界。

果然，这一天来到了。“在几个世纪之后，海洋揭示了它的

①希腊神话中科尔奇斯王之女，乃一女妖。

秘密，一个陌生的大陆出现在眼前，阿哥船① 上远航的船员们终于发现了新大陆，图勒不再是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虽然哥伦布，这个新的“阿哥船员”没有意识到，他发现了新大陆。他直到临终时，这个固执的幻想家顽固地把自己幽禁在妄想之中，他以为自己已经到达了亚洲，只要他从他的“希腊班尼峨那”② 向前航行，经过不多几天的航行就可在恒河口登陆，可是这恰恰是葡萄牙人所最害怕的。倘若西班牙在向西的捷径上抢先登陆，在最后一分钟先到达印度的话，尽管教皇的信中写明，向东发现的所有土地全归葡萄牙，可是这也帮不了葡萄牙的忙。这样一来，恩尼克毕生五十年的劳动成果和他身后的追随者们的四十年辛劳通通都将荡然无存。由于该死的热那亚人那狂热大胆的冒险的恶作剧，而使葡萄牙人失去了印度。倘若葡萄牙人认为要继续拥有对印度统治的优先权，那么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拿起武器对付这突然入侵的对手。

好在教皇消除了这行将来到的危险。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他心目中的爱子，因为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国王从未莽撞地反对过他的精神权威。他们反对摩尔人，赶走了异教徒，他们用火与剑消除国内的异端邪说，教皇的审判庭在对付摩尔人、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或回教徒和通常的犹太人，哪儿也找不到如此得心应手的好帮手。不，他的两个爱子是不应该分裂的。因此教皇决定，把世界上所有尚未发现的地域干脆全分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并且这一划分不是停留在我们今天的虚伪外交辞令

①希腊神话中英雄阿哥到海外去寻找金羊毛时所乘的船名。

②指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在之半岛。

上，即所谓的“势力范围”，而是作为基督的全权代表，凭着他的威望，明确地把所有还不知道的民族、国家、岛屿和海洋通通分给了这两个民族。他拿着地球仪就像拿着苹果，只是不用刀，而是通过一四九三年五月四日的训谕，将它分成两半。以佛尔德群岛一百里古亚① 作为分界线。从这时起，在地球上这条线以西尚未发现的国家尽属他的爱子西班牙，该线以东的地域属葡萄牙所有。最初，这两个孩子都一致同意，为这份美好的赠礼而深表感激之情，可是不久葡萄牙人就感到不安，提出要求，把分界线向西移动一些。一四九四年六月七日在图尔德西拉斯签订的条约规定，把分界线向西移动了二百七十里古亚（因此后来葡萄牙才得到了当时尚未发现的巴西）。

教皇根本不考虑其它国家，就大笔一挥，几乎把整个世界分赠给了这两个国家，乍看起来，这种做法豁达大方，其实十分怪诞荒唐，可是人们还应欣赏到，这样的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历史上少见的理智之举，遇事通过和平协商，而不是诉诸武力。尽管解决先前问题的办法仅只是一种暂时的举措，可是通过图尔德西拉斯条约实际上在数年甚至几十年内都防止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任何殖民战争。倘若用刀来分苹果的话，分界线必然会在看不见的另一侧呈现出来。那么设法寻找珍贵的香料群岛究竟在哪一半呢？位于另一侧半球上的东部还是西部呢？是在葡萄牙这一边，还是在西班牙那一边呢？此时此刻教皇不会，任何国王和学者都不会对此预言的，因为从来没有人测量过这圆形的地球，而且他们的教会无论如何都不承认地球是圆的。可是直到最后解决问题时，两个国家势必要做很多的

①一种古老的里程单位。

事，才能吞下这命运赐予他们的巨大食饼：那么一个小小的西班牙要吞食辽阔的美洲，小小的葡萄牙要吞食整个印度和非洲。

哥伦布令人称道的壮举，首先在欧洲引起了人们的莫名惊讶。接着，就出现了我们这个古老世界闻所未闻的冒险和发现的热潮。一个勇敢者的成功总是会激励整整一代人的奋发和进取。在欧洲所有感到冷落和无法耐心等待的人中，有年幼的儿子、闲散的军官、达官贵人的私生子以及一些受到法律追究的形迹可疑的家伙，他们不满于自己的现状和地位，向往着能去新大陆，于是公侯、商人和投机分子筹措资金，装备船只，甚至不得不用武力防范那些冒险家和游客，他们持刀相逼，要作为第一批探险队员前往黄金之国。当年恩尼克为自己的探险人员要求教皇恕罪，以便为船只找到必要的水手，可是现在整个村庄的人都涌向各个港口，船长和船主们面对这一情况简直束手无措。探险队一个接着一个，确实像是一幅雾幔突然消失了似的，现在一下子在东西南北四方到处都出现了无数新的岛屿，新的国家。放眼望去，有的冰雪覆盖，有的是棕榈遍地，绿叶葱葱。二三十年之间，从卡迪斯·帕罗斯和里斯本驶出的几百艘小船，发现了许多不知名的新大陆，数量远胜过人类生存了几十万年所发现的地方。那个发现时代的历程真乃令人难忘，无与伦比。一四九八年瓦斯科·达·迦玛抵达印度，并在卡里柯特登陆，正如曼努埃尔国王曾骄傲地宣称："为上帝服务，为葡萄牙王室效劳。"同一年卡伯特船长为英国人效劳，发现了纽芬兰，接着又发现了北美海岸。第二年（一四九九）彼逊的船只高挂着西班牙旗帜，卡布拉尔挂着葡萄牙旗帜分别同时到达了巴西，这时加斯帕·柯尔泰莱尔步了北欧日尔曼人的后尘，五

百年后踏上了拉布拉多岛上。后来，一桩接着一桩，在新世纪的最初的几年中，有两支葡萄牙探险队由阿美利柯·维斯普策号船随行，沿着南美海岸南下，直达里奥·拍拉塔附近。葡萄牙人于一五〇六年发现了马达加斯加，一五〇七年发现了毛里求斯，一五〇九年到达了马六甲海峡，并在一五一一年他们就已把它攻占，接着，控制了马来亚群岛的达岛的钥匙，一五一二年彭采·德·莱昂开发了佛罗里达岛。一五一三年隆尼茨·德·巴尔博亚作为第一个欧洲人，已从达连安湾高处俯视着太平洋了。从这时起，人类就不再有未发现的海洋了。在短暂的一百年时光里，欧洲航海事业所取得的成绩不只是增加了一百倍，而是翻了成千倍。一四一八年在恩尼克领导下，最初的一批小渔船到达马德拉群岛，这事曾引起人们的惊异——可以在地图上把这两者的距离对比一下——一五一八年葡萄牙船队已经在广州和日本登陆了。后来，航行去印度比起以前航行到博赫阿多尔海角的风险就更小了。由于受到这样速度的鼓舞，世界的面貌必然逐年逐月地发生着变化，绘图师和宇宙绘图器将日以继夜地在奥格斯堡工作着，可是他们却无法满足外界的订货。地图还没有晒干，甚至还没着色，人们就从他们手里拿走了。同样，印刷工人印制的有关旅行的书籍和地图集，也满足不了图书市场的需求，大家都渴求知道新大陆的信息。可是宇宙绘图器几乎刚刚根据最近资料清楚而准确地制出的世界地图，新的报纸和新的报道又来了。已做的一切又要推翻，必须重新制图，因为曾被认为是小岛的地方，现已证明是大陆，印度这地方却是新的大陆。新的河流、新的海岸、新的山脉都要添加进去。请看，制图师们刚刚制好的新地图，他们又不得不去从事一幅修订的、订正和补充的地图。地理学、宇宙学和地

理制图学在急速发展，如此神速，结出如此丰硕之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正如在这五十年之内，自从人类生存、呼吸和思维以来，第一次把它的外形和大小彻底弄清楚了，因为人类首次弄清了这个圆的星球，亿万年以来人类就一直在这个星球上、在宇宙中转动。可是这一了不起的成就应归功于这一代人。航海家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这些宇宙征服者打开了一条航路，英雄们解决了许多，几乎是所有的任务。只留下了一件事，最后一件，最美最艰巨的事，乘坐同一艘船环绕地球航行，针对过去宇宙学家和神学家的观点测量和证明一下我们的圆形地球——这一伟大任务便成了斐尔劳·德·麦哲哈斯的毕生理想和命中注定的事业，历史上把他称之为麦哲伦。

魏家国 译

麦哲伦在印度

1505 年 3 月—1512 年 6 月

葡萄牙第一批船只驶向陌生的远方，旨在发现新的地域。第二批船只试图与新辟的地域进行和平贸易。第三批船只已经进行了军事装备——一五〇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就坚定地确立了那支配整个殖民时代的三部曲。几个世纪都反复重演着这同样的进程：首先是建立海外代办处，接着是修建所谓保护代办处的城堡。一开始是与当地土人头目进行和平贸易，然后，一旦招募到足够的士兵，就直接占领这些领主的土地，抢走他们的全部财物。仅仅不过十年，葡萄牙就把最初的一些成果置之脑后，忘记了葡萄牙人最初只是渴求有限地参与东方的香料贸易，别无他求。可是在这场幸运的赌赛中，这些善良的愿望很快就消逝了；从瓦斯科·达·迦玛在印度登陆的那一天

起，葡萄牙人立即着手赶走其他的民族。她毫无顾忌地把整个非洲、印度和巴西看成她惟一的领地，从这时起，不再允许任何船只驶过从直布罗陀到新加坡和中国这一带海洋，在半个地球上除了欧洲这个最小的国家臣民之外，不准许任何人经商。

一五〇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这一天葡萄牙的第一支舰队离开了里斯本港，去征服世界上最大的新的帝国，当时的场面好不壮观！这在历史上可以比拟的，只有亚历山大大帝渡过赫勒斯滂①。在这儿同样也有着不平凡的任务，因为这支舰队出航，并非是为了使某个国家、某个民族，而是使整个世界臣服葡萄牙。二十艘船只停在港湾里，扬起篷帆，等待着国王起航的命令。现在已不再像是恩尼克时代的一些小小的敞篷划艇，而是宽阔、笨重的大帆船，首尾两端都有高大的瞭望台。这巨大的帆船有三四根桅杆，有很多海员。除了几百名经过军事训练的水手之外，船上还有一千五百余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以及两百多炮手。此外，还有木匠和各类工匠，以便到印度后就地立即装备一些新的船只。

大家一看就会理解，一支如此巨大的舰队肩负着这样的重任：强占东方。印度总督这一头衔并非白白授予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葡萄牙的第一名英雄和航海家瓦斯科·达·迦玛，印度洋海军上将，挑选和检查了船上的装备，这并非是偶然情况。阿尔梅达的任务很明确。他必须要摧毁印度和非洲的伊斯兰教的贸易城市，在各个据点建造堡垒，并留下守备部队。他们要在所有的出发地和过境处驻下来，封锁直布罗陀到新加坡的所有海峡，从而卡死所有其他国家的贸易。首先这里预示

①达达尼尔海峡之古称。——译注

了英国的政治意图。此外这位总督还接到命令，要消灭埃及、苏丹和印度拉亚斯的海军，并严格控制所有的港口，从一五〇五年起，不允许任何葡萄牙船只运走一点香料。意识形态和宗教任务也跟军事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所有被占领的国家宣传基督教，因此在军事远航同时，也举行了十字军远征时的仪式。国王在大教堂里亲手把一面绣有基督十字的白色锦缎制的新旗，授给弗郎西斯科·德·阿尔梅达，让这面旗帜在非基督教和摩尔人的国土上胜利飘扬。海军上将跪着接过了这面旗帜，全体一千五百名军人做完忏悔和进过基督圣餐之后，都跪在这位上将的身后，向他们的统治者葡萄牙国王和上苍宣誓效忠，要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建起基督教帝国。他们庄严地就像宗教游行行列似地穿过城市，走向港口。继而在隆隆的炮声中告别。船只威武地沿着塔霍河顺流而下，驶入浩瀚的大海，这位海军上将要为葡萄牙征服从此岸直达彼岸的辽阔海洋。

在这些跪在祭坛前举手宣誓效忠的一千五百名士兵中，也跪着一位一向无名的二十四岁小伙子，名字叫裴尔劳·德·麦哲哈斯。从他的出身，人们只知道他诞生于一四八〇年。至于他的出生地尚无定论。据后来的编年史家的看法是萨布罗萨，位于特拉様蒙特省，可是根据较新的研究结果，证明此论有误，因为人们推断所依据的遗嘱最终被认为是伪造的。最大的可能性是：麦哲伦诞生于波尔图。有关他的家庭情况不详，只知道是一个贵族家庭，不过只是四等贵族，无论如何，这一出身使麦哲伦有权继承与佩戴上自己的族徽，并能进入王宫。据说他早在青年时代就当过王后莱奥诺莉的侍童，可是并无法由此证明，曾经在那平庸的岁月中，他在宫廷中的地位有什么特别之处。因

为这位二十四岁的骑士进入舰队时，只是一个普通的额外人员，一千五百名下级水手之一，跟海员和一些少年水手同住同吃同睡在一个船舱里，只不过是数以千计的，为掠夺世界而出征的一个“无名小卒”，他们总是成千地死去，经历了冒险之后，只有一、二十人还会活着，往往只有极个别人能够在共同完成业绩之后，享受到不朽的荣誉。

麦哲伦在这次航行中，仅仅是一千五百名水手中的一名成员。无法从印度战争的编年史中找到他的名字，要是中肯地谈到这些年月，别无可言，只能说这段岁月是这位未来航海家的难得的学习年代。一个额外人员是不难接触的，他被分配去做一切事务。他在暴风雨来临时收帆，用水泵排水，今天被派去攻城，明天又要冒着火辣辣的太阳挖掘沙子建造城堡。他时而拖拉货物去出售，有时又得为总督府站岗守卫。他步行或乘船去作战，他要善于使用铅锤和利剑，善于服从和传达命令。他就是在从事这一切活动中，同时成为战士、海员、商人，成为了解人、每个国家、海洋和日月星辰的行家，命运最终使这个年轻人早早地就参与了一系列伟大事件，几十年之久他使自己的祖国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并制定世界地图。因为在经历几次小小的、与其说是正直的、倒不如说是掠夺性的战斗后，麦哲伦在一五〇六年三月十六日的坎纳诺尔的海战中真正受到了战斗洗礼。

在葡萄牙征战史上，坎纳诺尔战役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卡利卡特的统治者一四九八年在瓦斯科·达·迦玛初次登陆，曾热情接待过他，并曾表明，要跟这个陌生的民族进行贸易。可是不久他想必就认识到，这些葡萄牙人在不多几年后驾驶着更大、更精良的船只再次来到时，是要攫取对整个印度的统治权。印度的伊斯兰教商人们惶恐地看到，一条贪婪的梭子鱼闯入了

他们平静的鲤鱼池塘，这些外国人一下子就征服了所有海洋。由于害怕这些凶残的海盗，不再有任何船敢离开港湾，香料贸易停顿了，骆驼商队也不再去埃及了。直到威尼斯的里亚尔图人都感觉到，有一只冷酷无情的手切断了东西方的通道。埃及苏丹失去了税收，首先试图紧急威胁。他给教皇写信说，倘若葡萄牙（这对麦哲伦的业绩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到达久所渴望的香料群岛。在回来的途中，这个打扮成伊斯兰教教徒的乔装者，在卡利库特从两名基督教叛徒那里首先获悉：卡利库特首脑要准备袭击葡萄牙人的信息。出自基督教徒的团结精神，他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来到葡萄牙人住地，幸运的是他提出的警告很及时。一五〇六年三月十六日，当卡利库特首脑的二百艘船正要袭击毫无防备的十一艘葡萄牙船只，实际上葡萄牙人已作好战斗准备。这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总督还从未经历过呢。死亡人数不少于八十人，受伤士兵约达二百人（对最初期的殖民战争说来，这可算是一笔巨大的数字），葡萄牙人为他们的胜利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可是这一战役的胜利最终确保了对印度沿海的统治。

在这两百名伤员中就有麦哲伦。正如在那些令人不快的岁月里一样，命运只是获得创伤，而不是表彰。他首先跟其他的伤员一起被送往非洲，他的踪迹消失了，可是有谁去记录下一个普通的额外人员的生和死呢？他好像在索法拉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作为货物运输的押送者回到了家乡。根据各种可能——编年史对此众说不一——他是在一五〇七年夏天和瓦台玛乘坐同一艘船回到了里斯本。可是这位航海家对远方的土地却梦绕魂萦。他感到葡萄牙很陌生，他的短暂的休假却成了对去印度的下一支舰队的迫切期待，这支舰队将把他送回他真正的家乡

——那充满冒险奇遇的世界。麦哲伦终于乘上一艘负有特别使命的新的舰队回到了印度。毋庸置疑，他的旅伴路杜维柯·瓦台玛曾作过有关富丽堂皇的马六甲城的报告，并对多次寻找的香料群岛提供了详细资料，他作为第一个欧洲人和基督徒看到了这些岛屿。鉴于他提供的信息，葡萄牙宫廷认为，只要没有夺取所有的香料宝库，征服印度就没有完成，就不能说全部财富已经到手。可是前提是，首先要把封锁宝库的钥匙弄到手，即占领马六甲海峡和马六甲城（就是今天的新加坡，英国人并没忽视它的战略意义）。可是据试用的伪善做法，并没立即派出一支战舰，而只是首先委派洛佩斯·德·塞克拉，率领四艘船小心翼翼地探索接近马六甲，伪装成和平商人，侦察这一地域。

这支小舰队在一五〇九年四月，没有遇上任何事件就抵达印度。卡利库特之行，十多年前被历史学家和诗人颂扬为瓦斯科·达·伽玛的无与伦比的英雄壮举，现在任何一个葡萄牙商船船长都能完成了。从里斯本直到蒙巴萨，从蒙巴萨直到印度，人们都已熟悉每一个暗礁，每一个港口，不再需要引水员，也不需要“天文学家”了。当塞克拉于八月十九日从科琴港继续向东航行时，葡萄牙船队才又驶入陌生的水域。

经过三周航行之后，即一五〇九年九月十一日，葡萄牙的第一批船只驶近了马六甲港口。他们从老远处就看到，好样的瓦台玛并没信口胡说和夸张，他曾说，在这个港口里“停泊的船只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船帆一个接着一个，大大小小的船只挤在一起，有白色的、彩色的、来自马来亚、中国和暹罗的三桅船、大帆船和小帆船停泊在辽阔的港口里。由于这黄金半岛的天然位置，新加坡海峡被选定为东方的巨大转运地。从东方到西方，从北方到南方，从印度到中国，从马鲁古

去波斯，每一艘船必须经过这东方的直布罗陀。在这块集散地进行各种贸易，如马鲁古的丁香花干和锡兰的红宝石，中国的瓷器和暹罗的象牙、孟加拉的毛织品和帝汶岛的檀香木、阿拉伯大马士革的刀剑、马拉巴的胡椒和婆罗洲的奴隶。各个种族、不同肤色和各种语言的人乱七八糟地涌向这个东方商业中心，在这儿中心有亮堂的宫殿和石头砌成的清真寺，雄伟地耸立在零乱的低矮小木屋上空。

葡萄牙人十分惊异地从船上眺望着这座雄伟的城市，贪婪地看着这颗东方的美丽明珠，在阳光下闪着白色的光芒，它应当是镶嵌在葡萄牙统治的印度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马来亚的公侯也从他们的宫殿惊奇不安地注视着这些可怕的外国船只。他们就是那些未受割礼①的强盗，这些该死的家伙终于找到了通往马六甲的道路！阿尔梅达和阿尔布开克的屠杀和大战的消息，早就传到了千里之外。在马六甲人们知道，这些可怕的卢济塔尼亚人横渡大洋，绝不像那些暹罗和日本的帆船船主是来进行和平交易，而是阴谋等待时机，站稳脚跟，打算抢劫财物。最明智的做法：根本不让这四艘船进港。一旦强盗跨进了室内，那就晚了。可是苏丹得到的可靠信息是：葡萄牙船上装有重炮，战船和炮塔上伸出无声的黑色炮口，颇有威慑力量，他知道，这些白种人强盗厮杀起来如同魔鬼，简直无法抵挡得住他们。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以欺骗来对付欺骗，以假情对付假意，以诈对诈，在他尚未进行致命的一击时，就不失时机地先发制人予以猛击。

于是马六甲的苏丹满腔热情地接待了塞克拉的来使，带着

①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一种仪式，割去包皮前端。——译注

十二万分的感激之情收下了他们的礼物。葡萄牙人受到热情无比的欢迎，他让人告诉他们，他们可以随意在此进行贸易。不多几天之后，他尽力设法让他们弄到许多想带走的胡椒和其他香料。他热情地邀请船长们到他们的王宫里赴宴，即使这一邀请——由于种种警告——没有接受，那么水手们也都可以随意而快活地在这座陌生而好客的城里东游西逛，脚下终于又踩着坚实的土地，可以跟一些讨人喜欢的女人寻欢作乐，终于不用在臭气熏天的舱房里过夜，在一座猪、鸡与赤身露体的人们住在一起的肮脏村庄里住宿了，水手们坐在茶馆里闲聊，到市场上采购物品，尽情地享受马来亚人的烈酒和新鲜水果。自从离开里斯本，他们在哪儿都没有受到过如此热情的接待。马来人成百地划着他们的快速小艇，把生活必需品送到葡萄牙人的船上，他们像灵巧的猴子似地从一根根缆绳上爬了上去，惊讶地看着那些从未见过的陌生的东西。开展了一场非常称心如意的贸易。船员们不太情愿听到，苏丹已把预定的运载货物准备好了，并已通知塞克拉，他明天一大清早就要把所有的小艇派到岸边，以便在日落前能够把大量的货物装到船上去。

塞克拉对这样迅速弄到这些贵重的货物非常高兴，他把四艘大船上的所有小艇和船员都送到岸边。他自以为作为葡萄牙的贵宾，从事商业有损他的面子，于是他本人就待在船上，跟一名伙伴下棋，这说得上是酷热难受天气在船上的最好消遣了。其他三艘大船也静悄悄懒洋洋地躺在那里。可是由于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使加西牙·德·苏斯特别注目，他是护送舰队的第五艘三桅小帆船的船长。越来越多的马来亚小艇在几乎无人的四艘大船周围穿梭往来，越来越多赤身露体的家伙藉口要送货上船，从大船的缆绳上爬了上去。最后他产生了怀疑：到头

来那盛情无比的苏丹同时会从陆上和海上发起背信弃义的袭击。

好在那只三桅小帆船上还有一只小艇没有一起送往岸边，这样一来，德·苏斯就委派了他的最可靠的人，火速赶往旗舰，去提醒船长。他的这位最可靠的船员不是别人，正是麦哲伦。他迅速使劲摇着桨，划过去，他发现船长塞克拉还在悠然自得地下棋哩。有几个马来人站在两位下棋人的背后，好像是观棋。他们腰上都佩着马来人的蛇形短剑，麦哲伦目睹这一情况很不以为然。他不让人察觉地轻声提醒塞克拉要他警惕。塞克拉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依然十分镇静地下棋，可是他已命令一名水手从桅顶的瞭望台上去察看动静，并一面下棋，一面立即用手握着短剑。

麦哲伦在最后关键的一刹那间要塞克拉警惕。正好在这一分钟，一根烟柱从苏丹的宫殿上升起，这是从陆上和海上同时发动袭击的约定信号。幸好在船只瞭望台上的水手及时发出了警报。塞克拉一纵身跳了起来，在几个马来人还未来得及冲过来时，他立即把他们推向一旁。集合号一吹响起来，船员们就在船上集中起来，入侵到大船上的马来人，一个个从船舷上被推了出去，现在从四面八方来攻击大船的那些全副武装的马来小艇，本想强行攀登，现在却空自叹息了。塞克拉赢得了时间，起锚了，他的大炮接连猛烈射击，发泄着他的心头愤怒。马来人对葡萄牙舰船的进攻，终因德·苏斯的警惕和麦哲伦的机灵而宣告失败。

那些十分相信马来人而上岸的人遭遇很不幸，少数分散在街道上、赤手空拳的水手，面对成百成千险恶的敌人。大多数葡萄牙人当场被活活打死，只有少数逃到海滨，可是已为时太

晚了。马来人已夺走了他们的小艇，以致他们无法返回自己的舰船；葡萄牙人一个接着一个地败于马来人的优势兵力之下。在所有人当中，只有惟一的一个人极其勇敢地进行抗争，他就是麦哲伦最亲密的朋友，弗朗西斯科·谢兰。他被团团围住，身受重伤，眼看就要完蛋。可是就在这时，麦哲伦带着两个士兵，划着他的小艇赶来了。他无所畏惧，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的朋友。他猛烈砍杀，冲出包围上来的、十倍优势的敌人，把谢兰带到小船上，从而救了他的生命。葡萄牙舰队由于遭受这次毁灭性的袭击丧失了所有的小艇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水手。可是麦哲伦却得到了一个结拜兄弟，他的信赖和友谊对麦哲伦的今后事业有着绝对重要的作用。

在这次事件中，麦哲伦原本并不明朗的面目此刻却显示出了一个特点：他勇敢刚毅。就他的性格而言没有任何感人之处，就其本性来说也没有任何显眼的地方。不难理解，这场印度战争的所有编年史家长期以来都忽略了他，因为麦哲伦毕生都是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人。他不懂得令人注目，博得别人的欢喜，可是当一个任务落到他身上，特别是他本人主动接受一个任务时，这个难以捉摸、不为人注目的人，就会立即发挥他的智慧并显示出他的胆识。相反他从来也不会利用他做出的成绩来炫耀自己，而是静悄悄地非常谦逊地退居幕后。他懂得沉默，善于等待。他好像感觉到，他将要完成的业绩，他的命运是经受了多年的刻苦训练和考验。他在坎纳诺尔经历了葡萄牙舰队的一次最大胜利，在马六甲遭受了一次极其惨痛的失败之后，立即就联想到他艰苦的水手生涯中的一次新的考验：船舶遇难。

麦哲伦被确定要护送一支随季风定期运输香料回欧洲的船

队，他的大帆船撞在所谓的帕杜尔礁石上，没有人死亡，只是船只在珊瑚暗礁上撞成几百块碎片。因为只有几只小艇，装不了全体海员，一部分遇难的水手只好留下，船长、军官和贵族理所当然地提出要首先登上小艇。这一特权激怒了所有的水手们。眼看就要惹起一场纷争，出身贵族的麦哲伦这时站了出来，说道："倘若船长和贵族用名誉担保，你们一到陆地，就立即另派一只大船来救大家，我愿意跟水手们留下。"

他的这一勇敢姿态，首次引起了高级军官们对这个"无名小卒"的重视。短暂时间之后，一五一〇年十月，新任总督阿尔布开克征询皇家船长的意见，应当如何包围果阿，在发言的人当中，麦哲伦也被记了下来。因此，在服役五年之后，这个普通士兵和水手终于晋升为军官。并以军官的身份被分配到阿尔布开克舰队上，这一舰队要为塞克拉在马六甲所遭遇的可耻失败报仇。

就这样，两年后麦哲伦又再次出海，驶向遥远的东方。十九艘船组成了一支精良的舰队，于一五一一年七月威武恫吓地排列在马六甲港的入口处，剑拔弩张，声称要讨伐东道主的背信弃义。战斗打了六个星期，阿尔布开克才粉碎了苏丹人的抵抗。这次落入掠夺者们手中的战利品，是他们在天赐的印度所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由于征服了马六甲，葡萄牙就掌握了整个东方世界。最后永远切断了伊斯兰教贸易的大动脉。过了不多几个星期，伊斯兰教的贸易血液就完全流尽了。从直布罗陀赫拉克勒斯石柱直到新加坡海峡的所有海洋，最终完全成了葡萄牙人的海洋。这一决定性打击的隆隆巨响远传到中国和日本，并欢腾地回响到欧洲，这可是伊斯兰教很久以来所遭受的极其重大的打击。

教皇面对聚集的教徒为葡萄牙的壮丽事业致谢祈祷，因为

基督教控制了半个地球，罗马经历了胜利的壮观景象，这是从凯撒以来人们就未曾看见过的场面。特里斯丹·达·库尼亚领导的使馆，送来了从被占领的印度所获得的胜利品，有装上珍贵辔头的马匹、豹子。最重要的珍品是葡萄牙船只运来的一头活象，它在广大人群的欢呼声中三次跪下向教皇致意。

可是即使这样的胜利也不能满足葡萄牙的贪婪无度的扩张欲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哪一场巨大的胜利使胜利者满足。马六甲只是打开宝库的一把钥匙。现在葡萄牙人已把它弄到了手，就要进入这个宝库，攫取巽他群岛、安波那群岛、巴达、德那第和蒂多雷等有传奇般的富饶的香料群岛。在安东尼奥·德·阿布劳依领导下的三艘船已装备妥当，有几名同时代的编年史家也说到麦哲伦的名字，说他也参与了当时地球最东端的那次航行。然而事实上麦哲伦的印度时代在当时业已结束。命运告诉他，够了！在东方已经看够了！经历得够多了！该走新路！走自己的路！恰恰是他往后毕生之久梦想的这个神奇的香料群岛。他从此刻起，就着迷似地凝视着这些岛屿，麦哲伦那世俗的眼睛还从没见到过哩。可是命运注定他踏不上这些天堂般的岛屿，这些传奇般的岛屿对他只是一种梦幻，是他首创的梦。可是由于跟弗朗西斯科·谢兰的友谊，这些从未见到的岛屿对他来说已非常熟悉，如同自己经历过似的，他的朋友那类似鲁滨逊飘流记的奇异小说，鼓舞他去进行他那个时代的最伟大、最大胆的探险。

弗朗西斯科·谢兰引人注目的个人探险，对麦哲伦及其以后的环球航行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葡萄牙人进行战斗和屠杀的血淋淋的历史上一个愉快而又轻松的插曲。在所有那些富有声誉的船长当中，这位不出名的航海家的形象引起了人们的

特别关注。他在马六甲跟回国的结拜兄弟麦哲伦告别，前往他的上将那儿去，重新为葡萄牙国王效劳，因为他享受着国王的俸禄，并向国王立下过誓言。

可是这片乐土的风光，那温暖宜人的气候，不无焦虑地使弗朗西斯科·谢兰的军纪趋于松懈。尽管几千里远的里斯本王宫里的国王在满腹怨言，大发雷霆，声称要把他从船长和领退休金者的名单中划掉，他却漠然置之。他知道，他为葡萄牙做的事已够多了，他为国王已经历了够多的风险。现在弗朗西斯科·谢兰终于开始享受一下舒适、无忧无虑的生活了。就像在这些快乐的岛上生活的人们一样，不穿衣服，逍遥自在。让其他的水手和船长继续去航海，为外国经纪人流血流汗，收购胡椒和桂皮，让他们继续作为老实憨厚的人，在危险的战斗中浴血奋斗，为里斯本海关获得很多的税收，而他，弗朗西斯科·谢兰本人，葡萄牙舰队的前船长已经厌倦战争、探险和香料生意了。这位威武的船长悄悄地退出了那英雄的世界，进入田园生活。他决定从头开始，过一种好客的当地土著人那种原始的懒散生活。德那第国王赠给他的崇高的头衔，并没有加重他的工作，只是在他的统治者进行一次小小的战争时，他不得不以军事顾问身份出现。为此所得的奖赏是，他获得了一座带奴隶和仆人的房子，此外还有一个漂亮的黑皮肤的妻子，她跟他生了两三个半黑的孩子。

忘记了自己的伊塔克的另一个奥德赛——弗朗西斯科·谢兰年复一年地生活在他的黑皮肤的卡吕普索的怀抱中，任何安琪儿都不再能把他从这幸福的天堂里赶走。直到死前九年，这个自愿的鲁滨逊成了第一个逃避文明的人，他没有再离开过巽他群岛。在葡萄牙昌盛时代的所有占领者和船长们中间，他不

算是最英武的人，但也许是最聪明、最幸福的人。

初看起来，弗朗西斯科·谢兰的富有传奇性的逃跑，好像跟麦哲伦的生活和业绩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事实上正是这个小小的极无名气的船长享乐主义的隐退对麦哲伦的生活道路，随之对世界探险的历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两个结拜兄弟尽管远隔万里仍然保持着联系。一有机会就把消息从他的岛屿上送往马六甲，或是传往葡萄牙，谢兰总会给麦哲伦写一些内容丰富的信，这些信热情洋溢地赞颂他新的故乡的富饶和安逸。他透过字里行间道出了："我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比瓦科·达·伽玛所发现的地方更加富饶更加广阔。"他完全受着热带魔力的诱惑，尽快地敦促他的朋友离开那以怨报德的欧洲和那收入微薄的工作，尽快地到他身边来。几乎毋庸置疑，是弗朗西斯科·谢兰第一个使麦哲伦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因为这些岛屿位于远东，沿着哥伦布向西航行的道路，而不是沿着瓦斯科·达·伽玛向东航行的道路，去寻找这些岛屿，可能更为可取。

这两位结拜兄弟之间究竟商谈到怎样地步，我们并不知道。无论怎么样，这两个想必已有一定的主意，因为谢兰死后，在他的文件堆里发现了一封麦哲伦的信，信中麦哲伦十分神秘地答应这位朋友，他要尽快地去德拉第，并且说："要是不经过葡萄牙，就走另一条路。"显然，找寻这条新路成了麦哲伦的毕生愿望。

这个愿望，还有烤晒得黑黝黝的身体上留下的几处伤疤，和他在马六甲买的一名马来亚奴隶，这三者就是麦哲伦在印度服役七年后带回故乡的全部东西。这个退役的士兵在一五一二年终于又离船登陆，比起七年前离开祖国时所看到的，完全是另

一个里斯本，葡萄牙已今非昔比，他不禁特别惊讶，也许是非常不满。在他的船只进入贝伦港口时，他感到非常惊异。在瓦斯柯·达·伽玛当年出海时作祷告的那座低矮古老的小教堂那个地方，现在耸立着新建成的雄伟壮丽的大教堂，这是他的祖国从印度香料中获得的巨大财富的第一个明显看得见的标记。放眼周围，变化万千。在那过去航船寥落的河面上，如今已帆樯林立，沿岸船厂里的工人正在装备快速革新的、更大的舰队。港口里桅杆一根接着一根，密集排列着国内外船只的各种信号旗，停泊的码头上堆满了各种货物，仓库里装得满满的，成千上万人吵吵嚷嚷，行走在新建的雄伟宫殿之间的大街上，在各个代办处、金钱兑换所以及经纪人事务所里乱嚷着各种语言，由于掠夺印度，里斯本在十年之内由一个小城变成了世界性的豪华城市。贵族太太们坐着豪华的敞篷马车，向人们炫耀着身上佩戴的印度珠宝，大群宫廷侍从竭尽机灵圆滑之能事，以便讨好主人。这名从海外还乡的水手明白了：他和他的伙伴们在印度流下的鲜血，由于神秘的化学作用，在这儿变成了黄金。正当他们在南方那酷热的烈日烤晒下，拼死拼活，受苦受难，流血献身的时候，里斯本却凭着他们的业绩，继承了亚历山大和威尼斯的衣钵，曼努埃尔国王成了欧洲最富有的君主。家乡的一切全变了，如今在旧的国土上生活的人们变得更富裕，更适意、更会享受、更挥霍无度，好似那些掠夺来的香料所换得的黄金，使人们的精神状态大为振奋起来。只有他这个“无名小卒”回来后仍像过去一样，没有任何人期待他，谁也不会向他表示谢意，没有任何人欢迎他。葡萄牙士兵斐尔劳·德·麦哲哈斯在印度待了一年之后，回到祖国，就像是回到了异域他乡。

魏家国 译

麦哲伦自由了

1512 年 6 月—1517 年 10 月

英雄的时代从来都不是尽如人意的，那些英勇的征服者从他们国王那里得到的感激之情，确是微乎其微。他们为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了好几个大陆。哥伦布戴着镣铐回到塞维利亚，科尔特斯失宠，彼萨罗被杀，鲁莱斯·德·巴尔波阿发现了南太平洋，但却不免杀头之祸。甘蒙这位葡萄牙战士和诗人受到卑鄙的地方官吏的诬陷，几乎跟他伟大的同行塞万提斯一样，在比粪堆好不了多少的监狱里度过了悠悠岁月。地理发现时代的忘恩负义简直难以言表：正是那些航海归来的水手和士兵们却成了乞丐和残废，全身长满虱子，蓬头垢面，染上疟疾，流浪在加的斯和塞维利亚港口小街里，他们为西班牙王室掠夺过蒙特苏马的首饰珠宝和印加人的金库，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虽

然没有死于殖民地，但却像令人讨厌的癞皮狗似地、不光彩地被掩埋在自己的国土上。那些无名的英雄，尽管创造了业绩，可是跟那些从未离开过安乐的深宫、全靠要弄手腕捞取英雄们在战争中掠夺的财富的朝廷大臣们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这些宫廷寄生虫却成了新省的省长，他们用麻袋去装黄金，他们极度憎恶这些殖民战士们和当时的前线军官，把他们从自己肥缺的食槽旁挤走，这些官兵经历了多年的奋战牺牲之后，竟愚蠢地回到了故乡。麦哲伦参加了坎纳诺尔、马六甲以及其他战役，数十次为葡萄牙的荣誉奋不顾身，甚至把生命都置之度外，可是这并没有给还乡的麦哲伦获得任何相当的职务，及生活保障的起码权利。只不过是由于偶然的情况，他是贵族，早就被列入王室的预算，他谢天谢地，被列入享受养老金者的名单。说得确切一点，属于接受施舍者之列，甚至一开始时作为一名小贵族每月仅能得到一千瑞斯①，这是最末的等级了。一个月后或许是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涉之后，才取得了卫队身份，晋升了小小一级，月俸一千八百五十瑞斯（也有人说，作为“骑士身份”，月俸为一千二百五十瑞斯）。无论怎么说，尽管任何神职人员的头衔都不合适，任何头衔对他都不显得重要，因为授予他任何堂而皇之的头衔都不会给予麦哲伦什么权利和义务，只是懒散游荡在王室的前厅里，可是一个有自尊心、有抱负的人，是不会长期领取这样一点可怜的报酬，而无所事事的。因此就毫不奇怪了，麦哲伦利用了第一个机会，无疑这不是最好的机会，要重新去过戎马生涯，接受考验。

麦哲伦几乎等待了一年。一五一三年夏季曼努埃尔国王装

①货币名。——译注

备了一支庞大的军事考察队去对付摩洛哥，最终是要给海盗式的摩尔人以迎头痛击，就在这时，这名曾远征印度的战士立即报名入伍——要解释这一决定，只是由于他不满于自己处于被迫境况下而无所作为。麦哲伦在陆军战斗中根本无法发挥他的才能，因为他以前几乎一直在海军中服役，他曾经历过七年的磨练，已经成为一名非常干练的水手了。他在派往阿扎莫尔的一支大军中，只不过是一名没有军阶和独立指挥权的下级军官。正如在印度一样，他的名字在报告的前一部分是看不到的，而他本人却像在印度一样，总是出现在危险的前列。这次——已是第三次了——麦哲伦在白刃战中负伤，梭镖刺伤了他的膝关节神经，左腿活动困难，几乎半瘫了。

一个不能快行、又不能骑马的跛子，是无法在前线服役的。麦哲伦要在非洲退役，作为一名残废军人，要求提高他的退休金，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可是他却执意要留在军队里，不怕危险去参战，呆在这真正能锻炼他的环境中，因此人们要求这个伤员和另一名军官担任战利品军官，管理好从摩尔人那里掠夺来的大量马匹和牲口。可是就在这时出现了一桩可疑的事情。有几十只羊夜晚从偌大的羊厩里不见了，于是恶毒的谣言传开了，麦哲伦和他的同伙把一部分战利品暗地里卖给了摩尔人，要不，就是玩忽职守，让摩尔人在夜晚从羊栏里偷走了牲畜。这样无耻地控告麦哲伦侵吞财产，损害国家，却是令人惊异。这和葡萄牙殖民官员在几十年后诬陷和侮辱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葡萄牙诗人甘蒙完全一样。他们两人在印度待了数年之久，有上百次机会在掠夺中大发横财，可是他们却穷得像乞丐一样，从埃尔多拉多回到了家园，这些无耻诬陷玷污了他们的声誉。

饶幸的是麦哲伦性格比起温顺的甘蒙更为坚强，他不想让

这些卑鄙的家伙审问，也不想像甘蒙那样数月之久在监狱里被拖来拖去。他不会温顺地像卢西亚德英雄史诗的作者那样，把脊背对着他的敌人，而是在谣言传开时，有人敢于指控他以前，他就离开了军队，回到葡萄牙，要求洗刷他的耻辱。

麦哲伦根本不认为，他在这件卑鄙的诬陷中要承担什么过错，这就证实，他一回到里斯本晋见国王时，绝不是为了给自己辩护，相反，由于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功绩，最终要求一个更恰当的职位和更优厚的报酬。他再次失去了两年时光，又在这场战役中负伤，他几乎成了残废。可是他到达里斯本时情况不佳，曼努埃尔国王并没给这位精力充沛的人有时间提出他的一系列要求。从非洲司令部已经传来消息，这个倔犟的船长没有告假就擅自离开了摩洛哥的军队，因此国王就把这位有功之臣，受伤的军官当作一般的逃兵来处理。根本没让他开口说话，就直截了当地命令麦哲伦赶回非洲他的部队驻地，听候他的上司安排。为了遵守纪律的缘故，麦哲伦不得不服从命令。他乘上一艘船返回阿扎莫尔。当然在那儿不再有人谈起公开调查的事，也不敢谴责这位功勋卓著的士兵，凭着上级发给他的光荣离开军队的明确证明，并带着证明他清白无罪和立功异域的各种文件，麦哲伦第二次返回了里斯本。不难想象。他此时怀着什么样愤怒的心情！他得到的是冤枉而不是嘉奖，是伤痕而不是酬劳。他久久地沉默度日，悄悄地隐退到幕后，可是现在他已三十五岁了，他已没有兴致乞求施舍似地争取他应得的权利了。

在这样为难的处境下，理智要求麦哲伦，不要马上在他回国后，直接去叩见曼努埃尔国王，不要重新向他提出同样的要求。当然更合适的做法是，静待一段时光，在宫廷里广交朋友，

建立联系，熟悉情况，搞好关系。可是麦哲伦一向都不善于随机应变。尽管我们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皮肤黝黑、个头不大、不惹人注目、沉默寡言的人，从来也不会讨好别人，取得欢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国王始终都不喜欢他，甚至他的忠诚的同伙毕加费塔也不得不承认，军官们坦诚地说都讨厌他。正如拉赫尔谈到的克莱斯特那样，他的身上散发出严肃的气氛。他不会微笑，没有平易近人的亲切感，不会迎合别人的意见——从来也不会灵活地申述他的意见和想法。他一点也不健谈，性格内向，总是独身静处，这个一贯孤僻的人想必在自身四周制造了一种冷漠、不舒适和不信任的气氛，由于很少有人接触他，因此也就无人了解他的内在性格。他的同事们从他的沉默、离群独处中，不知不觉地感到，他有着难以捉摸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比起那些狂热无耻地挤到食槽旁公开争名夺利的人，更使大伙无法信赖。在他一双深陷锐利的小眼里，在他胡须丛生的口角边，一直隐藏着人们无法分晓的秘密。他始终隐藏着别人察觉不到的秘密，常年一直守口如瓶，他使那些可信赖的人——并非深奥莫测的人——感到毛骨悚然。从一开始起，麦哲伦由于自己高傲的秉性而招人不满。要跟他一起共事或为他做一点事，确实不容易，也许对这个独来独往的可悲的人来说，要跟他单独相处都是非常难办。

斐尔劳·德·麦哲哈斯没有得到任何人帮助和支持，第二次独自一人前往拜见国王，他选择了宫廷中最坏的道路——一条正直而不适宜的道路。曼努埃尔国王在同一座宫殿里接见了他，也许就是从前接待过哥伦布的、他的前任约奥二世的同一个宝座上，就在同一个地方又重新出现了一个相同的历史意义的场景。因为这个身材矮小、农民似的宽肩膀的、矮小粗壮结

实、浓眉掩盖着锐利目光的、黑胡子的葡萄牙人，他现在正向他的统治者卑躬屈膝，殊不知这个国王即将鄙视地要把他赶走，这个葡萄牙人内心的想法并不比那个外来的热那亚人更少。麦哲伦在勇敢、坚毅和经历方面，或许比他那位大名远扬的先驱更为优越。尽管曾经没有人目击到这一决定命运的时刻，可是人们在阅读了同时代编年史家的一致的描写后，可以通过遥远的过去，一直看到国王宫殿里的情况。麦哲伦拖着他那条一瘸一拐的腿向国王走去，弯下腰身，把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那些无理恶毒控告的文件呈给国王。接着，他提出了第一项要求：鉴于他一再负伤，失去了战斗能力，请求把他的月薪提高半个克罗赛多①。他所要求这个数额微不足道，令人可笑，似乎不值得这自负、坚强、雄心勃勃的人为了这一点点乞讨而低三下四。可是麦哲伦提出这一要求，显然不是为了获得这样一枚银币，半个克罗赛多，而为了他的身份地位，为了他的荣誉。月薪即退休金的多少，在这座争权夺利、排斥异己的国王宫廷里，表明了一个贵族在一个王室里领取薪金的等级。麦哲伦已经三十五岁了，是印度和摩洛哥战争时期的一名老兵，不愿在地位上屈居于伺候国王进餐和上下马车的一些年轻的佣人之下。出于自尊他从不会挤到人前，可是这种自尊也不允许他屈居于一些非常年轻未曾建功立业的人之下。他不愿人们小看了他的人格和他的业绩。

曼努埃尔国王深为恼怒，皱起眉头，看着这个性急的乞求者，对他这位富有的君主来说，自然不是微不足道的银币，使他恼火的是这个人的行径。麦哲伦不是谦恭地乞求，而是强烈

①葡萄牙之古币。一克罗赛多相当于现在英国的一先令。——译注

地要求，他不愿恭候国王恩赐给他的薪俸，而是固执倔犟地坚持要提高他的地位，似乎这是他应享受的权利。人们将会让这个头脑顽固的家伙懂得要等待和请求！不巧由于恼怒，这个外号为幸运的曼努埃尔拒绝了麦哲伦的请求，可是他并没料到，他为了节省下这半个克罗赛多银币，竟然要支付千万枚杜卡特金币。

麦哲伦原本应当告辞了，因为国王曼努埃尔紧皱眉头，这意味着他不可能得到国王的恩典了。可是麦哲伦不但没有奴性十足地欠身离开王宫，出于自负，他静若无事似地站在国王面前，又提出第二项请求，说到底，这才是他的真正要求。他问，国王能否给他找到任何一个差使，在他的王宫内替他找一个合适的公务。他觉得自己还非常年轻，精力充沛，不愿依赖别人恩赐以度余生。当时从葡萄牙各个港口里每月、甚至每周都有一些舰船驶往印度、非洲和巴西。要是把这许多航船中的任何一艘交给熟悉东方海洋的这个人去指挥，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在这座城市里，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除了年迈的老前辈瓦斯科·达·伽玛之外，无人能夸口在知识上超过麦哲伦。可是曼努埃尔国王对这个使人看来很不舒服的、自以为是的家伙的锐利和挑衅性的目光，越看越不能容忍。他没有给麦哲伦以任何慰藉，让他对未来寄予任何希望，就冷漠地予以拒绝：不可能，他无法给他找到工作。

完了。一切全完了，可是麦哲伦又提出第三个请求，这一请求原本不是请求，只不过是一个问题。麦哲伦问，倘若他在另一个可望得到优厚待遇的国家找到一个差使，国王是否会反对。国王轻蔑而冷淡地答道，这完全无所谓，麦哲伦想到哪儿去工作都可以。这样一来，就最清楚不过地向麦哲伦表明，葡

萄牙宫廷拒绝他从事任何工作，虽然还会继续对他恩典，予以施舍，可是倘若他离开葡萄牙国土和宫廷，人们会极表赞同，毫不惋惜。

这次接见，没有任何人旁听。就是这一次，不知麦哲伦是否向他的国王陈述过他原先的秘密设想。或许人们根本没给予他机会，实现他自已的计划，也可能他的计划遭到冷落。无论情况如何，在这次接见时，麦哲伦还再次表明，他要像既往一样，继续为葡萄牙浴血奋战，奋不顾身。只因这一粗暴的拒绝迫使他作出了内心的抉择，这一抉择终于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的生活当中。

此刻，麦哲伦知道，他像一个被驱逐的乞丐离开了国王的宫殿，他现在无法更久地期待和犹豫了。度过的三十五年时光，他可说已经经历和体会到了一名战士、一名水手在战场上所学到的一切，他四次绕过好望角，两次自西向东，两次由东到西。他无数次险些丧命，他那热血之躯三次接触敌人的冰冷的枪矛，他看到了大千世界，他知道地球东方的事物，多过他那个时代的任何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学家。将近十年的锻炼，考验了他，他掌握了各种军事技术，他学会使用剑和火药枪，掌握方向盘和使用罗盘，操纵风帆和火炮，善于划船，使用铁锹和长矛。他能查阅罗盘地图，还会使用铅锤测量，使用起航海仪器比天文学家更准确无误。其他的人只能在书本里读到：永无止境的无风平静和旷日持久的热带旋风，海上战斗和陆地战役，围攻和掠夺，突然袭击和船舶遇难。所有这一切他都亲身经历过。在十年时光中，经历过成千个夜晚和白天，他在辽无边际的海上学会了等待，然后又会利用那决定性的闪光的一秒。他熟悉

各种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和棕色人、印度人、马来人、中国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在各种不同的工作中，在水上、陆上，一年四季在海上，在霜冻地带和赤日炎炎的天空下，他都在为国王和他的祖国效力。可是这些事情是年轻时的事情，现在已将近三十六岁了，麦哲伦坚信，他为别人的利益和别人的荣誉已作了足够的牺牲，正如所有有创造精神的人那样，他感到有必要去追求自我职责和自我实现。祖国在他困难的时刻抛弃了他，解除了他的职务——现在更好了：他自由了。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本想把他一个人打倒，然而实际上却起了相反的作用，把他推上了正确的道路。

麦哲伦从来不会立即把已做出的决定不加思索地明白表达出来。尽管他的同时代人把他的性格描写得不讨人喜欢，但是这样一个，也是重要的品质，显然表明了他生活的各个时期情况；麦哲伦非常善于沉默。他本性既不急躁，也不健谈，就连在嘈杂的军队生活中也不惹人注目，显得异常怪僻，麦哲伦总爱独自一人考虑自己的想法。他目光远大，暗自盘算着各种可能性，麦哲伦只要自己的想法在内心里还未酝酿成熟和无懈可击，他是从不会把计划和决定公诸于众的。

这一次麦哲伦完美地展示了他的沉默艺术。要是另一个人在受到曼努埃尔国王的侮辱和拒绝后，也许会立即离开祖国，向别的国王自我推荐。可是麦哲伦却依旧在葡萄牙呆了整整一年，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营生。充其量人们只是注意到，他在一位到过印度的老水手那里，这免不了使人们注意，麦哲伦很多时间是跟舵手和船长们一起度过的，主要是跟那些早年在南方海域航行过的人们呆在一起，可想而知，猎人们除了闲谈打

猎，水手们除了谈海洋和新发现的大陆之外，还会谈什么呢？他在曼努埃尔国王的秘密档案库里仔细研究了珍藏在那里的所有海岸地图，罗盘图和最后几个巴西探险队的航海日志，这一切也不一定会引起外界的怀疑。一个不在其位的船长有许多空余时间，如果不研究这些书籍和有关新发现的大陆和海洋的报告，又有什么事可做呢？

引人注目的也许是麦哲伦所结识的新朋友。他跟鲁伊·法莱罗的关系日益亲密，法莱罗似乎是一个草率、神经质、爱发脾气的知识分子，他善于辞令，过于自信，喜爱辩论，跟这个沉默寡言、沉着镇定、讳莫如深的航海家和军人最不协调了。可是人们很快就看到亲密难分的这两个人的天才，恰恰由于他们性格的极端悬殊而产生某一种——必然短暂的——和谐。如果说，麦哲伦向往海洋探险和实地考察世界，那么法莱罗内心深处热烈追求的，则是抽象的地理学和天文学。鲁伊·法莱罗作为纯理论家，是地地道道的学究。从来没上过船，从来没离开过葡萄牙国土，他只是从计算、书本、图表和地图中了解到大地和星空的天体的遥远的轨迹。在这些抽象的领域里，他确实被人们视作制图学家和天文学家，被看作最了不起的权威。他不会张帆，但是却发明了一种独特的经度计算系统，尽管这种计算方法还有不足之处，但它却包括了整个地球，后来给麦哲伦的帮助很大。他不会掌舵，可是由他制定出了海图、罗盘图、星盘和其他仪器，似乎在当时是最好的航海仪器。麦哲伦是理想的实践家。他的大学只是在战争和探险中度过的，他所知道的天文学和地理学，严格说来，全是从他的航海经历中学到的，因此麦哲伦从这样一名专家那里得到的教益很多，无可估量。正好由于他们天赋和爱好的极端相反，所以这两人才会如此极其

幸运地相互补充，正如推理和实验，思想和事实，精神和物质等相互补充一样。

同时，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一时的命运结合也有关系。这两个葡萄牙人，各有特点，就他们的自我意识而言，都深受国王的伤害，妨碍了他们创造自己的业绩。鲁伊·法莱罗多年来谋求皇家天文学家的职位，在葡萄牙无疑没有任何人比他更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正如麦哲伦以默默的自负引起宫廷的恼火一样，鲁伊·法莱罗却是由于他激烈的、神经质似的、易于生气的、暴跳如雷的举止而得罪了国王。他的敌人把他称作傻瓜，为了通过宗教法庭对他进行处置，甚至散布谣言，说法莱罗在工作中借助于超自然的精神力量，说他跟魔鬼混在一起。麦哲伦和鲁伊·法莱罗两人在自己家乡遭到人们的敌视和不信任，而仇视和不信任这种外界压力却使麦哲伦和法莱罗从内心深处走到一起。法莱罗研究麦哲伦的口述资料和计划方案，给这些方案提供科学的依据，并用精确的图表计算，以验证麦哲伦纯粹出于直观的猜想。理论家和实践家越发更多地比较他们的感觉，就分外渴求共同思考和制作，下决心实现他们既定的方案。理论家和实践家一起发誓，在没有实现计划的决定性时刻，对任何人都严守秘密，不说出他们的计划，必要时甚至无需祖国的帮助，甚至跟自己祖国对着干，也要完成这一大业，这一大业不只是属于某一个国家，它属于整个人类。

现在这个时刻来到了，要是问：麦哲伦和法莱罗在里斯本王宫的阴暗处，像是阴谋家偷偷地讨论的神秘计划到底是怎样呢？有些什么东西迄今尚未出现过呢？究竟如何珍贵，使他们二人信誓旦旦地要严守秘密呢？从事这一方案有什么危险，以

致他们就像隐藏一个有毒武器似地把它收藏着呢？一开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这个新的计划不是别的，就是麦哲伦从印度带回来的那个想法，是谢兰鼓励他去设想：不要像葡萄牙人走着向东越过非洲的道路，而是向西绕过美洲到达最富饶的香料群岛。这个设想就本身而言，似乎并没什么新鲜之处。大家都知道，哥伦布出海航行，并不是为了发现美洲新大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美洲），而是要去印度，在全世界终于意识到哥伦布迷了路时——对此他本人从来也不清楚，直到他死以前，还误以为是在中国皇帝统治下的某个省登陆——西班牙并没想到，由于这一偶然发现的缘故而放弃通往印度的航路。因为跟随着这最初的欣喜，一个令人恼怒的失望很快就来到了。草率的幻想家哥伦布的声明，在圣多明各和伊斯帕尼奥拉地下藏有黄金，已证实是一派胡言。在那儿并没有发现黄金，没有香料，甚至也没见到“黑色的象牙”，因为软弱的南美印第安人并没给拉来当作奴隶。只要毕萨罗还没有掠夺印加人的宝库，波托西还没有开采银矿，就商业而言，发现美洲可谓毫无意义，渴求寻找黄金的卡斯蒂利安人，并没从事更多对美洲进行殖民统治的事，而是想尽快地绕过美洲到达珠宝和香料的天堂。遵照国王的旨意继续尝试着，绕过这个新发现的大陆，赶在葡萄牙人之前，闯进东方宝库，登上香料群岛。探险船队一艘接着一艘出发了，像以前葡萄牙人试图绕过非洲时一样，同样失望了。因为这美洲新大陆已完全表明，比起他们原先猜想的要辽阔得多。因为他们无论向南，或是想向北航行到达印度，到处都碰上不可逾越的障碍，被坚实的土地阻住了去路。美洲这块辽阔的大地简直就是“障碍物”，像一个巨大的方木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那些伟大的征服者们，一个接着一个枉图碰

碰运气，想从任何地方找到一条通道，或一个海峡。哥伦布第四次航行时向西折道，想经过印度回国，最后也碰上大陆，挡住去路。维斯普奇参加的探险队，同样徒劳地察看了整个南美洲海岸，想抵达香料群岛摩鹿加。柯尔特斯在他慎重地向查理皇帝作第四次报告时许诺，要在巴拿马寻找突破口。柯泰里尔和卡伯特向北一直航行到北冰洋，为的是寻找北方的航行通道，约安·德·索利斯沿着拉普拉塔河流而上，要在南方寻找一条通道。可是他们全都徒劳！在北方，在南方，在冰雪地带同样像在热带一样，到处都碰上大地和崖石构成的永不动摇的壁垒！任何希望从大西洋驶向努尼斯·德·巴尔波亚在巴拿马高地上第一次看到的另一个大洋，都一一破灭了。宇宙学家把南美洲看作与南极洲连成一体，载入他的地图，已经有无数船只在徒劳地寻找通道中失败了，而西班牙人已经死了这条心，心安理得地认为，同印度洋的富庶陆地和海域最终保持隔绝状态，因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所渴望的“海峡”，即人们满腔热情所要寻找的通道。

这时，突然冒出了一个不知名的小船长麦哲伦，他原本隐姓埋名，但却满怀激情，绝对自信地声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有一条通道。我知道，我认识这一地带。给我一支舰队，我会把这一通道告诉你们，我会从东向西，环绕整个地球航行的。”

现在我们站在这儿，面对着麦哲伦的秘密，这是几百年来许多学者和心理学家所探求的奥秘。刚才已经说过，麦哲伦的计划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实，他就像哥伦布、维斯普奇、柯泰里尔、柯尔泰斯和卡博特一样创造同样的业绩。他的方案本身并没什么令人惊讶的新奇之处，而是那无法改变的信

念，他凭着这一信念提出了他的看法，从海上由西驶往印度是可能的。因为从一开始起，他的谈吐就不像别人那么含糊，他说：我希望找到一个海峡，一个突破口。他信心十足响亮地说，我会找到这个海峡，因为我知道，只有我知道，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有一条通道，我相信，我一定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它。

麦哲伦事先究竟如何——这是一个谜——知道，这条由所有其他航海家所妄图寻找的海峡位于何处呢？他像他的伙伴法莱罗一样，从没有在他的航行中接近过美洲海岸，倘若他肯定确实存在这个海峡，那么他只可能从任何一个曾亲眼见过这个海峡的先驱者那里得悉：这个海峡的存在和它的地理位置。倘若另一名航海家先于麦哲伦发现了这一海峡，那么情况就复杂了，麦哲伦就不是大名鼎鼎，历史上所颂扬的发现者了，只不过是别人成绩的剽窃者。那么麦哲伦海峡同样就没有理由以麦哲伦命名，就像美洲没有按它的发现者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名字命名一样。

麦哲伦历史的秘密可以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说明：这个葡萄牙的小小船长通过谁，又用什么方法获得海洋与海洋之间存在通道的这一可靠信息，因而他能够保证实现以前这一无从相信的事，这就是在一次航行中能绕过地球一周。麦哲伦坚信他的事业会完全成功，他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一最初的提示归功于安东尼奥·毕加费塔，他的最亲密的伙伴和传记作家，他报道："即使在这个海峡入口已经出现在他们眼前时，整个舰队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会存在一个海峡把两个大洋联结起来。此刻，只有麦哲伦的信念坚不可摧，因为他事先清楚地知道，存在这样一个秘密的海峡，并且他是借助于著名的宇宙学家马丁·彼海姆的一张地图才知道的，这张地图是他在当时葡

萄牙国王的秘密档案馆里发现的。”毕加费塔的这份资料就其本身来说，完全可信，因为马丁·彼海姆一方面在他生前（一五〇七年）确实是葡萄牙王宫的制图学家。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麦克伦是一个缄默不语的资料搜集者，他善于获得许可进入这个档案馆。可是——这场游戏继续有趣地进行着——这个马丁·彼海姆并没参加过任何一次海上探险，他只是从其他的航海家那里打听到存在一个海峡的惊人的消息。想必他也有自己的先驱者。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这些先驱者究竟是谁呢？这些不知名的航海家是谁呢？海峡的发现者究竟是谁呢？难道果真有另一些葡萄牙船只，在制定那些地图和地球仪之前，就已航行到过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这个十分神秘的海峡了吗？请看：文件毋庸置疑地确认，实际上在世纪开始时，就有若干葡萄牙探险队（有一支探险队是由维斯普奇随行）探察了巴西海岸，甚至还考察了阿根廷海岸，只有他们会看到过这个海峡。

可是，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那些神秘的探险队究竟航行了多远？果真找到了真正的通道？到达了麦哲伦海峡？其他的航海家在麦哲伦前就已知道了海峡，就这一观点，长期以来人们并没其他的根据，只是毕加费塔的那份资料和保存至今的约翰·施耐尔的地球仪。一五一五年，施耐尔就曾惊异地在麦哲伦航行前很久，就清楚地标明了一个南部通道（当然，标的是一个完全不确切的地方）。可是彼海姆和德国教授又是从谁那里弄到情报，这就无从探究了。因为在那个发现的时代里，每一个民族由于商业上的嫉妒都非常警惕，严格秘密地保存着任何探险的成果。舵手的航海日志、船长的笔记、地图和罗盘图都严密地收缴和保存在里斯本的王宫里。一五〇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曼努埃尔国王下令，严禁把有关刚果河对岸的航海情况泄

露出去，以防其他国家从葡萄牙的发现中捞到好处，违者处以死刑。谈到优先权的问题，似乎已成为多余的事搁置一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在后来的一百年中似乎说明，彼海姆和施耐尔，最终还有麦哲伦，他们所取得的地理情报该归功于谁，这只是一份德语传单，印在劣质纸上，人们发现报纸上印有这样的题目：《来自巴西国的最新报纸抄件》，后来证实，报上有一篇报告，这篇报告是一位国外分店经理在本世纪初从葡萄牙给奥格斯堡的一些大商人维塞尔家族写的。那份报告是用很糟糕的德文如此写的，一只葡萄牙船大约是在南纬四十度发现并绕过了一个海角，类似好望角。在这个海角后面，从东到西有一条很宽的海峡，很像通向另一个海域的直布罗陀海峡，因而经这条路到摩鹿加的香料群岛是最方便不过的了。

这份报告清楚地说明，大西洋和太平洋是彼此相连的，这是需要证明的事。

谜底终于揭开了，最终麦哲伦成了一个剽窃者，是一个把早年人们的发现据为己有的骗子。不言而喻，麦哲伦对以前葡萄牙探险队成果的了解，至少不亚于那个不知名的海运公司的经理和里斯本的奥格斯堡地理学家。他对全世界历史的功绩表明：他很有毅力，懂得把很好珍藏的秘密转变，为整个人类所享用。机灵，神速，利用他人成果时毫不迟疑，这似乎就是麦哲伦的全部秘密。

可是又出现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这一切我们今天已知道得很清楚，可是当时麦哲伦并不十分了解。实际上，那些无名的葡萄牙探险队的水手们，从未到达过麦哲伦海峡，而他们的报告，麦哲伦以及马丁·彼海姆和约翰·施耐尔所非常相信的信息，实际上全是误会，是一种不难理解的错误。在南纬四十

度附近，那些航海家们看到了什么，这儿我们已触及到问题的来龙去脉。《新闻日报》的目击者的报告究竟谈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谈，只不过是那些航海家大约在南纬四十度发现了一个海湾，他们进入海湾航行了两天之久，并没航行到尽头，没有找到出海处，因为遇上风暴只好折回。他们曾经看到的是某些水道的入口，他们就误以为——可是这是错觉——这就是渴望寻找的通往太平洋的水道。然而真正的通道——我们从麦哲伦时代才知道——位于南纬五十二度附近。那些无名的航海家在南纬四十度附近曾经见到了什么呢？我们对此有了一个颇有根据的猜想。因为谁要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令人惊叹像大海一样广阔的浩瀚水域，拉普拉塔河在此处流入大海，他们自会明白，把这条河的浩瀚入海口看作一个港湾，看作大海，这并非是一个偶然的，而恰恰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错觉。那些无名的航海家在欧洲从没见过如此浩渺无际的河流，一看到这辽阔无际的水面，就连忙欢呼雀跃起来，以为这就是久所渴望寻找的联系两个大洋的水道，这确是很自然的事。《新闻日报》所引用的正是那些海员们实际上弄错的巨大河流，根据他们的叙述而制定的地图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说，这些无名的海员继续南下，除了发现拉普拉塔河，还看到了麦哲伦海峡——真正的海峡的话，那么他们会在自己的罗盘图上，施耐尔也会在自己的地球仪上标出拉普拉塔河，注明地球上诸多河流中的这一巨大水域。可是，你瞧，不仅施耐尔的地球仪，而且连我们所熟悉的其他地图上都没有标出拉普拉塔河，而是在那个位置上标出了这条水道，恰恰是在同一纬度上标上了神秘的海峡。这样一来，问题就真相大白了。那份《新闻日报》撰稿人确实是弄错了。他们成了一个明显和可以理解的错误的牺牲品，麦哲伦认为，有

可靠的资料证明一个海峡的存在，这一说法也不是不真实的。他借助于这些地图和报告，设计自己环球航行的宏伟计划时，由于别人的自我欺骗，他也受骗了。这一信以为真的错误，最终就是麦哲伦的秘密。

可是，我们不要小看这一错误！只要一接触到天才人物，碰上偶然事件，哪怕是最离奇古怪的错误也会变成最神圣的真理。任何科学领域里的重大发现，都曾产生于虚构的假设，这些重大发现有成百成千之多。倘若要是没有荒谬错误的计算了地球圆周的托斯卡尼利的地图，并错误地诱导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印度的海岸登陆的话，哥伦布怎么也不会进入世界大洋。那么麦哲伦怎么也不会说服国王把一支舰队交给他，他也不会凭着这种稀奇古怪的信念，相信彼海姆的那么不准确的地图和葡萄牙航海家们虚构的情报。只有他相信知道这一奥秘时，麦哲伦才会解开他的时代的最大的地理学上的奥秘。只因为他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一个短暂的妄想，他才发现了一个永恒的真理。

魏家国 译

理想实现了

1517 年 10 月 22 日—1518 年 3 月 22 日

麦哲伦面对着一个至关重大的决断。他有一个大胆计划，这一计划是他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航海家都不敢想的，他满怀信心（或是说，他认为有此信心），由于他掌握了一些特别的情报，这一计划一定会付诸实现。可是这样一个费用巨大而又冒险的事业究竟如何实现呢？葡萄牙国王已推开他不予过问了，他几乎已不可能指望从熟悉的葡萄牙船主们那里得到支援，因为他们都不敢把一支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在宫廷里混得不好的人。那么只有一条路：向西班牙求助。麦哲伦只可能从那儿得到支持，他本人只是在这个宫廷的心目中才有点分量，因为他不仅从里斯本的宫廷里随身带来了珍贵的资料，而且还向西班牙说明他的主张在道义上的正确性，这对他所计划从事

的事业不无重要意义。他的伙伴法莱罗计算过——他同样也计算错了，正如麦哲伦所错误报道的一样——香料群岛不属于葡萄牙管辖范围，而是在教皇划给西班牙的地域之内，因此香料群岛是西班牙人的财富，不属于葡萄牙王室所有。一个小小的葡萄牙船长把世界上最富饶的这些小岛和通向这些岛屿的最近的路，献给了查理五世皇帝作为见面礼，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西班牙王宫里指望得到支持。在那儿，也只有在那儿，他能从事他最伟大的事业，实现他毕生的理想，为此，他得在精神上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只要麦哲伦此刻投靠西班牙，那么他自会明白，他势必像是剥掉自己身上皮似地放弃自己骑士般高贵的葡萄牙名字麦哲哈斯，葡萄牙国王将会唾弃他，他在自己同胞们的心目中将成为千古罪人，叛逆者，投敌的无耻之徒。事实上，麦哲伦自愿放弃葡萄牙国籍，是由于他感到绝望才越过国境为外国服务的，把这事跟率领着外国船队去海上探险的哥伦布，卡伯特、卡达革斯图或是维斯普奇的行径相比较，他们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麦哲伦不只是离开了他的祖国，而且——我们不能对此不谈——他损害了祖国，故意让自己同胞所占有的香料群岛，落入葡萄牙国王最为嫉妒的竞争者手中。他的行动可谓放肆大胆至极，他这样做甚至完全背叛了爱国主义，他把航海秘密携出了国境，只因他曾获得许可进入里斯本王宫，才能掌握这些秘密。用我们当代人的话说，麦哲伦就其身份而言，他作为葡萄牙贵族，前葡萄牙船队的船长，所犯下的罪行，绝不亚于当今一名军官把总参谋部的秘密地图和动员计划转交给敌国的罪过。只有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尚能谅解他的不光彩行径，那就是他越过国境时，并非像是一个走私商那样的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地潜逃，而是光明正大，意识到等待着他的各种

各样的谩骂，堂堂皇皇地投入敌方的。

可是，这个富于创造精神的人听从于另一种更高的法律，而不只是局限于本国之内。谁要是做出一番事业，谁要是完成一个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发现和事业，那么他的真正祖国就不再只是他的祖国，而是他的事业。最终他只感到自己要负责实现他注定要完成的惟一任务。为此，他宁可不顾国家和眼前的利益，而要完成他的命运和特殊才干所赋予他的内心的义务。麦哲伦在忠诚于他的祖国工作多年之后，在生命的半路上才认识到了自己的职责。因为他的祖国拒绝了他实现自己的职责，现在他势必要使他的理想为他的新的祖国服务了。他坚决不顾自己一时的名声和他的公民荣誉，以便在自己的理想和一项不朽的事业中寻得复活和站立起来。

麦哲伦等待、忍耐和深思熟虑的时刻终于过去了。一五一七年秋天，他决定大胆付诸行动。他让一时勇气不足的伙伴法莱罗留在葡萄牙，麦哲伦跨过了他生命的鲁比肯河①，跨入了西班牙边界。一五一七年十月二十日，他带着他多年来形影不离的奴隶恩利柯，到达了塞维利亚。此时，塞维利亚虽然还不是西班牙新国王卡洛斯一世的宫邸，我们却把它称之为新旧大陆的统治者查理五世。这位十八岁的君主刚从弗兰德来到桑坦德，在去巴利亚多利德的途中，十一月中旬他想在那里建造宫殿。这当儿，麦哲伦要度过一段时光等候国王，没有任何地方比在塞

①鲁比肯河，意大利河流，跨过鲁比肯河，谓断然处置，决意冒险。当蓬彼雅斯与元老会共谋以图凯撒时，凯撒决然率兵渡此河以攻之。——译注

维利亚更好了，因为这个港口是通向新印度的门户，大多数船只都是从瓜达尔圭维尔海岸挂帆起航开往西方的。这儿商贾云集，有很多船长，经纪人和代理人，因而国王下令在这儿建立一座特别的贸易公司，称之为东印度公司。

在这家公司里聚集和保存了各种档案和公文，航海家和商人的情报资料以及各种报告。东印度公司既是商品交易所，同时又是船务经纪处。确切地说，应称之为航海商会，问讯处和咨询处。在那儿有资助探险队的实业家同希望率领探险队的船长们，在官府的监视下进行谈判。无论情况如何，凡是想挂着西班牙旗帜进行新的探险的人，首先要在东印度公司登记报名，并要获得该公司的许可和支持。

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证明他非凡的克制能力，他那善于沉默和耐心等待的性格，麦哲伦根本不急于走这必不可少的一步。麦哲伦从来不做幻想家，不做不切实际的乐观主者，不爱虚荣自我欺骗，而总是准确地谋划一切，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和现实主义者，麦哲伦总是预先深思熟虑着他的机遇，他认为现在就行事，太草率了。他知道，只有当别人伸手给他打开门闩时，他才会进入东印度公司。可是这儿又有谁认识他呢？他曾在东方航行过七年，在阿尔梅达和阿尔布开克指挥下浴血奋战过，但这一切在这大小酒馆挤满了解除职务的冒险家和亡命之徒的城里，在哥伦布、柯尔泰莱尔和卡伯特指挥下扬帆航行的船长们还活着的城市里，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他来自葡萄牙，他的国王不愿安排他做任何工作，他现在是一名流亡者，严格说，他是一名叛逃者，这同样不能给人们以好的印象。东印度公司是不可能给予他这个陌生的、无名之辈，这个外国移民以任何信任的，因此麦哲伦首先根本不会跨进公司的门坎，他的经验

够丰富了。他明白，在此时必须怎么做。他首先得像所有推荐新计划的人一样找到“联系”和“推荐”，在他跟一些有钱有权势的先生们进行谈判之前，首先他必须找到权势和金钱在他身后为他撑腰。见识远的麦哲伦在葡萄牙时就已建立了这种不可缺少的关系。无论怎么说，他立即受到迪戈·巴尔波查家族的热情接待，巴尔波查放弃葡萄牙公民权多年了，在西班牙供职已十四年之久，担任了军械库里一个重要职务。受到全城的崇敬，是圣地亚哥勋章的获得者。他对刚来到的麦哲伦来说，真是一位理想的担保人。根据一些资料介绍，巴尔波查家族与麦哲伦有血缘关系，从最初一开始就比任何亲属关系更为密切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一情况，迪戈·巴尔波查远在麦哲伦之前，曾在印度洋航行过多年。他的儿子杜亚特·巴尔波查继承了他探险的事业。他的航海足迹踏遍了印度洋、波斯和马来亚的海域，甚至还写过一本当年颇受青睐的旅行记《杜亚特·巴尔波查历险记》。这三个人很快就成了朋友。倘若这些殖民官兵们战争期间曾在同一个地区打过仗，今天会毕生之久地保持一种亲密关系的话，那么那几十位身经百战的海上老兵，经受千难万险的航行而奇迹般地活着返回家园的人，在当代会感到彼此之间又会亲密到什么程度呢！巴尔波查热情地邀请麦哲伦到他的家里住下，没有多久，他的女儿巴尔巴娜对这位三十七岁的刚毅而令人敬佩的男子产生了好感。还没到年底，麦哲伦已经称自己是市长的乘龙快婿了，这样一来，他在塞维利亚就有了依靠，站稳了脚跟。他在葡萄牙被取消了国籍，在这儿加入了西班牙国籍。从现在开始，他就不再是来历不明的人了，成了塞维利亚的居民，被人们看成是塞维利亚土生土长的了。由于巴尔波查的友谊和跟他结成的亲戚关系，再加上他妻子六十万马拉维

第① 的陪嫁费作后盾，现在他可以毫无顾虑地跨进东印度公司的大门了。

有关他在那儿的交谈以及他所受到的接待，并没留下任何可靠的材料。我们不晓得，跟鲁伊·法莱罗有过誓约的麦哲伦向委员会陈述过多少有关他的计划，这只要从跟哥伦布进行的粗略类比就可推想出，大约委员会不太友好地拒绝了他的建议，甚至对他有些讥笑。可信的是，东印度公司不愿也不能承担风险，轻易相信这个外来人要从事的事业。行家们从职业角度出发总是对那些特别的事情持以疑议。这就是这次历史上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并没得到主管当局的支持，是在没有他们参与，与他们意志相悖的情况下实现的。

东印度公司——这最重要的主管部门——没有支持麦哲伦。就连通向国王接见大厅的第一扇门都没有打开，这对麦哲伦来说，想必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日子。白白地跑到这里自荐，所作的周密思考完全违背自己意志，他那番雄辩和激情完全徒劳。任凭他怎么论证，都没能得到委员会的三位专家对他计划方案的认可。

可是在战争中经常会有这样情况，一位统帅自以为行将败北，准备撤退，打算清扫战场，这时跑来一名报喜的使者，说道：敌人撤退了，逃出战场，宣告战败了。一转眼，仅只是一转眼，秤盘从绝望的低处突然升到高处，令人欣喜。麦哲伦此时第一次经历了这一转瞬，他出人意料地接到三人委员们的一位委员的通知，尽管他不表赞同地跟他几位同事一道听取了麦

①古西班牙钱币名。

哲伦的报告，可是他本人却对麦哲伦的方案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印象。约安·达·阿朗达这位东印度公司的经理很想了解这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私下详细听取了这一大有可为的计划，他要麦哲伦跟他联系。

这对欣喜莫名的麦哲伦真乃是天赐良机，实际上这不过是人世间的一般事务罢了。对约安·达·阿朗达来说，正如当时所有的皇帝、国王、船长和商人一样（不管史书给我们年轻一代写得如何感人），这涉及到世界的发现，有关人类的幸福。使阿朗达成为这一计划的支持者，并非是什么崇高的理想或是纯洁可贵的热忱，而是这个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他作为一名职业性的商人，预感到麦哲伦的建议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业。想必有什么给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留下了印象，难道是麦哲伦明确的论证，还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葡萄牙船长的那一派刚强、稳健的举止，还是他内心所显示的自信，无论怎样，阿朗达觉察到，也许是凭着自己的理智和判断，或许是凭着他的本能直觉，他认为，通过这一伟大计划将有可能在这件事上得到很大的好处。因此作为王室官员就此公开身份，他拒绝了麦哲伦的建议，被认为对王室无利可图，但并不妨碍阿朗达以私人身份做这笔交易，正如人们使用生意场中的行话，“以个人名义”予以资助，或许通过经济资助，至少可以捞到一笔回扣。他以王室官员，宫廷身份拒绝了，但却又以私人身份暗地里使其得以实现，这一做法不能说是体面正直的吧。事实上，后来东印度公司由于财务上的参与，追究了约安·达·阿朗达的法律责任。

麦哲伦要是从道义考虑来处理这件事，那是太傻了。现在他必须抓紧时间，推进他的事业，在这样紧急情况下，他也许向约安·达·阿朗达更多地吐露了共同的秘密，远远超出了跟

鲁伊·法莱罗的誓约。毫无疑问，在他还未把金钱和他的个人影响投入到跟一个完全不相识的人的要干的这一风险很大的事业时，他需要做每一个处于同样情况下的有经验的商人所做的事。首先他要向葡萄牙打听有关麦哲伦和法莱罗的可靠程度。他秘密地找了一个非常可靠的人，他就是克里斯托夫尔·德·哈罗，这个人当时曾资助过第一批探险队去巴西南部，他对各种人和事都掌握着大量资料。他打听到的情况——再一次幸运的机遇——非常合适。麦哲伦是一个经验丰富、久经考验的航海家，法莱罗则是一个有名望的宇宙学家。

这样一来，最后一个障碍越过了。从这个时候起，东印度公司经理——他的意见对宫廷航海事务起着决定性作用——决定着麦哲伦的大业，同时也是在经营着他自己的事业。麦哲伦和法莱罗最初合股经营，现在又扩大范围，有了第三个人参与了。在这三人合作中，麦哲伦提供了他的实际经验，法莱罗有理论知识，约安·达·阿朗达提供了他的关系网作为基本资金。自从麦哲伦的理想跟他的事业联在一起，阿朗达不再放过任何可能性。他毫不犹豫写了一封长信给卡斯蒂利安的首相，信中明确地谈了这件事的重要性，举荐麦哲伦，是一个能为陛下建大业的人。并继续与王室的一个个成员疏通情况，确保麦哲伦能晋见国王。此外，还有：热心的经纪人不仅打算亲自陪同麦哲伦前往瓦利亚多里德，而且给他预支旅行费用。一夜之间，风向突变。麦哲伦眼见这一远胜他本人的大胆设想，一个月之内他在西班牙收获之多，远远超过他在自己祖国葡萄牙十年期间献身所取得的东西。现在进入王宫的大门已经打开了，他给法莱罗的信中写道，他不必担心了，尽快赶来塞维利亚吧，诸事均在顺利进行中。

人们认为，这位好样的星占学家，将会热情地欢呼此次磋商的惊人成就，满怀激情拥抱他的伙伴。可是在麦哲伦的生活中——将一直遵循着这一规律，并看到它十分有意义地相继出现——并非是没有暴风雨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法莱罗认为，由于麦哲伦富有成效的倡议（或：首创精神），他本人已退居次要地位，这好像使这位个性难以相处、脾气暴躁、十分敏感的鲁伊·法莱罗大为恼怒。可是这位对世俗一窍不通的星占学家的愤怒，猛地一下爆发出来了。因为他知道，阿朗达把麦哲伦引进宫中，并非是出于博爱，而是要赤裸裸地参与未来利润的瓜分。

现在出现了激烈的场景，法莱罗指责麦哲伦违背了诺言，未得到他的同意向第三者泄 露了秘密。因此，他大发雷霆，尽管阿朗达已经为他们预付了一切费用，他还是拒绝跟阿朗达一同去瓦利亚多里德宫廷。鉴于法莱罗愚昧固执，这一事业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这时阿朗达突然接到了宫廷的好消息：国王同意接见。围绕着回扣问题开始了两天激烈的磋商和反复讨价还价，最后在走向瓦利亚多里德门前的最后一刻，三个伙伴才有幸取得了一致意见。打猎还未开始，熊皮就分割好了，阿朗达鉴于他经纪人的作用将得到利润的八分之一（事实上，阿朗达、麦哲伦和法莱罗以后一文钱也没见到），就这八分之一的利润对聪明刚强的人所做出的贡献而言，确实不多，他明瞭现状，并善于驾驭情况：国王在运用他的巨大的权力方面还缺乏经验，所以有必要在国王面前，把王室会议的成员争取过来。

就麦哲伦的方案而言，在王室会议上一开始情况很糟。因为四名与会者中有三人，红衣主教阿德里安·冯·乌德里希、埃拉斯莫斯的朋友和未来的教皇，此外还有年迈的国王太师吉劳

迈·德·克里克斯以及首相索瓦盖，尼德兰人。他们的目光更多地注视着德国，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即将在那里获得帝王的王冠，哈布斯堡王朝将统治着世界。对这些封建贵族或书呆子式的人文主义者们来说，一个海上的方案似乎觉得太远，不切实际，这一方案的受益，可能只是对西班牙有利。而王室的那位惟一的西班牙人，他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赞助者，在航海事业上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真倒霉，他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或者说是声名狼藉红衣主教方萨加，布尔戈斯的主教。在阿朗达首次向他提到方萨加这个名字时，麦哲伦想必很惊恐，因为每一个航海家都知道，哥伦布毕生都未碰到比这个讲究实惠、惟利是图的红衣主教更令人讨厌的敌人了。红衣主教总是极其不信任地反对异想天开的方案。可是麦哲伦必须一点也不能输，他只能赢。他面对王室会议的成员们，决心非常坚定，头高高地昂起，捍卫他的设想，力争实现他的使命。有关在这次决定性会议上所发生的事，由于众说纷纭我们所得的材料很难确信。能肯定的有一点，就是这个筋骨强健，太阳晒得黝黑的人的举止谈吐，从一开始起就给人一种印象。国王的顾问们立即看出：这个葡萄牙船长不是那种胡说八道的人和空想家，像那些人自哥伦布取得成果以来，成群结队地挤破了西班牙王宫的大门，而这个人确实远征过东方，几乎不同于别人，当他谈起香料群岛，谈起它的地理位置，谈起它的气候条件和无尽的宝藏时，由于他认识瓦台马，还因为他同谢兰也是好朋友，因而他拥有的材料比西班牙档案库里的资料更为可靠。可是麦哲伦并未打出这些至关重要的王牌。他作了个暗示，把从马六甲带回的奴隶恩利柯叫到身边。国王的智囊们显得非常惊奇，用目光打量着这个面目清秀、身材匀称的马来亚人，这个种族，他们还从未见

过呢。据说，麦哲伦从苏门答腊带回了一名奴隶，他唧唧喳喳地说着一种人们不懂的语言，似乎是一只艳丽的蜂鸟，突然飞进了国王的接见大厅。最终作为最重要的证据，是麦哲伦朗读了他的朋友弗朗西斯科·谢兰，德那第的新任最高长官的一些信件，说到“那儿是一片新的土地，比瓦斯科·达·伽玛所发现的世界更辽阔更富有。”

在他引起了这些权贵们的兴趣之后，现在麦哲伦才开始谈起自己的结论和要求。正如他已说过的，这些宝贵的香料群岛，其富庶程度简直难以言表，它位于印度的东方，要像葡萄牙人那样从东面前往那里，首先要绕过非洲，接着绕过整个印度湾，再后再通过巽他海，这样就要绕一些不必要的弯路。更为稳妥的做法是由西航行，这可是至圣的教皇向西班牙人指出的方向。由于新发现的美洲新大陆像是一根巨大的横木挡住去路，因而人们会产生错觉，从南无法绕过。可是麦哲伦拥有确凿的资料，表明那里有通道，有一条海峡，他会自告奋勇地利用他和鲁伊·法莱罗所发现的秘密，为西班牙王室效劳。只有沿着他说的这条海路，西班牙才能抢在早曾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向这座宝库的葡萄牙人之前，国王陛下虽是瘦弱、苍白、噘着哈布斯堡式的下嘴唇的年轻人，人们也会俯首听命，他将是最强大的君主之一，鉴于他的疆域同时他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王侯。

可是，也许——麦哲伦又插话——国王陛下会想到，派遣一支探险队去摩鹿加群岛，这是入侵教皇在分配时划给葡萄牙人的这一领域。这一担心现已成为多余的了，因为他精确了解该岛的方位，和鲁伊·法莱罗的计算，麦哲伦已证实，这些宝岛无疑位于教皇划归西班牙人的那个地区之内，要是看不到自己毫无疑问的优先权而久久地等待着，直到葡萄牙人在西班牙

国王的统治领域内确立自己的统治，到了这个地步，那就是西班牙人的失误了。

麦哲伦中断了谈话。现在这个报告由实际转入理论探讨，要根据子午线和地图来证明，这片地域都是西班牙王室的领地，这时麦哲伦退到一旁，让他的伙伴鲁伊·法莱罗作宇宙学的论证。法莱罗拿来一个巨大的地球仪。根据他的论证，人们明确地断定，香料群岛位于教皇划分的界线那边的另一个半球上，因此它位于西班牙的领土范围之内，同时他伸出手指，指出麦哲伦和他本人所要走的路线。尽管鲁伊·法莱罗所计算的经纬度，后来证实完全不符合实际，因为这位书斋里的地理学家对尚未发现和尚未横渡过的太平洋的宽度的确定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直到二十年后，人们才弄清，他的一切结论都是错的，香料群岛不在西班牙管辖范围之内，而是属于葡萄牙所有。凡是这位激动的天文学家用手势指指点点的所有一切，全都计算错了。可是各阶层所有的人都高高兴兴地认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因为这位知识渊博的宇宙学家断定：香料群岛属西班牙所有，这样一来，西班牙国王的智囊们就没有兴致去推翻他那讨人欢喜的结论。的确如此，当他们中有几个人好奇地要在地球仪上寻找那个久所向往的通过美洲航行的海上通道，就是麦哲伦海峡所在的地方时，法莱罗解释道，他之所以没有标出，是因为他有意不标明这个海上通道的位置，以免这一伟大秘密，在最后一刻会被别人发现。

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听了报告，也许若无其事，也许已有某种兴趣。可是现在却发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人文主义者和学者对确定地球规模，否定目前所用的地图集的环球航行都不感兴趣，而恰恰是布尔戈斯的主教，这个害怕所有航海家的

怀疑派人物对此颇为热衷，他声称要支持麦哲伦。也许他暗自意识到，他对世界历史所犯下的罪过，迫害过哥伦布，现在他不愿第二次作为任何伟大思想的敌人而受到人们的中伤，也许是他同麦哲伦的长时间的谈话说服了他，无论如何，是因为他的赞许才通过了这个决定。这个计划原则上被批准了，麦哲伦和法莱罗接到官方的指示，要他们把自己的要求和建议写成书面材料递交国王陛下的顾问。

随着这次接见，他们获得了一切。谁要想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一旦一个人得到了幸福，幸福就会不断地来到。这短短几个星期给麦哲伦带来的东西远比过去许多年的要多。他找到了热爱他的妻子，找到了帮助他的一些朋友，找到了跟他志同道合的支持者，找到了一位信赖他的国王。此刻正当赌得兴起的时候，又一张重要王牌落入他的手中。意料不到这些日子在塞维利亚那位远近闻名的船主克里斯托夫尔·德·阿罗出现了，他是佛兰德的富有的大投机商，他跟当时整个国际大资本家维塞尔家族，福格尔家族以及威尼斯人手拉手地合作着，他自己花钱装备过许多探险队。迄今他在里斯本都设有总办事处。可是曼努埃尔国王却由于吝啬和忘恩负义而使他不快，因此凡是令曼努埃尔国王恼火的事，他却感到适意。他认识麦哲伦，并且信任他，因为从商业角度看，他认为这事大有可为，所以他向麦哲伦保证，只要西班牙宫廷和东印度公司不愿投资必要的钱，他准备跟他的商界朋友们合伙装备麦哲伦所要求建立的舰队。

由于这一意想不到的建议，麦哲伦这一下有两条途径可以达到目的。当他叩击东印度公司大门时，他是来恳求能给他一

支舰队，在国王接见之后，人们试图对他的要求进行挑剔，降低他的要求。可是现在，麦哲伦口袋里揣着克里斯托夫尔·德·阿罗的建议，能够以资本家自愿效劳的身份出现了。倘若王室不愿担当风险，他可骄傲地宣称，这绝不会影响他的计划，因为他不再需要钱，无任何要求，只求能荣幸地挂着西班牙国旗去航行。为了这荣誉，他愿落落大方地向西班牙国王提供五分之一的利润。

这一新的建议使西班牙国王不用担当任何风险，可说非常有利，然而王室会议却十分荒谬或许是出于正确论证的结果，做出决定，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倘若——西班牙既然如此权衡——一个像克里斯托夫尔·德·阿罗如此老奸巨滑的商人打算把钱投入一项事业，那么这想必是一件特别有利可图的事。因此，最好由国王金库资助这一方案，以保证获得大笔利润并享有荣誉。经过短暂的讨价还价以后，麦哲伦和鲁伊·法莱罗的全部要求终于被接受了，西班牙各个主管机构现在以一种显然不同于西班牙国家首相府的速度连忙办妥了这件事。一五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查理五世以他的发疯的母亲尤安娜的名义，并亲手庄严地用国王的名字跟麦哲伦和鲁伊·法莱罗一同签署了这一双边有效合同。

这个烦琐的文件是这样开始的："因为斐尔劳·德·麦加海斯出生于葡萄牙王国的贵族和贵族鲁伊·法莱罗同样出生于葡萄牙王国，打算在属于我们王国的那部分海域里，为我们竭诚效力，我们命令，同你们为此目的而缔结如下协定。"

接着下面是一系列具体条款。第一条规定麦哲伦和法莱罗在那些未经考察过的海域里有优先权和独家经营权。该协定用

的是皇家办公厅的隐晦的文体逐字逐句地写着："你们应当顺利地着手工作，以便在分配给我们的范围之内发现那一部分海洋，在你们前往那里时，其他的人如果同时从事同一样事情，损害你们，那是不公正的，由于你们不怕辛劳，承担此事，我出于仁慈和意愿，我应允：在最初十年，不允许任何人在你们计划所走的同一条路上航行，从事发现工作。假如有人要想从事这一航行，请求我们允准，我们会在批准别人之前将此事通知你们，以便你们在同一时间内，用如同其他想作这样发现的同样装备和同样多的船只，能够独自去作这样的发现。"在下列几个财经条款上，"顾及到麦哲伦和法莱罗的善良愿望和所做出的贡献"，宣布将他们新发现的土地上的所有收入的二十分之一，给予麦哲伦和法莱罗，倘若能发现四个以上的新的岛屿的话，他们有特权拥有其中的两个。此外，还像哥伦布所签署的条约一样，授予他们以所有土地岛屿的总督的称号，并可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一个皇家的海外代理人，财务主管，军需主任，他们只负责船上的财务结算，绝对无权限制船长的行动自由。接着，国王命令要装备具有一定吨位的五艘船只，配备好人员、食品和大炮，够用两年，并用如下庄严的字句结束了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件："我将对这一切承诺，我以我的荣誉和国王的誓言保证：我命令，要认真遵守上述各项条款，为此目的，特制定此协定，并以我的名义签署。"

可是这还不够，还明确规定，西班牙各级官员，从上到下，均需通晓此协定，以便他们在所有各项事务中协助麦哲伦和法莱罗，并将这一命令通知"赫尔南多王殿下、王室会议、王室和内阁各部诸位亲王、主教、公爵、伯爵、大臣、天主教骑士团团长、团员、法官和警官，以及我们属下的各王国和领地上

全体顾问、总督及各级官员，议会议员及各地城乡的司法和民事机构的所有人员”，通知发到各阶层、各级官员、上至王储、下至每一个普通士兵。明确宣称：从这一时刻起，整个西班牙王国都要为两个不知名的葡萄牙流亡者效劳。

麦哲伦在最大胆的梦中也不敢有更多的期待了。可是一件更重大的奇迹和更重要的事发生了：查理五世青年时代禀性就犹豫拘谨，现在却是这新的阿哥海上航行最性急最热情的支持者。这是麦哲伦男子汉的刚毅性格或大胆的事业本身有一些东西非比寻常地激起了这位年轻的君主的热情。他本人比大家都更渴望着装备船只，出海航行。他让人们一周又一周地向他报告工作进展情况，不管在哪儿出现阻力，麦哲伦都应向他求助，国王就会写信制止任何相反的意见。在他长期执政过程中，这是惟一的一次了。这位一向犹豫不决，易受别人影响的君主以始终不渝的忠诚，服务于一个伟大的思想。有了这样一个君主的支持，有这样一个国家由他支配，麦哲伦本人觉得这梦幻般的飞越简直是奇妙极了。这飞越使他这个无国籍的、失业、受人鄙视的人一夜之间成了一支舰队的总船长。成了圣地亚哥勋章的获得者，成为未来发现的各个岛屿和土地的总督，成为生与死的主宰者，主宰着整个舰队，归根结底，第一次成为他自己道路的主宰者。

魏家国 译

坚强意志战胜千重障碍

1518年3月22日—1519年8月10日

谈起伟大的业绩，一般说人们最爱放眼于英雄们的戏剧性、富于诗情画意的瞬间：恺撒横渡鲁比肯河，拿破仑站立在阿克勒桥上。可是那些酝酿着创造性的岁月，那具有历史意义事业的精神上坚韧不拔的创造性功绩，却往往不受人们重视。对于画家和诗人具有诱惑力的，是描写他们胜利的时刻，这对麦哲伦来说，是他沿着自己开辟的水路航行的时刻。事实上，他那无比的坚强毅力也许已表明了他的伟大，他迫切需要弄到船只，建立舰队，战胜千重障碍。这个以前的无名小卒突然面临着一项伟大任务。因为这个在组织工作方面尚无经验的人必须要完成一些完全崭新的没有先例的事业。要装备一支拥有五艘船只的舰队，进行史无前例的航行，以往的一切规模全不适用。在

麦哲伦进行探险时，没有人能给他出谋献策，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无人涉足的地带，那无人航行过的海域，可是他却要第一个大胆闯进去。没有人能约略地告诉他，环游这无人测量过的地球要多久时间，这条无人踏过的路将把他引入哪些国度，什么样的气候和哪些民族。同时必须装备一支舰队能对付各种可以想到的可能性，例如：北极的严寒和热带的酷暑、风暴和风平浪静、一年、也许是二年或三年的海上生涯、战争和贸易。他必须独自一人估计到这一切难以预料到的事项，还要战胜各种意料不到的障碍。这一任务只是向制定计划的人展示了它的艰巨性，只有在这时，最终才能看到这个长期不为人所注目的人的内在伟大。他的世界荣誉的竞争者哥伦布，这位海上的“堂·吉诃德”，这位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天才幻想家宁肯把一些必须要办的准备性事务交给宾村和其他水手。麦哲伦所表现的——同拿破仑一样——在总的计划方面非常大胆，但对每一个细节的周密考虑和审查却又非常精确，十分认真。天才的幻想和天生的准确性在他身上融为一体，正如拿破仑在他闪电般快速翻越阿尔卑斯山以前的许多星期必须预先估计到，为确定进攻的那一天，在进攻的某一个地点要准备多少磅炸药，多少袋燕麦，这个宇宙的征服者在装备他的船队时，必须进行深思熟虑，防止可能出现的匮乏和困难。一个人面临的任务是如此巨大，在进行如此巨大的事业中要克服数以百计的障碍，在理想变成现实的时刻，出现这些障碍是不可避免的。仅只建造船只就需奋战数月。查理皇帝虽然承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命令所有官员提供各方面的支援，可是在一个命令，甚至是皇帝的命令与命令执行之间，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拖延和耽搁。真正创造性的事业要付诸实现，必须有待于创造者自己去独立进行，才能真正

完成。确实如此，麦哲伦在准备进行他毕生事业时，从不把任何事情交给别人，甚至连次要的事也不轻易交给别人去做。在他跟东印度公司、跟各级官员、商人、所有供应者和手工艺人进行坚韧不拔的谈判时，他意识到对那些把生命托付给他的人应付的责任，因此他密切注意到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他检查每一件货物，检查每一项账目，亲自检查每一根缆绳，每一块舱板、每一件武器，他了解五艘船上的每一件东西，从桅杆顶端到龙骨，一切都了如指掌。正如在新建耶路撒冷墙时，人们一手拿泥镘，另一只手持着利剑，而麦哲伦在他装备这支舰队前往不知名的地方时，必须同时防备不惜任何代价要阻止他航行的那些人的嫉妒和敌对行为，因此他必须对三条战线进行英勇斗争，即对付外部敌人、国内敌人以及对付凡夫俗子任何意料不到的阻挠。可是综观所有被克服的障碍，才会看出一个事业和完成事业的人的真正和正确尺度。

对麦哲伦的第一个攻击来自葡萄牙。当然，曼努埃尔国王很快就知道签订协定的事。这个更坏的消息并没向他报道。香料垄断每年给王室金库带来二百万杜卡特。到现在他的船队才有可能到达真正的金矿井香料群岛。如果西班牙在十二小时后，从东方赶到摩鹿加群岛，赶在他们前面占领这个群岛，那会是什么样的灾难。这对葡萄牙王室金库的威胁真是太大了。因而曼努埃尔国王不得不试图采用一切手段，来阻止这样危险的探险活动。为此，他正式委托自己驻西班牙宫廷的大使阿尔瓦罗·达·科斯塔，在窝里就把布谷鸟蛋砸烂。

阿尔瓦罗·达·科斯塔全力以赴，并双管齐下。他首先找到麦哲伦，软硬兼施，同时又进行利诱和恫吓。难道麦哲伦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为外国统治者效劳，将在上帝和他本国的国

王面前犯下什么样的罪过，他难道不知道，他的国王堂·曼努埃尔正要跟查理五世的妹妹莱奥诺娜结婚，倘若曼努埃尔国王现在受到损害，这件婚事必将告吹，这件事难道不会更理智、更正直、更干净利索地处理，重新为自己国王效劳？他的国王一定会在里斯本慷慨地给予重赏的。可是麦哲伦十分明白，他自己的国王并不怎么喜欢他，他有理由猜想，当他回国后，在那里等待他的，也许不是装满黄金的，鼓胀胀的口袋，而是锋利的匕首对他袭击，他非常遗憾地说道，为时太晚了。他已经向西班牙国王许诺，他得履行自己的诺言。

小人物麦哲伦，外交棋盘上的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卒子，人们无法把他吃掉。现在阿尔瓦罗·达·科斯塔大胆地给国王将了一军。他强烈地纠缠着这位年轻的君主，有他给曼努埃尔国王的亲笔信为证：“有关斐迪南·麦哲伦的事，只有上帝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心血。我向国王认真地谈过这件事……我曾向他指出，倘若一位国王违反另一位友好国王明确表示的愿望，而任用他的子民，这是多么丑恶和非比寻常的事情……我请求国王注意，现在不是伤害陛下感情的时候，更何况是为一件靠不住的如此小事呢。他可以支配自己足够的下属臣民和人员，随时去从事发现，不必求助于不满意陛下的这种人的效劳。我对他进言，如果获悉：这些人请求回国，但却得不到西班牙的批准，陛下，您会感到侮辱的。最后，我请求他，为了他自身，也是为了您陛下的利益，他应在两者之间择其一——要么就批准这些人回国，要么就设法把这项探险的事推迟一年。”

这位十八岁的君主，不久前才登上宝座，还没有很多经验处理外交事务。他听了阿尔瓦罗的无耻谎言，说麦哲伦和法莱罗想回到葡萄牙，只因西班牙宫廷阻挠才未成行，因此，他无

法完全掩饰自己的惊讶。达·科斯塔报道说："他是那么惊讶，以致使他目瞪口呆了。"葡萄牙使臣的另一份建议是，把探险推迟一年，从中他立即看出了所露出的马脚。因为葡萄牙正需要这一年时间，好使一支自己的船队在这期间赶在西班牙的前面，到达香料群岛。对此，这位年轻的国王冷漠地拒绝了，这位大使最好是去跟红衣主教阿德里安·冯·乌德里希商谈。红衣主教又把此事交给王室会议，王室会议又让他去找布尔戈斯主教。就是使用这种拖延的手法，一直在彬彬有礼的保证之下，说他的表兄查理不会想到，有丝毫为难这位曼努埃尔国王之意，葡萄牙的外交抗议无人察觉被悄悄放到公文卷宗去了。阿尔瓦罗·达·科斯塔的任何目的都未达到，葡萄牙的嫉妒反而干预，甚至料想不到地促进了麦哲伦的事业。世界上两大君主的喜怒无常的脾气，在昨天还不为人知的菲达戈的命运中，奇怪地冲撞起来。一旦查理国王把一支船队托付给了麦哲伦，这位从前的小军官才会变成曼努埃尔国王心目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另一方面：自从曼努埃尔国王不惜任何代价要把麦哲伦收买回来，查理国王就更加不会把麦哲伦出卖给他。现在西班牙人越是试图更快地加速起航，葡萄牙人便越是变本加厉地试图阻挠。

里斯本把进一步秘密破坏船队的主要工作交给了塞维利亚的葡萄牙领事塞巴蒂斯昂·阿尔瓦尼茨。这个有官衔的间谍经常在船队四周转悠。他估算着运送到船上的各种物资。此外，他同港口内的西班牙船长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友好关系，并且似乎愤怒地查问，卡斯蒂利安的贵族是否果真要听命服从这两个脱离祖国的葡萄牙冒险家。据经验知道，民族主义是一根即使最笨拙的手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一拨即响的琴弦。不久，所有塞

维利亚的海员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谩骂：怎么啦？没有为西班牙效劳，没有进行过一次航行，只凭吹牛说大话，人们就相信这两个葡萄牙逃亡者，把一支船队交给他们，并立即委任他们为海军上将和圣地亚哥勋章的获得者？可是阿尔瓦尼茨需要的不只是船长们餐桌上和小酒馆里的抱怨和牢骚，他还需要一场真正的骚乱，能使麦哲伦失去舰队的指挥权，最好是丧失生命。说实话，这个狡猾的挑拨者非常高明地导演了这样一场骚动。

在各国港口里，都会有无数不知如何消磨时光的懒懒散散的游手好闲的家伙，在十月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麦哲伦的旗舰“特立尼达号”正系在岸旁整修船体，走拢来一群游手好闲的家伙。他们把手插在衣袋里，口里好像嚼着西印度新到的烟叶，这帮塞维利亚人看着这些好样的技工们熟练地在用锤子和软木塞，沥青和麻丝填塞船体的所有缝隙。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一个人指着“特立尼达号”的船桅愤怒地说道：“多么无耻啊！麦哲伦不知来自何方？他竟然在西班牙王国的塞维利亚港口，在一艘西班牙船上大胆地升起葡萄牙的旗帜！一个安达鲁西人是不能容忍这样挑战的。”在最初的忙乱中，这些谈吐激昂的家伙并没发现，这个有损民族荣誉的、如此义愤填膺的、热烈的爱国主义者根本不是西班牙人，而是这儿葡萄牙王国领事馆的领事。塞隆尔·塞巴斯蒂昂·阿尔瓦尼茨在扮演挑拨者的角色，不分青红皂白，他们大声地叫嚷起来，他们一听到叫嚷，其他好奇的人就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只要有一个人开腔，大伙就不需多问，随便就把外国旗帜扯下来，接着就有一伙人冲到船上。

麦哲伦从凌晨三点起，一直在船上监督技工们工作，他现在要赶去向随人群匆忙赶来的市长解释这一误会。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船桅上没有升起西班牙国旗，恰好今天把国旗取下

来翻新。船桅上的另一面旗也绝不是葡萄牙王国的国旗，而是他本人的海军上将旗，他有责任把它挂在自己的旗舰上。在麦哲伦彬彬有礼，非常周到地说清了这一误会之后，他请求市长凭着他的威望，把这些胡闹的人群从甲板上撵出去。

可是，煽动群众显然比平息人群的骚动要容易得多。乌合之众要起哄，市长竟站到他们一边。首先要把那面外国旗扯下来，否则他们有理由自己动手！东印度公司的高级官员马蒂恩索博士试图居间调停，但却枉然。那位市长在这当儿找到了爱国援军，港口警备司令率领着一大队警察来到面前，他指责麦哲伦有意冒犯，有辱西班牙王权，命令他的警察，将这名葡萄牙船长逮捕，声称他竟然在西班牙港口升起葡萄牙王国的旗帜。

现在马蒂恩索激烈反对。他警告港口警备司令，要逮捕国王亲笔写信并加盖王玺任命的一位船长，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事，要知道，他是一名王国官员了。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引火烧身。可是已经太晚了！麦哲伦的海员们和港口群众已相互争吵和扭打起来了。剑拔弩张，只是麦哲伦沉着镇定才防止了挑拨者蓄意安排的骚动。好吧，麦哲伦已作好准备，降下这面旗帜，甚至离开这只船，让这些愚昧无知的家伙为所欲为地去糟踏国王的财富吧。当然国王的港口官员必须要承担这一损失的责任。这时，激动的市长也感到不妙，这批在国家荣誉上受到侮辱的家伙便叽叽喳喳地散去了。不多几天之后，他们就尝到鞭打的滋味，因为麦哲伦即刻给国王写信告状，国王陛下的人格受到了侮辱，查理五世毫不犹豫站到他的海军上将一边，惩罚港口官员。阿尔瓦尼茨高兴得太早了。工作毫无阻碍地继续进展着。

这一可耻的阴险袭击被麦哲伦的镇静挫败了，可是这样复

杂的大事往往一处缝合好了，另一个地方又会裂开。每天都会有新的令人讨厌的事发生。最初，东印度公司消极对抗，皇帝亲手签署的命令响彻耳边之后，官员们才不再装聋作哑。可是在警备当中，司库又宣布，东印度公司没钱了，似乎整个事业由于无钱要无限期拖延下去。可是麦哲伦那倔犟的意志，善于克服这一障碍。他说服了宫廷，接受一批有支付能力的市民参与其事。这支无敌舰队共需八百万马拉维第，匆忙中一个临时筹建的财团克里斯托夫尔·达·阿罗立即送来了二百万。为此，他获得了优先权，以同等的份额参加了今后的探险活动。

资金问题已安排妥当，现在才能着手使船只适应远洋航行，给船只提供各种必需物资。国王按照合同提供的五艘大帆船，首次在塞维利亚港出现时，并不那么威严。密探阿尔瓦尼茨当时得意地向葡萄牙报告时说："这五艘船很陈旧，只好修修补补。我要是乘这样的船，哪怕只是到加那利群岛去，我也会感到害怕的，因为船的横梁软得像黄油。"可是麦哲伦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印度洋水手，他懂得，骑在老马身上有时会比骑着马驹更安全。精心的修理会使陈旧的、航行过的船只又可以动将起来，麦哲伦抓紧时间，工人们按他的吩咐，日日夜夜在翻新整治旧船，这时，他已经在招募一批有航海经验的海员了。

可是幕后又隐藏着新的困难，尽管宣传人员敲着鼓穿过塞维利亚各条大街喊叫，人们甚至把招募的人送到卡迪斯和帕罗斯，所需的二百五十名海员也没有招满。到处都在窃窃私语，这次航行一切都很可疑，因为招募人并没清楚地说出，究竟要航行到何处，船上带了整整两年的粮食，这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这都使人们猜疑。因此最终被招募来的人都衣衫褴褛，完全不像一个真正的船员。人们在这支由各个种族和民族组成的杂七杂

八的队伍中，势必会想到福尔斯泰夫① 的新兵：西班牙人、黑人、巴斯克人、葡萄牙人、德国人、英国人、塞浦路斯人、科孚岛人和意大利人，可是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只要他们能捞到钱，有希望获得大笔利润，他们就会把生命出卖给魔鬼，自愿或是并非心甘情愿地准备着向北向南，向东或向西航行。

侥幸，现在人员几乎刚刚招募起来，可是出现了新的难题。东印度公司对麦哲伦招募的人员提出抗议，它认为，他招到西班牙舰队来的人员中，葡萄牙人占的比例太多了，因此，它不会付给这些外来人马拉维第的报酬。可是麦哲伦是根据国王所授予的无限权力，随意挑选这些人的。他坚持自己的权力，又给国王写了信，再次请求帮助！可是这一次麦哲伦感到棘手了。据说，为了不得罪曼努埃尔国王，实际上是出于猜疑，麦哲伦跟葡萄牙人在一起，会搞独立，因此查理五世命令，船上总共只允许留下五名葡萄牙人。难题不断出现：为了节约，在其他省份甚至在德国订购的货物都没有及时到达。接着有一名西班牙船长起来反对海军上将，在海员面前侮辱麦哲伦，他只好再次向王室求助，让国王来排忧解难。每一天都有人吵闹纠缠。为了一点点小事都得向有关部门及国王写信，寻求解决办法。公文一份接着一份。有好几十次出现这样情况，好似整个舰队没有离开过塞维利亚港口就已遭到失败。

麦哲伦由于自己的坚韧和警觉一再克服了一切障碍。曼努埃尔励力的大使诚惶诚恐地承认，他要破坏探险的一切花招，都因麦哲伦的坚韧不拔、沉着镇定的针锋相对而趋于失败。五艘船装配一新，几乎装满了货物，正待命出航，看来已不可能再

①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他的特点是：肥胖、机智、爱吹牛。

继续给麦哲伦制造麻烦了。可是阿尔瓦尼茨的箭袋里还隐藏着一枝毒箭。他阴险地拉起弓，要把毒箭射向麦哲伦最致命的地方。这个密探向他的委托人曼努埃尔国王写信说："由于我认为，现在该是说出陛下委托我办的事的时候了。我前往麦哲伦家找他。我发现他正在忙乎着，把食品和其他东西往筐子和箱子里装，由此我推断，他是坚决要实现他的恶毒意图了，我意识到，这也许是我跟他进行最后一次谈话了，我再一次劝说他，我作为一个善良的葡萄牙人和他的朋友，曾经试图阻止他犯那有意要犯的大错。我向他阐述，他面前的道路千难万险，正如圣·卡塔琳娜的车轮①，他最明智的做法，是回到他的故乡，回到陛下您的恩惠中去，他会得到陛下的宽容……他应该明白，本城所有的卡斯蒂利亚人都会谈起，他是一个出身微贱，没有教养的人……只要他跟国王陛下的国家对立，人们都会蔑视他，把他看作一名叛徒。"

可是所有这一切威胁并没丝毫动摇麦哲伦的情绪。阿尔瓦尼茨现在装出一副友好的面孔，可是他所说的一切并不新鲜。没有人比他更知道，塞维利亚、西班牙对他怀有敌意，贵族的卡斯蒂利亚的船长们对他咬着格格作响的牙齿，但都服从这位海军上将。这就让塞维利亚的市长先生们去恨他，让嫉妒者去窃窃私语，让贵族血统的人们去抱怨吧！现在这支舰队已准备出海了，任何皇帝、国王都不再能妨碍和阻止他了。他可说是生活在海上。他将是生与死的主宰，自己道路的主人，实现自己目标的主宰者，他不为任何人服务，只是为自己的使命而献身。

可是阿尔瓦尼茨还有最后一张长期精心保存下来的王牌没

①圣·卡塔琳娜曾被绑在装满铁钉的车轮上。

有打出。现在他把它打出来了。他虚伪、故作殷勤地作为一名朋友奉劝麦哲伦。他“真诚”地警告他，不要太相信红衣主教的甜言蜜语，甚至不要去相信西班牙国王的各项许诺。当然，西班牙国王授予了他和法莱罗为这支舰队的海军上将，似乎给予他以无限的指挥权。可是麦哲伦能否肯定，国王不会暗中给其他的人发出指示，秘密地限制他的权力呢？但愿麦哲伦不要欺骗自己，首先是不要被人欺骗。尽管他有信件和印章，此事看起来，他的指挥权还是相当不可靠的。对国王一同派来的监视官员——无权向麦哲伦透露更多情况——还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指示，麦哲伦得悉这些情况时，要挽救他的荣誉已为时太晚了。

“挽救荣誉已为时太晚了。”麦哲伦不由自主地暴跳起来。这位一向善于坚定地克制任何激动情绪的、坚定不移的人，由于这一姿态而泄露了真情，这箭正射中了他最敏感的地方，射手可以自豪地说：“我了解这么多，他当时非常惊讶。”可是创造者总是最了解创作隐藏的毛病及其内在的危险。阿尔瓦尼茨向他所暗示的，麦哲伦早就明白了。长期以来，他发现西班牙宫廷在态度上的两面性。各种各样的迹象使他害怕，人们并没跟他玩一场光明正大的游戏。皇帝不准他招募五名以上的葡萄牙船员，皇帝这样做，难道不是违反了合同上的条文吗？宫廷里人们果真以为，他是葡萄牙的一名秘密代理人？人们强加给他的监察员、财会、司库，果真都只是审计官员？他们最终果真给派来秘密监视他，也许是要从他的手里夺取指挥权？麦哲伦早就感到背后有这样一阵仇恨和背叛的冷风——这是有某种可能的，对此他无法否认，它存在于这个消息灵通的特务的阴险的秘密报告中。他虽然对此次航行考虑得很精细，可是面对这一危险却手无寸铁，这个危险他没有估计到，就像所有不知道

的事情一样。一个人单独跟一个陌生的人坐在牌桌上，在他玩牌之前，由于怀疑他们都是作弊玩牌的家伙，大伙串通一气对付他，因而他给弄得不知所措，心情很不愉快。

此刻，麦哲伦所体验到的，是科利奥兰的悲剧，科利奥兰由于名誉受损而成了背叛者，正如莎士比亚创作了这个悲剧。科利奥兰像麦哲伦一样是个男子汉，一名爱国者，他多年之久为祖国效劳，但却被祖国不公正地抛弃了。为了这一不公正的做法，他把自己尚未耗尽的精力献给了敌人。可是不论在罗马，还是在塞维利亚，最纯洁的思想也帮忙不了背叛者。怀疑像影子一样跟随他。谁离开了一面旗帜，就会背叛第二面旗帜。谁要是背叛了一位国王，他就会对另一位国王不忠。背叛者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他都得完蛋。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对他恨之入骨。他在哪儿都是孤身一人，他反对所有的人。悲剧的主人公了解自己的悲惨处境时，只有这时悲剧才会真正开始。也许在这一秒麦哲伦首次预感到一切灾难。

可是，英雄就意味着，要跟强大的命运作斗争。麦哲伦坚决推开了魔鬼。不，尽管西班牙人对他的效力没有表示谢意，他也不会跟曼努埃尔国王达成协议。他是一位正直的人，忠于自己的誓言，忠于职守，忠于查理五世。阿尔瓦尼茨理应灰溜溜地、情绪沮丧地回去了，他看到，只有死亡才能摧毁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意志，因此他在结束给里斯本写报告时，末尾用的是这样虔诚的愿望：“愿万能的上帝保佑他们航行，就像科尔特尼亚尔兄弟航行一样。”——这就是说，麦哲伦和他的舰队会无影无踪地消逝在无人知晓的海洋里，就像勇敢的科尔特尼亚尔兄弟一样，他们葬身之处成了永恒的秘密，假如他的这一虔诚愿望实现了的话，假如麦哲伦果真在此次航行中毁灭的话，那

么，“国王陛下，您就不用有什么担忧了，您将永远受到世上所有君侯的羡慕。”

阴险毒辣警告者的箭没有把麦哲伦射倒，也没有让麦哲伦面对自己的任务而退怯，可是那箭上的毒药，那怀疑的火辣辣的毒药从现在起将毒害着麦哲伦的心灵。从这一刻起，孤独的麦哲伦知道他随时在自己的船上都会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然而这种不安定的感觉绝不会使麦哲伦的意志衰退，相反，倒是更加锻炼了他的意志，要做出一个新的决定。谁看到暴风雨来了，他就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拯救船和人，船长要无比坚强地把握好舵，首先最重要的，是由他一个人掌握好舵。

要排除一切妨碍他自由意志的事情！他挥动着拳头和胳膊，推开所有挡路的人！恰恰在他感到自己背后有这些监察员和司库，麦哲伦便坚决要做到完全独立自主，毫无顾忌。他知道，在关键时刻只能由一个意志去指挥和做出决定：一个舰队的指挥权不能由两个海军上将去分担。一个人必须凌驾于所有的人之上，必要时要反对所有的人。因此，他不愿在充满着危险的航行中，受到鲁伊·法莱罗，如此歇斯底里的、爱吵架的同级指挥官的拖累——在舰队尚未出港时，这个累赘必须从船上扔掉！这个天文学家早就成为麦哲伦的多余负担了。在那艰辛的几个月里，这位理论家什么也没有做过，因为招募水手，整修船只，采购食品，试验火枪、起草规章条例，这一切都不是星占学家的事。带上他，意味着在自己脖子系上了一块石头，麦哲伦需要放开手脚，左右自如行动，要对付面临的各种危险和隐藏在他背后的阴谋诡计。

人们并不知道，麦哲伦最后是如何施展他的外交拳术，摆

脱了法莱罗，据说，法莱罗自己观察星象，发觉他不会从这次航行中活着返回，因此，他自愿退出了此次航行。从表面看，这人彬彬有礼地给打发走了，婉转地说，他甚至给提升了。皇帝下了一道圣旨，任命法莱罗做第二舰队的惟一指挥官（这支舰队还只是纸面上的风帆和船板）。为此，法莱罗要把自己的海图和天文图表交给麦哲伦。就这样，他战胜了成百个困难中的最后一个困难。麦哲伦的事业重又成了一开始时的样子了：成了他的理想，成了他切身的事业了。现在所有的事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了，重担和辛劳，汇报和风险，创造性个性的最大精神享受都由他一人去承担，只有他本人去负责，完成自己所选定的毕生事业。

魏家国 译

起航

1519年9月20日

一五一九年八月十日，在新旧大陆的未来统治者查理签订合同一年零五个月之后，这五艘船终于离开塞维利亚港口的泊地，沿河顺流而下，行到桑卢卡·德·巴拉梅达，瓜达克维尔河在这儿流入公海。舰队在这里作最后一次检验和装载最后一批粮食。告别仪式原本已进行过了。可是麦哲伦在圣·玛利亚·德·拉·维多利亚教堂里，面对聚集的全体船员和满怀崇敬之情来观看这个场面的人群，仍然双膝跪在地上，发誓效忠，然后从圣科·马丁尼茨·德·拉瓦总督手中接过国王的旗帜。此时，他也许想到了，他第一次的印度之行前，同样跪在一座大教堂里，宣誓效忠。当时是另一面旗帜，他发誓效忠的是葡萄牙旗帜，是另一位国王，是葡萄牙的曼努埃尔国王，他当时

要为之流血的不是西班牙的卡洛斯，当时这位年轻人抬头望着阿尔梅达海军上将，这时他正把丝绸制成的旗帜展开，举到那些下跪的人的头顶上，二百六十五名船员现在正同样十分崇敬地看着他们命运的主宰者和支配者麦哲伦。

在梅迪拉·西杜尼亚公爵的宫殿对面的桑卢卡的港口里，麦哲伦在他起航出海、去那无从分晓的神秘远方之前，进行最后一次察看。他怀着谨慎小心、心神不安的爱护之心，就像一名艺术家在调试自己的琴弦，出发前再一次检查自己的舰队。他虽然非常了解这艘船，就像了解自己的身体一样。啊，当他首次看到匆忙中买来的船只，陈旧、破烂，一派难看的样子，当时麦哲伦简直给吓坏了！可是从那以后工作就做得很好，每一艘破旧的大帆船都翻修一新，腐烂的横梁换上了新的，从龙骨和桅杆顶端都涂上了柏油，打上了蜡，填补了缝隙，擦洗得干干净净。麦哲伦亲手敲一敲每一块船板，检查一下这些木材有无腐烂，有没有虫蛀，他还检查了每一根缆绳，每一颗螺丝，每一枚铁钉。用刚刚印染的结实的亚麻布做的风帆，上面印着西班牙的保护神圣地亚哥的十字架，编织品焕然一新，金属部分擦得雪亮，每一件东西都整理得有条不紊，清理得干干净净，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任何特务和嫉妒者现在都不再敢来嘲笑这些全都焕然一新，恢复青春的船只了。的确，尽管这些船航行得不快，不适宜于划船比赛，因为这些船大腹便便，船体圆滚，可是船体结实宽大，吃水量大，载运量多，在远海航行中安全可靠。正因为它们笨重，据大伙的预见，它们能经受得住最强烈的风暴。在这些集拢的船队中，最大的船是“圣安东尼奥号”，载重量一百二十吨，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麦哲伦把这艘大船交给约安·德·卡塔盖纳指挥，他自己指挥“特立尼达

号”，尽管它要少十吨，但却作为旗舰。接着它们的大小次序是九十吨的“康塞普西翁号”，由加斯帕尔·凯撒达指挥，“维多利亚号”（它将因用这一名字而感到光荣）八十五吨，由路多斯·德·门杜萨掌管，“圣地亚哥号”七十五吨，船长是若奥·谢兰。麦哲伦强调这支舰队是由不同船只构成，他需要用吃水量小的小船去进行先头侦察，可是另一方面又要求船员需具备高超的航行技术，维持一支由不同类型的船只组成的船队，在大海上以密集队形持续前进。

麦哲伦从这条船走到那条船，主要是检查装载的物资。他不计其数次地从舷梯上爬上爬下，反复多次编制物品清单，据保存的档案文献资料，我们今天可以断定，他工作非常仔细认真，对世界历史上的这一神奇的探险活动，他作了最细致的思考和反复推敲。在这厚厚的记录本里，连半个马拉维第价值的东西都登记在册，如每把锤子、每根缆绳、每一小袋食盐、每一令纸价值多少。由任何一只无关紧要的手写下的这些枯燥而准确无误的一行行数字，也许比所有过分慷慨激昂的话语，都更加雄辩地说明了这个人的绝顶细心和非凡的耐心。麦哲伦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海员，他知道前往完全不熟悉的境地的责任重大。他明白，如果在起航时由于轻率或考虑不周，哪怕是忘记一件极小的东西，对整个航程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就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任何疏忽和粗心大意都会造成无法弥补、无法代替的结果。一颗钉子、一团麻絮、一块铅、一滴油、一张纸在他前往的那些无人知晓的地区，都是花多大一笔钱，甚至用自己的鲜血都无法买到的珍贵东西。忘记带任何一个配件都会使船运行不得，任何一个错误的考虑都会使整个事业毁灭。

因此，要最后一次极其严格认真地检查食品。在这次航行中，无法约略估计航行的期限，二百六十五名海员需要储备多少食品？这是最难计算的一件事，因为这个因素——航行期限——很难分晓。只有麦哲伦一个人意识到——出于小心谨慎这件事可不能告诉海员们——，也许要经过好多月，甚至要几年之后，才能再补给充裕的粮食，因此，宁可多带也比少带为好，考虑到船舱的容量不大，但现有储备数量的确已相当可观了。船上的面包干是主要食品，麦哲伦在船上储备的计达两万一千三百八十英磅，价值三十七万二千五百一十马拉维第，据人们预计，这一巨大的储备足够用上两年。看了麦哲伦的食物清单，人们会想到一艘载重两万吨的现代化远洋轮船，而不是载重五六百吨的五艘捕鱼帆船，所有东西都堆集在狭小、不通风的船舱里！一袋袋面粉，大豆和小扁豆，大米和豆荚旁边还贮存着五千七百磅腌猪肉，两百木桶的沙丁鱼，九百八十四块圆形干酪，四百五十捆大蒜和葱；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可口的美味，例如一千五百一十二磅蜂蜜，三千二百磅玛拉加产的葡萄、葡萄干和扁桃干，大量的食糖、醋和芥末，最近人们还牵来了七头奶牛（这些听话的四条腿动物尽管活不了多久），这样，可以保证最初一段时间给大家提供新鲜牛奶，稍后可以吃到新鲜牛肉。可是，对这些结实强壮的小伙子说来，酒比牛奶更为重要。为了保持海员们的饱满情绪，麦哲伦让人在克西莱斯买了最好的酒，不少于四百七十酒囊和二百五十三桶。从理论上计算可供两年之用，每一个水手午餐和晚餐都可以饮用。

麦哲伦手里拿着清单，从这条船走到那条船，从这件东西走到那件东西旁边。他回忆起来，为了筹措、检查、计算和付款，他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劳！白天他跟官员们、商人们打交道！

夜晚感到惶恐莫名，惟恐忘记了什么，分发错了什么！可是现在终于一切都齐全了。可以供应二百六十五张口在航行途中的需要了。照料到所有的人和海员了。可是船也是有生命的，会坏的东西，在跟大自然斗争中，本身必然会有所消耗。风暴会撕破布帆，扯乱扯坏缆绳，海水会使木头腐烂，使金属生锈，太阳的照射会使油彩褪色，黑夜会消耗灯油和蜡烛。每一件装备——铁锚和船缆，木头、铁和铅、换作新桅杆的粗大木头，换作新帆的粗麻布——都得准备双份甚至很多份。船上装的木材不少于四十大车，为的是破损时立即得以修复，每一块木板和横梁要能够更换，还有一桶桶焦油和柏油，蜡和麻絮，用来填补缝隙。无疑，还要有必要的工具库，存放钳、锯、螺丝、铁锹、锤和钉。船上还存放着成千个鱼钩，几十把大鱼叉，此外还储备着鱼网，以便途中捕鱼之用，除了携带来的面包之外，鱼是海员们的主要食品。为了夜晚照明，还应把蜡烛考虑。为了长期的航海需要，还考虑到，诸如：罗盘、罗盘针、沙漏计时器、星盘、象限仪、星座图，每一件东西都不可缺少。为统计人员还准备了十五本笔记本（因为除中国外，航行途中弄不到一张纸）。甚至连令人不快的偶然事件也预计到了：装满药品的药箱、医护人员的拔火罐、为叛逆者准备的手铐和锁链。对娱乐也很关注，船上有五个大鼓和二十个小鼓，还有几把小提琴、笛子和风笛。

这只是麦哲伦船上庞大清单中的一小部分，只是船员们和船在难以估计的航行中，所需要的成千种物品中最主要的一些东西。可是这支舰队的所有装备价值八百万马拉维第，它绝不只是出于对无人知晓的远方世界的好奇，才被两个大陆的未来主人派遣去的。这五艘船不只是要带回地理考察结果，而且还

要带回钱，带回尽可能多的钱给实业家和财团！这就势必要挑选好并带足大量的货物，以交换所希望得到的商品。麦哲伦从印度航行起，就了解自然之子们质朴的口味。他知道，有两件东西到处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首先是镜子，黑色皮肤、棕色皮肤或是黄色皮肤的人，会第一次惊奇地从镜中看到他们自己的面貌；第二样东西是铃铛和小的摇铃，这玩意儿永远会吸引孩子们的。因此，他们至少带了两万个这种能够发出响声的小玩具，此外，还有九百面小镜子和十面大镜子（可惜大多数都给撞碎了），四百把德国造的小刀（清单上明确地写着：四百把最便宜的德国刀），五十打剪刀，此外，自然还有必不可少的花手帕和红帽子，铜手镯，假宝石和彩色玻璃制品。一旁还放着几件土耳其服装，都是头等样品，以及一些耀眼的衣服，有天鹅绒的，也有毛料的，总之都是一些毫无用处的廉价商品，在西班牙价格低廉，如同摩鹿加群岛上的香料一样，不值钱。但却十分符合交易的需要，在买卖主那里十倍于当地产品的价格，可是交易双方仍能赚到很多钱。

梳子、帽子、镜子和玩具无疑都很畅销，可是只是在当地人自愿进行和平交易的友好情况下。也充分预计到另一种动武的情况。五十八门大炮，七门长筒鹰炮，三门巨大的白炮从船舱里凶恶地眨着眼睛，船舱里载有大量的铁、石制成的子弹，以及成吨的铅，以便铸造新的子弹。有一千支梭镖，两百条长矛，两百块盾牌，这都表明了他们的战斗决心。此外，半数以上的船员还备有头盔和胸甲。还为海军上将本人从毕尔包特别制订了两套铠甲，可以从上到下把人保护起来。他穿上铠甲跟外国人作战，就像是无法伤害的神灵似的。尽管麦哲伦按其性格，根据他的计划，想避免任何武装冲突，但这样一来，这支探险队

的军事装备不亚于赫南多·科尔特斯的探险队，科尔特斯也是在一五一九年夏天在世界的另一端率领着一小撮人占领了一个百万人口的国家。西班牙的英雄年开始了。

麦哲伦最后一次怀着警觉和性格如一的明显的耐心，恳切地逐一检查了五艘船的航行、运载和装备性能。现在该察看海员了，招募这一批海员并不那么容易。花了好几个星期时间才从港口的偏僻小巷子里和小酒馆里把他们召集起来。他们刚刚来到时，衣衫褴褛，不守纪律，大伙乱七八糟地说着混乱的世界语。这一个说西班牙语，另一个说意大利语，第三个说法语，也有的说葡萄牙语，希腊语，加泰隆语和德语。要把这样一群乌合之众训练成一支精良的、可靠的、朝气蓬勃的海员队伍，还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可是在船上呆上几个星期，他就能牢牢地控制他们了！谁要是当过七年水手和战士的，他准会知道，海员们需要什么，可以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应当如何对待他们。这批海员并没让这位海军上将操心。

可是当他看到被委派到他的几艘船上当指挥官的三名西班牙船长时，他就感到紧张，心情很不舒服。他的肌肉就像即将临场的拳击手一样，不由地紧张起来。这个国王派来的监察员约安·德·卡塔盖纳从他身边走过时，表情冷漠、傲慢、欲盖弥彰，也许是有意不掩饰那一派蔑视的神情，可是他势必要派他去接替法莱罗担任“圣安东尼奥号”的指挥官。肯定无疑，约安·德·卡塔盖纳是一位富有经验、有一定身份的海员，他的正派如同他的虚荣心一样无可怀疑。可是这个贵族出身的卡斯蒂利亚人能否克制这种虚荣呢？布尔戈斯主教的堂兄弟，国王曾授予他与法莱罗“权利平等”称号的人，果真能像他所誓言

的，服从麦哲伦的指挥？麦哲伦看到他，就想起了阿尔瓦尼茨向他耳语的话，除了海军上将之外，其他的人也掌握着特别的权力，他听到这些话时，要想挽救已为时晚了。指挥"维多利亚号"船的路易斯·德·门杜萨也同样持敌视态度。在塞维利亚时，他有一次就曾大胆地拒不服从，麦哲伦并没敢开除这个皇帝硬性派来做司库的暗藏敌人。不，很明显，所有的军官虽曾在维多利亚圣玛利亚大教堂里，在展开的旗帜影子下向他效忠听命，宣读誓言，但这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他们内心里满腹敌意和嫉妒。麦哲伦势必要警惕这些西班牙贵族啊。

好在麦哲伦设法成功地回避了国王的旨意和东印度公司的一系列强烈反对，暗地里招了三十名葡萄牙人，其中有几名可靠的朋友和亲戚来到船上。首先要提及的是他的小舅子杜亚脱·巴尔波查，他虽年轻，但却是久经考验的远洋海员，此外还有他的近亲阿尔瓦罗·德·麦斯基塔和葡萄牙杰出的舵手艾斯特瓦奥·戈麦斯，其中包括若奥·谢兰，他虽然在名册上写的是西班牙人，并曾跟随毕萨罗和彼德罗·德·阿里亚斯，参加过探险队去过卡斯蒂利亚——亚德尔——奥罗，可是弗朗西斯科·谢兰（麦哲伦的结拜弟兄）的亲戚，无论怎么说，也算是他的同胞。此外，约奥·科尔瓦荷也很有用，多年前他曾到过巴西，甚至带着一个儿子在船上，这是他以前跟一位巴西女人同居生下来的。由于他们熟悉那儿的语言和当地情况，可以充当理想的向导，倘若从巴西抵达马来亚，即到达香料群岛，马六甲，那么麦哲伦的奴隶恩利柯可以充当翻译。在二百六十五名船员中，麦哲伦总共有六到十二名称得上是绝对可靠的，这实在是为数太少了。可是对一个没有选择余地的人，即使人数和时间对他都不利，他也得大胆行事。

麦哲伦全神贯注，认真地考查了每一个人和整个船员队列，他内心暗地里一直在估量着，遇到关键的情况，谁会听他使唤，谁会反对他。他没有留意到，由于集中精神思考，他额头上已出现了皱纹。可是，突然又轻松下来，他不由自主地微笑了。上帝啊，我几乎忘记了一个人，这个在最后时刻犹如大雪飘来似的那个额外的人，多余的人！确实明显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斯文、谦逊、年轻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毕加费塔，他混进这追求虚荣，贪图钱财、各种冒险家和亡命之徒所混迹的色彩缤纷的世界里，他是维琴察的一个古老贵族的后裔，这个嘴上没毛的罗德岛上的骑士，跟随着教皇的私人秘书来到巴塞罗那查理五世的宫廷，听到人们谈起这支神秘的探险队，沿着迄今无人知晓的路线，前往未曾考察过的目标和地带。或许毕加费塔读过在他的故乡维琴察一五〇七年印刷的维斯普奇的有关《新发现的地域》的书。维斯普奇在书中谈到他对周游和亲眼目睹一下奇妙的大千世界的向往之情。也许是他的同胞路多维科·瓦尔特马的享有盛名的《旅行指南》鼓舞了这个年轻的意大利人，能够亲眼看一看大洋里一些伟大而可怕的东西，哪怕是一部分也好。这一思想强烈地吸引着他。他请求，查理五世同意他参加这支极为神秘的探险队，因为查理五世把他介绍给了麦哲伦，于是在这些职业航海家，贪图钱财者和冒险家之中，又出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空想家。他并非是为了荣誉，也不是为了钱才去冒险的，而是出自对环球旅行的真诚爱好，说得好一些，他是一个半坛醋，只是由于他的业余爱好，有兴趣想看一看，经历一下，欣赏一番，才投身这一冒险事业的。

事实上，这个不显眼的，多余的人却成了麦哲伦航行探险

的最重要角色。因为一项事业不用语言载入史册，那它还能有什么意义呢？一项事业从来不是在它付诸实现时，而是在它留传后世时，它的历史意义才算有了结论。我们所说的历史，绝不是指所有时间和空间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世界史只是包括那偶然由诗人和学者所描绘和阐述的一小部分，阿基利①要是没有荷马史诗就什么也不会留下。如果没有编年史家让这些事迹凝聚在他的笔下，没有艺术家把它们进行塑造，那么任何形象都会黯然失色，任何事业就会像转瞬即逝的波浪消失在事件的无边大海之中。倘若我们只有彼得·马尔蒂尔的《十件事》，马克西米尼安·特朗西尔瓦努斯的那封短信和舵手们那些干巴巴的笔记和航海日志，那么我们有关麦哲伦和他的事业知道得就很少了。就因为这个小小的罗得骑士，这个超额的多余的人记下了麦哲伦的事迹，他的业绩才得流传后世。我们那位善良的毕加费塔肯定不是塔西陀②，也不是李维。他在文学和航海方面也只不过是一名颇受人喜爱的业余爱好者。他并不了解人，他在船上完全忽略了麦哲伦和船长之间那些心理上的最重要的冲突。可是恰恰因为毕加费塔很少关心这些关系，他才精心注意这些细节，就像中学生做作业时，描写星期日远足一样，兴致勃勃地把事情记下来。他并非一直觉得所记的很可靠，有时他由于天真而受到那些立即看透他这个黄口小儿的新手的老舵手们的莫大欺骗。毕加费塔由于好奇而对每一个细节予以仔细描写，大大地弥补了那些不足称道的荒诞想象和无稽之谈。他甚至竭力向巴塔戈尼亚人打听贝尔利茨的做法，给那身微言轻的

①荷马史诗中的英雄。——译注

②罗马历史学家，公元约55—118年。——译注

罗得骑士意想不到地取得了历史声誉，载入第一部美洲词典。他还有更大的荣誉。因为莎士比亚为他的《暴风雨》应用了毕加费塔《旅行记》中的一个场景，对于一个普通的作家最壮丽的事业莫过于，一个天才从自己短暂的工作中为他永恒的作品吸取一些东西，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把他那不为人知的名字带进永恒的境地。

麦哲伦巡视完了。他可以冷静地扪心自问：一个平凡的人所能估计和预想的事，他都预计和认真考虑到了。可是一个冒险者和探险者的航行，向上苍的力量提出了挑战，这种力量远胜过凡人。试图极度准确地预定成功的一切可能性的人，必须注意到这次航行的可能结局。可能会一去不返。因此，麦哲伦在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普通平凡的事业之后，在他起航前两天写下了他最后的遗愿。

麦哲伦的这份遗嘱，人们读了深受感动。因为一般说来，凡是写遗嘱的人，至少大体上都知道他的财产多少。可是，麦哲伦如何能估计得到，他将会留下什么遗产，留下多少遗产呢？无法预料，他一年后将成为乞丐，抑或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之一。因为他的全部财产都在跟国王签订的那份合同之中。倘若这次航行成功，麦哲伦发现了那神话般的海峡，他到达了香料群岛，而且带回丰富的物质的话，那么这位当初出海时一贫如洗的冒险家，将成为大富翁回到塞维利亚。如果沿途还发现一些新的岛屿，那么，他的子孙除了这些物质之外，还将得到世袭总督的称号。一旦他走错了航线，船只撞碎了，那么，为了免予饿死，他的妻室儿女势必得站在教堂前乞求好心人的同情与施舍。只有驾驭风浪的上苍操纵着结局。早先麦哲伦作为热情而又虔

诚的天主教徒驯服地服从上帝玄妙莫测的意志。因此，这份感人的遗嘱首先是给“最高的和万能的上帝，给那永恒统治的主宰者”，然后才给人群和官员，首先他是基督教徒，然后是贵族，最后才是丈夫和父亲。

可是麦哲伦永远不会含糊不清，乱七八糟地受着虔诚宗教的支配，他把他活着时的同样令人惊奇的预见技艺用于他死后的长存。他预见到了各种可能性，并作了细心的安排。“我现在的生命一旦结束，永恒的生命开始的时候”，他愿望，“最好能安葬在塞维利亚的塞维利亚圣玛利亚教堂自己一座单独坟墓里。”倘若死亡在航行途中，不可能把他的遗体运回祖国，“那么就请人们在最近的一座圣母教堂里为我的遗体小心地安排一个最后的安息之处。”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按照教规恰当地分配了用于宗教事业的遗赠。合约中五分之一总利润中的十分之一，应平均分配给维多利亚圣玛利亚修道院、圣玛利亚·蒙塞拉修道院、奥波尔图的圣多明各修道院，给塞维利亚小教堂一千马拉维第，起航前他曾在那里进行过圣餐，并希望（在胜利返航后）随着上帝的旨意，再在那里进行圣餐。他要把一笔雷亚尔银币遗赠给十字军远征，第二笔银币用于从异教徒手里赎回基督教徒俘虏，第三笔银币遗赠给圣拉萨罗的久病者的医院，第四笔给拉斯布巴斯养育院和圣塞巴斯蒂安的贫民，让那些得到捐赠的人“就地为我的灵魂升天而祈祷上帝”。在他的遗体旁做三十场弥撒，在他安葬后三十天再在维多利亚圣玛利亚教堂做三十场弥撒。此外，他还嘱咐，在他的安葬日要给三个贫苦的人发放衣物，每人一件灰呢大衣，一顶帽子，一件衬衣和一双鞋，让他们为他的灵魂向上帝祈祷。他希望，“在这一天不仅让这三个人吃饱，还要让另外十二个人吃饱，好让他们都为我的

灵魂向上帝祈祷，还要捐赠一个金质杜卡特作为救济，拯救那些在炼狱里遭受苦难的灵魂。”

在教堂得到他的这一部遗赠后，人们会想到，最后终于会给他的妻子和儿女安排了。可是令人感动不已的，是这位宗教意识浓厚的人更多关心的是他的奴隶恩利柯的命运。也许先前他的良心已经意识到，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是否可以让一名奴隶，一个接受基督教洗礼，从而成为一名宗教信仰的兄弟，成为一名灵魂不死的人，像一块土地，一件大衣似地成为他的财富呢？绝对不能，麦哲伦不愿带着这种不安的心灵去见上帝，因此他又叮嘱：“从我离开人世的那一天起，我那出生在马六甲城，大约二十六岁的俘虏，奴隶恩利柯，不再是奴隶，或处于从属地位，他完全可以随意行动，此外，我还愿望，从我的遗产中取出一万马拉维第现金资助他，我给他这笔钱，因为他已成了基督教徒，也好让他为我的灵魂的得救而向上帝祷告。”

麦哲伦在很好地安排了未来的生活，预见到“在最后审判时，也能为罪孽深重的人充当辩护的善事”之后，麦哲伦才在自己的遗嘱上谈到家庭。可是，他对非物质方面的安排优先于钱和财富的考虑：维护他的族徽和贵族称号，他嘱第二代和第三代，万一他的儿子——朦胧的预感——死于他之前，由谁继承他的族徽。这位基督教徒、贵族在最后的遗嘱中，如何在热切地追求永生。

接着，麦哲伦才把他那在风浪中飘荡不定的财产分配给妻子和儿子。这位海军上将挥动着如同他本人一样正直的、刚劲有力的笔，签署了这份遗嘱，署名是“斐尔劳·德·麦哲伦”。可是命运并不一定跟笔画联系在一起，也无法由于誓言而平静下来，他那家长式的意志比一个人的最热切的愿望更加强烈。他

的所有安排没有一项付诸实施，麦哲伦的最后遗愿都成了一纸空文，毫无用处。他所指定的那些继承人并没继承到财产，他想到的那些穷人并没得到布施。他的遗体并没能埋葬在他所愿望的地方，他丢失了族徽。只有他亲身所建立的业绩比这位举世闻名的航海家更为久远地延续着，全人类在感激他留下的这笔宝贵遗产。

为祖国尽了这最后义务后，告别的时候到了。一名妇女颤抖地站在他的面前，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第一次真正幸福地跟她一起度过了一年半时光。她怀中抱着她为他生下的儿子，她失声痛哭，她那已第二次怀孕的身体震颤着。他再一次拥抱了她，握住巴尔波查的手，他要把他惟一的儿子带走，跟他一同去探险！接着，为了免予给别离妻子的眼泪所动摇，他果断迅速地乘上小艇顺流而下，驶向桑卢卡尔，他的船队正在那里等待着他。在桑卢卡尔的小教堂里做过忏悔后，麦哲伦跟所有的船员进了圣餐。一五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二的黎明，这一天将载入世界史册，铁锚哗啦啦地响起，起锚了，篷帆扬起，船只乘风破浪，礼炮齐鸣，声震长空，向着逐渐远离的国土告别：人类历史上最远的一次探险，最勇敢的航行开始了。

魏家国 译

徒劳的寻找

1519年9月20日—1520年4月1日

一五一九年九月二十日，麦哲伦的船队驶离了大陆。但是早在那些年代，西班牙的国土就已经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当五艘船临时停靠在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补充食粮和饮水的时候，他们仍然处于皇帝查理五世的统治范围之内。在继续向那陌生的海域航行之前，这些将要环行世界的航海者们还有机会再一次踏上祖国亲切、坚实的土地，再一次呼吸自己家园的空气。

但这最后一次休整很快就结束了。麦哲伦又准备升帆起航。正在此时，一只从西班牙方向驶来的小帆船追了上来，远远地就发出了信号，它给麦哲伦带来了他岳父迪奥古·巴尔波查的密报。正如所有的密报通常都是坏消息一样，这个密报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巴尔波查提醒他的女婿。

他得到可靠的消息，船上的西班牙船长们密谋在途中拒绝继续服从麦哲伦的指挥。这个阴谋的主脑是布尔戈斯主教的堂兄弟胡安·德·卡塔赫纳。麦哲伦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个警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它完全印证了那个密探阿尔瓦尼茨闪烁其辞的威胁:“还有另外一些人被派到了船上，他们得到了相反的指令。等到麦哲伦得知这一切的时候，要继续保持他的荣誉肯定已为时太晚。”但剑已出鞘，面临着明显的危险只不过使麦哲伦本已坚定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罢了。他很骄傲地往塞维利亚写了一封回信，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将坚决地为国王效劳到底，他的生命就是保证。他没有向船上的任何人提起，这封信给他带来了阴郁而真实的警告，这也是他一生中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他依然不动声色地命令起锚。短短几小时之后，特内里费的山峰便已远远地隐没在天的另一端。这是船上的大多数人最后一次看见祖国的土地。

在这次航行的所有困难之中，麦哲伦最艰巨的任务就是要保持五只完全不同吨级、不同速度的船只始终结队而行。只要有一艘船掉了队，对于整个船队来说，它就被丢失在浩瀚无际的大海里了。早在起航前，麦哲伦在征得贸易法庭的同意之后，就为此制定了一套保持船只之间随时联系的方法。虽然船长、舵手和领航员们知道大体的航向，但在大海里他们必须执行一项命令，跟随着前面领航的旗舰“特立尼达号”前进。在白天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即使遇到大风浪，船只之间也能观望到对方，保持联系。而这五艘船要在夜间也保持联络就困难得多。必须靠一套在船只之间能通用的信号灯系统来维持。天一入黑，就在“特立尼达号”尾部的灯箱里点燃起火把，使跟在后面的船只不至于与带路的“老大”失去联系。如果“特立尼达号”上

除了燃起火把，还点起了另外两盏灯的话，就是通知其他船，他们应当减速行驶，或是前面逆风，它们应当避风而行；点起三盏灯是说：风暴即将来临，各船应该只升低帆；如果是四盏灯，各船就应当落下所有船帆；如果旗舰上的火把忽明忽暗，或者鸣炮，则是提醒后面的船要小心附近有浅滩或暗礁。就这样，利用夜晚的灯火，船队制定出了一整套富有创新意义的信号系统，以应付各种顺利和不顺利的情况。

这种原始灯光电报所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其他各船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予以回答，使船队总首领知道，他的命令已被接受和执行。此外，每天傍晚夜幕降临前，四艘船都会驶近旗舰，船长们向旗舰喊道：愿上帝保佑您，尊敬的海军上将先生，保佑各位亲爱的伙伴。以此向海军上将致敬，并听取他对夜间三班值班人员的命令，看来，通过四位船长向海军上将每天的这种例行报告使船队的纪律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保证，那就是：旗舰领队，其余船只跟随；海军上将指示航向，其余各船长无条件遵循。

但是，正因为领导权如此权威地控制在一个人手里，而这个掌握着领导权、一贯沉默寡言，严守着自己秘密的葡萄牙人，每天像强迫新兵一样要他们列队致敬，发布完命令以后，方才打发他们走开，像打发小喽罗一样，这令其他四位船长都很生气。他们毫不怀疑，而且人们也有理由这样说，麦哲伦在西班牙时之所以严格保守任何关于此次航海目的地的秘密，是不愿意把海峡的秘密泄露给多嘴的人和密探们，那么到了海上，他们希望他不再这么小心谨慎，会将他们召集到旗舰上，借助手里的海图向他们说明他一直处心积虑保守着的秘密计划。然而恰恰相反，他们看到麦哲伦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冷酷无情，

更加难以接近。他不召集他们上旗舰，不询问他们的意见，一次都未曾听取这些久经考验的船长们的建议。而他们还必须像狗似地紧跟着自己的主人，机械地、恭顺地跟着他，白天跟着他的旗子，夜里则要跟着他的火炬。一连几天，麦哲伦就这样一言不发地率领船队前进，西班牙军官们也很冷静地容忍他这样颐指气使。可是海军上将没有朝西南方向驶往巴西，却比原定航线偏南很多，几乎沿着非洲的海岸线驶到塞拉利昂。胡安·德·卡塔赫纳终于在一次傍晚集合时公开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违背最初的指令，改变了航向？

从胡安·德·卡塔赫纳这方面来说，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绝不是骄横无礼的表现（这一点绝对有必要强调一下，因为在大多数作品中，作者为了拔高麦哲伦，总是从一开始就把胡安·德·卡塔赫纳描写成一个卑鄙的叛徒）。相反，一个由国王亲自任命的船长，全船队最大船只的船长，一名西班牙皇家监察员有礼貌地询问总指挥，为何改变了原定航线，人们不得不说，这也是很合乎逻辑和很合理的事情。此外，就连从航海学的角度来看，胡安·德·卡塔赫纳的问题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新的路线完全是绕道而行，这将使整个船队白白耗费掉十四天。是什么原因使麦哲伦改变航线，我们不得而知。他就这样一直沿着非洲海岸线航行，直到几内亚。也许是为了要追踪信风，信风——这是葡萄牙航海业的技术秘密，西班牙人是不知道的；又或者，他是想避开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派往巴西，妄图要夺取他的船队的那些船只。无论如何，向其他船长们诚恳、友善地说明之所以改变航向的原因，对于麦哲伦来说其实是易如反掌的事。然而麦哲伦可不是把它当作一般情况来看待，而是当作一项基本原则。这里牵涉的不是向西南方向还是向更西

南方向偏离几海里的问题，而是要确立一条完全能保证船队顺利航行的纪律。如果船上真像他岳父信中说的那样有阴谋分子的话，他宁愿与他们面对面地较量。即使真有瞒着他的其他指令存在，这些指令也必须在有利于他树立权威的情况下由他来统一解释。正因为如此，胡安·德·卡塔赫纳一定要他说出改变航向的原因，对他反而是太有利了。这样一来，正好可以搞清楚，这位西班牙贵族老爷是与他处于同等地位抑或是他的属下。这个职务上的等级关系确实也是不大明确的。胡安·德·卡塔赫纳原本是国王作为总监察员派来跟随船队的，而事实上，作为“圣安东尼奥号”的船长，他又是海军上将的下属，不得对麦哲伦提出异议和要求解释。当麦哲伦解除了同伴法莱罗的职务，任命胡安·德·卡塔赫纳接替他成为船长后，这种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因为“conjuncat”一词是“权力相等”的意思。他们两个人都可以从国王颁布的文件中找到对自己的有力支持。麦哲伦是从国王的任命书中，根据此任命他显然是船队惟一的和最高的指挥官；胡安·德·卡塔赫纳则是从国王亲笔的短笺中，国王指定他，在发现任何疏忽以及发现其他人目光短浅或处事不周的情况下，要特别留心监督。但这位船长是否有权要求海军上将先生作出解释呢？这正是麦哲伦一刻也不想悬而不决的问题。胡安·德·卡塔赫纳一提出问题，麦哲伦就粗鲁地回敬道：任何人都无权向他要求解释，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地跟随他。

这些话太粗暴了，但是麦哲伦宁愿像这样立即以棍棒出击，也不愿意花太长时间去进行威胁或者寻求妥协。他立即向这些西班牙船长们（也许就是阴谋分子们）清楚地表明：“别想得太美了，我将会用铁腕来把舵，只有我，一个人。”然而麦哲伦的

拳头虽然粗暴，坚强有力，但也缺乏某些可贵的特性，首先就缺乏那种在粗暴地对待过别人以后再去安抚他们的技巧。麦哲伦从来就不曾学会用婉转一些的语气来说不中听的话，更不懂得亲切、随和地与上级和下属相处的艺术。因此，在这个集聚了巨大毅力的中心人物周围，势必从一开始就形成一种紧张、敌对和充满怨恨的气氛。当事实表明胡安·德·卡塔赫纳所反对的航向的改变确实是麦哲伦的明显错误，这种潜伏的不满情绪就更加强烈了。顺风未能捕捉到，船队就这样在微风不起的大海上滞留了两个星期。紧接着又遇上了狂风暴雨的天气。按照毕加费塔的浪漫叙述，是发光的“圣体”，海员的保护神——圣安西门，圣尼古拉斯和圣克拉拉的圣体现身（即所谓的“圣艾利马的火光”）才搭救了他们。由于麦哲伦独断专行地改变了航线，船队白白浪费了十四天。胡安·德·卡塔赫纳再不愿，也再不能克制自己，既然麦哲伦置他的劝告于不顾，又不接受批评，那么就该让整个船队的人都看看，他，胡安·德·卡塔赫纳，对这位无能的航海家是多么不屑一顾。虽然这天他仍像以往一样，在傍晚时分将他的“圣安东尼奥号”驶近“特立尼达号”，听取麦哲伦的指示，但他第一次没有亲自登上甲板向麦哲伦致敬，而是派水手长代替他去。水手长向海军上将的致敬词是“愿上帝保佑您和船员们，船长先生”。

麦哲伦一刻也不愿意让自己相信，这次不合规范的致敬只是无意的、完全偶然的现象。如果恰恰是胡安·德·卡塔赫纳让人称呼他为船长（capitan）而不是海军上将（capitan-general），也就是向整个船队宣布，被任命为总监察员的胡安·德·卡塔赫纳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上司。于是，他当即下令转告胡安·德·卡塔赫纳，他希望今后受到正确的、应有的尊敬。可

这时卡塔赫纳也拉下了面具。他很傲慢地答复道，他很后悔，这一次委派自己最得力的助手致敬词，下一次他只会派船上的见习水手去做。一连三天“圣安东尼奥号”都继续当着整个船队的面不作任何致敬。这是要告诉其他人，他们的船长不接受葡萄牙司令官这种毫无节制的专制。这位西班牙贵族把铁手套①扔到了葡萄牙人的脚下——公开向他提出挑战。这使胡安·德·卡塔赫纳赢得了荣誉。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阴险、卑劣的叛徒，尽管经常有人在书里把他描述成这样的人。

从一个人在关键时刻的行为最能看清他的性格特征。越是危险关头越能显示出一个人潜在的实力和才能，所有在一般情况下被隐藏起来的独特个性，惟有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才表现得一览无余。麦哲伦对危急情况的反应在任何时候都一样。每当遇到决策性的重大问题时，麦哲伦就会变得异常沉默和冷淡。他仿佛被冻僵了一样，任侮辱再粗暴，也无法让他隐蔽在双眉下的眼眸发怒，任形势再紧张，也无法开启他紧闭的双唇，他完全能控制住自己，这种冷静的态度使一切事情在他看来都像水晶玻璃一样清晰明了，同时他又可以用这种冷酷的沉默将自己封锁起来，以便更好地思索和筹措他的各项计划。麦哲伦在他的一生中都从未凭一时冲动仓促出击。在每次闪电之前，漆黑低沉的乌云总要长时间地聚集在空中，正如麦哲伦每次行动前都会长时间地保持他那阴郁的沉默一样。

这一次麦哲伦正是这样保持缄默。不了解他的人——西班

①按照古代骑士规则，在向其他骑士挑战时，要向对方扔下手套。——译注

牙人当然还不完全了解他——可能会认为，他没有理会胡安·德·卡塔赫纳的挑战。可实际上，麦哲伦已经在酝酿着反击了。他很明白，在茫茫大海上不能以武力来解除一艘更大，武器装备也更精良的大船的船长的职务。那么，只有忍耐，再忍耐！最好装出反应迟钝，漠不关心的样子。于是，麦哲伦对侮辱报以沉默，他独有的那种沉默。像狂热的教徒一样执着，像农民似地顽强，像赌徒般地痴迷。人们看见他在“特立尼达号”上随意地走来走去，似乎很专注于处理船上最日常、最细小的事务。“圣安东尼奥号”完全不遵守晚间的致敬和汇报规则，似乎也没有激怒他，船长们意外地发现，这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突然间变得有些和善了：因为一名海员做出了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事情，海军上将第一次将四位船长作为同事召集到他的船上。船长们立即就想到，对于他来说，要与所有同事都敌对相处，始终也不是那么惬意的事情。自从他选定的航向被证明是错误的以后，他一定也明白了，最好还是多征求经验丰富的老船员的意见，而不要把他们都当作废物来看待，胡安·德·卡塔赫纳也来到了旗舰上，经过这么长时间，他终于等到了可以和麦哲伦直接对话的机会，他又提出了同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要改变航向。麦哲伦控制住了自己，并且因为早有心理准备而表现得很傲慢。他知道，只有用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进一步激怒卡塔赫纳，事情才会对他有利。而作为国王派遣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卡塔赫纳认为他有权力自由发表意见，显然，他太充分地运用了这一权力。事情终于闹到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公开声称绝不服从的地步。事态会发展到这步田地，是麦哲伦这位出色的心理学家早就预料到的，也正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事已至此，他就可以出击了。他立即就实施查理五世授予他在必要时

施行司法的权力。他一边揪住胡安·德·卡塔赫纳的胸口一边说："您是我的俘虏了。"然后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军需官和警卫长）将叛乱者关押起来。

其他的西班牙船长们惊愕得面面相觑。短短几分钟之前他们还完全站在胡安·德·卡塔赫纳一边，即使现在，他们心里也仍然是向着自己的同胞而憎恨这个异乡的武夫的。但是麦哲伦行动太快，他像对待罪犯一样揪住对手，并下令将其监禁起来，他的这股魔力瓦解了他们的意志。胡安·德·卡塔赫纳向他们请求帮助，但是没有用，没有一个人敢移动一步，也没有一个人敢抬眼看看这个身材矮小而强悍的人。这是他第一次让自己集聚的巨大力量从封锁他的沉默之墙内迸发出来。只是在卡塔赫纳被押往囚室的时候，他们其中一个才转向麦哲伦，极其恭敬地恳求他，看在卡塔赫纳是西班牙高级官员的分上不要给他戴上镣铐。只要他们中的一个人以名誉保证看守好这名囚犯就行了。麦哲伦接受了这个建议，只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受他的委托看管胡安·德·卡塔赫纳的路易斯·德·缅多萨要发誓保证，只要海军上将发令，就马上将卡塔赫纳带到。这件事解决了。一小时以后，另一名西班牙军官安东尼奥·德·科卡接管了"圣安东尼奥号"。当晚，他亲自从船上准确，分毫不差地向海军上将先生致敬。航行在继续，没再发生什么小插曲。九月二十九日，桅楼上传出欢呼声，报告已经从伯南布哥海岸附近的轮廓看出就快要到巴西海岸了。船队一路没有停歇，经过了十一个星期马不停蹄似的航行，终于在十二月十三日驶进了里约热内卢湾。

里约热内卢湾当时的优美风景决不亚于今天城市的富丽繁

华，对于疲惫不堪的水手们来说无异于就是天堂了。以雅努斯神命名的里约热内卢湾从被人发现那天起就被错误地称为“一月之河”① ——人们猜测，在这些杂乱无章的岛屿后面一定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的入海口。这个海湾当时已经处在葡萄牙的管辖范围之内。按照指令，麦哲伦不该在此靠岸。但此地虽是葡管地，葡萄牙人还没在这里建立居住区，也没有修筑带防御炮台的要塞，这片色彩斑斓的海湾实际上还是一块“无主领地”。在由花团锦簇的美丽海滩所环绕着的如诗如画的岛屿间，西班牙船只或是自由自在地迂回穿行，或是轻松随意地靠岸停泊，还没等登陆小艇驶到岸边，土著居民都早已从茅屋和树林里跑了出来，很好奇地迎上去，看到这些武装齐备的士兵，连一点怯意都没有。他们显得特别敦厚、和蔼，而毕加费塔后来伤心地得知，他们其实是凶狠的食人族，常常会把俘虏到的敌人杀死，像烤牛肉一样叉在铁叉上烤得香喷喷的，再一块块切来吃掉。可是这次，瓜拉尼人② 却没有向这群像上帝一样白皮肤的陌生人表现出他们有这种爱好，那么船员们也就无需动用原始的火炝和沉重的长矛了。

只不过过了几个小时，双方就热火朝天地开始了交易。对此，平淡了多时的毕加费塔也终于可以畅所欲言一番了。在前面十一个星期的航行中，这位颇有虚荣心的编年史家没有发掘到多少可写的东西，只不过编写了几篇关于鲨鱼和稀奇小鸟的小故事。逮捕胡安·德·卡塔赫纳的一幕看来他似乎是错过了，

① “一月”在葡萄牙文里是由古罗马的雅努斯神而得名，而里约热内卢在葡萄牙语中的意思则为“一月之河”。

②原是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土著人。

也许是睡过头了吧。而现在，要在日记里描述所见所闻的种种新奇美妙之事，他觉得他带的鹅毛笔都快不够用了。当然，他并没有描绘当地绚丽的自然风光，但这一点不能归咎于他，让·雅各·卢梭① 开始对自然景物进行描绘，也已经是三百年以后的事了。然而，对于以前从未见过的一些果实，他却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外形像松果，但又极其甘甜可口的”菠萝，味道像栗子的甘薯，还有“甜蔗”，也就是甘蔗。不谙行情的土著人把食品卖给这些异邦人，价格之低让善良老实的小伙子诧异不已。这些黑皮肤的傻瓜们用五六只鸡去换一个鱼钩，用两只鹅换一把梳子，用十只长着艳丽羽毛的鹦鹉换一面小镜子，还会用足够十几个壮汉饱餐一顿的鲜鱼去换取一把剪刀。为了换一个能发出响声的小玩意（要知道，像这样的小东西船上绝不止有两万个），他们扛来满满一筐甘薯，只为了换一副旧牌里已经很破旧的一张“国王”，他们竟提来五只鸡。这些瓜拉尼人还自以为骗过了这些罗德岛② 来的骑士，占了便宜。在这里，年轻姑娘的价格也便宜得出奇，这些姑娘们，正如毕加费塔不好意思地写道：“头发就是她们惟一的衣饰。”用一把刀或是一把斧子就马上可以换两三个人供终身享用。

毕加费塔拿着记事簿不辞辛劳地四处走访，水手们在尽情吃喝，钓鱼消遣，和热情的黑姑娘们一块寻欢作乐，消磨时光。而此时麦哲伦惟一考虑的就是接下来该怎么走。船队又恢复了

①让·雅各·卢梭（1812—1867）是法国风景画家，巴比松画派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有《桦树下的黄昏》《林中》等。——译注。

②罗德是地中海东部归属希腊的小岛，罗德的骑士在此就是指西班牙船员们。

生机，这让他觉得好过一点。与此同时，他还是要求整个船队保持着严格的纪律。他牢记着对西班牙国王的承诺，禁止在巴西沿海一线地区购买奴隶和采取任何暴力行动，这样，即使葡萄牙人想找麻烦，也找不到借口。

麦哲伦这种正派的做法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土著居民和他们相处得很愉快，于是也就慢慢地不再像开始时那么畏缩。每当船员们在海滩上举行弥撒时，这群憨厚又幼稚的土人也会成群结队地聚集过来，好奇地观察着这一奇怪的仪式。他们看到这些白皮肤的异邦人在高高举起的十字架前下跪，他们也双手合十，跟着跪了下来，一起祷告。因为他们相信，就是这些人带来了那场他们盼望已久的大雨。而虔诚的西班牙教徒们则认为，这明确地表示，土著人已经不自觉地领会了基督教的神圣意义。当船队经过三十天的停泊，终于在十二月底离开这个令人难忘的辽阔海湾时，麦哲伦能够比同时代的其他南美征服者更问心无愧地继续航行。因为，即使他在这里没有为他的国王夺得新的领地，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至少为上帝赢得了新的信徒。在这些日子里，没有任何人受到哪怕一丁点的侮辱，也没有任何一个温顺的土著人被武力逼迫，要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麦哲伦和平地到来，又和平地离去。

水手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天堂般美丽的里约热内卢，他们不愿意沿着迷人的巴西海岸不作停留，挂起风帆，一直往前航行，可是麦哲伦不会让他们再休息。隐秘而又焦灼的心情推动着这个意志坚定的人不顾一切地向着期待中的海峡前进。他想，按照马丁·彼海姆的地图和报道，应该可以找到海峡的位置。如果葡萄牙船长们的消息和马丁·彼海姆的地图上标明的纬度是准确的话，这个海峡应该就在圣玛利亚角后面，所以麦哲伦命

令不要停顿，向着目标前进。一月十日，他们终于在遥无边际的海平面上发现了一座隆起的小山头，他们将其命名为蒙得维的（也就是今天的蒙得维的亚）。因为天气极其恶劣，所以他们只得在看起来往西无限延伸下去的辽阔海湾里暂避。

这个辽阔的海湾实际上只是拉普拉塔河的河口，但麦哲伦可没有这么想，他怀着满腔掩饰不住的得意之情站在地图上标明的地方，看着汹涌的波涛滚滚西去，心想，这一定就是彼海姆在地图上标明的，他一直在寻找着，并预言一定存在的海峡了。地点位置似乎都和那个陌生的里斯本人向他提供的消息完全相符，这绝对就是那道海峡。按照《新报》的报道，葡萄牙人二十年前就曾想由此西去。毕加费塔也证实，当时船上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有这么雄伟壮阔的水流，就一定能找到了盼望已久的通道了。莱茵河、波河、埃布罗河、特茹河① 在入海时水势都很平静，并且在入海口处都不宽阔，能够清楚地看到左右两边的河岸。跟这里简直无法相比。这里水面极宽，一望无际，这个辽阔的海湾前面一定就是另一个直布罗陀海峡，另一个英吉利海峡，或是另一个达达尼尔海峡②，将海与海连通起来。于是，海员们都对自己的领袖深信不疑，满心梦想着能在几天之内就穿过这个新的海峡，到达传说中的南部海域，那是通往印度、日本、中国和香料群岛，通往戈尔康达的宝藏和地球上一切财富的黄金水道。

就连麦哲伦，看到如此波涛汹涌的滚滚水流，也不由得坚

---

①波河在意大利境内。埃布罗河在西班牙境内。特茹河在葡萄牙境内。

②土耳其境内连通黑海和爱琴海的海峡。

信，梦寐以求的海峡终于找到了。这也证明了，他在这个地区，恰恰是在这个地区寻找海峡是正确的。他在拉普拉塔河口徒劳地搜寻着海峡，度过了一段时光，更准确地说是失去了整整十五天的时间。他们到达时遇上的那场暴风雨稍一平息，麦哲伦就将整个船队分成两队。那几艘较小的船只沿着他们认定的那条通道往西行（其实是逆流而上），而另外两只大船则在他的亲自带领下横过拉普拉塔河口往南行，试试能否穿过去，以便往这个方向也作一次探测，看看这条寻求已久的通道究竟有多长。小船在往西进发，而他则在海湾的整个南部区域作缓慢、细致的探索。结果却让人心酸失望。麦哲伦在蒙得维的亚激动地探寻了十五天而毫无发现，前方也出现了返航船只的帆影，但桅杆上并没有悬挂报喜的信号旗，船长们带回来的也是让人沮丧的消息：他们轻率地认定这就是所要寻找的海峡的辽阔澎湃的水道，其实只不过是一条河道特别宽广的淡水河。为了纪念曾在这里寻找通往马六甲的航道并死在此地的胡安·德·索利斯，他们暂且把这条河命名为索利斯河（后来才改名为拉普拉塔河）。

现在，麦哲伦也极度紧张起来，但是却不能让任何一位船长，甚至任何一个船员看出来，这次的失望对于他内心的信念是多么致命的打击。因为此刻有一件事麦哲伦是最清楚不过的了：马丁·彼海姆的地图根本就是错的；葡萄牙人当初自认为已经找到了海峡，也是轻率而下的错误判断；他制定整个环球航行计划最初的那些消息和情报都是不可靠的；法莱罗的全部推测都是错的；而他自己向西班牙国王及其大臣们所许诺的种种也都是不存在的。如果真有这个海峡的话——这个绝对自信的人第一次想到“如果真有”这个问题——那么它的位置一定

是再偏南一点。可是船队早已越过赤道很远了，再往南走就不是意味着越来越温暖，反而离极地地区越来越近。赤道这一边的二三月也不像在家乡那样是冬天的结束，反而是冬天的开始。如果通往南海的航道不是马上出现，如果他们不尽快找出他们正在寻找的海峡，那么就会错过绕过南美大陆的最有利季节。因此他们眼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返航到比较温暖的地带，要么就在附近找个地方度过这个冬天。

自从侦察船都徒劳而回的那一刻起，想必不祥的念头就一直盘踞在麦哲伦的心头。就像他的内心世界一样，他周围的外部世界也变得越来越恶劣。海岸越来越阴冷、荒凉、死寂，天空也越来越幽暗。南方太阳的光芒黯淡了，原本蔚蓝的苍穹此刻密布着黑压压的云层。那一片片的热带丛林，连同那从海边一直飘送过来，萦绕在船只周围的温暖、馥郁的气息都感受不到了，巴西那如画的风景，果实累累的葱茏树木，五花八门的动物，憨厚随和的棕色皮肤土人、棕色皮肤姑娘，也都永远消失了。这里所能见到的，只有企鹅在光秃秃的沙滩上摇摇摆摆地晃来晃去，一有人接近，便惊慌地一扑一扑跳开去。另外就只有海狮在岩石不时笨拙地、懒洋洋地翻几个跟头，此外就再也见不到其他的生物了。看来，在这片抑郁的不毛之地上，好像所有的人和动物都绝迹了。惟一一次碰上几个打猎的土人，粗壮慓悍，浑身上下像爱斯基摩人一样裹满兽皮，一见到人地惊慌地钻到岩石后面躲起来，任凭船上的人拼命挥动带响声的小玩意和色彩艳丽的花帽子，都无法把他们再吸引过来。总之，只要有人想接近他们，他们便不客气地逃得远远的，任你再怎么找，都休想找到半点可以追踪他们住处或是行动的蛛丝马迹。

航行推进得越来越艰难，也越来越缓慢。麦哲伦仍然坚持

沿着海岸线前进。每一个小海湾，就连最小的入海口他都要去认真地测试一下水的深度。虽然他早已不再相信那张早先诱使他进行这次航行，而后又在途中出卖了他的神秘地图，但却还抱着一丝希望，也许，也许真会有奇迹出现，在前面某个地方会突然出现一道海峡，而他们也终于可以在冬天到来之前进入南海。人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逐渐失去信心的麦哲伦还是紧紧地抓住这最后的一线希望。也许这张地图和葡萄牙舵手们只是在纬度的确定上有偏差，也许海峡的位置比这些人虚报的还要再往南偏几海里。当船队在二月二十四日再一次驶近一个宽阔得望不到边的海湾——圣马提阿斯海湾时，几乎被狂风吹熄的那微弱的烛火又燃起了熊熊的希望之焰。麦哲伦立即又派遣那几只小船前去侦察，弄清楚这条是否就是盼望中那条通向马鲁古群岛的通道。船队再一次徒劳而返。这又只是一个封闭的海湾。他们还考察了另外两个海湾，“企鹅湾”（因湾内特别多企鹅而得名）和“历险湾”（因纪念在此处登陆的船员曾遭遇到的无比艰险而得名），也同样徒劳无获。冷得半死的船员们从岸上带回来的只是死去的海豹，没有意想中的好消息。

沿着海岸线的航行在满布阴霾的天空下继续着，推进着。沙滩越来越荒凉，白天越来越短，夜晚则越来越长。迎面而来的不再是和煦的微风。冰凉的波涛粗暴地撕扯着船帆，大雪和冰雹敲打着船身，灰色的海洋翻卷着凶险的巨浪。船队从拉普拉塔河口到圣胡利安湾这短短的一段，走了整整两个月，而且一路都在和恶劣的天气作斗争。船员们几乎天天都在同这个地区不停狂啸的飓风，能摧折桅杆、扯破船帆的强烈阵风搏斗。天气越来越冷，天色也一天比一天暗淡，可海峡却始终不曾出现。失去的那几个星期现在开始了无情的报复。因为船队在花时间

考察每一个海湾和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冬天已经赶到了前面，它现在就拦在船队面前，成了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用风暴挡住全队的去路。半年的时间就这么白白地溜过去了，麦哲伦丝毫没有比他离开塞维利亚那天更接近他心目中的目标。

船员们也渐渐开始表示出明显的不安。他们凭直觉感到，一定有些事情不对头。在塞维利亚招募船员的时候不是说这次航行的目的地是香料群岛，是闪烁着夺目光芒的南方，是天堂般的世界吗？奴隶恩利柯不是把他的故乡描绘成遍地都是贵重香料，毫不费力就伸手可得的极乐世界吗？当时不是许诺过让他们个个都发财，而且可以很快返航的吗？可现在怎么全变了？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带领着他们往越来越冷的贫穷荒滩上前进，有时昏黄微弱的阳光也会透过云层，照射着有限的一小片天空，而绝大多数时候天空中总是乌云密布，白雪纷飞。寒风吹过面颊像刀割一样，穿透层层衣服像尖刀刺骨一样。如果想抓住结冰的缆绳都足以让双手冻僵，每呼一口气都会在嘴边化成一团团白色烟雾。而且四周又荒凉得令人绝望，就连食人族也因为惧怕这里的寒冷而逃之夭夭。船员们登岸时，岸边既没有动物，也没有植物，只有贝壳和海狮，它们也宁愿蜷缩在冰凉的水里，而不愿呆在老被暴风雨冲击的荒凉沙滩上。这个疯狂的葡萄牙人将他们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鬼地方！他还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他最后是不是想把他们都带到冰封的世界或者干脆带到南极去呢？

麦哲伦徒劳地试图平息船员们的大声抱怨。他对他们说：“你们不该被这一点寒冷吓倒，丧失你们的勇气。挪威和冰岛的海岸线纬度不是更低吗？可是春天在那里航行不是也和在西班

牙一样轻快吗？只要我们都再坚持几天。如果万不得已也可以就在这里过冬，等天气好一点再继续航行。”可这些空洞的话语再也不能让船员们平静下来。这两者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他们的国王绝对没有预料到会航行到这么严寒的地方，海军上将提到的挪威和冰岛也完完全全是另外一回事。首先那里的人们从孩提时代起就习惯了寒冷，再说他们知道，每次出海都不过是离家八九天，最多也是两星期的路程。可这些船员们却给赶到了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这里别说不曾有过基督徒的足迹，就连异教徒或者食人族都没有，甚至连狗熊或者狼都没有一只。那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呢？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这条远路呢？明显有另一条东印度航线可以顺利通往香料群岛，可以不经过这些结冰的海岸和玩命地带。船员们就这么公开地对海军上将的回答提出反问。而在私底下，在船舱的阴影遮掩下，无疑就抱怨得更历害了。在塞维利亚时就已流传着的怀疑又扩散起来：这个阴险的葡萄牙人是不是一个“两面派”？他是不是在玩两面的把戏呢？他是不是为了重新获得葡萄牙国王的宠信就卑鄙地妄想毁灭五条上好的西班牙船只和船队的全体船员来邀功呢？

西班牙船长们暗自怀着满意的心情关注着船员们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而他们自己并不掺和进去，他们避免和海军上将直接交谈，反而更加审慎地越来越沉默，一言不发。他们的这种沉默比船员们溢于言表的不满可要危险得多。因为他们对航海学在行得多，所以麦哲伦按照虚假的地图走上了一条错路，连他自己也早已对自己的“秘密”失去了信心，这些都瞒不过他们的眼睛。很明显，如果这位海军上将果真知道那条所谓的“海峡”的准确的经度和纬度位置的话，那他为什么要让船队在拉普拉塔河口毫无意义、毫无结果地白白探察十五天呢？他又

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时间，连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海湾都要作长时间的详细探测呢?当他很肯定地宣称他知道海峡的位置时，他要么就是欺骗国王，要么就是欺骗了他自己。现在已经可以断定：他只是在“寻找”一条通道，一条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的海峡。西班牙船长们不加掩饰地幸灾乐祸，他们看着麦哲伦探测每一个小海湾，又一再地在弯曲错落的海滩上碰壁。好吧，就让麦哲伦把船队继续带领到冰冻、遥远的地方，他们用不着阻止他，也不用再向他抱怨，胜利的一刻很快就会来到，麦哲伦终将会自己承认：“我无法再指挥前进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向何处前进。”这一刻也就是他们夺取指挥权，击败这个沉默寡言、傲慢无礼的家伙的时刻。

不能想象还有比麦哲伦在这段日子里更加恶劣的心情。自从他寻找海峡的梦想遭遇到两次极度失望以后——第一次是在拉普拉塔河口，第二次是在圣马提阿斯湾——他已经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他对彼海姆那张地图的坚信不移，还有他对不熟悉的葡萄牙舵手们所说的话轻率地信以为真，统统都是错误的。现在最有利的情况就是，这个可恶的海峡确实存在，那它就应该是在更南一点，几乎接近南极的地方。即使真有这种最有利的情况，要在今年内找到这个海峡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冬天已经赶到了他的前面，毁掉了他的一切计划。即使他们现在就找到海峡的话，这个由饱受侵蚀、满负荷运行的船只和满怀怨言的船员所组成的船队也无法在开春前穿过海峡。九个月就这么白白地过去了。麦哲伦并没有像他先前承诺的那样，带领船队在马鲁古群岛登陆。船队仍然在没有路的大海上盲目航行，为了生存，还要和最凶猛的暴风雨搏斗。

最明智的做法是：现在就讲出实情。麦哲伦应该把船长们召集起来，向他们解释，是地图和有关海峡的传言欺骗了他，寻找海峡的工作只能等到开春后才能继续。目前最好是回航，避开风暴，再回到亲切、温暖的巴西海岸，在那里度过一个舒适的冬天，也让船只和船员们在开春后继续南行之前好好休整一下，恢复元气。这是最适宜的做法，也是最人道的方式。可是麦哲伦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后退了。他欺骗别人和欺骗自己——说他知道通往马鲁古群岛的新的捷径——也已经太久了。他还严厉地惩罚了对于他的秘密稍有怀疑的人，他侮辱了西班牙船长们，还将船上最高级别的皇家官员撤职查办，像对待罪犯一样关押起来。这一切只能以一次巨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来补偿。如果他只是稍作暗示——更别说向所有人公开承认——他对这次航行的结果绝非像他在国内对国王所作的保证那样充满信心，那么西班牙船长们和全体船员连一小时、一分钟都不会再服从他的指挥，就连位置最低的一个见习水手也会拒绝在他面前脱帽致敬。麦哲伦此时已没有退路了。一旦他命令向巴西回航，他将不再是西班牙官员们的指挥者，而将沦为他们的阶下囚。于是麦哲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像科尔特斯在同一年里为了阻止将士们返航而烧毁了船队其余的船只一样，麦哲伦决定把船只和船员们阻截在一个更偏远的地方，那么，即使他们想迫使他返航也不可能了。如果他在开春后能够找到海峡的话，这一仗他就赢了。如果找不到，他就全盘皆输。对于麦哲伦来说，再没有其他中间道路可走，只有顽强才能给他带来力量，只有大胆才能拯救他逃离困境。这个总让人捉摸不透的人又在不动声色地准备下一次决定性的出击。

天气一天比一天恶劣，暴风雨也一天比一天更寒冷，猛烈

地冲击着船队。船只在这种气候下几乎无法前进，整整两个月过去了，船队像蚂蚁爬行似地才向南推进十二个纬度。三月三十一日，在空寂的岸边终于又出现了一个海湾。海军上将的第一瞥视线里蕴含着的已经是最后的希望:海湾是否是畅通的?这就是梦寐以求的那条海峡吗？不是，海湾又是封闭的。尽管如此，麦哲伦还是命令船队驶进海湾。经过初步的探查发现这里并不缺乏新鲜的饮用水和鱼类，于是他下令在此抛锚。当船长们和船员们得知，他们的海军上将（事先没有征询过任何人的意见，也没有征得任何人的同意）决定在这里，在圣胡利安湾，在这个纬度达到四十九度的陌生的、无人居住的海湾，在这个从来没有航海家到过的地球上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之一过冬时，无不感到诧异和恐惧。

滕奕丹 译

叛　乱

1520 年 4 月 2 日—1520 年 4 月 7 日

在圣胡利安湾这个远离尘世，又乌云密布的阴冷牢笼中，双方原本在海上就日益紧张的关系必定会导致更加激烈的冲突。然而麦哲伦面对船员们如此膨胀的不满情绪，居然还能毫不退缩地采取可能会加剧这种情绪的紧急措施，这正是对麦哲伦坚定不移的刚毅性格的最好证明。只有麦哲伦最清楚地知道，船队最快也要在几个月之后才能到达富饶的热带地区，于是下令将船队携带的食品严格按定量配给。要这样做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在这个几乎是世界尽头的地方，向这班已经怨气冲天的船员们宣布，立即要大量削减每天的面包和烧酒配给等于是要进一步激怒他们。

事实上正是这一严厉的措施后来挽救了整个

船队。如果不是这时节约下了充足的食品贮备，船队根本无法完成这次著名的、历时百余日的穿越太平洋之行。可当时船员们内心根本不关心这项措施的目的，只是对这种限制丝毫不愿接受。本能——一种完全正确的本能告诉水手们，即使他们的海军上将真能凭这次航行立下天大的功勋，赢得极高的荣誉，为了他的胜利，他们中间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将会因为饥饿和严寒，还有途中的种种艰难困苦而痛苦地死去。他们抱怨道：没有足够的粮食就该打道回府。现在他们已经走到了比人们想象中任何一只船能到达的地方更远的南方，在国内，绝不会有人指责他们没有履行职责。他们中间已经有几个人冻死了，他们当初应召而来是去马鲁古群岛，而不是来这么个冰封的鬼地方。按照当时西班牙史学家们的记载，麦哲伦是以与他平时简单而缺乏热情的说话方式很不相符的演说来回答船员们的不满言论的。这番演说带有太多普鲁塔克① 和修昔底德② 的意味，因而简直就不可信。他说他非常惊讶，他们，作为卡斯蒂利亚人，竟表现得如此软弱，似乎忘记了作这次航行是为国王和祖国效劳。他还说，当他接受指挥官这一头衔时，他原本认定会在同伴们身上也能找到，自古以来一直鼓舞和激励着西班牙民族的勇敢精神。而他自己则决定，宁可死，也决不可耻地回去。他劝说船员们要耐心地等待冬天过去，他们现在经历的艰难困苦越多，日后国王对他们的奖赏也就越丰厚。

---

①普鲁塔克（约 49—119）是罗马帝国时期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著有《道德论丛》和《希腊罗马名人列传》。

②修昔底德（约前 460—前 400）是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然而，从来就不曾有什么动听的花言巧语能说服得了辘辘饥肠。在这个危急时刻解救麦哲伦的并不是他的滔滔雄辩，而是他毫不妥协，寸步不让的决断魄力。他故意一开始就激起反抗情绪，正是为了再以强硬手段即刻摧毁它，宁愿立即彻底摊牌，而不要让人难受地拖拖拉拉！宁愿与暗藏的敌人正面对抗，而不要让对手把自己逼进死角！

麦哲伦不能再自我安慰了，一定要作最后的摊牌，而且必须马上去做。然而，在麦哲伦和船长们之间，因为互相保持缄默而又暗地里互相监视的紧张状况在过去一段日子里已经达到极点，要在同一艘狭小的船上继续保持冷淡和疏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天比一天，一小时比一小时更难以忍受。这种沉默迟早总会引致一场大骚乱，甚至引发武力冲突。

事情发展到这样一个危险的地步，责任更主要是在麦哲伦，而不在于西班牙船长们，把这些不对麦哲伦惟命是从的西班牙官员们描述成一伙妒忌天才，与天才为敌的可耻叛徒，不过是人们最惯用的，最简便的手法罢了。在这个紧要关头，船长们不仅有权力，更有义务要求麦哲伦对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作出说明，这不仅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命，更关系到国王托付给他们的这个船队的命运。如果查理五世正式任命卡塔赫纳、缅多萨和安东尼奥·德·科卡三人为他的船队的监察官、司库和会计，那么，他在授予他们头衔和高薪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同等的责任。他们必须监督和看管皇家财产——五艘船只；一旦这些西班牙皇室财产遇到危险，他们还必须负责进行保护。而现在，这些财产确实遇到了危险，致命的危险。许多个月过去了，麦哲伦并没有找到他预料中的那条通道，也没有如期到达马鲁古群岛，因此，在麦哲伦明显地慌了手脚，没有了主意的时候，

领取皇家俸禄并曾宣誓效忠国王和谨守责任的皇家财产监护人最后一次要求麦哲伦，将他那“伟大的秘密”透露那么一丁点，让西班牙船长们稍微了解一下底牌，这一举动是完全适当的和正确的。西班牙官员们提出的不外乎是那些最合情合理的要求：领队先生该停止他这种独自严守秘密的方式了，应该和其他船长们一起坐下来，共同商讨船队下一步的航行路线。正如德尔·卡诺在他后来的证词中总结性地说道：“我们只要求他听听我们的意见，并且告诉我们他究竟要去什么地方。”

然而，可怜的麦哲伦此时却不能摊牌——在他确定王牌确实掌握在他手里之前，这是他的痛苦之处，但却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不能出示马丁·彼海姆的地图来为自己辩解，地图上标明的海峡位置是在南纬四十度，这当然是错的，在撤了胡安·德·卡塔赫纳的职之后，他也不能再承认，是受了错误情报的欺骗，欺骗了你们大家。他不能允许别人向他提出任何关于他承诺过会找到的这条海峡的位置或是下落的问题，因为连他自己也自始至终都不知道答案。他不得不装聋作哑，紧闭双唇，握紧双拳，随时准备着，一旦这种纠缠不休的刨根问底变本加厉，就予以还击。总的来说，现在的情形是：皇帝官员们会死缠住麦哲伦，要求这位老是避而不答的、倔强的海军上将，一定要说清楚下一步的打算；而麦哲伦却会坚持不允许别人强迫他回答问题，他一日不找到海峡，他的这盘账就一日与他的承诺不符，勉强作答，只会将他的信誉和权威破坏殆尽。

很明显，军官一方是正确的，而麦哲伦此时则陷于困境中。如果他们此时死缠住麦哲伦不放，那这种逼迫也不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而是他们应尽的义务。还应当赞赏的是，船长们并没有对麦哲伦进行阴险的突然袭击。他们还是对他做出了最后

的暗示，让他知道他们的忍耐快到头了。只要麦哲伦愿意，他是完全能明白这暗示的意思的。于是，为了减轻自己独断独行和发号施令引起的船长们的愤怒情绪，麦哲伦做出了一个很礼貌的姿态，他邀请他们在复活节星期日和他一起听晨祷，然后和他一起在他的旗舰上进餐。可是这些西班牙贵族们也不是这么容易被收买的，如果这次进餐只是一次纯粹的聚餐的话，他们还是不会善罢干休的。这位仅靠几句大话和诺言骗得圣地亚哥骑士勋章的“尊敬的”斐尔劳·德·麦哲哈斯先生，在过去的九个月里，从未将他们当作有经验的航海家和皇家官员看待，也从未礼貌地——哪怕只有一次，向他们请教过关于船队的问题，于是他们也礼貌地谢绝了共同进餐的这一“殊荣”。甚至于，他们根本都没有对此表示感谢，认为就连表示礼貌而做出谦虚的姿态都是多余的。三位船长：加斯帕尔·凯塞达，路易斯·德·缅多萨和安东尼奥·德·科卡更是连拒绝两个字都懒得说，故意把海军上将的邀请当成耳边风。椅子摆好了，却没有人来入座；碟子上盛满了美味佳肴，却没有人品尝一下。只有麦哲伦孤独、闷闷不乐地和他的堂兄弟阿尔瓦罗·德·麦斯基塔坐在摆满美酒佳肴的餐桌旁，他还是麦哲伦利用自己手中的绝对权力才得以任命为船长的，很可能这桌原本作为和平宴会而摆下的复活节大餐也不合他的胃口。三位船长以他们的集体缺席公然提出了挑战，他们这也是公然知会麦哲伦：“弦已拉紧！你要当心自己，还是醒悟过来，悬崖勒马吧！”

麦哲伦完全懂得这个警告的含义。但是任何事情都无法干扰这个思想犹如铁一般坚定的汉子。他平静地同麦斯基塔一起坐在餐桌旁，丝毫没有流露出不满或是抱怨的情绪，他冷静地

在船上照常发布各项命令，然后晚上还从容地伸展沉重、健壮的身体，准备就寝，不一会，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五只船犹如五只正在昏昏欲睡的黑色巨兽，一动不动地匍匐在海湾的阴影中，在一艘船上几乎都看不清另一艘船的轮廓，这是一个完全被雾霭笼罩着的，黑漆漆的漫长冬夜。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无边黑暗中没有人看见，在海潮猛烈的拍击声中也没有人听见，午夜时分，有人驾一只小艇静静地离开了其中一艘船，悄无声息地驶近“圣安东尼奥号”。更没有人想到，在这静悄悄、鬼鬼祟祟的小艇上竟藏着三位西班牙皇家船长：胡安·德·卡塔赫纳，加斯帕尔·凯塞达和安东尼奥·德·科卡。他们的计划非常大胆，也相当巧妙。他们知道，要将一个像麦哲伦这样厉害的对手逼到墙角，不仅需要拥有一般优势，更要拥有绝对的优势才行。西班牙船长在船队的绝对权威是查理五世预先就明智地安排好了的。在船队出发时他只将一艘船，也就是麦哲伦的旗舰全权托付给葡萄牙人，考虑到船队的力量平衡，将其余四艘船都置于西班牙船长的掌握之下。无奈国王所希望的这种权力分配在途中已被麦哲伦用他的强硬措施改写了。他先是将胡安·德·卡塔赫纳以“不可信赖”为由撤职查办，然后又用同样的借口撤消了安东尼奥·德·科卡“圣安东尼奥号”船长之职，更把这艘船队第二大，意义也仅次于旗舰居于第二位的船只的领导权交到了他自己的堂兄弟麦斯基塔的手中。手里牢牢掌握了这两艘大船，那么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刻，他也仍然是船队的军事首领。所以，要打破他的防卫，恢复国王确立的秩序，只有一个方法：重新夺取“圣安东尼奥号”的领导权，用一种不流血的方式解除这位未依合理程序被任命的麦斯基塔船长的实权。这样一来，西班牙船长们又占有三比二的优势，可以拒不

服从海军上将继续航行的指令，直到他终于对皇家官员们的问题做出回答。

计划布置得天衣无缝，这几位久经沙场的船长们行动起来也分毫不差。小艇载着三十名荷枪实弹的船员小心翼翼地驶近还在酣睡中的“圣安东尼奥号”。因为是在海湾里抛锚停泊，所以甲板上连站夜岗的人都没有——在这个地方谁会想到还会有敌人来偷袭呢？偷袭者们由胡安·德·卡塔赫纳和安东尼奥·德·科卡在前面带路，沿着绳梯爬上甲板。因为他们二人以前都曾经是这艘船的船长，所以即便是摸黑，也能熟练地找到船长休息室。阿尔瓦罗·德·麦斯基塔迷迷糊糊地还没来得及从床上挣扎起来，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武装的船员包围了。他们立即给他戴上脚镣，把他扔进司书的舱房里。直到这时，才有几个船员被惊醒。其中之一，舵手胡安·德·艾洛里亚加意识到是有人叛乱，于是很严厉地质问凯塞达，半夜里到别人的船上来干什么。凯塞达飞快地用匕首对他连刺六刀，算是回答。艾洛里亚加倒在地上，血流如注。甲板上所有的葡萄牙人都被锁上了镣铐，这样一来，就算是麦哲伦最忠实的拥护者也被锁得严严的，动弹不了。为了收买船上其他的船员，凯塞达下令打开贮藏室，允许每个船员都敞开肚皮大吃一顿，痛饮一回，一醉方休。除了使用匕首这一令人不快的小插曲给这次“单纯”的突袭行动增加了一点血腥和叛乱的气氛，可以说，西班牙船长们这次的突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胡安·德·卡塔赫纳，凯塞达和德·科卡又可以放心地回到自己的船上，让这几艘船也作好紧急情况时的战斗准备。“圣安东尼奥号”被托付给一个叫胡安·塞巴斯蒂安·德尔·卡诺的人指挥，此人的名字在这里还是第一次出现。此时此刻他被任用，是为了阻止麦哲伦实现其

梦想，而后来，在另一时刻，命运却选择他，恰恰是此人，去完成麦哲伦的大业。

大船又像黑色的巨兽般纹丝不动地匍匐在海湾的阴暗处，没有一丝声音，一线光亮透露出刚刚发生过一场叛乱。

在这个阴冷的地方晨光也冷冷地姗姗来迟。五艘船还像原来一样漂浮在这个监牢似的酷寒的海湾，位置一点都没变。麦哲伦从表面的迹象无论如何都看不出，他忠实的兄弟和朋友，还有“圣安东尼奥号”上所有的葡萄牙人都已经戴上了镣铐，指挥整艘船的已不是麦斯基塔，而是另一个叛乱者。现在，桅杆上还是和以前每天一样飘扬着同样的信号旗，从远处看来，一切都没有变化。于是，麦哲伦也像每天早晨一样命令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从“特立尼达号”上派一只小艇去岸边搜罗每天所需的木材和淡水。照例，这只小艇每天都会先靠上“圣安东尼奥号”，船上也同样会派几名水手跟着去取木材和淡水。可是奇怪，这一次小艇驶近“圣安东尼奥号”时，船上没有放下绳梯，也没有水手出现。当艇上的桨手不耐烦地冲着上面大声叫嚷，要他们动作放快一点时，得到的却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回答：这艘船不再听从麦哲伦的命令，只服从加斯帕尔·凯塞达船长的指挥。这个回答无疑太出乎意料，于是小艇立即返回旗舰，向海军上将转达这一消息。麦哲伦很快就对形势做出了判断：“圣安东尼奥号”肯定已落入叛乱分子手中。可是，就连如此致命的意外也一刻都不会加速他脉搏的跳动，干扰他清晰的思考。首先要做的是要对危险程度做出估计：有几艘船还拥护他？又有几艘船是反对他呢？他毫不迟疑地派小艇在船只之间来回穿梭，探听消息。除了无足轻重的“圣地亚哥号”，另外三艘船：“圣

安东尼奥号”“康塞普西翁号”和“维多利亚号”都宣称站在叛乱者一边。三比二，或者不如说是三比一，因为“圣地亚哥号”几乎不具备作战能力，根本不能计算在内。这场游戏看来是必输无疑，任何人处在这个位置上都不会再玩下去，麦哲伦投身多年的事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单靠这艘旗舰他是不可能继续他那往陌生的远方的航行的，而另外那几艘船，他既不能放弃，也无法迫使它们听命于他，在这片还未曾有任何一艘欧洲船只航行过的海域他求助无门。对于麦哲伦来说，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只剩下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基于他现在所处的劣势也是理所应当的:放弃他一贯的固执,和西班牙船长们达成谅解。当然还有既荒谬、也颇具冒险性的第二条路：孤注一掷，即使毫无希望也奋力一试，作一次决定性的反击，将叛乱者彻底击败。

一切条件都表明应该走达成谅解这条路。西班牙船长们并没有危害到麦哲伦本人，他们也没有对海军上将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他们的船一动不动地停泊在那里，看来暂时也没有发动进攻的打算。他们即使占有绝对优势，也不愿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作无谓的兄弟相残的争执。他们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故乡，在塞维利亚，在教堂里所发下的誓言，他们也太了解对叛乱者和逃兵将施以何等侮辱性的惩罚。像胡安·德·卡塔赫纳，路易斯·德·缅多萨，加斯帕尔·凯塞达和安东尼奥·德·科卡这样被国王册封为亲信的贵族老爷们，都希望能载着荣誉，而不是背负着叛徒的可耻声名回到西班牙。所以他们并没有仗恃着数量上的优势进行威胁，而是从一开始就表示愿意进行友好的谈判。他们夺取“圣安东尼奥号”并不是想大开杀

戒，只是想向海军上将施加压力，迫使这位顽固的寡言者最终能就皇家船队今后的航行路线向他们清楚地作个说明，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好。

所以，加斯帕尔·凯塞达代表西班牙船长写给麦哲伦的信也绝不是一封战书，恰恰相反，只是一封恳求信。信的开头谦卑地写着“面呈”的字样，而且一开始就很留意于遣词造句，为前夜的突袭行动辩护。说正是因为受到海军上将的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才被迫采取夺船行动，他们是国王任命的船长。他们希望麦哲伦不要把这一行动理解为他们要剥夺国王授予他作为海军上将所拥有的权力。他们只是要求海军上将今后对待他们态度稍好一些，如果他们这个小小的合理要求能够得到满足的话，他们不但会对他言听计从——这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还会满怀尊敬为他效劳。（信件的西班牙原文辞藻过于夸张华丽，无法一字一句准确翻译过来：今日我等吻着大人的手足，恳请施恩，日后我等仍将惟大人马首是瞻。）

面对西班牙船长们毋庸置疑的军事优势，他们的这一提议对麦哲伦来说无疑也是一条绝好的出路。然而他早已决定要走另一条冒风险的路。他犀利的目光一下就发现了对手的弱点：缺乏自信。其实他们信中的语气已经暴露出，这场叛乱的组织者们内心并不想把事情闹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占有优势，麦哲伦还是从他们的这个弱点中找到了惟一可以进攻的突破点。如果将这个机会善加利用，像闪电般迅速出击，也许还可以扭转局面，如果够胆识的话，甚至还可以将本已输掉的一盘再赢回来。

但是——这一点必须一再重复，一再强调——大胆这个概念对于麦哲伦来说又别有一番含义。大胆行事在他看来绝不意

味着因一时的头脑发热而鲁莽出击，或因一时冲动而不顾一切，相反，大胆表现在遭遇到最危险的事情时也要极度小心，先进行最周密的盘算，然后才行动。所以麦哲伦每次实施大胆的计划都像是炼一块好钢一样，先将它放在炽热的情感之火上锻炼捶打，再放入理智的思考之冰中淬火，所以每次面对困难他都能凭借想象和警觉的结合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麦哲伦此时认识到：他必须做和船长们所做的同样的事，他必须至少再夺取一艘船，重新取得主动权。这件事叛乱分子当时做起来是多么容易，而现在麦哲伦要做却又是何等困难呵！叛乱者们是趁黑夜突袭一艘毫无防备的船只，船长在睡觉，船员们也都在睡梦中。没有任何人进行抵抗，没有任何一个水手手里握有武器。可现在是白天，疑心重重的船长们在紧盯着旗舰上的麦哲伦的一举一动，火炮和石弹都已准备就绪，火枪也已上膛。叛乱者们太了解麦哲伦的冒险精神了，他们知道他会进行最大胆的进攻的。

然而他们只了解他的冒险精神，却不了解他的神机妙算。他们没有料到，这个神算者居然胆敢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来：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去进攻三只武装精良的大船。他没有把关押着他堂兄弟麦斯基塔的“圣安东尼奥号”作为此次冒险行动的目标，——这一招很聪明——对方这艘船毫无疑问早已准备好，正等着他出击呢。正因为对方准备好了他从右面的进攻，他偏要从左边出拳，不打“圣安东尼奥号”，而攻“维多利亚号”。

这次反击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的推敲。首先麦哲伦扣留了为凯塞达传递恳求信、提出谈判建议的船员和他们的小艇。这样做达到了两个目的：首先，一旦发生正面冲突，可以削减

叛乱者一方几名战斗队员；其次，当他发动突袭时，他手里掌握的不是一只，而是两只小艇。而这一看上去极其细微的优势在即将开始的行动中将会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他可以保留着自己原有的小艇，派遣对他绝对忠诚的军需官，船队的卫士长冈萨洛·戈麦斯·德·艾斯皮诺萨和另外五名船员，乘他从叛乱分子手中夺过来的另一只小艇去“维多利亚号”，给叛乱船长路易斯·德·缅多萨送回信。

叛乱分子们站在自己已经充分装备妥当的大船的甲板上，镇静地看着小艇逐渐划近，丝毫没起疑心。一只只载着五个人的小艇又怎么可能对一艘由六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着的，枪炮都已上膛的大船发动进攻呢？更何况这艘船还是像在缅多萨这样精明能干的船长的指挥下呢？大船上的人当然看不出来，这五个看似普通的水手在他们的外衣底下都暗藏有武器，戈麦斯·德·艾斯皮诺萨更是身负重大使命。他跟着五名水手不慌不忙，非常从容地按照事先计划的速度——每一秒钟都经过了精确的计算——故意慢吞吞地登上甲板，向船长路易斯·德·缅多萨转交麦哲伦的亲笔邀请信，邀请船长上旗舰去与海军上将对话。

缅多萨将信展开。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初在“特立尼达号”上，胡安·德·卡塔赫纳被当作“罪犯”突然逮捕起来的那一幕。不，路易斯·德·缅多萨可没有那么蠢，绝不会让自己掉进同样的陷阱里去。“我是不会被你骗过去的。”他一边看信，一边笑着说，可他的笑声最后却变成了一声低沉的咕噜——卫士长的匕首已经刺穿了他的喉咙。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家请看，麦哲伦是多么巧妙地计算好了从一只船到另一只船每一桨划动的速度和距离——另

外十五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又在杜亚特·巴尔波查的带领下乘“特立尼达号”上原有的小艇来到了“维多利亚号”，并迅速登上了甲板。甲板上的船员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船长被军需官一刀毙命后的尸体躺在地上，根本还没来得及对发生了的一切做出反应，没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动，杜亚特·巴尔波查早已接管了全船，派他手下的士兵占据了船上所有的要害位置，并且在对他们发布各项命令了。缅多萨的这些心惊胆颤的船员们只有乖乖听命的分了。另两艘叛乱船只还没有意识到“维多利亚号”上发生了仿如晴空霹雳般的大变故，一眨眼，它已起锚升帆，作为海军上将名正言顺的战利品向旗舰驶去。现在，“特立尼达号”“维多利亚号”和“圣地亚哥号”将联手对付“圣安东尼奥号”和“康塞普西翁号”，三艘船已经占据了海湾和河口，封锁了叛乱者的每一条退路。

因为这次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天平的这端又高高地扬了起来。本已输掉的一盘又赢了回来，短短的五分钟里叛乱船长们就成了输家。眼下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种选择：逃跑，对抗到底或者不战而降。麦哲伦早已想到了对付他们逃跑的方法，三艘大船已经堵住了海口，他们无路可逃。要对抗到底也是不可能的，麦哲伦凶猛的出击已经摧垮了对手的意志。即使加斯帕尔·凯塞达现在一手拿长矛，一手执利剑，全身披挂，亲自带领船员们应战，也于事无补，他的士兵们都已吓得惊惶失措，根本不再听从他的指挥。麦哲伦剩下来要做的就只是派小船载着他的士兵登上甲板，“康塞普西翁号”和“圣安东尼奥号”上所有的抵抗都会停止。阿尔瓦罗·德·麦斯基塔在被囚禁了几小时以后又重新获得了自由，曾使麦哲伦这位忠实战士饱受屈辱的镣铐，现在却是铐在叛乱船长们的手上。

紧张的气氛像是夏天的雷雨一样，猛的来一阵，很快就结束了，一次出击就彻底地粉碎了叛乱。也许这场公开 的战斗还只是这次斗争中比较容易解决的部分。根据航海法和军法，接下来还必须对叛乱分子进行审判，这才是麦哲伦心里最矛盾的地方。按照国王的委任令他享有决定叛乱分子生杀的绝对权力，可这些重犯们同样也是国王最信任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他必须严惩叛乱分子，但不是全部。如果按照军法将占全船队五分之一的叛乱者都钉死在横杆上，那船队还怎么继续航行呢？在这个离乡万里，又荒无人烟的地方，海军上将不能失去这么多好劳力。他必须带着这些罪犯们继续航行，以自己的善意把他们重新争取过来，而另一方面也要杀一儆百，以示惩戒。

为了以严厉的威慑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麦哲伦决定要牺牲一个人来做榜样。他选中了惟一使用匕首，使他忠实的舵手艾洛里亚加受了致命伤的船长加斯帕尔·凯塞达。这一极其严肃的审讯开始得非常隆重：有书记员被邀到场，证人的每句证词都一如在塞维利亚或者萨拉戈萨①的正式法庭上一样，按照完全相同的格式，详而又详地记录在案，在巴塔戈尼亚海岸②这片不毛之地上，贵如饮水的纸张被他们写满了一张又一张。在这块“无主领地”上进行的审讯由麦斯基塔主持，他指控原皇家船队船长加斯帕尔·凯塞达犯了杀人罪和叛乱罪。然后由麦哲伦判决。凯塞达被判处死刑。海军上将给予西班牙贵族老爷的惟一恩惠就是：不用绞索而用剑来行刑。

可是，由谁来担任刽子手呢？全体船员中恐怕都找不出任

①西班牙东北部大城市。——译注

②在阿根廷境内。——译注

何一个人自告奋勇来担当这个差使。最后终于还是选定了一个刽子手，然而条件却是很残忍的。凯塞达的贴身侍卫也参与了对艾洛里亚加的突袭行动，是杀害艾洛里亚加的帮凶。现在只要他答应砍掉凯塞达的头，就可以免他一死。要么自己被处死，要么处死自己的主人，要在其中做出选择让凯塞达的贴身侍卫路易斯·德·莫利诺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充满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而最后他还是同意行刑。他一剑砍掉了前主人的头，从而保住了自己的脑袋。按照当时的野蛮风俗，凯塞达的尸体和之前已被杀死的缅多萨的尸体都要被肢解，然后还要将没有四肢的尸体挂在木杆上示众，伦敦塔和欧洲其他刑场上惨无人道的风俗第一次用在了巴塔戈尼亚的土地上。

可是，这些还不够，麦哲伦还要做出另一项判决。谁能断言这项判决比一剑斩头的判决更轻还是更重呢？叛乱的真正主谋胡安·德·卡塔赫纳和一个一直在煽风点火鼓动叛乱的牧师也被宣判有罪。然而，一贯敢作敢为的麦哲伦此时也不敢签署明确的死刑命令。海军上将不能把国王委派的，和他处于同等级别的船长交由刽子手行刑。同时，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也绝不愿担当杀害头上涂过圣油的牧师的罪名。可是，要带着这两个披枷戴锁的主犯继续环球航行也是行不通的。于是，麦哲伦决定将两人开除出船队，以此来避免作令人头痛的选择。当船队升帆继续航行的时候，他们二人会得到一定数量的食物和酒并被留在此地，留在圣胡利安湾荒凉的岸边，然后就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他们是死是活了。

麦哲伦做得对吗？抑或他在圣胡利安湾所作的死刑判决是不正确的？他的堂兄弟麦斯基塔所作的法庭上供词记录中没有

只言片语的被告辩护，这份记录是否那么确凿无疑呢？另一方面，西班牙船长们后来回到塞维利亚作证，说麦哲伦为了奖励杀害缅多萨的卫士长和他的士兵们，给了他们每人十二个杜卡特，并许诺会将两位被杀害的贵族的财产也分给他们。那时麦哲伦已去世，无法驳斥他们的这番证词，那么这番证词是否就是正确的呢？任何事情只要一经发生，人们马上就会对此各执一词。如果说后来的历史证明麦哲伦是对的，那人们也不该忘记，历史从来都是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去谴责失败者的。戈培尔有一次也曾说过同样精彩的话："历史才不在乎事情到底是怎样的，它总是站在正在创造丰功伟绩的人和已经创造了丰功伟绩的人一边。"如果麦哲伦后来不是发现了海峡，完成了他的宏愿，那么他处死那些为了要反对他进行危险的航行的西班牙船长们，就会被视为纯粹的杀人罪。然而，正因为他确实是做出了足以令他流芳千古的伟大功绩，证明他是对的，那些悄悄死去的人便被人遗忘了。麦哲伦的残酷无情和不屈不挠即使不从道德的角度，单从他的历史成就来看也始终被认为是正确的。

无论如何，麦哲伦此次的死刑宣判成了他的最佳接班人弗朗西斯·德雷克效仿的危险榜样。当这个既是英雄，又是海盗的英国人在七十年后，在一次同样危险的航行中，受到船员们同样的威胁时，他也在这个不祥的圣胡利安湾抛锚停泊，向麦哲伦曾作的残酷判决献上了又一份贡品。他又重复了麦哲伦所做的一切。弗朗西斯·德雷克完全了解自己的先驱者在航行途中发生的一切情况，他也了解麦哲伦对叛乱者的毫不心软的审判以及所有的证词，据说他甚至在海湾里找到了五十七年前钉死叛乱者的木桩。这次与他作对的船长叫托马斯·都提，就像卡塔赫纳一样，这位船长也是一路被扣押着，直到——真是世

间少有的巧合——船队来到这同一片海岸，甚至是圣胡利安湾里的同一个内格罗港，才被审判。他也被判了死刑。所不同的是，弗朗西斯·德雷克让曾是朋友的他自己选择：是像凯塞达一样受一剑，干脆、体面地死去，还是像卡塔赫纳一样放逐在这个荒滩上。都提对麦哲伦的航海史也略有所闻，他知道，后来再没有人听到过关于卡塔赫纳和那个与他一同被放逐的牧师的任何消息，他们临死前一定受尽了痛苦和折磨。那么，既然一定要死，他宁愿被砍头，干净利落，又不失男子汉气概和骑士风度。沙滩上又落下了一颗人头——所有值得纪念的事业都浸染着鲜血，只有最坚毅勇敢的人才能完成最伟大的事业。这就是人类永恒的命运。

滕奕丹　译

伟大的时刻

1520年4月7日—1520年11月28日

麦哲伦的舰队不幸被寒冷的冬天困结，在这荒凉的港湾里已待了四五个月了。时间在这渺无人烟、极度孤寂的地域流逝着。海军上将很清楚，懒散最容易导致人们的不满情绪，因此从一开始就得让船员们不断地卖力工作。他让大家把航行了一年的船只从龙骨到桅杆彻底检修。他命令，砍伐新的树木，锯成方木。他甚至还会想出一些完全不必要的活计，来蒙蔽船员们。大家还误以为，航行即将重新开始，他们就将离开这难以忍受的寒冷的不毛之地，驶向大家渴望到达的南方诸岛。

春天的最初信息终于来到了。在那寒冷、阴沉、大雾迷蒙的日子里，船员们已经意识到，他们正流落在一个无人地区，一个既无人迹也无野兽出没的荒凉地带，有着明显的可怕感觉，在这

儿好似居住在一座原始的洞穴里，远离着人类社会，这使他们的情绪越加沮丧了。一天早晨，在一座山岗上出现了一个古怪的形影，是一个人，可是一开始他们根本辨别不出，这是同他们一样的人，因为一惊之下，非常奇怪，觉得这个人的身材大大地超出普通一般人。彼得·玛尔蒂尔写道："比普通人高出一倍。"毕加费塔证实："这个人很高大，我们只能达到他的腰部。他的身材非常壮实，面庞宽阔，面孔好像涂上了红色，眼睛周围画上了黄圈，脸颊上画上了心形的斑渍，他的头发很短，染成白色，衣服是用兽皮精巧缝制成的。"使这些西班牙人感到特别惊奇的，是这个庞然大物的一双大脚，为了这双大脚的缘故，他们把这类土著人称之为帕塔戈尼亚人，称这个国家为帕塔戈尼亚。可是，面对亚讷族巨人①最初的恐惧，很快就消失了。因为这个身著兽皮的人，一面微笑，一面张开双臂，载歌载舞，不停地把沙子撒到那染白了的头发上。麦哲伦早就了解这些原始人的习俗，这是向对方表示友好的亲切愿望，于是他命令一名船员，模仿着他的舞姿跳舞，同样也把沙子往头上抛撒。使这些劳累不堪的海员开心的，是这个野人果真把这个哑剧看作为亲切欢迎，十分温顺地走到他们身旁。现在就像在《暴风雨》之后，特林鸠罗一伙终于获得了他们的凯列班②，对生活在荒无人烟地带的这些长期寂寞无聊的可怜的船员来说，他们第一次有了消遣和尽情欢乐的机会。因为当他们把一面小镜子突然递到心地善良的巨人鼻子面前时，他由于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面孔，猛

①圣经传说中的人物。——译注

②特林鸠罗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弄臣，凯列班是剧中野性而丑怪的仆人。——译注

地吓得往后急退，因而撞倒了四名船员。他的胃口很大，竟然让船员们忘记了配给不多的粮食定量。他们瞪大眼睛凝视着，这个卡冈都亚①竟然一口气喝下满满一桶水，一口就吃下半篮子干面包，就像吞下一个用胡椒调制的小胡桃饼。在他们为满足他的极大的食欲而给他几只老鼠时，他连同皮毛一起活生生地把它们全都吞了下去。这可使观众莫名惊讶，周围不禁爆出了一片喧闹声！在这个食量无比的人和船员之间出现了真诚的好感，于是麦哲伦又送给他几只小铃铛，这时，他立即又叫来了几个男性巨人和几个女性巨人。

正是这样的漫不经心给原始人带来了厄运。麦哲伦像哥伦布和其他南美洲的西班牙占领者一样，从东印度公司接受了一项严峻的任务，不仅把他们旅行途中所发现的植物和矿物，而且也要把所有的人种带几个样品回国。最初船员们觉得，要活生生地捉住这样一个巨人，其危险程度不亚于抓住鲸鱼尾翅。他们胆战心惊地围着帕塔戈尼亚人转来转去，可是到了最后一刹那间，他们总是又失去勇气。最终他们卑鄙地施展了一个诡计。他们往两个巨人的手里塞了很多礼物，他俩为了抱住得到的所有东西，只好把两只手全都用上了，然后船员们又向这两个喜形于色、高高兴兴的人亮出了一件特别珍贵的闪光铮亮、叮当悦耳的东西，这是一副脚镣，并且询问地示意着，他们是否愿意把这玩意儿戴到脚上。可怜的帕塔戈尼亚人满面笑容，兴奋地点着头——他们奇怪地想着，这些奇怪的玩意儿，每走一步都会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他们紧紧地抱着赠送给他们的小礼物，好奇地俯首看着，船员们如何把那些轻脆悦耳、冰凉而又

①法国作家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中的人物。——译注

漂亮的脚镣向他们的脚上套去。于是，喀嚓一声，他们全都给锁上了。现在船员们可以无所畏惧地像对待沙袋似地把这些巨人推倒在地，他们全给铐住了，不会有任何危险了。这些受骗上当的土人徒劳地号叫着，在地上翻滚，挣扎，向他们的神灵塞提柏斯（莎士比亚后来也借用了这个名称）求救。东印度公司需要这些希奇古怪的东西！船员们就像拖动击晕了的公牛似的把这些野人拖到船上。他们在船上由于没有食物会活活饿死。由于这些所谓“文化传播者们”的阴险袭击，一下子就破坏了彼此之间的良好和睦关系。这些帕塔戈尼亚人从此便对这些骗子避而远之，有一次一批西班牙人追逐土著人——毕加费塔在这儿的报告极其含糊——目的是捕捉还是拜访几个女性巨人，她们出于自卫，结果一名船员因冒险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圣胡利安这个糟糕的港口，无论是对土著人还是对西班牙人都是不幸。麦哲伦在这儿没有办成任何一件事情，他也不想办成什么事了。他的命运跟这个血迹斑斑的海岸粘在一起了。船员们怨声不绝于耳，只是希望立即离开这儿，指望返回家乡。麦哲伦则渴望着：即刻继续航行，即时前进，随着白昼一天天地变长，两种急躁情绪都在日益增长。那一阵阵最猛烈的冬季风暴几乎刚刚平息下来，麦哲伦就试图起航远行。他把船队里最灵活最快捷的那只小小的“圣地亚哥号”交给可靠的船长谢兰指挥，作为诺亚方舟上的白鸽派出去探听消息。谢兰应当向南航行，探察各个港湾，定期回来报告。时光流逝得很快，麦哲伦焦急不安地瞭望着大海。可是消息来自陆地，不是海上。有一天从山上摇摇晃晃地下来了两个奇怪的人影，起初船员们还误以为他们是帕塔戈尼亚人，大家都剑拔弩张。可是这两个人赤身露体，冻得半死，饿得要命，累得精疲力竭，不

修边幅的人简直像是幽灵，他们用西班牙语向他们叫喊着——他们就是“圣地亚哥号”上的两名水手。他们带来了很坏的消息。谢兰高兴地就要到达一个名 字叫圣克鲁斯河，河口宽阔，鱼产丰富，利于捕鱼，可是当他们正在继续侦察情况时，一阵风暴把船撞到岸旁，砸得粉碎。只有一个黑人死去，其他的人全都幸免于难。大伙在圣克鲁斯河畔身处困境，等待救援。他们两人沿着海岸走到圣胡利安湾，在这可怕的十一天中，他们全是用野草和草根充饥。

麦哲伦立即派出一只小艇。遇难的船员们回来了，可是有人又有什么用呢？派去的那一只船，是所有的船当中最灵活、轻便、快捷的！这是第一个损失，在这儿，地球的另一端的这一损失是怎么也无法弥补了。因为麦哲伦终于在八月二十四日下令起航，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两个留下的哗变者，就离开了圣胡利安湾，也许他内心暗自诅咒让他在这儿抛锚的一些日子。损失了一只船，有三名船长丧失，更为重要的是：过去了一年时光，永不复返了，什么也没得到，无任何发现，一事无成。

这些日子想必是麦哲伦一生中最令人不快的时光，也许是这个一贯怀着坚定信念的人暗自气馁的惟一的一些辰光。可是就在驶离圣胡利安湾的时候，他故作坚定地宣称：他决心，在必要的情况下沿着帕塔戈尼亚湾一直航行下去，直到南纬七十五度，到那时如果还未发现通向另一个大洋的通道，那就只好选择通常的路线绕过好望角了——仅就“在必要时”和“只好”这些费解的措辞，就泄露了他的信心不足。麦哲伦第一次在为自己作后退的准备。他首次在他的船长们面前承认，要寻找的通道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要么它就是在北极的水域里。显

然他内心里已失去信念，他那梦寐以求寻找通道的美好预感，在这关键时刻已离开了他。历史几乎还未造成一个比麦哲伦更有嘲讽意味、更为恶毒的境况，因为他在航行两天之后，又在谢兰所发现的圣克鲁斯河河口再次抛锚，命令船只再次停泊两个月过冬。如果看一看我们今天完美的地理材料，就知他当时的决定完全没有意义。他是这样一个男子汉，受着一种伟大思想的驱使，但却又被一个巨大而完全不真实的消息弄得不知所措，尽管如此，他还会把发现从大西洋通往太平洋的航道，第一次进行环球航行，看成是自己的毕生奋斗目标。他凭着自己不寻常的意志战胜了资料匮乏的局面，他找到了助手，帮助他完成几乎无法实现的计划，他凭着自己思想所具有的令人信服的力量，博得了一个外国君主把一支舰队托付给他，并且成功地率领着这支舰队，沿着南美海岸南下，比他前面的任何一位航海家都航行得更远。他战胜了海上的风雨雷电，战胜了叛乱；任何障碍和失望一直都没使他火热的信念受挫，他势必已接近他所寻找的通道，这是他久所向往的目标。可是，现在突然在他临近胜利之前，这个一向目光敏锐的人被一层迷雾遮住了自己有预见的目光，好像神灵不喜欢他，不怀好意地给他的双眼扎上了一条带子。一五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这一天麦哲伦命令他的船员们继续停泊两个月，实际上他已接近目标了。他本应坚决再前进两度，在他三百天的旅行之后，再航行两天，只要在几千海里航行之后，再行驶几海里，他就会使自己心烦意乱的心灵高兴起来。可是——命运却在恶毒地嘲弄着——这个身遭厄运的人不知道，也没有预感到，他的目标已经是那么近了。在这无聊而又漫长的两个月内，充满着焦虑和疑团，他在这条小河的河口旁，在人们遗忘的这个荒凉的海岸边，期待着春天，

好似一个人蹲在暴风雪中冻僵在自己的茅屋前，可是却没有意识到，他只要向前摸索，再前进一步，就有希望了。两个月，没完没了的两个月，这两个月简直是毫无意义。麦哲伦坐在那里苦思冥想，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他思考着，他是否能到达连接两个大洋的通道。其实，这个海峡就在前方，只有两天的航程了。这个海峡将以他的名字命名而流芳百世！这个人像普罗米修斯要夺取大地的最后秘密，他感受着怀疑那折磨人的鹰爪，直到最后一刻。

摆脱烦恼是多么美好！只有从沮丧的深渊所得到的那种幸福，才能到达感情的顶点。一五二〇年十月十八日，经过两个月漫长的不必要的休息，麦哲伦终于重新发布继续航行的命令。大家举行了庄严的弥撒，船员们共进了圣餐，接着船队扬帆向南航行。强风迎面吹来，他们只能顶着狂风一时又一时地前进。眼前看不到宜人的绿色，没有人烟的海岸空旷、平坦、荒凉、贫瘠，映入眼帘的只是砂土和岩石，岩石和砂土。第三天，即一五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一座海角终于矗立在前方，引人注目的曲折海岸是一块块白色礁石，这个突出的地方是麦哲伦为了纪念历书上的女圣徒而命名的“圣女角”，在这个突出部分的后面就是一片黑色水域的深深的海湾。船只渐渐驶近，呈现出一幅引人注目、雄伟壮丽的景色！山岗陡峭，倾斜，悬崖崩裂，参差错落，远方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山峰，几年来都未曾见到过这样的景观了。这辽阔海面死一般沉寂！周围没有人迹，没有树木，连灌木丛林也见不到；只听见海风在不停地呼啸，打破这阴森恐怖、空旷沉静的海湾，船员们心情抑郁地目睹着这阴暗的水域。大伙都感到很荒唐，这群山环抱的港湾和它那阴暗的水域难道会通向一个平坦的海岸，或是通向那阳光灿烂的南

部海洋。舵手们满怀信心，异口同声地说，这个深深的港湾只可能是类似北方国家的狭湾，倘若用测深锤勘探这个封闭的港湾，或是驾驶船只去四周探测，都会是徒劳，浪费时间。他们侦察所有的帕塔戈尼亚海湾，已经浪费了好几周时间，人们并未发现任何港湾里有着人们所期望的海峡通道。现在别再拖延了！迅速前进，前进吧！倘若不能很快地发现通道，那就得利用这有利的季节赶紧回去，或是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

麦哲伦一直在想着那尚未弄明的海峡，他坚持，从这引人注目的海湾驶出去。船员们虽都服从命令，可是内心里都很恼火。他们都想继续前进，可是都认为，这是一个封闭的港湾。

两艘船——旗舰和“维多利亚号”留下，对海湾外围进行勘察。“圣安东尼奥号”和“康塞普西翁号”的任务是：尽可能向海湾纵深挺进，可是至迟要在五天后回到原地。因为时间已非常珍贵，食品已经不多了。麦哲伦无法像以前在拉普拉塔河畔那样给予十五天的期限了。五天时间勘察，这是他能用以投入的最后赌注了！

现在，伟大的戏剧性时刻来到了。麦哲伦的两艘船——“特立尼达号”和“维多利亚号”开始在海湾的前部环游，直等着“圣安东尼奥号”和“康塞普西翁号”从远方勘察回到港湾。可是大自然激起了反抗的意念，好像不轻易预告它的最后秘密。突然，风刮得猛烈起来，已经变成风暴了，转眼就变成如同在这个地区经常出现的一种飓风。在西班牙的早先地图上就标有警告性的词句：“这儿从来没有好的季节。”顷刻之间，海湾白浪滔天，狂风大作。第一阵飓风就扯断了锚链，有两条船只好放下篷帆，任凭风吹浪打，好在那猛烈的风暴并没把它们刮向岸边的岩石。这可怕的灾难持续了一天，又一天。可使麦哲伦

心烦意乱的倒不是他本人的命运，因为他的两艘船一直是漂荡在海湾的开阔水域，离海岸还很远。可是另外两艘船——“圣安东尼奥号”和“康塞普西翁号”情况怎么样呢？风暴势必会在港湾内部抓住它们，怒吼的飓风会在那狭窄的隘口处袭击它们。处于那狭窄的通道，它们无法逆风行驶，也没有任何可能抛锚，或设法避难。如果不是发生奇迹，这两艘船早就给抛到岸上，或是撞在岩石上，砸得粉碎。

这几天麦哲伦像是得了寒热病似的，他胆颤心惊而又焦急地等待着，这是麦哲伦的最重要的命运时刻。第一天，没有任何信息。第二天，他们依然没有返航。第三天，第四天，他们依旧没有音信。麦哲伦知道：如果这两艘船都沉没，连同船员全都遇难，那么一切全完了。仅凭现有的两艘船，他是不敢继续航行的，那么他的事业和梦想全都将在这陌生的岩石上撞得稀巴烂。

桅楼终于传来了信号。但却非常可怕！侦察员看到的不是正在返航的船，而是看到远方的一根烟柱。多么可怕的时刻。一根烟柱的信号只可能意味着，遇难的船员在呼救。他的两艘最好的船——“圣安东尼奥号”和“康塞普西翁号”完蛋了。这个无名的海湾葬送了他的整个事业！麦哲伦立即命令，放下小艇，划向那港湾内部，拯救船员们的生命。可是就在这一刻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正如《特里斯坦》①中的同样令人震惊的伟大

①即《特里斯坦和绮瑟》，是流传最广的骑士叙事诗之一。故事取自不列颠凯特尔人的传说。作品叙述康瓦尔国王马克派他的外甥为他去向爱尔兰公主绮瑟求婚的故事，最终酿成特里斯坦和绮瑟的爱情悲剧。——译注

时刻，那牧笛的无力奋进、哀怨、丧失信心的死亡调子，突然间高昂起来，变成令人振奋，欢欣雀跃、充满喜悦的旋转舞曲。一片风帆！一艘船！一艘船！感谢上帝——总算有一条船得救了！不，两艘船！“圣安东尼奥号”和“康塞普西翁号”两艘船都回来了，都安全完好地回来了。可是你看，这是怎么回事？麦哲伦和他的船员几乎一看到这两艘船时，就发现它们左舷上闪着灯光，一次，两次，三次，礼炮轰鸣，像是从山里发出的回响。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这些人平时细心地节省每一小撮火药，现在竟在所不惜，一次接着一次地鸣放礼炮呢？麦哲伦几乎不敢相信，为什么升起所有的旗帜，甚至所有的信号旗都升起来了？为什么船长们水手们都在挥手、呼喊？他们干什么挥手，呼喊什么呢？由于距离很远，无法辨别清楚，同事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叫喊什么。可是大家终于同时感觉到了，麦哲伦第一个悟到了：他们报道的是胜利的喜讯！

确实不假，这两艘船带来了天大的喜悦。麦哲伦怀着喜不自禁的心情聆听着谢兰的报告。一开始，两艘船身处困境，可是刮起风暴后，他们已深入港湾内部，尽管他们及时卸下了布帆，激流还是把他们向前冲去，一直向前冲去，他们以为自己已无能为力，任其撞碎在港湾陡峭的岩石上。可是，最后一刹那间，他们却发现，屹立在他们面前的嶙峋的峭岩并没完全封闭，在一座突出的岩石后面，好像有一条水道。通过这条宁静的通道，他们进入了另一个海湾，这通道开始很窄，慢慢地就宽敞起来，并延伸开去。他们航行了三天，并没到达这条令人惊异的水路尽头。他们并没发现这个海湾的出口，可是这条引人注目的水路绝不是一条河流，因为这儿的水仍然是咸的，岩边有规律地出现潮汐。不像是一条河，这条奇异的水流不像拉

普拉塔河那样，从河口上溯，越深入就越狭窄，这儿却相反：越往前走，水面越加辽阔宽广，水的深度依旧。因此，这个狭湾，这条水路很可能就是通往他们所向往的水域①，正是努尼耶斯·德尔波亚几年前作为第一个欧洲人，从巴拿马的高山上所看到的那个大洋的海岸。

一年来，久经磨难的麦哲伦几乎都没听到过一件令人振奋的消息了。人们只是觉得，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会突然使他阴郁的心开朗欢乐起来。因为他内心深处已开始沮丧和失望了，已打算通过好望角踏上归途，无人知道，他曾跪倒在地上，向上帝和神灵暗自作过多少祈祷。现在，正当他信心开始动摇时、他的幻想却变成了现实，他的梦想实现了。他一刻也不犹豫，起锚！扬帆！再一次向国王鸣放礼炮致敬，为最高海军上将默祷！接着就大胆地向迷宫进军！倘若他能从这些冥河的水域中找到一条通往另一个大洋的水路，那么他将是第一个发现环球航路的人，于是麦哲伦率领着所有四艘船勇敢地向这个海峡驶去。为了纪念这个地方，他把这个海峡命名为"众圣徒"海峡。后代人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之情，把这个通道命名为"麦哲伦海峡。"

想必这是一个奇异的阴森恐怕的景象，人类的最早四艘船第一次悄然无声地进入这一沉寂、阴森、自古以来一向无人涉足的海峡。等待着他们的，是一片沉寂。岸边的山峦像磁铁山似地高高耸立着，云遮雾障的天空，滚滚乌云压得很低，黑沉沉的海水像阴界船夫的渡船所行驶的冥河水域一样，四艘船幽灵似地静悄悄航行在冥府世界里，一座座白雪皑皑的山峰在远

①即指太平洋。

处闪光，夜晚的海风吹来了阵阵寒气。周围未见到有什么生物，可是这儿一定有人居住，因为在这沉沉的黑夜里总是见到闪烁的火光，所以麦哲伦把这个地域称作火地（几百年来一直都能看到燃烧的火光，他们是这样解释这种种情况的，土著人的文明还完全处于比较低级阶段，还不懂得取火的技术，因而日以继夜地在他们的茅屋里不断燃烧树木和干草）。可是在海员们不安地向四方窥视时，根本未听到什么动静，也没看到任何活动的人影；麦哲伦派出水手，驾着小艇向岸边划去时，他们并没发现住房，也没看到生物的痕迹，只是看到死人和几十座荒冢。他们发现的惟一动物是一条鲸鱼，它的巨大的尸体被潮水冲到岸上。它游到这岸边真是送死。他们惊异地注视着这阴森可怕的宁静，好像陷入到一个完全烤焦了的、一切都已死绝了的星球上。啊，只能是继续前进！只能前进！船只又被风吹着慢慢地向前行驶，船只穿过从未触及过船的龙骨的阴森水域。测深铅锤再一次沉入水中，根本测不到底。麦哲伦诚惶诚恐地向前方窥探，那海湾是否会突然关闭，自由的水上通道是会中断。可是并没有，这条水路一直奇异地、曲折地向远方延伸，一些新的迹象表明，这条水路通向大海。然而却又看不到那久所渴望的时刻。这条路仍不明确，他们心儿七上八下。这神秘的航行一直继续通过基米里人①的黑夜，只有山中刺耳呼啸的寒风，发出那莫名其妙的怪诞曲调，伴随着他们。

这次航行不仅令人闷闷不乐，同时又是一次危险的航程。这条航道根本不像那条幻想中笔直的航路，就是天真的宇宙学家舍涅尔和他以前的贝海姆坐在他们舒适的书房里，绘入他们地

①荷马史诗中永远住在黑暗中的人。

图中的那条航路。这原本只是意味着，一种简单化的婉转表达方式，把这条海峡称之为麦哲伦海峡。实际上，这是一条有许多曲折的水道纵横交错，大小海湾，狭窄水道，沙洲和互相交织的水系，蜿蜒曲折交错，必须具有高超的驾驶技术，而且是极为幸运的舵手才能顺利通过这条海峡。这些海湾外形异常狭窄，又深不可测、慢慢又突然开阔起来，小岛星罗棋布，到处是浅滩；航道分岔，一会向右，一会向左，有时分成三个河汊，有时分成四个河汊。人们从来都不知道，应走哪一条水道，究竟应向西、向北，还是向南行驶。要避开沙滩，绕开暗礁，突如其来地又会刮起一阵阵急剧的旋风，穿过不平静的海峡，卷起狂涛，撕扯篷帆。只有根据后来航海家的众多描述，人们才知道，为什么麦哲伦海峡几百年之久一直使所有海员望而却步。这里从四面刮来的总是北风，而且从未平静过，见不到阳光灿烂、舒适宜人的航海天气，在后来的航海探险中就有几十条船在这可怕的海峡里遇难，直到今天两岸也见不到人影，麦哲伦十分精通航海技艺，事实证明，他是第一个征服这条水路的人。多年以后，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顺利通过海峡，而未损失一条船的卓越航海家。如果考虑到他的航船并没有别的装置，只有一张巨大的鼓胀胀的篷帆和一个大的木质船舵，去勘测成百条主流和支流，必须不断地来回行驶，再回到约定的地点相互会晤，这一切工作又是在不好的季节，由疲惫不堪的船员们去进行，那么像这样顺利地穿越海峡，理应被认为是一个奇迹，难怪这一奇迹被后来世世代代的海员们赞不绝口。可是正如在所有领域一样，麦哲伦在航海艺术方面所显示的独特天才，就是耐心和始终如一的小心谨慎，还有非凡的先见之明。他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进行了细致认真有效的探索。他镇定自若，他

冷静期待，毫不急躁，尽管他内心里深感焦虑，但他要，一定要找到出路，无论如何要看到南部海洋。可是在每一个分岔处，他总是把自己舰队分开。每一次，当两艘船勘测北部海域时，另外两艘船同时又去南部水道进行探测。这个冷静的人似乎知道，他生来就不顺利，从来也不指望幸运，他从不信命运的偶然性，而要自己从出现的许多水道中去选择。从不抛掷硬币预测正面或反面来决定一切。他总是试测所有的道路，以便从中找出一条正确的路，他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最新鲜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英勇坚定，同时还加上他那富于天才的幻想。

胜利了，这条水路的第一批海峡已经顺利地被一一通过了，第二批也被战胜了。麦哲伦再一次来到了岔口，宽阔的海湾在这儿向左右两边分成两股支流。谁能知道，这两条水道中哪一条直通大海，哪一条对他来说是无用的死路。麦哲伦再一次把自己的船队分成两支，“圣安东尼奥号”和“康塞普西翁号”向东南方向探测，他本人乘旗舰和“维多利亚号”一同勘探西南方向水域。由于这条小河盛产沙丁鱼，他们把它称之为沙丁鱼河，至迟五天后，他们约定在这条河的河口会合。有关指示已非常明确地下达给各个船长。每艘船本可起锚扬帆了，可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这是这支舰队中谁都预料不到的，麦哲伦把所有船长召集到旗舰的甲板上，以便在下一步行动前，报告一下有关粮食储备的情况，目的是想听取意见，他们现在是否该继续前进，还是在侦察成功以后才返航。

“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取意见？”大伙惊讶地问。为什么要作这样令人不解的民主姿态？这个坚强的独裁者迄今还从未向他属下哪位船长说过，他们有权利对他的命令有什么非议，现

在，恰恰这时要弄这小小的花招，把他的军官们从下级提到他的同事的位置上，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没有任何情况比这一急剧变化更合乎逻辑了。所有的独裁者都是在彻底胜利后，才表现出人道主义，在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后，才给人们以言论自由。现在，他已发现了这个海峡，麦哲伦想必不再害怕别人提问题了。他已胜利在握，他已王牌在手，可以满足别人的意愿了。在幸运的时候比在倒霉时更容易公正地处理事情。这个严厉的、沉默寡言的人，这个孤身独处的人，最后终于不再沉默，张开了一向紧闭的嘴巴。自从麦哲伦的秘密不再是秘密，能公之于众，他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

船长们来了，并一一报告情况，尽管他们的报告并不令人欣喜。食品贮备已消耗到了危险的境地，每艘船上的食品最多只够三个月之用。这时，麦哲伦开口了，他着重说明，此次航行的第一个目标已经达到了，可以认为那条水路——通向南部海洋的通道已经找到了。现在他请他的船长们，自由地发表意见，这支舰队是否应满足于既已取得的成绩，还是继续探测，完成麦哲伦答应国王的诺言，抵达香料群岛，让西班牙霸占这些岛屿。当然，他知道，库存食品已极度匮乏，他们将会面临巨大的艰险，可是他们在顺利完成大业之后，期望得到的荣誉和财富也同样重要。可是在他做出决断——他们现在已取得成功便返航回国，还是为了荣誉直向最后目标奔去——之前，他想听听他的军官们的意见。

船长们和舵手们的回答并没流传下来，可是人们的猜测是不会有误的，大多数人持沉默态度。圣胡利安海岸和他们的西班牙伙伴被砍掉四肢的情景，一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大家一直都不敢顶撞这位铁面无情的葡萄牙人。只有一个人敢于明确

而尖锐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他是“圣安东尼奥号”舵手艾斯特瓦奥·戈麦斯，一名葡萄牙人，据称甚至和麦哲伦是亲戚。戈麦斯口直心快地说，据现有情况，海峡已经找到了，最明智的做法，是返回西班牙，然后换上新装备的船只，重新穿过现已发现的海峡，前往香料群岛，据他的看法，现有的船只已不适宜于远航。此外，储备的粮食也用不了多久，谁也不知道，南部海域，这个新的、陌生的大洋离开新发现的海峡究竟有多远。一旦在这片陌生的海域里迷失了方向，不能尽快地找到港口，舰队势必会惨痛地趋于覆灭。

艾斯特瓦奥·戈麦斯谈话很理智，毕加费塔首先怀疑每一个反对麦哲伦的人，把各种胸襟狭隘的动机转嫁于他，对这样一位富有经验的舵手的这一做法显然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就逻辑而言，或就客观情况来说，艾斯特瓦奥·戈麦斯的建议：现在光荣地返回祖国，然后进行第二次探险，奔向既定的目标，无疑是正确的。他本应能拯救麦哲伦和差不多两百人的性命，可是麦哲伦考虑的不是人的生命，而是不朽的事业。凡是想着英雄主义的人，他必然会违背理智行事。麦哲伦毫不犹豫对戈麦斯进行反驳。当然，他们会面临重重困难的，也许他们还会忍受饥饿，经历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困难。他有一句惊人的预言：即使他们吞食帆桅上的皮革索具，他也有义务继续航行，驶往他曾许诺要发现的那个国度。这一心理上非常奇特的会议随着麦哲伦的这些豪言壮语结束了，麦哲伦的命令从一条船传到另一条船，航船继续前进，可是麦哲伦暗地里已经给他的船长们下达了命令，要极为严密向全体船员封锁食品短缺的实况。任何透露这一情况，甚至做出暗示的人，都将处以死列。

船长们默默地听取了命令。负责勘探南部水域的“圣安东尼奥号”在麦斯基塔指挥下和“康塞普西翁号”在谢兰指挥下，很快就消失在杂乱的曲曲弯弯的海湾中。留下的两艘船是麦哲伦的旗舰“特立尼达号”和“维多利亚号”，在这儿它们有了一段宽裕的时间。这两艘船停泊在沙丁鱼河河口。麦哲伦没有向西去继续勘察水域，而是派了一条小艇作为先头部队去察看情况。海峡的这一段很平静，不会有什么危险，只是麦哲伦发布的命令：去侦察的船只至迟第三天要返回，因此在“康塞普西翁号”和“圣安东尼奥号”返回前的这三天，他们这两艘大船完全可以好好休息。麦哲伦跟他的人在这个舒适的地方可以尽情地休息一番。奇怪的是最近这些日子里，他们越向西航行，风景就越加美丽。不再是沙石和悬崖峭壁，出现了绿色的草地和翠绿的森林。岗峦平缓起伏，闪耀的雪峰似乎离得更远了。空气温和，清甜的泉水使水手们心旷神怡，多少天来他们只能喝船上木桶里装的发臭的、略带咸味的水。现在他们可以惬意地躺在松软的草地上，懒洋洋地欣赏飞鱼奇观，甚至兴高采烈地去捞河里的沙丁鱼，这儿的沙丁鱼丰盛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还发现了许许多多美味可口的野菜，几个月来他们还从未这样吃得饱饱的，四周的大自然美景使他们感到美不胜收，舒适宜人。毕加费塔热情洋溢地感叹着：“这一海峡也许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了。”

可是这愉快、舒适、轻松的小小幸福，怎能跟麦哲伦四周即将激荡的那种伟大、火热、迷人、朝气蓬勃的幸福情景相比？这情景已经临近了。第三天，他派出去的小艇就要遵命返航了，水手们像在圣徒节那天发现海峡的入口一样，从老远就向他招手了。可是——这次比上次要重要一千倍——他们终于发现了

出口，并亲眼看到了这海峡流入的大海！大海，大海，这是希腊人千百年来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返航时，向永恒的大海致意时所发出的呼声，这里回荡着的尽管是另一种语言，但却同样热情奔放，在这儿的海空里还从未响彻过人们如此欢乐的呼声。

这一分钟是麦哲伦的伟大时刻，那一刻令人极为陶醉，无与伦比，每一个人在一生中只能享受一次这样的欢乐时刻。一切全都实现了。他履行了他向国王所许下的诺言。他真正地实现了愿望。他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人实现了成千人在他之前所梦想的事业。他发现了通向另一个大洋的航路。他理直气壮地明白了，他的生命从这一刻起将永垂不朽。

此刻，在这个冷酷无情、孤身独处的人身上竟然发生了谁都想象不到的事情。突然，一种内心深处燃起的热情竟然控制了这个严格的战士，他从未在别人面前流露过自己的感情。他流出了眼泪，滚热的泪水流入他那黑蒙蒙的胡须里。他有生以来，这还是头一次，惟一的一次流泪，这个坚强的麦哲伦由于欣喜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瞬间，在他整个令人不快的艰难的一生中，这是惟一短暂的瞬间，麦哲伦感受到了赐予创造性天才的最大欢乐：他的毕生理想实现了。命运注定这个人必须为每一点幸福付出惨重的代价。他的每一个胜利都不可避免地与失望联系在一起。他只能看一看幸福，但却无法拥有和保留住幸福，就连这短暂的快乐时刻，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他还未充分体验，很快就消逝了。另外两艘船究竟在哪儿？它们为什么拖延了 这么久还不回来呢？现在，自从那只小艇已经察看到流入大海的出口，现在去探看流入南部海洋的任何其他出口都是浪费时间，成为多

余的事了。如果“圣安东尼奥号”和“康塞普西翁号”这两艘派出去的船，能获得好消息回来，那该有多好！但愿它们最终能够回来！麦哲伦焦急并越发烦躁地张望着海湾的远方。约定的时间早就过去了，第五天也过去了，一点信息都没有，看不到他们的任何踪迹。

难道最终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吗？他们迷路了吗？麦哲伦焦急万分，他无法无所事事地在约定的地点久久地等待了。他命令扬帆，驶回海峡，以便迎接那两艘耽搁时间的船只。可是海面上空空荡荡，什么也见不到，那冷冰冰、死气沉沉的水域里一片沉寂，见不到任何迹象，见不到一点船影。

终于在寻找的第二天，看到了一片帆影。这是可靠的谢兰指挥下的“康塞普西翁号”。可是另一只最大的船“圣安东尼奥号”在何方呢？谢兰无法做出回答。“圣安东尼奥号”在同一天就曾向他们的前方航行去了，从此就不见踪影。起初，麦哲伦没料到有什么灾难。也许“圣安东尼奥号”迷失了航向，抑或它的船长记错了约会的地点。为了搜索寻找麦哲伦海峡主航道的每一个角落，他现在把他的舰队的所有船只派往各个方向。他命令发出灯光信号，旗杆上挂起旗帜，在杆子下方还给万一迷失方向的船只留下了指挥信号。可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圣安东尼奥号”的踪影。想必一定是遇难了。要不就是“圣安东尼奥号”沉没了，连同船上的人和财物一同葬身大海，可是这又不大可能，这几天恰好风平浪静，天气异常的好。要不就是——也许可能——“圣安东尼奥号”的那位舵手艾斯特瓦奥·戈麦斯在军事会议上主张尽快回去，现在用叛乱的方式实现了他的要求：他和那只船上的西班牙军官，直接战胜了那位忠诚可靠的船长，携带着全部东西开小差逃跑了。

当时，麦哲伦并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只知道，出现了可怕的事情。这条船不见了。这是他的舰队中最好、最大、装备给养最多的船。可是它究竟去哪儿了呢？出了什么事？船上究竟情况如何？在这烟波浩渺、看不到人迹的大海上，没有人能回答他这些问题，究竟是沉入海底，还是临阵出逃，匆忙中逃回西班牙去了呢？只有那些陌生的星座，被所有闪亮的群星拱卫着的南十字星座是这一神秘事件的见证人。只有它们知道“圣安东尼奥号”的行驶途径，只有它们能够给予回答。因此，应理解为：麦哲伦像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一样，相信星相术是真正的科学，把代替法莱罗跟随船队的星占学家和天文学家安德列斯·德·圣马丁喊到面前，他或许是惟一能够根据星相判断情况的人。他命令圣马丁，拿出星相图。凭自己的知识去解释一下，“圣安东尼奥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星占学家意外地提供了正确的结论。这位能干的星占学家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在军事会议上艾斯特瓦奥·戈麦斯的坚决态度，所以他认为——事实也将证明这一点——这艘船叛逃了，船长被戴上镣铐。

麦哲伦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临着刻不容缓的决断。他高兴得太早了，他太轻信，过早沉浸在欢乐之中。现在麦哲伦遇到的，也是他的后继者弗朗西斯科·德雷克所碰到的同样情况，他的最好的船同样也由于船长文特尔叛乱，连夜悄悄地开小差了，这是第一次环球航行和第二次环球航行中再一次出现的、互不相干的两件事。在胜利进军途中，那个与麦哲伦有血缘关系的同胞竟成了敌人，在背后阴险地袭击麦哲伦，这支舰队早就食品不足，因此饥饿已成了明显的威胁。大量精制的食品储存在“圣安东尼奥号”上。此外，六天毫无意义的等待也

消耗掉了相当数量的食品。八天前在无比有利的情况下向陌生的南部海洋进军，原本就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冒险行为。现在"圣安东尼奥号"叛逃后，向南部海洋进军差不多是自寻死路了。

麦哲伦从骄傲自信的顶峰猛地一下被推入万丈深渊。根本不需要巴罗斯向我们这样报道："他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他当时心情确是很乱，他做不出任何决断。"我们从麦哲伦在心慌意乱时刻，给整个舰队军官发布的命令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内心里是惶惶不安的。

几天后，他第二次征求大家的意见，舰队是否应当继续前进，可是这一次他命令船长们，给他做出书面回答。因为麦哲伦需要——这却表明他的卓识远见——辩护。他需要为以后留下一个书面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他征询过船长的意见。他非常明白——这些事实将会是有力的证明——在"圣安东尼奥号"上的那些叛逃者几乎一到塞维利亚就对他指控，以免由于自己不服从命令而受到指控。毫无疑问，他们把他这个不在场的人说成是一个暴君，他们将夸大其词地进行描述，煽动起西班牙人的民族感情。他，这样一个外来的葡萄牙人，如何给国王任命的官员戴上镣铐，说他如何把一些卡斯蒂利亚的贵族砍掉脑袋和四肢，或是让他们活活地饿死，为的是对抗国王的严令，最终要把这支舰队交到葡萄牙人手里。为了驳斥这一不可避免将要发生的谴责，说他在整个航行期间用野蛮的专横手段，压制军官们自由发表意见，因此，麦哲伦现在就预先发布了那条不平常的命令，如果说这是对船长们发出的同志式的呼吁，倒不如说他在进行自卫。这项命令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多岛河附近的圣徒海峡发布的，命令是这样开始的："我，斐迪南·麦哲伦，圣地亚哥勋章获得者，本海军上将得悉，你们大家都认为

继续航行的决定是有风险的，因为你们认为航行的季节已经过了。我这个人从来都没有瞧不起别人的看法和建议，相反，倒想跟大伙就我本人的动议一同探讨，并付诸实行。”

在读到这奇异的自我独白时，所有的军官好似都报以微微的一笑。因为要是谈起麦哲伦的突出之处，那就是他在管理和指挥时的一意专横独断。大家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这个人一向爱挥舞拳头，压制船长们的不同意见。可是麦哲伦很清楚，他们一 定会记住他对不同言论的无情压制。因而继续说道：“人们不应害怕圣胡利安海港发生的事件。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毫不畏惧地告诉我，你们对我们舰队未来航行的安全持什么看法。倘若你们隐瞒自己的看法，那可就违背自己的誓言和违反了你们本身的义务。”他要求每个人，应当明确而且要用书面表明自己的看法，我们是否应继续航行，还是返航，而且应把对这些情况的内心看法表达出来。

可是连续好多个月所失去的信任，是无法在一个小时内重新恢复的。军官们内心深处诚惶诚恐，不敢大胆地说出要求返航的愿望。我们保存到现在的惟一答案——就是天文学家圣马丁的说法——说明，在这个责任重大的时刻，他们是多么不愿跟麦哲伦共同承担责任。这个受人崇敬的星占学家说的话，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用极其巧妙的方式说：一方面是对的，另一方面也不错之类的词句。他的话完全合乎他的职业身份。他虽然怀疑，他们通过圣徒海峡能够到达马鲁古群岛，可是他当时却建议继续航行，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春天”。可是另一方面大家又不应继续前进，最好是一月中旬返航，因为大伙都精疲力竭，身体虚弱。最好的办法，也许是不要继续向前航行，而是向东，可是麦哲伦要怎么做，他都认为是正确的，上帝会给

他指出道路的。其他的军官所发表的意见也是类似一样，模棱两可。

可是麦哲伦询问他的军官，并不是为了获得答案，而只是为了日后能证明，他曾征求过意见。他明白：他冒险前进得太远了，因而已无法回转。他只能作凯旋而归的统帅，载誉归去，否则，他只能失败。尽管星占学家预言：他要死亡，他势必还会继续走他英勇的道路。一五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每艘船都遵照他的命令，离开了沙丁鱼河港湾，不多几天之后，就穿过了麦哲伦海峡——人们将永远称呼这条海峡——在海峡的出口处有一个海角，麦哲伦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把它命名为“希望之角”，他绕这个海角看到的是一个波涛万顷的、欧洲航船从未航行过的新的海洋。看起来简直令人震惊：向西，越过了无边际的海平面，想必就是香料群岛，物产丰富之岛，绕过它，就是东方大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然后再继续前进，在遥无边际的远方就是祖国，西班牙，欧洲！因此在坚决打开这陌生的、自开天辟地以来无人横越的大洋之前，进行一次休整，最后一次休整！一五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锚扬帆，升起了旗帜！三艘孤寂的船只鸣放着隆隆的礼炮，向这莫测的大洋致敬，就像骑士们要迎击即将与之生死决斗的敌人一样。

魏家国　译

麦哲伦发现了他的王国

1520年11月28日—1521年4月7日

正如马克西米利安·特兰西瓦奴斯在他的笔记中记载的那样，"横渡至今人们尚不知道它的名字的那个大洋，是人类史上不朽的创举"，"这个大洋如此浩瀚，让人无法想象。"哥伦布遨游大洋的事，当时甚至多少年代之后，仍然被公认为无比勇敢的创举。诚然，此事从其献身意义及其所蒙受的损失而言，都不能与麦哲伦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和所取得的丰功伟绩相提并论。众所周知，哥伦布远征时率领的是三艘崭新的、装备一流和给养充足的船只。总共在海上航行了三十三天。在他登陆前的一个星期，海面上漂浮着的野草、叫不出名的木头、在空中飞翔的野鸟就使他意识到，他们的船队离陆地不会太远了。船员们个个精神抖擞，船上又有充足的食物，即使在最恶劣的情

况下，不能如愿以偿到达目的地，也能平安返航。摆在前面的虽然是一片茫茫的未知王国，而他们后面却有坚强可靠的靠山——祖国。然而，麦哲伦的远征不是从欧洲一个人们熟悉的海港出发，而选择在一个陌生的、偏僻的巴塔戈尼亚港起航。长达数月的海上漂泊，使所有的船员都精疲力竭。饥饿和困苦无时无刻不在追随着他们，与他们相伴而去。衣服破了，帆布成了碎片，缆绳也磨损了。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一连数月，他们没有见过一张新的面孔，没有见过女人、没有美酒、没有鲜肉、面包。每当孤独向他们袭来时，他们暗地里是多么羡慕那些半途开小差逃回家的伙伴们，用不着饱受这种毫无尽头的寂寞之苦。就这样，他们在茫茫无际的大海漂泊了二十天、三十天、四十天、五十天、六十天。两个月过去了，仍然不见陆地的迹象。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整整在海上漂游了一百天，足足等于哥伦布横渡大洋的三倍时间。麦哲伦的船队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渡过了成千上万小时寂寞的时光。自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希望之角”消失在地平线上后，海图和测绘仪器就完全无用了，所有华雷里奥在家里计算出来的距离无疑全部都是错误的。麦哲伦以为早已驶经日本，事实上才穿越这个不为人知的大洋的三分之一。因为一路上风平浪静，所以为其取名“太平洋”。

但是，在这平静的后面，隐藏着的又是多么的残酷。在死一般的沉静之中，挥不去的孤独是一种最可怕的折磨。总是那么一片湛蓝的大海，仿如一面大镜子；总是晴空万里，一丝云彩也没有；总是静若寒蝉、催人入睡的空气；总是那样遥远，巨大无比的圆形地平线，仿佛一把利刀把天水切开，刀刃刺得人心发痛；总是一片无尽的蓝色和无尽的空寂包围着三个移动的

小不点。白天，在热辣辣的阳光下，人们所见到的景色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而晚上所见到的又总是那孤单寂寞不懂开口讲话的群星，一路相依为伴。在人们视觉所及的四周，你所见到的总是那些相同的东西。同样的帆，同样桅杆，同样的甲板，同样的锚；总是那几门大炮；总是那几张台椅；从船舱里不断散发出来一阵阵令人作呕的、略带甜味的、腐烂食品的气味；那一张张闷闷不乐呆滞的脸孔，从早到晚周而复始，一天不知碰上多少回。所不同的是，他们变得越来越瘦，眼窝一天天凹陷下去。随着令人失望的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光彩。颧骨慢慢地凸起，越来越萎靡不振，仿佛魔鬼缠身。几个月前，小伙子们个个还是身强力壮、生龙活虎，在缆绳上爬上爬下，在风浪中抛绳缚缆。如今个个像病夫一样有气无力地躺在席子上。这三艘船都是为了进行至今人类最为壮观的探险创举才扬帆出海的，而今他们经历了作为水手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连他们自己都几乎互相认不出来了。每艘船上的甲板成了浮动的医院，长期的病房。

由于未能估计到这次横渡时间如此漫长，船上的储备日渐减少，人们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供养员每天分给大家的与其说是食品，不如说是垃圾。就连这点东西，还得定量分配。最后连那仅能用来润润口唇，提提精神的葡萄酒也一点不剩了。在炎炎烈日的暴晒下，盛在罐子里和水袋里的淡水被晒得发烫，发出难闻的气味。每天分给病号们用来润喉的一口水，他们都是捏着鼻子强忍着咽下去。船上除了捕到的鱼虾外，惟一的食品就只剩下一点点用来应急的面包干了。就连这点东西，也早已发霉生虫。其次还有的是，就是那些可恶的老鼠。而这些小生灵也是全靠这仅有的一点点食品为生，于是船员和老鼠也成了

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当人们发现仅有的一点粮食被它们掳掠时，见到这些动物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追打，而是连它们的肉也被当作美味佳肴处理了。有谁抓到了一只老鼠，可得到半个杜卡特金币。而幸运的买主会狼吞虎咽地迅即把它装到肚子里去。为了填塞那早已饿得干瘪了的肚皮，为了满足饥饿的需要，船员们不时地采取一些冒险行动：他们把锯末和面包碎片混在一起，自欺欺人地使分量增加，然后强咽到肚里。后来，饥饿变得越来越可怕，麦哲伦可怕的预言终于应验了：他们不得不把用来拴桅杆用的皮革缆绳当作食物。我们可以在毕加费塔的书中发现有关“饥不择食”的描写。那些原来不能食用的东西，饥饿时也能成为美味佳肴：为了不致饿死，寻求一条逃生之路，我们开始吃这些东西。那些皮制的缆绳长年累月经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变得异常坚硬，以致我们不得不把它放到海水里泡上好几天，使它变得软些，然后一点一点地把它放到煤火上烧烤，再吞食下去。

毫无疑问，即使是那些久经锻炼，具有顽强抵抗能力的铮铮铁汉也难于长期忍受这样的艰难困苦。因为缺乏新鲜食物，确切地说缺乏维生素，船员中开始出现败血病。起初，患者牙周发炎化脓，牙床浮肿，紧接着松动脱落，口腔溃疡，最后咽头红肿，无法咽东西，甚至惨死在饥饿中。饥饿令幸存者们耗尽最后一点力气。他们拄着拐杖，迈着化脓的、麻木的双腿蹒跚地四周移动，或是有气无力地蹲在甲板的角落里。足足有十九个人，正好占幸存船员的十分之一在这次令人不堪回首的饥饿中死去。其中最先死去的是一个来自南美洲的大个子，大家叫他“大个胡安”。就在几个月前，他因一次吃下半箱面包干并像喝一杯水那样轻而易举地灌下一桶水，而令众水手大为吃惊。随

着无休止的航行，尚能干活的人日渐减少。毕加费塔说得对，依靠这些体弱无力的人员是无能为力在风暴中和恶劣的天气条件下驾驭这三艘大船的："要不是上帝和圣母赐给我们这样的好天气，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因饥饿而葬身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之中。"

这支由三艘船组成的孤零零的船队，在汪洋大海里整整漂泊了三个月零二十天，经受了无数人们无法想象的苦难的折磨，尝尽了一切难以想象的痛苦。甚至一切痛苦中最可怕的痛苦——希望受到欺骗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痛苦。因为仿佛在饥渴中饱受煎熬的人们突然看见了一片绿洲。绿色的棕榈树在眼前随风晃动，片片绿荫带来了一丝凉意，一连数日，那刺眼而且毒辣的阳光似乎变得柔和了许多。人们仿佛听见了潺潺的流水声。但是，当他们鼓足力气，踉踉跄跄向前移动过去的时候，突然间，那些幻觉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无际的荒漠满怀敌意似地依然包围着他们，麦哲伦的人员又一次成了海市蜃楼魔法的牺牲品。有一天早上，突然从桅楼上传来一声嘶哑的呼叫声。一个水手发现了一块绿地。这是他们很久以来第一次见到的一块陆地。那些又饥又渴的人们像疯子似的一个劲地涌到甲板上，连那些骨瘦如柴，躺在地板上的病号听到这个消息也跌跌撞撞地爬起来，想看个究竟。真的，真的，他们正在向一个岛屿靠近。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岛屿。满载着人们的小舢板飞快地向小岛划去。人们仿佛看见了那潺潺流动的清泉，梦寐以求的淡水和在树荫下歇息那种令人神往的惬意在脑际中一幕幕闪现。一周又一周他们是多么渴望自己的双脚能够站在坚实的土地上，而不是在起伏不定的波涛中摇摇晃晃的木板上。但是，又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幻觉。当他们靠近小岛，还有随后发现的第二个，他们称之为"不幸之岛"，原来是一个光秃秃的，荒无人烟的礁岛。

既没有人和动物，也没有泉水和植物。在这块不毛之地他们毫无收获地浪费了一天的时间。于是，他们又只好向漫无边际的蓝色大海继续航行。向前！向前！在人类历史上写满人类苦难和人类坚韧精神的记载里，这次航行也许是最可怕最艰难的航行。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不知还要延续到哪一天！

一五二一年三月六日，自从船队离开麦哲伦海峡驶向大海以来，太阳每天都从那空荡荡的蓝色的海面上升起，又从那空荡荡的蓝色的水面上消失，日出日落，一百多个白昼和黑夜交替着重复了一次又一次。就在这一天，终于从桅楼上又传来了喊声：陆地！陆地！人们早就盼着听见这一喊声了。这喊叫声来得也正是时候，要是迟到二天、三天，这个举世无双的英雄创举恐怕就不会为后人所知了。载着由于饥饿而去的船员的船队，会像一座移动的坟场，在海上随风飘荡，最终要么被狂风巨浪所吞噬，要么被礁石撞得粉身碎骨。但是，——谢天谢地！这个新发现的岛上有人居住。岛上有淡水，这些渴得濒临死亡的人有救了。船还未靠岸，船帆尚未收起，船锚尚未抛下，只见几条“卡奴斯”——一种外表涂成五颜六色，用棕榈叶作帆的小船，神不知鬼不觉地围拢过来。他们一个个赤身裸体，像猴子般敏捷地翻过船栏，爬到甲板上来。他们没有一点道德规范的概念，如入无人之境，看见什么，拿什么。船上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就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转眼间都装进了他们的魔袋里，一下子全不见了。就连“特立尼达号”船上用来登陆用的救生艇，他们割断拖缆，也把它带走。他们肆无忌惮，丝毫也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否有些不妥之处，反而为自己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获得一些见所未见的东西而兴高采烈。他们满载着

珍贵的掠夺物品扬长而去。因为在这些天真烂漫的异教徒看来，把一些闪闪发亮的东西插到头发里，——他们光着身子没有口袋——如同西班牙人，教皇以及国王所认为的那样，所有一切尚未为人所开发的岛屿以及岛上的人和动物，无可争议地属于基督君主的合法财产，是理所当然合乎情理的。

在麦哲伦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无法理解在既没有皇上的圣旨又没有教皇的指令的情况下肆意掳掠他的财物。更加令他不能容忍的是，他那艘登陆用的小舢板，在塞维利亚（根据留在那里的账单记载）就已经价值三千九百三十七个半马拉维第，而在千里之外的这个地方它已经成了价值连城的宝贝了，那些强盗却轻而易举地把它拖走。于是，第二天麦哲伦决定派四十名全副武装的水手上岸把舢板要回来，并实实在在地给这些岛上土著人一点颜色看看。麦哲伦的人员烧掉了他们几间茅房，但是并没有挑起真正的冲突。因为这些可怜的土著人对杀人的技术一窍不通。当西班牙人的利箭射穿他们的血肉之躯时，他们还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带羽毛的从老远飞过来的锋利的家伙深深地扎在他们的身上是那样的疼痛。他们先是一边拼命地抓住箭柄往外拔，企图把扎在身上的箭头拔出来，一边惊慌失措地逃到树林子里去，躲避那些可怕的野蛮人。这群饥肠辘辘的西班牙人终于为那些干渴得半死的人弄到了水，并且大举抢劫他们的粮食。他们匆匆忙忙地从那些土著人离开的茅屋里，把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抢个精光：鸡、猪和野果，一点不留；他们先是互相偷来抢去，待到双方都被抢劫一空后，那些文明的强盗们为惩罚岛上的土著人，竟然给这个岛起了一个永世蒙受耻辱的名字：贼岛。

总而言之，这次行动救了那些饿得半死的船员的命。经过

三天的休息，那些抢回来的新鲜水果、肉类和清甜爽口的清泉使船员们重新恢复了精神。在以后的航行中又有几个船员因疲劳过度而死去，其中之一是船上惟一的一个英国人。还有几十人因过度虚弱而病倒。尽管如此，最艰难的时刻总算挨过去了。他们满怀信心继续朝西方向前进。约莫过了一个星期，即三月十七日，又一个岛屿出现在前方，并且在它的附近还有另外一个。麦哲伦认为，是命运在怜悯他们。根据他的推测，那里应该是马鲁古群岛了。真令人兴奋！船员们高兴得又唱又跳，因为他们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但是，尽管胜利近在咫尺，他们并不敢贸然行事。他们没有选择其中较大的苏鲁兰岛登陆，而选择了一个较小的毕加费塔称之为“胡姆奴”的岛屿停泊。因为该岛没有人居住，麦哲伦首先想让他的那些患重病的船员在这里休养生息，避免与土著人发生冲突。然后才考虑与他们谈判或战斗。病号被安置到岸上，给他们水喝，使他们清醒；他们特意把从贼岛上抢来的一头猪宰了，慰劳病号。开始是绝对的休息，不作任何冒险行动。但好景不长，第二天下午便有一只小船从大岛那边划过来，但并无敌意。船上的土著人友好地向他们挥手致意，还带来了许多连毕加费塔当时也还从未见过的新鲜水果，如香蕉、椰子等。乳白色的椰子汁对病人的康复十分有效，连毕加费塔也大加赞赏。一场活跃的交易开始了：饥肠辘辘的海员们只要用几个丁当作响的小铃铛和五颜六色的串珠就能换到新鲜的鱼、鸡、棕榈酒、柑橘、各种蔬菜和水果。船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健康的还是生病的，几个星期，确切地说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填饱了肚子。

麦哲伦兴奋不已，起初他还以为，他这回远航的目的地已经到达，香料群岛就在眼前。其实那里并不是马鲁古群岛，他

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否则恩利柯能够而且一定能听懂他们的话。他们不是他的同族人。这一定是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群岛，命运偶然把他们送到这个岛上来。麦哲伦的计算，使他在太平洋的航向向北偏离了十度，结果再次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正是这一计算的失误，给他带来了新的发现。麦哲伦也正因为他的船队往北偏离，因此到不了马鲁古群岛，却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知名的地方，欧洲人至今也从未提到过和想象过的一个地方。他在寻找马鲁古群岛的时候，发现了菲律宾群岛，从而为查理皇帝找到了一个新的省份，它归属于西班牙王国统治的时间，比哥伦布、科尔特茨和毕萨罗发现的并征服的其他群岛要早得多。然而，他也因为这意外的发现建立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因为根据条约的规定，如果他发现六个以上的岛屿的话，其中的两个归他和法莱罗所有。一个昨天还是贫寒的冒险者，一个濒临绝望的乞丐，一夜之间成了一国之长，成了一位从新殖民地获取利润的永久分享者，因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男人之一。

这是经过几百个艰难困苦，令人绝望的日日夜夜之后，迎来的一个命运转折的伟大日子。病人们吃下了岛上居民每天从苏鲁安岛送来的新鲜的、有助健康的食品后，渐渐地变得有生气了；而能治病的甘泉美酒给病人们增添了活力。在这个静谧的热带海岛上，经过九天的精心护理，几乎所有的病号都康复了。麦哲伦已经着手准备勘察邻近的马萨畦群岛。在这关键时刻，一个意外的、令人懊丧的事件几乎把命运最终给麦哲伦带来的幸福和快乐蒙上阴影。他的好朋友，史料收集专家毕加费塔在钓鱼时，不慎掉进大海里，而当时谁也没有发觉。就这样，一部有关我们首次环球航海的历史差点付之东流。因为毕加费

塔显然不会游水，明摆着会被活活淹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抓住了垂在船栏外边的一根绳子，发出绝望的呼叫。人们听见呼喊声，急忙把这位对于我们来说不可取代的史料家拉上船来。

这一回，人们高兴地升起了风帆，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渡过了可怕的大洋，那可怕的荒凉与寂寞已经过去，再也不会令人感到压抑了。他们只需要再航行几个钟头或几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因为在船队的左右两边经常出现一些轮廓不清的山峦和岛屿。终于在第四天，三月二十八日，即耶稣受难日的前一天，船队到了马萨畦群岛。在那里他们再次进行休整，为向探索已久而尚未到达的目的地作最后冲刺做准备。

马萨畦岛是菲律宾群岛中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岛，在普通地图上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它。但对麦哲伦来说，他在这里却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戏剧性时刻之一；在他那黯淡的、艰难的人生历程中，偶尔也会出现如直上云天转瞬即逝的火光一样短暂的幸福。这种纯真的幸福是对他面对无尽的寂寞、忧虑所显示出来的顽强、坚毅、不屈不挠的精神的慷慨回报。不过这一表面上的原因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还未待三艘张满帆的外国大船靠近马萨畦岛，兴奋好奇的岛上居民就已经云集岸边，等待这些异乡客人的光临。为了预防不测，麦哲伦在亲自登岸之前，派自己的黑人奴隶恩利柯作为和平使者先行上岸。他的估计是不无道理的：岛上土著人毕竟更加相信黑人，而不太相信那些穿着古里古怪，全副武装留着大胡子的白种人。

但这时还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些半裸身子的

岛上黑人把恩利柯团团围住，大喊大叫。这个马来亚奴隶突然警觉起来，他听着听着，他能听懂其中一些话。他终于听明白了，他们在对他说话，因为他几年前就被人从自己的故乡带走。这一回他是头一次听到自己的乡音。这是人类史上多么伟大，多么难忘的时刻啊！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是第一次一个人，一个活着的人，从自己的家乡出发，绕地球一周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乡。他只不过是一个并不引人注意的奴隶，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其伟大之处不在于什么人，而在于他的命运。因为人们只知道这位马来亚黑奴，在失去自由后才叫恩利柯。他被人用皮鞭从苏门答腊岛驱赶出来，经过印度、非洲，最后被运到了欧洲。他是地球上居住着的数十亿人口中的第一个，经过巴西、马塔戈尼亚，越过所有的大洋和大海，最后又重新回到用自己母语说话的故乡。历经千百个民族和不同肤色的种族和部落聚居的地方，他们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一个概念。而今，他是绕过不断转动的地球一周之后，又回到了他惟一能听懂其语言的民族，而那里的人也能听懂他的话的第一个人。

在这个时刻，麦哲伦十分清楚：目的已经达到，他的事业已经完成。他从东方出发，又回到马来语区的边沿。这里是他十二年前向西出航的地方。不久之后，他又可以把这位他从马六甲买来的奴隶健康地送回到那里去。是否明天，或者再迟一些时间可以实现这个愿望。是他自己，还是别人代替他到这个他朝思暮想的岛上去已经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因为这时他所做的一切已经基本达到了目的。他第一次远航所写下的事实将永远证明：不论谁，只要他矢志不渝地在大海上坚持朝一个方向航行，不管他是背向太阳，还是迎着太阳，最终他一定会回到他出发的地方。千百年来，那些哲人们所推测的，学者们所

幻想的，如今只通过一个人的勇敢变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地球是圆的。不信你看看，因为有人已经绕地球走了一周！

在马萨畦群岛的这些日子是他整个旅途中最幸福、最惬意的日子，是麦哲伦这颗明星处于最光辉灿烂的时刻。再过三天，即复活节星期天，是发生在尤利安港那件不幸事件一周年的日子。他不得不用匕首和武力镇压一起阴谋暴乱事件。此后，又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磨难，多少折磨，多少痛苦！如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可怕的饥饿、艰辛的日子、那些在神秘的大海上遇上风暴的黑夜，所有难于用语言来表达的艰辛和痛苦如今都成了过去。而其中令他最难承受的痛苦 就是那月复一月压抑着他的可怕的动摇情绪和强烈的怀疑：他所率领的船队所走的路线正确与否。这种怀疑也已经成了过去了。船员中残酷的纷争已被彻底消除。虔诚的基督教徒们可以在复活节这一天庆祝真正的死而复活了。当一切危险烟消云散的时候，他所创造出来的业绩便放射出灿烂的光芒。多年来麦哲伦为之付出全部精力和劳动的不朽业绩终于完成了。麦哲伦找到了从西方通向印度的海上航道。在此之前，哥伦布、维斯普奇、卡勃特、宾松还有其他航海家们也曾寻找过这条道路。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麦哲伦发现了许多在他之前从未有人到过的国家和海洋。他是第一位欧洲人，也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成功地横越这个不知名的大洋的人。在这个辽阔的地球上，他所涉足的地方比任何人都要多，都要远。所剩下的路程对他来说，与他已经完成的辉煌业绩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多么轻而易举。只要有一位可靠的领航员，用不了多少天就可以到达马鲁古这个世界上最富庶的群岛了。那时候，他向皇上立下的誓言就可以实

现了。在那里，他会感激地拥抱给他勇气，为他指明航向的朋友谢兰，然后给每艘船的船舱装满香料，起锚返航回家去。沿着他熟悉的航线，经印度，绕过好望角，那里每一个港口，每一个海湾他都清楚地记在脑海里。他要穿过地球另外一半地区，以一个胜利者、凯旋归来的英雄、一个富豪、一个州长和总督、带着世间绝无仅有的永不褪色的桂冠回到西班牙去！

为此，不用着急，不必匆忙。现在终于可以好好地休息了，好好地享受一下经过几个月漂泊的艰苦历程后真正的幸福。胜利的探险家们在幽静的港湾悠闲自得地休息。优美迷人的景色，令人惬意的气候；和蔼可亲的岛上居民，他们热爱和平、无忧无虑，悠闲自在。他们生活在公正、幸福、恪守中庸的世界里。但是，除喜欢悠闲和安静之外，这些自然之子也喜欢吃喝。正如童话故事中所描写的那样。不久前，为了防止饥饿，用锯末和老鼠肉来填塞那因过度饥饿而萎缩的肚皮的水手们，现在突然置身于一个极乐王国。想吃美味可口的食物的欲望如此不可抗拒，以至连一向对圣母和圣徒感恩的虔诚的毕加费塔也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因为那天不是一般的星期五，而是斋戒日星期五。麦哲伦派他到岛上去见那里的酋长，卡林布（岛上的人都这样称呼他）热情地把他请到自己的船式竹棚里。锅里煎着的大块大块的肥猪肉发出嗞嗞的响声，散发出扑鼻的香味。可能是出于礼貌，或是因为嘴馋，他经受不住那诱人的猪肉香味，在这个最神圣、最庄严的斋戒日。他大口喝着棕榈酒、美美地咀嚼着大块的肥猪肉。但这一盛餐刚刚结束，麦哲伦的这些对食物一点也不挑剔的特使们刚刚把肚子填满，卡林布又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家里进行第二次盛餐。客人们盘腿而坐，像裁缝师干活那样——毕加费塔这样写道——又吃了起来。大盘

大盘的鲜羌端上来，斟满棕榈酒的大碗摆在台上，而这些造孽的人只好继续造孽。但这还不足为奇！因为毕加费塔和他的随行人员刚刚吃完第二餐，这个富国的王子又前来欢迎他们。出于礼貌，他们不得不再次坐到台前进行第三餐。这一餐的内容有所不同，吃的清水煮鱼和加足调料的米饭。一阵狂饮之后，毕加费塔的一个随行人员不胜酒力醉倒了。他摇摇晃晃，喃喃自语，人们只好让这个在马萨哇群岛上醉倒的第一个欧洲人放到竹席上，让他休息。可以想象，他正陶醉在天堂上的美梦之中。

但是，那些印苏兰人的激情一点也不比他们的那些饿坏了的客人逊色。那些飘洋过海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多么的神奇，他们带来了多么精美的礼物！光滑的玻璃器皿，光亮得如同一面镜子，透过玻璃可以看见自己的鼻子；光闪闪的刀具，还有那沉重的斧头，锋利得一斧能把一棵棕榈树砍倒。值得夸赞的还有那火红色的帽子和漂亮的土耳其服装，他们的首领正穿在身上炫耀呢！那些闪闪发光，刀枪不入的护身铠甲漂亮得让人难于置信。奉海军上将之命，一位水手穿上铠甲任由岛民踢，他们用骨箭向他射去，他非但没有受伤，反而哈哈大笑，拿他们开心。这是什么妖术！就拿毕加费塔本人来说吧，他手上拿着一根小木棍或者一根羽毛，当人们说话的时候，就用那根羽毛在一张白纸上龙飞凤舞地画上一些符号，过后他便能详详细细准确无误地把两天前别人跟他讲的话全说出来。在他们这些人称之为复活节星期天的那个日子里，他们表演了一个十分精彩的节目。他们在海滩上搭起了一个他们称之为祭坛的东西，上面竖起了一个十字架，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然后，他们排成两队，海军上将等五十多人，一个个穿上他们最漂亮的衣服。当他们面对十字架跪下的时候，一道闪电划破船队的上空，顿

时，晴朗的蓝天里雷声隆隆，响彻海面。

人们深信，这些聪明和强悍的异族人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具有神奇的效应。岛民们个个心惊胆战地模仿他们每一个动作，迅即跪在地上，猛吻十字架。海军上将答应给他们在岛上也竖立一个巨大的，无论从什么地方都能看得到的十字架时，这些至今还是异教徒的岛民们无不对这位海军长官感恩戴德。仅用几天工夫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个岛上的酋长不但成了西班牙国王的同盟者，而且成了他们的基督教兄弟；不仅为王室争得了一片土地，而且使这些无意犯罪的灵魂，这些自然之子受耶稣基督的支配了。

在马萨畦岛上度过的这些日子，真是如诗如画般的美妙！如今，麦哲伦，你休息够了。水手们也个个精力充沛，玩得开心极了，现在该让他们回家去了。你为什么还犹豫不决呢？你已经完成了当今世人最伟大的发现，再发现一个小岛对于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只需要再到香料群岛一趟，你就算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了。那时候，你回家去吧，妻子正在盼望你的归来，盼望让你这个父亲看看你离家后才出世的第二个儿子！回家去吧，去揭穿那些中途逃跑的胆小鬼们对你无端的中伤！回家去吧！向全世界人宣告，一个葡萄牙人何等的勇敢；西班牙船队的不屈不挠、不怕艰难困苦的精神能够创造出何等的成就！回去吧！不要让你的朋友们苦苦地等待；不要让那些原本相信你的人误解；回去吧，麦哲伦！拨正航向，回家去！

然而，一个人的天赋同时也是潜伏在最深处的危险。麦哲伦的天赋就是坚韧、善于等待和保持沉默。在他看来，责任感

在鞭策着他。他把它看得比凯旋而归，接受两个世界（新旧大陆）的权贵们的感谢的愿望还要强烈。这个人迄今所做的一切，他都是一丝不苟地亲力亲为，并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此，这一回也是一样，在他尚未完全弄清楚查理皇帝这个新省的情况、使它永远归属西班牙王国之前，他是不会轻易地离开这个由他发现的菲律宾群岛的。他那强烈的责任感表明，只考察一个小岛并把它兼并，是远远不能令他满足的。由于没有那么多人，他不可能在这里留下政权代表，也不可能设立商务代理，所以他想要和这个岛上更加有权力的王侯们签订一份类似与微不足道的卡林布签订的那种条约。他要让这里每一个岛屿的上空飘扬着卡斯蒂利亚的旗帜，在每一个岛上树起天主教的十字架，作为国家领土的永久象征。

麦哲伦从酋长那里获悉，塞布岛是这个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当麦哲伦请他给他一个领航员，陪他到该岛上去的时候，酋长自告奋勇，请求给他亲自陪同他前往这份荣誉。

然而，酋长当领航员的崇高荣誉反而拖延了出发时间。因为在征收稻米的时候，正直的卡林布吃得太饱，并且喝得烂醉，因此，船队不得不直到四月四日才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个盘塔格鲁埃利族领航员。随后船队离开了这个曾经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并赐予他们幸福的海岸。他们的船队在平静如镜的大海上航行，从许多风景迷人的大小岛屿旁边经过，直接驶向麦哲伦亲自选定的目标。因为——忠诚的毕加费塔满怀悲怆地写道："他那不幸的命运要求他这样做。"

陈秀琼　曾加耀 译

麦哲伦在凯旋前死去

1521 年 4 月 7 日—1521 年 4 月 27 日

船队在平静的海面上平安地行驶了三天之后，于一五二一年四月七日靠近赛布岛。老远就可以看到，岛上有许多村庄，这说明岛上居民稠密。酋长引水员卡兰布十分有把握地把手一指，引导舵手把船朝京城方向开去。麦哲伦第一眼看见这海港就意识到，他将在这里与更高级别的拉亚或酋长和更高文化层次的各类人物打交道，因为在港口停泊着不少外国船只和无数本地小帆船。这种种迹象表明，一开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暗示他们是比雷电还要厉害的人。麦哲伦下令鸣放礼炮表示友好的问候，并且同往常一样，这一奇观，这一人工制造出来的晴天霹雳，首先给岛上居住的自然之子们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他们惊恐万状，绝望地喊叫着四处逃窜，躲藏起来。但是，

麦哲伦立即派遣他那位勇敢的翻译恩利柯上岸，与岛上的首领进行外交接触，向他们解释，这些炮声毫无敌视之意，相反，友好威武的海军上将想借此高超的魔力来表达对赛布岛尊敬的国王陛下崇高的敬意。这些船上的首领们自己只不过是一位极其平凡的仆人，当然只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仆人。是奉他的旨意，他们才横渡地球上最大的海洋，专程前来访问香料岛的。借此机会顺道对赛布岛的国王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因为他在马萨哇群岛就已经久闻大名，陛下是赛布岛上一位多么英明的君主。这位能指挥雷电的海军上将十分乐意把那些岛上居民们从未见过的、价值连城的宝贝让他看看，并和他进行易货贸易。他毫无在岛上久留之意。而且在表明自己的友好之后马上离开这里，无意给威武的国王陛下增添任何麻烦。

但是，这时候的赛布岛上的国王，更加确切地说，是拉亚·胡玛邦，完全不同于贼岛上那些赤裸着身子的野人和在巴塔戈尼亚岛上所见到的那些"巨人"那样天真烂漫，他已经尝试过智慧之果，懂得如何去挣钱以及金钱的价值；这位黄褐色皮肤、住在地球另一端的君主是一位很现实的经济家。这一点从他仿效别人的或者是自己制订的有关港口收费的制度，以及由此取得的非同一般的效益可见一斑。翻译的甜言蜜语没有打动这位精明的君主，隆隆的炮声也没有把这位老练的巨贾吓倒。他冷淡地对恩利柯说道，他绝对不会拒绝外国船只停泊在他的港口，甚至欢迎与他们建立新的商务联系。但是，有一点必须遵守，所有要求在本港停泊的船只必须毫不例外地缴交停泊费及港口税。这就是说，这位三艘商船的船长大人，如果他想在这里做生意的话，那就必须首先付清这笔费用。

奴隶恩利柯心里十分明白，他的上司，一位皇家海军上将、

圣地亚哥骑士勋章获得者从来就没有打算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王交纳港口税，因为假如这样做的话，那岂不是说他承认了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根据教皇的训谕，这个小岛在很久以前已经是西班牙所属的一个省份了。为此，恩利柯想尽快说服酋长胡玛邦，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放弃对他们交纳各种费用的要求，不要与这位能主宰雷电的人为敌。对此，这位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的拉亚一再表示歉意。在他看来金钱第一，友谊第二，进港交钱，谁也不能例外。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把一位伊斯兰商人叫来，他是乘坐自己的小艇刚从暹罗到此的，并且乐意地交了税。

一个摩尔国商人不一会出现在他们面前，吓得脸无血色。他一眼认出大船上张满的风帆有圣地亚哥的十字标志，他就意识到情况不妙。哎呀！糟糕了！就连这个东方最偏僻的角落、那惟一可与这些海盗们自由地进行正当交易的地方也被基督教徒们找到了。这些杀人魔鬼，这些与伊斯兰教势不两立的敌人，看，他们带着可怕的大炮和火药枪来了。和平自由的经商不复存在了！赚钱的机会也全完了！他战栗着小声地对国王说，小心点，千万别与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争吵。因为这些人（他无意中竟把这些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搞混了）掠夺和征服了卡利卡特、印度和马六甲人，谁也打不赢这些白色的魔鬼呀！

这一次打交道再次画上了一个圆圈；在地球的另一端，在另外一个星座下面，欧洲同欧洲又一次连接在一起。至此，麦哲伦在向西行驶的道路上，涉足了所有以往欧洲人从未到过的地方。他在航行途中所碰见过的所有土著人，没有一个曾经听说过有关白人的事情，没有谁在此之前曾经见过欧洲人是个什

么样子。在瓦斯科达·伽玛到印度时，一个阿拉伯人甚至用葡萄牙语跟他说话。他觉得两年来从来未碰见真正认识他的人，仿佛这些西班牙人在一个陌生的从未有人涉足的世外星球上漫游，在巴塔戈尼亚，人们以为他们是外星人；贼岛上的居民把他们视作妖魔鬼怪，惟恐躲避不及。如今，在地球的另一端，这些欧洲人终于又与一个认识他们，承认他们的人站到一块儿。一座跨过大洋连接两个世界的大桥终于架了起来。一个围绕地球的圆圈形成了。再过几天，再航行几百海里，经过两年的航行之后，麦哲伦将重新与欧洲人相会，与那些基督信徒们，朋友们，同一信仰的教友们相聚在一起。如果，在此之前，麦哲伦对自己是否将到达目的地表示怀疑的话。如今事实将给他极大的鼓舞：距离在逐渐缩短，一个半球与另外一个半球连接在一起，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成功了，他绕地球走了一圈。

摩尔商人的警告显然引起了赛布岛国王的重视。他害怕了，马上取消对他们纳港口税的要求。为了表明自己的热情好客，还特意盛情宴请麦哲伦的使者。而第三个不容置疑的证据是这些亚哥利亚远航家们离亚各斯不远了。因为饭菜不是放在草垫上或木板上，而是盛在马可·波罗神话般地从中国直接运来的陶瓷器皿里。由此可见，日本和印度已近在咫尺了，西班牙人已经站在东方文化古国的边缘了。哥伦布从西方到达印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外交上的冲突平息后，礼节性的官方交往及商品交易也顺利地开始了。毕加费塔以特命全权使节被派遣上岸。赛布岛国王诚心地宣布与查理皇帝陛下结成永久的和平友好联盟；麦哲伦为了和平也真诚地作了一番努力，而科尔特茨和毕萨罗斯则

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一上岸马上把手中的猎犬放开，野蛮地杀害岛上居民或把他们掠为奴隶，他们毫无顾忌，一心只想尽快掳掠这个国家。然而富于远见的和人道的探险家麦哲伦在整个旅行期间自始至终所采取的是和平的渗透方式。他一开始便竭力采用友好和签订协约的方式，而避免采用流血和暴力强迫新省区归并。与当时所有其他海洋征服者相比，麦哲伦塑造了一个道德上无与伦比的优胜者的形象。麦哲伦生就一副铁面无私的性格——这一点在镇压叛乱时已得到证明，他要求船队有铁一般的纪律，他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也不顾情面，但是，尽管如此，他从不残忍的声誉却是不容置疑的。像科尔特茨和毕萨罗斯所采取的那些诸如活活烧死酋长，严刑拷打古亚塔摩津而使自己的伟大事业永世蒙耻的野蛮行为是绝对与他不沾边的。其他海洋远征者与异教徒打交道时，背信弃义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但麦哲伦从不让这样的行为使他的胜利蒙受耻辱。他至死一直严格遵守他和每一位国王所签的每一项协约；他的一片真诚是他最有说服力的武器，也使他的英名永垂青史。

其间贸易也开始了，而且令双方都十分高兴。最令印苏兰人感到惊讶的是那些铁器，这些外国人带来的坚硬的东西用来制剑、矛、锄头和犁真是妙极了，与那些软的、浅黄色的金子相比，他们觉得，这些硬邦邦的铁更有价值。岛上居民们用十五磅黄金去换取十四磅这种当时在欧洲毫无价值的金属。以致麦哲伦不得不采取严格的措施来限制那些水手们，他们被视金子为粪土的岛民们的无比慷慨举动弄得神魂颠倒，他们甚至连衣物也拿去换取金子。麦哲伦不想让这些岛民们知道这些金属的真正价值，一但让他们猜出了，反而会使自己的货物被压低价格。麦哲伦想保持住由于岛民的无知给他们带来的好

处，——但在其他方面他却看管得很严，在数量和质量方面，不能占赛布岛人的任何一点便宜。这位目光远大的人，他不会鼠目寸光，只是死死盯着小小的金钱方面的好处，而是着眼于长久地与赛布岛人做生意和赢得这个新省的人的信赖。他的决策又一次证明他是对的：不久土著人对这些友好而威武的异国人表示无比信任；岛上国王及其大多数追随者都自愿表示信仰基督教。其他西班牙征服者依靠刑具、宗教法庭的裁决，可怕的惩罚和火刑历经多年所取得的东西，但对宗教深信不疑，又与宗教狂热格格不入的麦哲伦来说仅用短短的几天功夫，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了。他在与当地人的交往中多么的人道，多么的灵活，这一点可以在毕加费塔后来的书中读到。"船长对他们说，他们不要因为害怕我们或是为了讨好我们才信仰基督教，如果是真心诚意地想成为基督教徒，那就必须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做，并且是出于内心对上帝怀着真诚的爱。但是，即使他们不想成为基督教徒，也不会受到不友好的对待。而对那些加入基督教的人应该会得到更多更好的关照。于是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为了讨好，而是自愿加入的。他们愿意听从他的分咐，也希望他能像对待他自己的下属一样对待他们。随后，船长噙着深情的泪花一个个拥抱他们，紧紧地握着王子和马萨畦国王的手对他们说，他以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皇上的忠诚向他们做出承诺，从现在起，他们将和西班牙国王之间永久和好，而他们也向他作了同样的保证。"

一五二一年四月十七日，即第二个星期天，——在告别的时候，麦哲伦的幸运仿佛落日的余辉闪耀着光芒——西班牙人庆祝他们最伟大的胜利。在市政广场上竖起了华盖，铺上了从

船上取下来的地毯，地毯上摆好了两张用天鹅绒罩着的大椅，一张给麦哲伦，另一张是为国王陛下准备的。在华盖底下竖起了一个老远就能看见的祭坛，祭坛上香烟缭绕。祭坛的四周成千上万的皮肤黝黑的当地居民围站着，等待着壮观的场面的出现。麦哲伦有意把这一场面布置得像演戏那样隆重豪华。在此之前，他出于精心的考虑，一直不露面，所有谈判均由他的忠诚侍臣毕加费塔出面处理。登岸时，四十名全副武装的卫士走在前面，后面是一个旗手高举查理皇帝绸制大旗，这面大旗是在塞维利亚教堂授给海军上将的，也是首次在这个新省份的上空飘扬。接着麦哲伦在他的军官护卫下从容不迫、镇静自若、威武雄壮地上了岸。就在他登岸的时候，船上礼炮齐鸣。顿时把围观的观众吓得四处逃跑。然而，此时他们的国王（事前已把这次鸣炮给他打过招呼）依然不动地端坐在椅子上，于是他们又跑了回来，而且兴致勃勃地看着人们把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竖起来。他们的国王、王储和许多其他要员们都低着头站在十字架前接受洗礼。麦哲伦以教父的名义，借此机会给他取名为卡洛斯，取代他至今一直沿用的异教名字胡马波恩；皇后则叫约安娜，她美丽出众，即使是今天也完全有机会出现在上流社会场面，因为她那涂了口红的嘴唇和涂了指甲油的纤纤十指，就时尚而言，比欧洲和美洲的姐妹们领先将近四百年，两位公主也被授予西班牙王国的名字：一个叫卡达琳娜，另一个叫伊莎贝拉。当然赛布岛和邻近一些岛屿上的王公贵族们也不甘落在国王及其他首领之后，船上的神父一直忙到深夜，为数以百计前来的人做洗礼。有关这些神奇的异国人的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天，居住在其他岛屿上的居民听说这些外国魔术师的奇妙仪式后，也蜂拥而来，在短短的几天里，邻近岛屿上的几乎所有首领们都宣

誓效忠西班牙并低头接受了圣水。

一个伟大的奇迹完成了。麦哲伦获得了一切。越洋的航线已经探明；地球的另一端已经找到；并为西班牙王国赢得了许多富饶的岛屿；无数异教徒归顺上帝；所有这一切节节胜利都滴血不流而轻易取得。上帝与他的忠实信徒们永远站在一起，在他们面临人世间是痛苦的时刻拯救了他们。麦哲伦内心充满着对宗教的感情和信心，在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还将经受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呢？在他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之后，还有什么将会危害他的事业呢？一股神奇的力量使他充满信心，这就是上帝、为国王做的一切必定会成功。

然而正是这个信念日后却成了他的厄运。

仿佛天使指明了他前进的道路，麦哲伦一帆风顺。他又使一个新的帝国归附西班牙王朝。但是，如何才能使西班牙王国保住这些胜利果实呢?继续在赛布岛上逗留显然是不可能的。同样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征服群岛上所有的岛屿。于是，麦哲伦——这个能综观大局的人，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使西班牙王国的势力长时期在菲律宾得到巩固，那就是把卡洛斯·胡马波恩这个惟一的天主教酋长推举为所有头目的首领。从现在起，作为西班牙王国的盟友，赛布岛上的卡洛斯国王应该享有比其他国王更高的威望。麦哲伦将会向赛布岛国王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一旦有谁胆敢反对他。这不是一个轻率的许诺，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步骤。

正好这几天给他提供了一个证明他诺言的绝好机会。与赛布岛相望的一个叫马克坦的弹丸小岛，岛上首领叫西拉普拉普，他早就不服赛布岛国王的管辖。这时，他暗中禁止他的下属向

卡洛斯·胡马波恩的那些神秘的客人提供食品，而且这种敌视行为也许还是有根据的：在小岛上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大概是因为那些水手们压抑得太久了，他们在岛上发疯似地追逐女人，并且烧毁了几间茅屋。因此，西拉普拉普想尽快赶走这些外地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麦哲伦看来，西拉普拉普对胡马波恩客人那种不友好的举动恰恰成了他显示威力的绝妙机会。不仅仅赛布岛的国王，而且四周的酋长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谁听命西班牙人，谁就会得到好处，谁敢与这雷神作对就会自讨苦吃。这场小小的流血不多的冲突要比任何言辞都更具说服力。麦哲伦于是向胡马波恩建议，他想用枪炮教训一下那位顽固的酋长，以便其他酋长日后对他更尊敬点。令人意外的是，赛布岛国王对麦哲伦这一建议没有表示特别的兴趣。也许他担心，他这样做，外国人走后，他所管辖下的部族会马上起来反对他。另外，谢兰和巴尔波查也劝说海军上将没有必要采取这种军事惩罚手段。

其实，麦哲伦也完全没有作真正对抗的打算。如果反叛者自愿屈服，对他对大家都是一桩好事。麦哲伦一向反对其他西班牙征服者所采取的不必要的流血行为。他首先派遣奴隶恩利柯和摩尔国商人到西拉普拉普那里向他提出真诚的和平建议。他别无所求，只要求他承认赛布岛国王的最高权力和西班牙的宗主地位。如果西拉普拉普同意的话，西班牙人将和他和睦相处。如果他拒绝承认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力那就让他看看西班牙人的枪矛究竟有多厉害。

但是，拉亚也回敬说，他们的人也有矛枪，尽管它是用竹子和芦苇管做的，但矛尖用火焙烤加固。西班牙人可以亲自证实一下它的厉害。在听到如此傲慢的回答后，作为西班牙权力

象征的麦哲伦除了采取武力之外，别无选择了。

在这次小规模出兵惩罚的准备工作中，麦哲伦头一回忽视了自己特有的性格：小心和富于远见。这个一向精明的人头一回如此轻率地冒险。因为赛布岛的国王已经宣布，调遣一千名士兵给西班牙人参与这次惩罚行动。而麦哲伦调遣一百五十人上小岛也不成问题。毫无疑问，这个连一般地图上找都找不到，只有跳蚤般大小的小岛上的拉亚必将一败涂地。但麦哲伦并不想大开杀戒。麦哲伦这次远征为的是一桩更加重要的事：就是西班牙的声望。在两个世界的皇帝的海军上将看来，派遣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去对付那些又穷又脏，家里连一张不打补丁的草席也没有的黑人，去反对印苏兰岛上如此可怜的岛民，有失他的尊严。而恰恰相反，麦哲伦所追求的目的是，他要表明，仅仅一个全副武装，身披盔甲的西班牙人就足以对付一百个赤身裸体的人。这次讨伐行动，就是要让所有岛上的岛民看清，西班牙人就是像传说中的那些刀枪不入的神人一样。就在前几天，马萨瓦岛和赛布岛国王在船上亲眼见到过，为了娱乐，二十多个士兵同时用长矛，短剑对着结实无比的西班牙盔甲猛刺，而裹在里面的人丝毫也没有受伤。这一回将以更大的规模向这位不服气的酋长显示他的威力。仅仅是出于心理方面的原因，一向小心行事的麦哲伦这一回没有把全部人员都带上，只带六十个人，并要求赛布岛国王带领他的增援人员留守在船上，不要介入战斗。只是以证人，以观众的身份观看这一出具有教育意义的表演。看看仅仅这几十个西班牙人是如何把这些岛屿上的首领们、酋长们、还有那些拉亚斯赶跑的。

难道这一位经验丰富的预言家这一回估计错了?绝对不是。六十多名身披盔甲的欧洲人对付一千多名赤身裸体手持鱼骨武装的印第安人，从历史角度上看，绝对不是荒谬的力量对比。因为科尔特茨和毕萨罗斯就曾带领四百多名士兵战胜过数十万墨西哥人和秘鲁人，征服不少国家。与这些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相比，麦哲伦出征一个针尖大的小岛，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次军事野游而已。他和另外一位伟大的航海家、船长库克一样——一位在一次与岛上居民发生的一次小小冲突中丧生的——把危险置于脑后。从下面这件事我们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以往每次在进行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之前，都要让船员们与他共进圣餐，而这一回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安排。几声猛烈的枪声，结结实实地狠揍他们几下，西拉普拉普的那些可怜的士兵定会如鸟兽惊散。几乎滴血不流，西班牙王国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地将永远在这里确立。

一五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五夜里，当麦哲伦和他六十多名随员乘船穿过两岛之间窄长的海峡时，岛上土著人说，看见一只罕见的、黑色的叫不出名字而样子有点像乌鸦的鸟停在屋顶上，而且真的，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四周的狗都一齐吠了起来。比自然之子还要迷信的西班牙人个个心惊胆战地画起十字来。但是，一个敢于游弋世界大洋的人，会因为一只乌鸦的尖叫，就会放弃与一位光着身子的酋长以及他手下的那群喽罗们较量吗?

不幸的是这个小小的酋长发现海滩的特殊结构是他的一个绝好的盟友。由于密密麻麻的珊瑚使小船无法靠岸。这样西班牙人采取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战斗手段——那些从火枪发射出

来的致命火力，那些声似雷鸣足以使那些土著人吓得屁滚尿流的火药枪——一开始便失去了作用。但是没有想到，这六十名全副武装的西班牙士兵放弃这一背面掩护，——其余人员留在船上——麦哲伦一马当先，纷纷跳到水里。正如毕加费塔在书中所记载的那样，他是一个不愿离开羊群的好牧人。他们在没脐的海水中涉水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到岸边；而岸上的印第安人正在大喊大叫挥舞着盾牌在等待着他们。双方一下子就打起来了。

有关这场战斗场面有各种各样的记载，而只有在那次战斗中身上深深地中了箭伤，而且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热爱的海军上将的毕加费塔的描写最为可靠。他在书中写道："我们跳进齐腰深的水中，涉过足足有两箭以上的距离才到岸边。因为其间礁石林立，我们的船无法靠岸。这时我们发现，岸上约莫有一千五百多名岛上居民，分别站在三个地方，他们疯狂地喊叫着朝我们跑来，他们从左中右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的船长把人员分成两组；我们的火枪手和弓弩手在船上向他们猛射长达半个多小时。但是，由于距离太远，他们发出去的子弹、箭和矛连岛民们的木制盾牌也打不穿，更谈不上伤及他们的手臂。海军上将只好下令停止射击，很明显他是想节约弹药，以便决战。但是，枪手们没有听从他的命令。岛民们眼看着我们的子弹只是使他们受点轻伤，甚至根本不能伤害他们，于是不再后退。他们越叫越大声，并从一边跳到另一边，躲避我们的射击。他们手持盾牌，同时向我们逼近。不断地向我们投来箭、镖、经淬火过的木制矛、石头和脏物，令我们不得不左右抵挡，防不胜防，有几个甚至把装有铜制的锋利的矛枪向我们的海军上将投来。

为了吓唬他们，海军上将派了几个士兵放火把印苏兰人的

房子给烧了。但是这样做只会加剧刺激他们野性的发作。他们中几个人向烧毁他们二十至三十间房子的大火奔去，当场打死了我们两个人。其余的人更加气势汹汹地向我们冲过来。当他们发现我们虽然身披盔甲 ，而两条腿却没有任何保护的时候，便一齐向我们的腿部发起攻击。海军上将的右腿被一枝毒箭射穿，他立即命令我们的人逐步后撤。然而，我们的人员此时可以说是乱哄哄的狼狈逃窜。因此只有七八个人留在海军上将的身边。(他因为近年来腿部有毛病，因此撤退时明显比别人走得慢）这时石头、矛枪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投来，我们却无力抵抗。船上的火炮也帮不了我们。因为水浅，船停泊在离岸很远的地方。我们只好一边抵抗，一边一步步向后撤离海滩。当我们离海岸一箭之遥的时候，水已淹到膝盖上来了。但是岛民们仍然紧追不放，不断从水中捞起已经用过的矛、枪向我们投过来。就这样，一支矛枪他们可以用上五六回。因为他们认出了我们的船长，因此把目标集中对准了他。他们两次击中了他的头盔。但他，还有他身边仅有的我们几个人，像英勇的骑士一样，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毫无继续后撤之意。我们就这样与他们搏斗了一个多钟头，直至一个印第安人用芦杆做的标枪打伤了海军上将的脸部。他怒不可遏，举起长矛立即向那个家伙的脸膛刺去，长矛紧紧地卡在他的身上，拔不出来。海军上将伸手拔剑，但他只能把剑抽出一半，因为他右手受伤已不能动了。岛民们发现了这一点，一齐向他扑过来，其中一个人用匕首刺伤了他的左腿，他立即倒下。其他人一拥而上，一齐用矛枪和其他随身带的武器向他捅去。就这样他们掠去了我们的镜子、我们的光明，我们的安慰，还有我们忠实的统帅的生命。

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在他完成他的伟大事业最崇

高和最美好的时刻，却在与一群赤身裸体的印苏兰岛民这样的乌合之众的小小冲突中无谓地倒下了。一个像普罗斯佩罗那样能制服水、火、风和土，战胜风暴、征服过不少人的天才，竟然被一个可笑的人渣西拉普拉普杀害。但是，这出荒唐事故夺走了他的生命，却不能夺走他的胜利。因为他的伟大事业即将完成。对他来说，完成史无前例的业绩之后，个人的命运已是无关紧要的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就在他英勇倒下的悲剧发生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一件滑稽的事情。同是这些西班牙人，几个小时之前还俨然是从天而降的神仙，不把小小的马克坦岛国王放在眼里，竟然卑躬屈膝地跪倒在他们的仇人面前，他们不是马上派人从那些刽子手们手中把自己首领的尸体抢回来，而是胆怯地派一名求和的谈判代表前往西拉普拉普处，要求他们把尸体卖给他们；他们想用几个铜板和几个彩色的布袋把海军上将的遗体赎回。但是，比起麦哲伦那些不那么勇敢的战友们还要傲慢、光着身子的胜利者们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无论是用小镜子、玻璃珠子还是彩色斑斓的天鹅绒他都不愿用对手的尸体作交换。他决不会出卖这件战利品，因为伟大的西拉普拉普像宰一条鱼、杀死一只鸟那样轻而易举地杀死了那个能主宰雷电的异乡来客的消息，已经传遍所有大小岛屿了。

谁也不知道那些可怜的野蛮人是怎样处理麦哲伦的尸体的，无人知晓。他们把他的遗体是用火烧了，让潮水冲走了，还是埋葬了。一点点可作证据的东西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他的坟墓已不复存在。这位环游了地球、揭开浩瀚大海最后奥秘的人的踪迹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

陈秀琼　曾加耀　译

胜利归来没有统帅

1521 年 4 月 27 日—1522 年 9 月 6 日

在与西拉普拉普那次小规模的冲突中，一共有八个西班牙人被打死，数字本身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统帅的死去却使这一天成了大灾难。麦哲伦一死，那至今把外来的白人奉若神灵的奇妙光环一下子失去了它的光辉。因为所有的征服者的强大与成功大多数都是依托在这种虚无缥缈的不可战胜的基础上的。尽管他们英勇无比，尽管他们吃苦耐劳，尽管他们具有战争的道德观和战斗所需要的武器。但是，如果没有所向无敌，刀枪不入神话中的保护天使米夏埃尔陪伴着他们的话，无论是科尔特斯还是毕萨罗，永远也无法战胜上万甚至数万敌人。惊惶失措的土著人原以为，这些能够从他们的小木棒放出电闪雷鸣的、无所不知的异域生灵是刀枪不入的，你无

法伤害他们。因为箭一碰上他们的盔甲就会反弹回来，你无法逃脱；那四脚巨兽和它们结合在一起，一定能够追上逃跑的人。在那个殖民扩张的年代，没有什么能够证明比一个西班牙人在河里被淹死这样一件小事更加令人震惊。印第安人把他的尸体在茅屋里停放了三天。他们守着他，但出于害怕，不敢去碰他，生怕这个异邦之神又复活过来。直至尸体腐烂，他们才壮起胆子来。一个自称魔法无边的白人，一个一直所向无敌的人，一旦遭到了失败，他的一切所谓魔法便化为乌有，他所具有魔力的神话也就顿时失色。

这一回也不例外。赛布岛国王对这位能主宰雷电的人命听计从，也恭顺地接受了他们的信仰。他认为他们的神比他自己迄今所崇拜的木头神像更加强大。他希望，一旦自己与这个神奇莫测的、超自然的人结下友谊，他将成为周围诸岛最强大的君主。而现在，他和他的上千名士兵亲眼目睹了，西拉普拉普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头领如何把这个白人之神打败；亲眼看见他们的雷电毫无威力。不但如此，还看见了那些身披闪闪发光的盔甲、自称刀枪不入的士兵们在西拉普拉普那些赤身裸体的士兵面前狼狈逃窜，如此不堪一击的可怜相；最后他还亲眼看见了这个首领的尸体是如何被他的那些所谓勇敢的同胞们出卖的。

假如西班牙人采取强硬的态度，也许可以挽救一点他们的尊严。如果他们有一位勇敢的领袖站出来，把二百来号人召集起来，如果他们全都涉水登上马克坦岛，一拥而上，冲过去把他们的统帅的尸体从土著人手中抢回来，并且狠狠地整治一下那位赤身裸体的土著人的头领及其部落，这样也许可以使塞布岛酋长感到心惊胆战。然而，唐·卡洛斯·胡马波恩（他也不

可能长久使用这个至尊的名字了）却没有看见这些，只看见被打败的西班牙人老老实实地派遣使者去拜见得胜的酋长，想用物品和钱赎回麦哲伦的尸体。但是，结果如何呢？那位微不足道的马克坦岛酋长不但拒绝那些白人神仙的请求，还鄙视地赶走来使。

这些白人神仙如此胆小的举动，不能不使国王卡洛斯·胡马波恩感到不可思议，很可能他尝到了卡利班痛苦失望的滋味，因为这个受人欺骗、头脑简单的可怜虫终于明白，他轻率地把特林库罗这样一个吹牛大王和饶舌鬼视作神灵，总而言之，西班牙人的所作所为破坏了他们与印苏兰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彼得·马尔蒂尔一回来便马上向水手们调查，在麦哲伦死后与土著人的关系发生变化的真正原因。从一个亲眼目睹这一情况变化的证人口中，一个大概叫马丁的热那亚人了解到了一些详细情况：侮辱妇女是导致骚乱的主要原因。尽管麦哲伦对下属的要求十分严格，但长达几个月的海上航行，令那些压抑多时的水手们，情不自禁地向热情好客的主人们的妻子扑去。他曾试图阻止他们的粗鲁行径，但一切徒然。麦哲伦的小舅子巴尔波查也因擅自上岸留宿三个晚上受到严厉惩罚。但是，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在麦哲伦死后越演越烈。不管怎么样说，酋长对这帮外来入侵者的敬畏及其军士力量的恐惧，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显然。西班牙人也觉察到了土著人对他们的不信任情绪正在与日俱增，因为他们突然不耐烦起来。他们现在只有尽快地把货物和赚来的东西搬到船上，迅速离开那里，到香料群岛去才是上策。麦哲伦当时的想法是：用和平和友好的方法使菲律宾归属西班牙王国的统治，并使基督教在那里扎根。但是，他的这一思想没有引起他的那些更加惟利是图的继承人的重视，他们

只想尽快了结此事，赶快回去。但是，他们要做成这笔生意，必须有麦哲伦的奴隶恩利柯的帮助，因为他是惟一懂得当地语言的人。只有通过他才能与土著人进行交往和贸易。而同时也正是这桩本来无足轻重的事情暴露了他们不善与人打交道的毛病。而比较人道的麦哲伦恰恰相反，他正是凭借着这种本领，不断取得伟大的成就。他的那位忠诚的奴隶恩利柯在战斗到最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他负伤后被抬上船送了回来。现在还一动不动地躺在凉席上，也许是战斗负伤的缘故，也许是因为失去亲爱的主人而感到悲伤。在麦哲伦死后，与谢兰一起选为船队首领的杜阿托·巴尔波查做了一件大蠢事，使麦哲伦最忠实的仆人恩利柯的心灵受到了莫大的创伤。他极其粗暴地对他说：恩利柯，不要以为主人死了就可以什么事情都不用干了，就不再是奴隶了。一回国就会立即把他交给麦哲伦的遗孀，而现在他还必须服从命令。如果他现在不马上出发，上岸当翻译，帮助把货物卖掉，他们会让他结结实实地尝尝鞭子的厉害。恩利柯出生于一个从不屈辱的坚强的马来亚族。这时他脸上露出了不屑一顾的神色倾听着他们的威胁，他十分清楚，麦哲伦在临终前曾留下遗嘱：主人死后，他会恢复自由，并且可以得到一笔遗产。为此，他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不公正的对待。他伟大的主人和师长的这帮继承人妄图剥夺他的自由，而丝毫也不理会他的痛苦。他们把他同那只叫“佩罗”的狗同样称呼，事实上也把他当狗看待。他们一定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

这个逆来顺受的马来亚人表面上丝毫未露出复仇的迹象，在交易市场上尽心尽责地做他的翻译工作。但同时也在不怀好意地利用他的翻译技巧。他暗地里告诉赛布岛国王，西班牙人打算把尚未卖出的商品搬回到船上，明天一早带着全部东西突

然离去。如果国王现在能够机灵一点，连丁点东西也用不着跟他们交换，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所有的货物占为己有，甚至连那三艘漂亮的西班牙船也可以借此机会一并弄到手。

也许恩利柯的报复性建议正好与赛布岛国王的心愿不谋而合，不管怎样，这番话他很中听。于是一个复仇的计划在他们之间取得共识并且在秘密地策划之中。表面上买卖做得挺红火。赛布岛国王对他新结识的同一信仰的弟兄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热情；而自从巴尔波查用鞭子教训恩利柯以后，他也好像不敢再偷懒。麦哲伦死后第三天，即五月一日，他满脸春风地给船长们带来了一个特别令人兴奋的消息：赛布岛国王终于筹备到了送给既是他的主又是他的朋友——西班牙国王的珠宝首饰。为了使赠送仪式尽可能搞得隆重些，他特地把所有的部落首领和臣民百姓都召集来了。巴尔波查和谢兰两位船长在显贵们的陪同下徐徐出场，亲手从赛布岛国王手中接过礼物，转呈给至高无尚的主和朋友——西班牙国王卡洛斯。

要是麦哲伦还在世的话，他一定能回忆起，在他征战印度的年代，马六甲国王也曾对他发出类似盛情的邀请。毫无戒备的船长刚一上岸，岛民就发出信号，把他们杀害了。多亏麦哲伦的英勇抢救，才保住了与谢兰同姓的表兄一条小命。但另外一个谢兰和杜阿托·巴尔波查却掉进了那些新基督教兄弟所设下的陷阱，他们应邀前往。事实再次证明，星占学家连自己的命运如何也一点不知道，因为星占学家安德雷斯·德·圣马丁也陪同前往。好像他也忘记了，出发前先替自己占星。对什么都十分好奇的毕加费塔因在马克坦岛战斗中受了箭伤，这回他躺在床上，而幸免一死。

一共有二十九个西班牙人上了岸。不幸的是其中有最好的、

经验最丰富的领航员和舵手。他们被带到一座棕榈林里，在那里酋长设宴热情欢迎他们。一大批一大批土著人好像出于好奇，并且出人意外的热情从四面八方向西班牙客人围拢过来。但是，酋长一个劲地把他们引向棕榈林的深处，这引起舵手胡安·卡尔瓦洛的不高兴。他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船队军械师戈梅茨·德·艾斯皮诺萨；于是，他俩决定，马上把留守在船上的其他人员调到岸上来。一旦发生叛变，可以搭救其他伙伴，他俩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借口，从混乱的人群中溜了出来，赶快跳上小艇向大船划去。还没有待他们回到大船，就听见从岸上传来了凄厉的喊叫声。正像在马六甲那回一样，还没有待他们来得及自卫，那些土著人就向彬彬有礼正在进餐的西班牙人发起突然袭击。阴险恶毒的赛布岛国王不费吹灰之力便把所有客人解决了，并且占有西班牙人留在岛上的全部货物、武器及其刀枪不入的盔甲。

船上的伙伴们目睹这一悲惨的一幕，一个个都吓呆了。随后，因其他船长突然遇难而一跃成为船队长官的卡尔瓦洛下令靠岸，所有大炮一齐向岛上开火。隆隆的炮声响彻海天。或许卡尔瓦洛用轰隆隆的炮火救出了几个伙伴，也许这只不过是愤怒的发泄。但是，就在第一批炮火摧毁茅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可怕场面。受到袭击的西班牙人中最勇敢的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若奥·谢兰神秘地再现。就像弗朗西斯科·谢兰当年在马六甲海滩上那样，在最后关头从刽子手的魔掌中挣脱出来，逃离海滩。但敌人穷追不放，包围了他，把他捆了起来。他赤手空拳，失去任何自卫能力。他拼尽全力向船上的伙伴呼救，要他们马上停止向岸上开火，否则那群折磨他的人会把他杀害，他央求他们看在上帝

的分上，赶快派一艘船，运些货物来把他赎回去。

这笔交易眼看就要成交，这位最勇敢的船长的生命的价格已经确定：值两门大炮和几桶铜，但是，那些土著人要求他们把货物送到岸上。卡尔瓦洛担心，这些不信守诺言的恶棍不但会把货物而且连同小船也会被抢去。也许——毕加费塔自己也对此表示怀疑——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不愿意让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指挥官的称号得而复失，也不愿意又在被赎回来的谢兰手下当一名普通舵手。总之，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在海滩上，一个被五花大绑、满身是血、额头上汗如雨滴的伤号蜷缩在那里，一群杀气腾腾的土著人把他团团围住。此时，他惟一的生存希望是：三艘装备精良，张满风帆的西班牙船，就停靠在几乎不足一投石之距的地方。然而，站在旗舰上的正是他的同乡、他的船长、他的好朋友卡尔瓦洛。他俩一起度过了无数艰难困苦，相信卡尔瓦洛宁可牺牲自己也不会置自己的朋友于痛苦之中而不顾。于是，他不断扯开沙哑的嗓子朝他叫喊：“快点！快点！拿东西来把我赎回去。”他的双眼贪婪地紧紧盯着在大船旁边摇晃着的小舢板。但是，为什么卡尔瓦洛犹豫不决呢？为什么他拖延了这么久还不来呢？对于船上每一个动作都十分熟悉、曾经当过水手的谢兰，睁大着发红的双眼，看着那艘登陆用的小舢板被吊到甲板上。背叛！背叛！他被出卖了。他们没有派船来救他，反而掉转船头，准备跑了。旗舰正在掉头，微风吹鼓了风帆。起初，不幸的谢兰不能也不愿意这样想：他，一位一船之长，最高指挥官，竟会在自己的伙伴，自己的结拜兄弟的命令下，胆怯地交到杀人魔鬼的手里。他再次用沙哑的声音，朝着那些逃跑者们呼唤。他求饶，他命令，在临死前的绝望之中，仍然想再挣扎一下。然而，当他终于弄明白，船

队已经起锚，就要离开泊地的时候，他憋足了最后一点力气，抬起头来，迎着海浪对着胡安·卡尔瓦洛大声咒骂：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他会因为他那卑劣的背叛行径，被传讯到至高无上的上帝面前，接受审判。

但是，这些诅咒的话却成了谢兰临终的遗嘱。甲板上那些出卖了他的伙伴们亲眼看见了他们亲自选举出来的首领，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还没有待他们离开海港，那个巨大的十字架便在土著人的欢呼声中倒塌了。就这样，麦哲伦历经几周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由于他的后继人的轻率、愚昧和无知被葬送掉了。蒙受着奇耻大辱，带着死去的船长的诅咒、伴随着从背后传来的一阵阵土著人欢呼雀跃的号角声，西班牙人仿佛一群被追赶的强盗，仓皇逃离在麦哲伦带领下曾经像神一样登上过的小岛。

幸运地从赛布港逃出来的人，伤心地清点所剩下的人员。自从船队出发以来，经历了命运的种种打击，而这一回的损失是最严重的。除失去麦哲伦这位无可替代的统帅以外，还损失了杜阿托·巴尔波查和若奥·谢兰两位经验丰富的船长。他俩对东印度海岸十分熟悉，对刚刚踏上归途的船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安德雷斯·德·圣马丁之死又使他们失去了一位航海行家；恩利柯的出逃使他们没有翻译。在塞维利亚港上船时总共有二百六十五人，而今只剩下了一百一十五人。所剩下的这些人已经不能满足三艘船的需要了。事到如今，最好的办法是放弃其中一艘船，以便满足其余两艘船上人员的需要。根据抽签的结果，自动沉没的命运落到了“康塞普西翁号”船上。这艘船早已渗水，令人担忧，它已无法承担这一艰难的航程。它的

死刑是在波和岛附近执行的。船上一切尚可使用的东西，包括一根钉子，一条破旧的缆绳都被搬到另外两艘船上，空荡荡的船体被付之一炬。船员们心酸地目送着“康塞普西翁号”在烈火中魂归西天。火苗从小到大，慢慢地从四面八方燃烧起来，这艘船，两年来曾经是他们的家和祖国，如今被大火所吞噬，化为灰烬，一根根烧焦了的骨架沉没在充满敌意的异乡海域里。在塞维利亚港出发时，五艘大船满载着众多人员，万国旗随风招展，好不气派。第一个牺牲者是“圣地亚哥号”，它是在巴塔戈尼亚海岸触礁沉没的，“圣安东尼奥号”是在麦哲伦海峡中途开小差离开船队的；“康塞普西翁号”是他们现在亲手把它烧毁、亲手把它埋葬到大海里去的。如今只剩下最后两艘船了，它们并列航行在苍茫的大海上：一艘是麦哲伦的旗舰“特立尼达号”，另一艘是又小又难看的“维多利亚号”。它无愧于自己骄傲的名字，是它最终使麦哲伦的伟大计划流芳百世。

麦哲伦这位经验丰富的统帅离开了船队，使这个规模缩小了的船队顿时迷失了航向。他们仿佛成了瞎子、老眼昏花的老头，在孙达群岛四周摸索前进。船队不是朝西南方向，向近在咫尺的摩鹿加群岛驶去，而是毫无把握地兜着大圈朝西北方向走，然后又糊里糊涂地往回跑。整整半年的时光在毫无目的地乱闯中度过，一会儿驶向明登那奥，一会儿驶向婆罗洲。但是，比起这些盲目乱闯更加严重的是，失去天才的统帅使严明的纪律渐渐涣散。在麦哲伦的管理下，在陆上没有发生过抢劫事件，在海上也没有出现过海盗行为。船员们一个个都认认真真、严格遵守规章制度。麦哲伦时刻没有忘记，他肩负皇家海军上将之职，在远离国土的地球的另一端，他负有维护西班牙国旗荣

誉的责任。但是，那个卑鄙的小人卡尔瓦洛，是借助马克坦岛和赛布岛酋长之手杀害了他的前任之后，才登上海军上将这个宝座的。他根本不懂什么叫道德，他肆无忌惮地在海上进行抢掠，一路上碰见什么抢什么，甚至连一只小舢板也不放过，把它掳掠一空。卡尔瓦洛把从中所得的赎金毫不客气地统统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他无须向任何人报告，因为他自己既是会计，又是司库。在麦哲伦生前，从不允许让女人上船。而卡尔瓦洛先后从抢劫的小船上带了三个土著女人上船，他借口要把她们送给西班牙女王。这个新上任的帕夏，他的行为渐渐地引起了船员们的不满，因为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德勒·卡塔说：他关心的不是国王的事业，而是他自己的利益。因此，这位养情妇的帕夏很自然地被大家赶下台。代之以由"特立尼达号"船长戈梅茨·德·艾斯皮诺萨、"维多利亚号"船长塞巴斯蒂安·德勒·卡诺和被授予船队指挥官称号的舵手彭赛罗组成的三驾马车执政班子。

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摆脱不了原来那种毫无意义的兜圈子状况。在这片人口稠密地区，迷途的海员们通过交换货物和抢劫，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弄到食品，但麦哲伦大胆决定作这次远航的伟大任务却早已被他们抛之脑后。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们找到了逃出孙达群岛这个迷宫的出口。抢劫成性的人们，有一次截住了一条小船，他们从船上俘获了一个出生于德那地的人，他认识回他家乡的航路，也准确知道前往香料群岛怎样走，还认识麦哲伦的好友弗朗西斯科·谢兰，——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把他们带出迷宫的向导，最后的考验通过了。现在他们可以直接地朝目的地前进了。其实，他们几个星期以来，在毫无意义的转悠当中曾不止一次地在目的地的附近经过。如

今，他们只经过几天毫不费力的航行后，比六个月盲目乱闯更加接近目的地了。十一月六日，他们终于看见浮现在远方海面上的山峦，看见了德那地岛和第多雷岛的山顶了，极乐群岛就快到了。

毕加费塔在书中写道：陪同我们的领航员告诉我们，这里是摩鹿加群岛。我们大家一起向上帝表示谢意，鸣炮表达我们的感激心情。但是也用不着，对我们的幸运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为了寻找这个群岛，我们在海上仅差两天就整整度过了二十七个月的时光；为了这次寻索，在无数的小岛之中穿梭行驶，我们几乎游遍了所有的大洋。

一五二一年十一月八日，他们终于登上了第多雷岛。它是五个极乐小岛中的一个，也是麦哲伦一生向往的岛屿之一。正如死去的席德，被战友扶上忠实的战马夺取最后的胜利一样，麦哲伦的精神在他死后依然鞭策着人们去拯救他的事业。他的船、他的部下见到了那块如同莫泽斯曾经许诺过带他的随从去的那片乐土。然而他自己——船队的统帅——却命中注定来不到这个地方。还有那个在大洋彼岸向他召唤，给予他精神和行动上鼓励的人，弗朗西斯科·谢兰也已与世长辞了。麦哲伦如今也不能张开双臂去拥抱他走遍全球才找到的这位有许多朋友的朋友了。谢兰是在几周前死去的，据说是被毒死的。两位环球旅行思想的开创者用短暂的生命作代价换取了永垂不朽的英名。谢兰热情洋溢的描写，事实证明完全属实。这里不仅风景优美、自然资源丰富，而且这里的人和蔼善良。“对这个岛还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马克西米利安·特兰西勒瓦诺斯在他著名的信件中这样写道：“这里一切都是那样的纯朴，没有什么比和平、舒适和香料更有价值的了。在这个岛上最为宝贵的，也许是世界

上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和平。好像从我们那个世界被邪恶驱赶出来的人，在这里找到了藏身之地。“岛上的酋长，谢兰曾经是他的朋友和支持者，当即坐着凉篷抬轿赶来，盛情接待他的客人，把他们视若兄弟。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教徒，登船后还用手捂着鼻子，生怕闻着那令人厌恶的猪肉气味。但是，酋长阿勒曼索尔却以兄弟般的情谊一一拥抱这些基督教徒。“欢迎您们的到来，在海上漂泊了这么长的时间，历经这么多的艰难险阻，请好好享受一下岛上的舒适的生活；好好休息，不必有什么顾忌，就像在您们自己的国家一样。”酋长热情地对他们说。他诚心诚意地把西班牙国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这位善良的酋长与以往西班牙人所见到的酋长完全不同。那些人只是想着法子，尽可能地从西班牙人身上多捞点东西，而这位豁达的酋长却要求他们不要送他礼品，因为他：“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回赠他们。”

多么令人神往的岛屿啊！只要西班牙人想要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得到满足。最贵重的香料、食品和金粉。即使在本岛上没有的东西，热情的酋长会设法从邻近的岛上为你弄到。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水手们沉醉在无比欢乐之中。他们拼命地购买香料和一种极其珍贵的极乐鸟。水手们用衬衣、火枪、弓弩、大衣和皮带作交换，因为很快就要回去了。用如此低廉的价格买到这些宝贵的物品，一个个像大富豪，衣锦还乡。有些人甚至自愿仿效谢兰，永远留在这个人间天堂不走了。因此，在启航前宣布，两艘船中因为只有一艘比较坚实，可以经得起归途的风浪，为此，一百多名船员中有五十多人必须留在这个富饶的岛上，待另一艘船修好后再走。这样一个坏消息却出人意料地令相当一部分船员感到高兴。

那艘被留下的船是麦哲伦生前的一艘老旗舰“特立尼达号”。它首先驶离桑·卢卡尔港口；第一个通过麦哲伦海峡；第一个横渡太平洋；它总是走在船队的最前面，是船队向导，也是统帅意志的体现。如今，统帅离开了人世，它也不愿意继续前进了。就像一条忠实的犬守候在主人的坟前，不愿离去。“特立尼达号”在实现了麦哲伦为它所规定的目标后，也拒绝继续前进。装满淡水的水桶、食品、大量的香料都已经装到船上；圣地亚哥旗在迎风招展，旗上写着“这是我们顺利返航的保证”几个大字，帆也已经升起。突然，这艘破旧的船发出巨大的破裂声，海水涌进了船舱。人们来不及寻找漏洞，赶快卸货，以便把破船拖到岸上。但是，时间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故障依然不能排除。而另外一艘是前舰队留下来的惟一的一艘完好的船，它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现在正是刮东风的季节，麦哲伦用他的生命作代价实现了他的诺言。在我们出航后的第三年，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将把在西班牙国旗下，在世界航海史上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奇迹带回给西班牙国王。大家一致认为：待“特立尼达号”修复后，可尝试横渡太平洋，前往西班牙在海外的领地巴拿马；在此同时“维多利亚号”则利用顺风立即西行，穿过印度洋直接回国。

曾经在关键时刻，一度势不两立的两位船长——戈梅茨·德·艾斯皮诺萨和赛巴斯蒂安·德勒·卡诺正相视无言。他们在共同航行两年半后，现在要永远分手了。在那个令人终生难忘的尤利安港叛乱的夜晚，当时的枪械师戈梅茨·德·艾斯皮诺萨是麦哲伦的一位忠实助手。他当时用匕首果敢的一刺，拯救了“维多利亚号”，使它能继续航行。巴斯克人赛巴斯蒂安·德勒·卡诺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水手，那天夜里他也参与了哗

变。在他的积极鼓动下，叛乱人员占领了“圣安东尼奥号”。麦哲伦奖励戈梅茨·德·艾斯皮诺萨，表示对他的忠诚的答谢，并宽恕了背叛他的德勒·卡诺。如果命运公正的话，为了光荣地完成自己的伟大事业，它也应该挑选对麦哲伦计划起保证作用的艾斯皮诺萨。但是，宽容掩盖了公正，幸运却被赐给了一个受之有愧的人。在艾斯皮诺萨和“特立尼达号”上那些与之同甘共苦的兄弟们历经无尽的苦难和漂泊之后无声无息地死去，被不知感恩的历史所遗忘的时候，而那个曾经企图阻挠麦哲伦的伟大事业，反抗海军上将的叛乱者——赛巴斯蒂安·德勒·卡诺却成了在尘世间闪耀着永垂不朽光辉的星星。

在地球的另一端出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告别场面：四十七名船员——“维多利亚号”的军官和水手，他们奉命乘坐“维多利亚号”即将踏上归途；另外五十一名海员和“特立尼达号”继续留在特多雷岛上。直至起航前，留下来的人员一直在甲板上与他们的伙伴依依惜别。他们互相拥抱、相互祝贺，托付先期回去的人把信件带回给家人。两年半来共同肩负的重任早已把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全体船员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纷争，任何挑拨离间都不可能把他们分开。当“维多利亚号”起锚时，留下的人员仍然依依不舍，不愿离去。他们划着小艇、马来亚帆船紧紧跟着渐渐远去的大船，以便再多看一眼朝夕相处的兄弟们，多说几句知心的话。直至夜幕降临，双手已经觉得十分累了，他们才掉转船头。这时大船上大炮齐鸣，向留下的弟兄们表示最后的道别。随后，麦哲伦所留下的最后一艘完好的旗舰“维多利亚号”开始了它艰难的归程。

这样一艘在大海上漂泊了两年半，已经变得陈旧不堪的帆船，如今又要进行一次环绕半个地球的回程航行，堪称航海史上英雄的创举。德勒·卡诺决心要用他的光辉事迹来弥补对麦哲伦的过错，实现已故统帅未就的遗愿。乍看起来，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把船队从摩鹿加群岛带回西班牙——仿佛并不十分艰难。因为，自从进入了十六世纪，每年都有葡萄牙船队借助东南亚季风定期地往返于马来群岛和葡萄牙之间。十多年前，还属阿尔布开尔克和阿尔梅达统治时期，到印度去旅行，应该说是进入一个陌生之地，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而今只要熟识已经详细标明的航海路线就行了。起码在紧急的情况下，船队可以在印度、在非洲、在马六甲、莫三鼻给，或者佛得角等每一个停泊处都可以找到葡萄牙的代表、领航员和官员。在每一个停船站都有准备好了的补养食品和维修船只所需要的部件。但是，德勒·卡诺所面临的而又必须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他不但不能利用这些维修站和给养站，而且还必须远远地绕开它们。因为在前往第多雷岛时，麦哲伦的船员就从一个逃跑的葡萄牙人那里获悉，曼努埃尔国王曾经下令，拦截所有麦哲伦的船只，并把所有船员以海盗罪名扣押起来。事实上，“特立尼达号”上的不幸的伙伴们没有逃脱这一残酷的厄运。因此，德勒·卡诺不得不驾驶着那艘老态龙钟、被蛀虫咬得千疮百孔的、满载货物的船只拼命励力一口气穿过印度洋；然后绕过好望角和整个非洲，中途一次也不能停泊。而在三年前，当他们还在塞维利亚港的时候，阿尔瓦列茨领事就曾经对他们说过，他不敢乘这样的船到卡那利群岛去。风险之大，只要在地图上略略查看一下，就一目了然了。就是在四百年后的今天，对装备有现代化机器的轮船来说，也称得上空前的冒险行动。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航行；似威武的雄狮从马来群岛一跃跳到塞维利亚。他们于一五二二年二月十三日从帝汶岛一个港口出发，这一天也成了值得纪念的日子。德勒·卡诺在那里再次补充食品和淡水，重温已故统帅有关小心谨慎的教导。为迎接即将面临的连续几个月与狂风巨浪的搏击，他们对船进行了彻底的检修、填补漏洞。在出发后的最初几天，“维多利亚号”驶经一些岛屿，海员们还能看见远处模糊的岛上一片片绿色的热带植物和高耸的山峦。但是，时节已晚，德勒·卡诺必须抓紧机会，借助东风，马不停蹄地往前赶。因此，“维多利亚号”只能从那些风景秀丽的岛屿旁边擦身而过，从未停留。这使无比好奇的毕加费塔感到十分遗憾，“神奇美妙的东西”对他来说总是百看不厌的。为了打发时间，他要求那些被抓到船上的土著人（船上一共有十九名土著人和四十七名欧洲人）给他讲述那些笼罩在朦胧中的岛屿上的情况。于是，那些黑人便给他讲起了那些奇妙的一千零一夜的童话故事：居住在对面岛上的居民，个个不足半尺高，而他的耳朵却足足有他们的身子那样长。睡觉时可把一只耳朵当席子，另一只耳朵当被子。这个岛上只有女人，男人不准到该岛上去，但是，她们照样会怀孕，生儿育女，也许是海风吹来的吧！她们把生下的男孩子都杀死，留下女孩，并把她们养育成人。渐渐地所有的岛屿都消失在蓝色的微雾之中。马来人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愚弄善良的毕加费塔了。只有无边无际的大海包围着航船。单调的蓝色令人感到无比的孤独和惆怅。一连几周，他们在空寂的印度洋上漂泊，海员们所见到的只是蓝天和大海，平淡无奇一成不变的景色给人一种难以承受的压抑，没有游人，没有航船，也没有风帆；听不见一点儿声音。极目远眺，有的只是空荡荡的遥无边际的蓝

色的海面。

他们一连几个星期没有听见过陌生的声音，没有见过一张陌生的面孔。但是，从船的深处突然冒出一个熟悉的、又老又丑的怪物来。深深的眼窝，骨瘦如柴——它就是饥饿。饥饿是他们在太平洋航行时一个可怕而又忠实的伴侣。一个残酷无情的折磨者，一个杀害亲密伙伴们的刽子手；它又偷偷摸摸地钻到船上来了，因为它现在又出现在他们中间。它不怀好意地、凶残地、脸上暗藏着阴险恶毒的微笑凝视着他们。船员们一张张惊惶失措的脸孔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降临了。它打破了德勒·卡诺的如意算盘。尽管船员们储备好了足够在海上五个月的食品，首先是充足的肉类。但是，他们在帝汶岛没有弄到食盐，因此未经完全晾干的猪肉在印度洋灼人的阳光下很快就变质、腐烂了。为了躲避腐烂的猪肉发出的那股难闻的气味，他们不得不把全部储藏的猪肉抛到大海里，只剩下大米和水。除了米和水还是米和水，这是他们惟一的聊以生存的食品。随着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大米和水也越来越少了，而且淡水也变得越来越浑浊。坏血病再次出现，船员中开始有人死于该病。灾难在五月份最为可怕，部分船员因此要求船长把船开到附近的莫三鼻给休整一段时间。宁可把船交给那里的葡萄牙人，也不要继续航行，免得无辜地被活活饿死。

但是，这艘船传给昔日的叛乱者除了指挥权外，还有麦哲伦钢铁般的意志。同是那个德勒·卡诺，当年他还是一个下级时，曾试图迫使指挥官们下台。现在自己当了指挥官，却要求大家做出最大的努力，拿出最大的勇气，去战胜困难，共渡难关。他成功地使全体船员服从自己的意志。“我们发誓，宁可饿死也不把自己拱手送给葡萄牙人。”这是他日后引以为豪的向皇

上报告时说的一句话。他们在此期间曾试图在非洲的东海岸登陆，但没有成功。在这块不毛之地，他们既找不到水，又找不到水果，令人难于忍受的痛苦一点儿也没有减轻。因此不得不继续前进。在好望角——他们不由自主地把它称之为“风暴之角”——附近他们遇上了一场特大的风暴，前桅杆被刮断，主桅杆也出现了裂痕。疲惫不堪的水手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免强把损坏部分修复。大船像一个重伤员似的，吃力地、缓慢地伴随着吱吱的响声，沿着非洲海岸向北驶去。然而，不管狂风巨浪，还是风平浪静，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饥饿时刻不停地折腾着他们。这个灰色的魔鬼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朝着他们冷笑。这一回它采用了一种新的更加可怕的方法折磨他们。对这些横越太平洋的航海者们来说，这一回不同以往。以前在太平洋上航行，船舱里总是空荡荡的，一点东西也没有。而今船肚子里塞得满满的，几乎都快溢出来了。“维多利亚号”载着七百公担的香料。七百公担啊！它足够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作精美佳肴的调料。饥饿难熬的船员们本可尽量地吃，但是，难道能用干燥的嘴唇去咀嚼那坚硬的胡椒粒吗？难道能用加工香料的桂皮和肉豆蔻来代替面包吗？如果说在浩瀚的大海被活活渴死是多么带有讽刺意义的事，那么，在“维多利亚号”船上，面对堆积如山的香料却受饥饿所困惑，被活活饿死，该是最可怕的折磨了。每天都有憔悴的尸体被抛进大海。当这艘疲惫不堪的大船经过五个月不停顿地行驶，在七月九日到达佛得角群岛附近的时候，船上四十七名西班牙人这时只剩下三十一人，原来十九名土著人也只有三人还活着。

佛得角群岛是葡萄牙殖民地。葡萄牙人的一个海港就坐落在圣地亚哥移民区，在这里抛锚停泊，实际上等于向自己的对

手和敌人束手就擒，等于离目的地只有咫尺之遥的地方投降。然而，船上的食品最多只能继续维持二至三天。饥饿不允许他们做出别的选择，迫使他们壮着胆子去行骗一回。德勒·卡诺决意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迷惑葡萄牙人，让他们认不出与他们打交道的是些什么人。但是，当他派遣几个人上岸去购买食物时，他还是郑重其事地要求他们发誓，绝不向葡萄牙人泄露，他们是麦哲伦手下的幸存者，并完成了环球航行。船员们只能谎称：一场飓风把他们的船从美洲，即是说从西班牙统治区域吹到这里来的。桅杆被刮断，船体受破坏。幸运的是，这番编造出来的谎言竟然使葡萄牙人深信无疑。他们没有过多的查问，也没有派官员上船检查，便以海员特有的热情，友好地接待了靠岸的小船。他们马上提供给西班牙人淡水和新鲜的食品。小船一次、二次、三次满载着食品往返于陆地与大船之间。这条锦囊妙计眼看即将大功告成。休息，而更主要的是久已不见食物的船员们，见到猪肉和面包，精神顿时为之一振。储备的粮食足够他们吃到塞维利亚。德勒·卡诺只要再派最后一次船去运一些大米和水果，就可以继续前进了。真正走向胜利！走向胜利！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一回小船一去不复返。德勒·卡诺马上意识到出事了。水手们一定有人在岸上走漏了风声；要不就是有人想用香料换取船员们久已未喝过的烧酒；因此，葡萄牙人识破那船是他们的宿敌麦哲伦的船只。这时德勒·卡诺已发现，岸上的人正在准备船具前来扣留他们。只有果敢的决定才能拯救这次远航的成功。那就是抛弃在岸上的那几个人，迅速离开这里！决不能在离目的地只有咫尺之遥的地方被扣下，坚决地去完成历史上最伟大的航行！尽管这时“维多利亚号”船上只有十八个人。这么几个人，要把一条破船开回西班牙也许

是太少了。但是，德勒·卡诺还是下令起锚升帆。确切地说，这是一次逃亡，但这是一次通向伟大的、决定性胜利的大逃亡。

尽管在佛得角的逗留是那样的短暂和危险。但是，正是在这个地方毕加费塔这位正直善良的编年史学家在最关键时刻亲身经历了这一奇迹。也正是为此目的他才参加这次航海探险的。因为在佛得角他第一次观察到了一种令他终生都觉得新奇和重要并为之而毕生求索的现象。登陆上岸采购食品的船员们带回来了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消息。在岸上，那天明明是星期四，而回到船上，大家都十分肯定地说那天是星期三。毕加费塔也感到十分奇怪。因为在海上长达三年的航行过程中，他日复一日，每天都详细地记日记，从未中断过。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直到一周结束，周而复始。他不断地往下数着，整年如此，难道他漏了一天？他去问每天都写航海日志的舵手阿勒沃，结果那天也是星期三。不断地西行，不知为什么这些航海家们竟会让日历上的日期在眼皮底下溜走了一天。毕加费塔日后有关这一奇特现象的报导，令全世界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感到震惊。无论是希腊的学者们，还是其他地区的天体学家和数学家们都弄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多亏麦哲伦的推动才发现了这一秘密。公元前四百年，赫拉克利特·范·彭杜斯提出的假设，如今通过一个精确的观测得到了证实：地球在太空中并非静止不动，而是绕着自己的中轴作匀速旋转运动。而随着它的轨迹西行的人，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中可以多获得点滴的时间。对于这种在地球上不同的地区，它的时间和钟点不尽相同的新的认识，这一真理曾经使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如同今天人们对相对论一样激动不已。彼得·马尔蒂尔马上请来一位“哲人”，请他

解释这一现象。然后向皇上和教皇作了报告。就这样，在其他人这次旅行中带回来一大堆香料的时候，这位荣获罗德士十字勋章的小个子骑士带回来的却是世上无价之宝：一个新的发现！

但是，这艘船还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维多利亚号”还在艰难地、慢吞吞地在大海上移动着它那衰惫不堪的身子，竭尽全力抗击着狂风巨浪。从香料岛出发，如今活下来的只有十八个人，原先一百二十只手干的活，现在必须由三十六只手来完成。这时它多么需要强有力的手啊！因为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又遇上了一场灾难。陈旧单薄的船体，木板一块一块松脱开来，海水从不断增大的裂缝中涌进船舱里。起初人们想用抽水器把水抽掉，但漏洞太大，无法抽干。这时不得不把七百公担的香料中的一部分作为多余的东西抛到海里，以便减轻船的负重。但是，德勒·卡诺还是不想让皇上的财产白白地受到损失，他让船员们日夜不停地轮流守候在两台抽水器旁边，这真称得上是最繁重的苦役了；与此同时船员们还得收帆、掌舵、瞭望和料理无穷无尽的日常事务。渐渐地船员们一个个精疲力竭，一连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一个个像梦游者似的摇摇晃晃，蹒跚地走向自己的岗位。德勒·卡诺在写给皇上的信中说道：“船员们衰弱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还必须完成双倍甚至三倍的工作。他们用最后一点力气拼命地干，因为他们很清楚，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七月十三日他们十八位勇士从佛得角出发。一五二二年九月四日（他们离开祖国将近三年了）终于从桅篮上传来了嘶哑的欢呼声：他们见到文森特角了！文森特角对我们来说是欧洲大陆的终点；但对他们——环球航行的旅行者来说，这里才是欧洲的始端，家乡就是在这里开始的。陡峭的岩石从海潮中慢慢地升起，与此同时他们的勇气也随之不断增强。前

进！前进！只要再坚持二天二夜，再坚持一天二夜、一天一夜，还有一夜，只有一夜了！终于，他们都跑到甲板上，他们拥挤在一起，高兴得说不出话来。远处，一条银色的带子出现在陆地的中间。那是瓜达勒奎维尔河。它从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流入大海。这里是三年前他们在麦哲伦的率领下，总共二百六十五人，分乘五艘大船的出发地点。如今他们只驾驶着一艘最小的船回来，并且在同一地点停泊。十八个人蹒跚地从船上走下来，一下子跪倒在地上，忘情地吻着祖国那坚实的、富饶的、吉祥的土地。多少年来，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创举就是在这一天——一五二二年九月六日完成的。

德勒·卡诺登岸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向皇上报告这个伟大的喜讯；而他的下属则个个贪婪地抓起欢迎的人们向他们递过来的还冒着热气的新鲜面包。他们已经好久连摸也没有摸过这样又松软又可口的大圆面包了；几年没尝过家乡的美酒、鲜肉和水果。前来迎接的人惊奇地盯着他们，仿佛他们是从地府里归来似的，真不敢相信这一奇迹。还没有待他们吃饱喝足，便纷纷倒在席子上睡着了。他们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通宵。几年来头一回睡了个安稳觉，他们的心第一次与家乡相贴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另一艘船把凯旋归来的“维多利亚号”沿瓜达勒奎维尔河拖向塞维利亚——完成了环球旅行的它，自己这时已无能为力逆流而上了。沿途遇见许多舢板和小船，人们以惊奇的目光目送着它，向它招呼致意。没有人认得出这就是几年前飘洋过海的那艘”维多利亚号”。塞维利来、西班牙、甚至全世界早就以为麦哲伦的船队沉到海底里去了，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看！那船虽然行走得很吃力，但胜利而归的它多么

自豪地前往参加凯旋的盛典!终于,白色的钟楼在前方闪现——塞维利亚!塞维利亚!波尔托·德·拉斯·米拉斯港——这个他们从这里离开的港口,现在又在向他们招手了。德勒·卡诺下令:“鸣放臼炮!”这是这次远航中的最后一道命令。这时一阵隆隆的炮声掠过河面;三年前他们也是在这样的隆隆的炮声中告别自己的家乡;也曾以隆隆的炮声庆贺麦哲伦海峡的发现;以这样的形式向神秘的太平洋致敬;以这样的形式欢呼胜利;当他们发现陌生的菲律宾群岛时;当他们到达麦哲伦确定的目的地——香料群岛时,也是以这种雷鸣般的欢呼来宣告他们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在蒂多雷岛他们以这种方式向被迫留在危险的远方的姐妹船上的弟兄们告别。但是,那声音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响亮,这样欢快。因为这炮声宣告:“我们回来了!我们完成了前人从未干过的事业!我们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环游地球的人!”

陈秀琼　曾加耀　译

死去的人总是有错的

塞维利亚市民们人声鼎沸地聚集在海边，正如奥维杜说的那样，惊奇地想看一看这独一无二，享有盛誉的船只，它的航行表明了自上帝创造世界和第一个人以来，第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人们曾经所看到过的最伟大的事件。市民们震惊地凝视着十八名海员如何离开了“维多利亚号”，他们徒步，摇摇晃晃，举步维艰，一个接着一个踏上了陆地，他们显得虚弱，消瘦，倦怠，一派病态，精疲力竭，摇摆不定地向前移动着脚步，这些无名的英雄，经历了三年没完没了的海上生涯，几乎苍老了十岁。欢呼和同情同时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包围着。人们给他们提供食品，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强烈要求他们讲述一下冒险的经历和所受的痛苦。可是这些归来的海员们都拒绝了。往后再谈这一切吧！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履

行他们在生死攸关的危险时刻所许下的诺言：就是去维多利亚圣玛利亚和圣玛利亚安蒂果亚教堂忏悔！市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默默而虔诚地排列道路两旁，形成了空巷，看着这十八名幸存的海员，赤着脚，穿着垂危病人的白色衬衣，手持点燃的蜡烛，向教堂走去，在他们曾告别祖国的地方，感谢上帝所给予的喜出望外的恩赐，上帝拯救他们脱离了困境，让他们回到了故乡。风琴又在耳边响了起来，神甫又在昏暗的大教堂里跪在地上的人们头上举起圣饼盒，就像是举起一个光华夺目的小太阳似的。人们感谢万能的神及其圣徒们对自己的拯救，水手们还为三年前在这儿与他们一起跪拜祈祷的兄弟伙伴们的灵魂做了安息祈祷。当年曾看着国王赐给的，并经神甫祝福的接过丝绸旗帜的麦哲伦的人，他们现在又在何处呢？有的人已葬身大海，有的已被印第安人杀死，还有饿死的，渴死的，下落不明的或是被俘的。只有他们，难以预测地碰上了好运，凯旋回来了，命运赐福给他们。这十八个人嘴唇颤动，轻声地为死去的首领、为这支舰队的二百名死难船员的灵魂安息祈祷。

这时，他们幸运归来的消息激烈震荡在整个欧洲，首先唤起一阵极度的惊讶，继而是莫名钦羡赞赏。自从哥伦布航行以来，还没有一件事使当代世界受到如此鼓舞。什么缺乏信心已不复存在了。怀疑，这人类知识的大敌在地理上正被战胜。自从一只船从塞维利亚港口开出去，径直向着一个方向航行，又会回到塞维利亚港口，已无可辩驳地证实，地球是一个不停转动的圆球，所有的海洋是一片连成一体的海域。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宇宙学最终被战胜，抛在身后了，教会的异议和一些无稽之谈永远被人抛开了。地球的大小被确定下来了，认识了地球的规格，其他大胆的探险家将来还会补充有关这个星球的一些

详情细节，可是地球是圆形，这已被麦哲伦确定下来了，他的测定直到今天或是遥远的未来，都是永远不变的。现在地球是一个确定界线的地域，人类已战胜了它。随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西班牙民族从此无比豪迈，骄傲地站了起来。哥伦布在西班牙的旗帜下开始了发现新大陆的事业，麦哲伦在西班牙的旗帜下完成了这一大业。人类四分之一世纪对自己居住的星球的了解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几十年。这一转折耗去整整一生的时光，为这一转折感到幸福而陶醉的一代人无意中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纪元开始了。

这次航行在精神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广泛地鼓舞着人们。甚至为船队提供装备的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和克里斯托夫尔·德·阿罗情绪也很饱满，他们原本想把为这一艘船花掉的八百万马拉维第写进亏损栏里，现在突然这艘归来的船不仅收回了全部支出，而且还带来了想象不到的盈余。“维多利亚号”从摩鹿加群岛上带回的五百二十担（约合二十六吨）香料，除了全部费用外，还有约五百杜卡特金币的纯利润，这一艘船上的货物完全可以弥补其他四艘船的损失——毫无疑问，二百条人命的代价几乎等于零。

在整个宇宙中只有那十几个人，在他们得知：麦哲伦舰队的一条船环球航行，现已平安地回国了，突然，他们害怕得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他们是几位哗变的船长和舵手，驾驶着“圣安东尼奥号”开小差逃跑了，一年前就已到达塞维利亚，离船登陆了。

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犹如丧钟一般地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他们早就指望着，危险的证人和指控人再也不会回到西班牙，因而在法院记录中给这些勇敢的远航船员们开了死亡证明（据他

们的主观判断，麦哲伦是不可能再回到卡斯蒂利亚了)。他们肯定认为，几条船和所有船员早就烂在海洋底下了。因而他们面对国王的调查委员会竟然无忧无虑地把他们的叛变行径吹嘘成爱国行为。有意隐瞒在他们离开麦哲伦的关键时刻，麦哲伦已经发现了海峡。他们只是提了一下，说什么他们曾驶进了一个海湾，并说麦哲伦所寻找的路是既无目的也毫无作用。他们对缺席的麦哲伦肆无忌惮地控告着，说他故意让舰队落到葡萄牙人手里，他狠毒地谋杀了国王的亲信人员，他们逮住了麦哲伦暗自带上船的表兄弟麦斯基达，他们这才拯救了自己的船。

无疑，国王的法庭并没完全相信叛乱者的证词。他们持着不偏不倚的值得赞许的态度，宣称双方都有可疑之处，把几个哗变的船长、舵手和忠诚的麦斯基达都关进了监狱。就连麦哲伦的妻子——她还不知道,自己已成了寡妇——也受到软禁,不能离开这坐城市。国王的法庭做出决定，人们应当等待其他几艘船和海军上将回来作证。可是已过去一年了，第二年几乎也没听到麦哲伦的消息，叛乱者们又变得得意起来。这时礼炮隆隆，这炮声报道了一条麦哲伦的船回来了，炮声谴责着他们的良心。现在他们完蛋了。麦哲伦的大业完成了，他将狠狠地报复那些违背誓言和航海规则、胆怯地离开他，并且叛逆地给他的船长戴上手铐的人。

可是当他们得知，麦哲伦已经死了，这样一来，他们又松了一口气。主控人无法说话了。他们一得知，是德尔·卡诺指挥着“维多利亚号”回国，他们又感到更加笃定。德尔·卡诺曾是他们的同伙,那天夜晚在圣尤利安港口跟他们一起叛变的!这个人不可能控告他们犯法的，因为他本人也犯法了。他不会反对他们，只会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作证的。因此，麦哲伦

的死，德尔·卡诺的证词可谓苍天赐福！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对了。麦斯基达虽然从监狱里放了出来，甚至还得到了赔偿。可是鉴于德尔·卡诺的帮助，他们也未受惩罚就离开了监狱。随着一片欢腾，他们的叛乱已置诸遗忘了，活人跟死人打官司，到头来总是活人有理。

这当儿，德尔·卡诺的特急使者把平安归来的消息送到了瓦利亚多里德城。查理皇帝刚从德国回来；他在沃尔姆斯亲眼看到了，路德如何果敢地一举永远粉碎了教会的精神一致。在这儿他又得知，另一个人同时把过去对地球的认识重新改变过来，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证明海洋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迫不及待地要了解这件光辉业绩的来龙去脉——因为他曾亲自一同参与这一业绩的构想，这业绩或许是他见过的最完美的，最永恒的壮举，于是，在九月十三日当天，皇帝便命令德尔·卡诺尽快偕同两名久经考验和最精明的人进宫，并把有关此次航行的全部资料带来。

德尔·卡诺带到瓦利亚多里德城的两个人是毕加费塔和舵手阿尔瓦罗，这两人可谓是经受过考验的人。皇帝的另一个愿望，要他亲手把舰队的所有资料交给他，这一点德尔·卡诺做得含糊，他的办事态度引起了一些怀疑，因为德尔·卡诺并没交出麦哲伦亲手写的任何一行字（麦哲伦航行期间亲手草拟的惟一文件之所以保存下来，是因为它和“特立尼达号”一起落入了葡萄牙人手中）。有谁能怀疑，麦哲伦这样精细、热衷于工作的，意识到自己任务重要的人不每天写日记呢。只可能是心怀嫉妒的家伙暗地里把它销毁了。想必是那些在航行途中反对他们长官的人意识到，一旦皇帝得到那些品质恶劣的行为的公

正材料，这对他们是太危险了。就因为如此，所以在麦哲伦死后，他的每一行手迹全都神秘地无影无踪了。毕加费塔亲手记的那一大本笔记也不见了，确是令人费解，这次晋见时，他亲自把亲手写的原稿呈交给了皇帝。真实的日记无论如何都不能跟我们后来见到的那本旅行记混为一谈，显然，这本旅行记只不过是真实记录的摘录，实际上现在涉及到两份不同的材料，这已被曼图亚大使的报告所证实。这位大使在十月二十一日谈到了毕加费塔逐日所作的日记，三星期后他将从中做出简短的摘要——这就是我今天所说的毕加费塔的报道，只是不完备地补充了不同舵手的笔记，并补进了彼得·马尔蒂尔和马克西尼安·特朗西瓦鲁斯的信函。毕加费塔亲手写的日记消失得无影无踪，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只能猜测，显然，为了显示这位巴斯克贵族德尔·卡诺 的胜利，有关西班牙军官反对葡萄牙人麦哲伦的报道，事后避而不谈。在这儿就像历史上经常有的那样：民族虚荣心压倒了正义感。

忠诚的毕加费塔对如此有意贬低麦哲伦的做法非常生气。他觉得在这儿一切都是用错误的砝码来衡量的。世界只奖赏有幸把事业进行到底的人，可是它却把所有那些用自己精神和鲜血使事业成为可能的人忘得一干二净。这一次的做法特别不公正，令人气愤。恰恰是在关键时刻要阻碍麦哲伦创建业绩的这个家伙，这个曾经叛变过麦哲伦的塞巴斯蒂昂·德尔·卡诺却捞到了所有的光荣、荣誉和头衔。早先他就有不法行为（就因为犯法他才躲避到麦哲伦船上的），把一条船卖给一个外国人，但却宣布退赔了，并给他终身享受五百杜卡特金币的退休金。皇帝授予他骑士头衔和一枚徽标，鲜明地标志着德尔·卡诺完成了不朽事业。两枝交叉的肉桂和豆蔻和丁香花在徽标的中央，徽

标的上方是一顶头盔，盔上是一个地球，四周题着令人自豪的话语："你第一个绕我航行了一周"。尤为不公正的是那个艾斯特瓦奥·戈麦斯也得了奖，其实他在麦哲伦海峡开了小差，可是在塞维利亚法庭面前却振振有词地说，并没发现海峡，只不过是一个宽阔的港湾。正是他，这个恬不知耻地否定了麦哲伦发现的艾斯特瓦奥·戈麦斯也因"作为长官和主舵手发现了海峡"这一所谓功劳而获得贵族称号。麦哲伦的全部荣誉，一切功劳完全算到了在航行中顽固地试图阻碍麦哲伦毕生事业的那些人身上。

毕加费塔陷入沉默，思考之中。这个早先单纯轻信、无比忠诚的青年人第一次感觉到，永恒的不公平充满着我们世界。于是他悄悄地离去了，"我要尽快地离去"。让宫廷里那些谄媚的臣仆避口不提麦哲伦吧。让那些没有资格的家伙挤到前面去把属于麦哲伦的荣誉据为己有吧——他知道，这次不朽的业绩是谁的设想，是谁创造，是谁的功劳，在皇宫里也没法说话，可是为了正义的缘故，他决心，要向后代人颂扬这位被人忘记了的伟大的人。他在返航的描写中，一句话也没提到德尔·卡诺的名字。他只是写着："我们航行""我们决定"，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德尔·卡诺所做的并不比其他的人多。让宫廷去奖赏那个偶然取得成功的人吧，只有麦哲伦才应享有真正的荣誉，可是已无法再给他任何荣誉了。毕加费塔怀着无比动人的忠诚站在失败者一边，用雄辩的证词为这位永远沉默的人的权利辩护。"我希望。"毕加费塔把自己的书送给罗德骑士团首领，在献词中写道，"一个如此高尚的船长的荣誉将永垂青史。在许许多多使他增添光彩的美德中，有一点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在危难的时刻，他总是大伙当中最坚强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更能忍

受饥饿。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像他懂得那么多地图和航海知识。人们从中看出了，他实现了：在他之前谁都不敢想、不敢做的事业，这是千真万确的。”

只有死亡才能解开一个人的生活最后奥秘。只有在他的思想胜利实现的最后时刻，这个孤独人的内在悲剧才显而易见，一直只允许这个孤独的人，肩负重担，从来也不为任务的最终完成而欣喜。只是为了创造业绩，命运才从千百万群众中选出了这个深沉、沉默、内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准备着，牺牲自己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命运召唤他来从事不喜欢的工作，而不是做乐意的事，由于事业的完成，命运就把他像一个短工一样地打发走了，没有感谢也没有恩赐。是别人夺取了他的荣誉，是别人获取了金钱，也还是别人去参加庆功会。命运总是对这个严格的军人采取一种严格的敌视态度，无论他在一切事务中，对所有人的情况如何。命运允许他做的，只是他倾注全部精力所做的事：发现环绕地球的路。遗憾的是并没让他胜利归来，没能让他享受自己的业绩带给他的幸福。他只能看一看，摸一摸胜利的桂冠，他想把它戴到头上，命运之神却说：“够了。”他只好放下了那只渴望举起的手。

赐予麦哲伦只有这一件，这惟一的一件，就是业绩本身，而不是它的金灿灿的征兆——一时的荣誉。因此，在他毕生的理想变成现实时，没有什么比再次浏览麦哲伦的遗嘱更震撼人心了。他在起航出发的那一个时刻所期求的一切，全都被命运拒绝了。他在“合同”里为自己本人和自己的亲人们争取的东西，全不属于他所有。他在自己的最后遗愿里那么小心谨慎从容不迫地立下的所有嘱咐，在他英勇牺牲之后，竟然没有一项在他

的后代身上兑现，他的每一次，甚至是最清白、最纯正、最虔诚的愿望都无情地遭到了阻挠。麦哲伦曾叮嘱，把他的遗体埋葬在塞维利亚教堂里，可是他的尸体却腐烂在异国他乡的海边。本应在他的棺材旁作三十次弥撒，可是围绕着他那饱受耻辱，被弄得残缺不全的尸体四周却是西拉普的乌合之众的得意叫喊。在他安葬的那一天，本应把衣服和食物分赠给三个穷人，可是并没有一个人得到鞋子和灰色的大衣和一点干粮。没有人来，连最穷的乞丐也没来，为“保佑他的灵魂祈祷”。他要赠送给神圣的十字军远征的列阿利银币①，给囚犯的施舍，给修道院和养老院的捐助，全都没有兑现。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人来实现他的遗嘱。他的伙伴们本应把他的遗体带回家园的，可是却没有钱给他买裹尸布。

麦哲伦的继承人也没成为富翁吗？根据合同难道不能给他的后代以所有利润的五分之一吗？他的遗孀难道没有成为塞维利亚的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吗？他的儿子、孙子、曾孙不是贵族，不是他新发现的那些岛屿的世袭总督吗？没有，没有人继承麦哲伦的遗产，因为他的亲属都已不在人世了，不可能继承他的遗产了。在那三年中他的夫人彼亚特里丝和未成年的儿子都在他之后相继去世了，麦哲伦家族一下子断了后嗣。没有兄弟，没有侄儿，连同族人也没有留在人世，继承他的族徽。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留下，连一个人也没有留下啊！这个贵族操劳一世，这个作丈夫作父亲的苦心，这个笃信上帝的基督教徒的虔诚愿望全都属于徒劳。惟一只有他的岳父巴尔波查比麦哲伦活得更久，可是他要咒骂那一天，就是那一天这个摸不透

①古代银币名。——译注

的客人，这个漂泊的水手踏进了他的家门，娶走了他的女儿，现在他已经离开人世了。他把他惟一的儿子也带到海上去了，而且不再会回来了。不幸的可怕氛围团团围住了这个人！谁要是成了他的朋友和支持者，他就会把他拖进阴森可怕的境地，谁要是信赖他，他就会遭殃。他的业绩像吸血鬼似地使所有围绕他，支持他的人的幸福的生命突然消失。法莱罗，他从前的同伙一回到葡萄牙，就被关进监狱，那个为他开辟道路的阿朗达由于卷进了该死的案件审理，而失去了他大胆赞助麦哲伦的所有钱财。恩利柯，他曾答应让他自由，现在他又被人看作奴隶了。他的表兄麦斯基塔，由于他忠诚于麦哲伦，三次被戴上镣铐，巴尔波查和谢兰在麦哲伦死后三天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像他一样死去。只有塞巴斯蒂昂·德尔·卡诺与众不同，他把已故忠诚战友们的一切荣光和所有利润完全占为己有。

更悲惨的是：麦哲伦牺牲一切，甚至献出生命所建立的业绩，看起来全属徒劳。麦哲伦要为西班牙获得香料群岛，他正是为此付出了生命，可是他的英雄创举所开拓的事业，竟然以微不足道的商业交易而告终：查理皇帝以三十五万杜卡特金币重又把摩鹿加群岛卖给了葡萄牙。麦哲伦发现通向西方的航路，几乎没有被人们继续利用，他所开辟的海峡通道，既没有带来金钱，也没有带来利润。在麦哲伦逝世后，灾难依旧追随那些仍然相信麦哲伦的人。几乎所有试图重创航海家麦哲伦英雄业绩的西班牙舰队，都在麦哲伦海峡遇难了。航海家们一个个胆战心惊地避开它，西班牙人宁肯结成长长的商队，拖着他们的货物，越过巴拿马狭窄地带，也不敢进入阴暗的巴塔戈尼亚狭窄的海湾。最终，全世界曾热烈欢呼所发现的麦哲伦海峡，由于它的危险又完全被人们所唾弃了，以致在同一代人的心目中

就已完全置诸遗忘，像以前一样重又成为神话。在麦哲伦驶过海峡三十八年之后，在一首名叫《阿劳卡拉》的著名诗歌中，公然说出了：麦哲伦海峡已不复存在，它已经找不到，已经不能通行了，不知是一座高山，还是一座小岛，隔断了它的航道。这首著名的诗歌是：

“这条曾经发现过的秘密水道
如今面对它，却似云雾缭绕。
有时它成了海员们的严重误导，
时而又像是一座孤岛，
面对着大海狂涛，
守着洞口放哨。”

因此，人们就不再注意这个海峡，它变成了一个传奇性的地带。五十年以后一个冒失的海盗名叫弗朗西斯·德雷克竟利用它作为藏身的安全窝，他像苍鹰一样从那里冲出，袭击西海岸的西班牙殖民，掠夺满载白银的船队。后来，西班牙人才又想起，那儿有一条麦哲伦海峡，为了防止海盗通过，连忙筑起了一座堡垒。可是每一个走麦哲伦海峡的人都遭到不幸。萨尔米恩图受国王委托，率领着舰队进入海峡，这支舰队撞毁了，他所建起的堡垒后来也彻底地土崩瓦解了。它的名字，饥饿的海港使人想起它的垦殖者的饿死的惨状。打自那时以后，有几艘捕鲸船，时而也有一艘大胆的帆船经常航行过麦哲伦所梦想的海峡，它或许会成为从欧洲通向东方的巨大商业通道。可是，当威尔逊总统于一九一三年秋季的一天在华盛顿按动电钮，打开了巴拿马运河的船闸，从此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大水域就永远

地联结在一起，麦哲伦海峡从此就完全是多余的了。最终它的命运就无可挽回地决定了。这条海峡的地位下降了，变成了一个纯历史、纯地理的概念了。这个人们长期探寻的海峡并没成为千万条船只的通道，也没有成为通往印度的最近最便捷的道路，发现它之后并没有使西班牙更加富裕起来，也没有使欧洲更强大起来。在巴塔戈尼亚和火地岛之间，这段海岸被列为全球有人烟的地区的最荒凉，最贫瘠的地带。

可是历史上一个伟大功绩的道义价值，从来并非由它的实际用途所决定。只有那些增强人类知识，加强其创造意识的人，才会持久地使人类丰富起来。就这一意义来说，麦哲伦的业绩超过了他同时代人的任何功绩。我们认为，麦哲伦的荣誉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像大多数领袖人物，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不惜牺牲成千上万人的性命，牺牲的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性命。为了这样一段真实历史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五艘陈旧、孤独的小船这一卓绝的壮举：投身于人类反对神秘莫测的神圣战斗，大伙将永远记住他，他的英名万古长存。他作为第一个人大胆设想要环球航行，并由他的船队的最后一艘实现了他的理想。因为人类尽管几千年来一直在探索地球的体积，但都没有成功，这一下可是第一次了解了自己新的力量，被征服的浩瀚的宇宙，帮助人类重新振奋而勇敢地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一个人要想成为后世楷模，他就得有自己的壮举，要是说起业绩，那么几乎被人们遗忘的麦哲伦业绩将永远证明：思想，一旦受到天才的激励，并满腔热情坚定地推动它前进，会证实它胜过自然界的任何力量，一个人凭着自己短暂的一生，能够把几百代人的梦想变成现实，变成永恒的真理。

魏家国　译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茨威格文集　　5　　传记卷·下
作者=高中甫主编
页数=393
SS号=10454291
出版日期=1998年